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九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 桦 主编

第九卷

后清篇目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战前的国内外形势与禁烟运动	(1)
一、战前的中国与世界	(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	(1)
清朝在闭关锁国政策中落后于世界潮流	(3)
二、中英贸易与鸦片走私	(7)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	(7)
鸦片泛滥	(10)
三、林则徐禁烟	(14)
第二节 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	(17)
一、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17)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7)
战争的第一阶段	(19)
战争的第二阶段	(21)
战争的第三阶段	(24)
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	(33)
三元里抗英	(33)

大江南北的群众自发抗英斗争	(40)
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	(43)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6)
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46)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46)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49)
二、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50)
战后社会经济的变化	(50)
战后思想、学风的变化	(56)

第二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63)
一、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激化	(63)
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早期活动	(64)
第二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	(69)
一、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	(69)
二、清政府的疯狂反扑	(73)
三、太平军北伐、西征	(77)
第三节 太平天国前期的制度和政策	(81)
一、《天朝田亩制度》	(81)
二、巩固政权的各项措施	(83)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89)
一、英法联合发动侵华战争	(89)
“修约”讹诈与“亚罗号事件”	(89)

抗击英国炮轰广州城	(91)
在珠江袭击英舰之战	(95)
大沽口战役	(97)
二、广州失陷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103)
三、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105)
第五节 沙俄吞并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	(108)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在东北、西北边疆的扩张	(108)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109)
中俄《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	(109)
中俄《北京条约》和《堪分西北界约记》	(111)
第六节 中外反动势力的正式结盟	(113)
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13)
二、“借师助剿”方针的提出	(116)
三、辛酉政变	(118)
第七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123)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和分裂	(123)
二、太平天国危局的暂时缓解	(127)
三、《资政新篇》	(131)
四、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132)
第八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135)
一、第二次西征	(135)
二、安庆保卫战	(137)
三、抗击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	(140)
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一次上海之战	(140)

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二次上海之战	(143)
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浙江宁绍地区之战	(148)
太平军苏南城镇保卫战	(150)
四、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155)
天京的陷落	(155)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156)
第九节 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的其他农民起义斗争	(160)
一、小刀会起义	(160)
二、回民起义	(165)
三、天地会和云南彝民起义	(170)
四、贵州苗、教、号军起义	(171)
五、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73)
抗暴起义	(173)
由滇入川，分军转战	(174)
牛佛渡会师	(175)
绵州之战	(176)
眉州之战	(177)
转战陕甘和阶州保卫战	(179)
六、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斗争	(181)

第三章 洋务运动

第一节 洋务运动的兴起	(186)
第二节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189)

第三节 在洋务运动兴起的近代工商业	(190)
一、军事工业	(190)
二、官督商办企业	(199)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	(208)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	(208)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代特征	(211)
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212)
第四节 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新式陆海军	(215)
第五节 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	(219)
一、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	(219)
二、设立京师同文馆	(221)
三、翻译西书和创办报刊	(224)
第六节 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早期改良思潮	(226)

第四章 中国边疆危机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国际国内形势	(232)
第二节 左宗棠收复新疆	(233)
一、阿古柏入侵新疆	(233)
二、左宗棠“昇旆出关”	(236)
第三节 日美侵犯台湾	(240)
第四节 西南边疆危机	(241)
一、《烟台条约》及英俄对西藏的入侵	(241)
二、堆拉之战	(244)
三、江孜保卫战	(246)

四、拉萨城下订约	(246)
----------------	-------

第五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第一节 中法战争	(247)
一、法国侵略越南与清政府内部的主战主和之争	(247)
二、中法首战山西	(249)
中法首战山西	(249)
北宁战役	(251)
《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的签订	(254)
中法观音桥事件	(257)
基隆保卫战	(260)
马尾丧师	(261)
台湾保卫战	(262)
中法船头、郎甲之战	(264)
中法谅山之战	(266)
临洮大捷	(269)
镇南关大捷	(270)
三、《中法新约》的签订	(279)
四、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	(282)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恶活动	(282)
南昌教案	(284)
天津教案	(285)
贵州和其他地区的教案	(288)

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	(290)
一、甲午战前的形势	(290)
《征讨清国策》	(290)
战云密布	(294)
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297)
丰岛海战	(297)
平壤保卫战	(303)
黄海海战	(306)
摩天岭阻击战	(308)
金州旅顺之战	(311)
威海卫防御战	(318)
保卫刘公岛	(322)
三、《马关条约》	(328)
四、台湾人民的斗争	(333)
台湾人民反对日本侵占台湾的武装斗争的爆发 ...	(333)
台中、彰化保卫战	(335)
台南之战	(340)

第六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345)
一、三国干涉还辽	(345)
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	(347)
三、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	(353)
第二节 戊戌变法	(359)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359)
二、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362)
三、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兴起	(366)
四、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	(368)
五、“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373)
六、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385)
七、百日维新	(389)
八、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398)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	(400)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400)
义和团的兴起及其内部组织结构	(400)
山东义和团揭开反帝斗争的序幕	(405)
直、鲁两省烽火遍燃	(412)
反“剿办”	(420)
廊坊大捷	(426)
二、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	(435)
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435)
大沽陷落与对外“宣战”	(443)
东南互保	(452)
天津保卫战	(454)
北京防御战	(458)
三、东北军民的抗俄斗争	(461)
瑷珲保卫战和北大岭阻击战	(461)
完工保卫战和牙克石、雅克岭之战	(465)
吉林三边保卫战	(470)

奉天保卫战	(475)
四、《辛丑条约》	(483)

第七章 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	(486)
一、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	(486)
二、中国农村经济的残破停滞	(492)
三、清末新政和新北洋军阀的崛起	(494)
四、此起彼伏的反清起义	(499)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和发展	(504)
一、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504)
探索救国的方案	(504)
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506)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508)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512)
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	(514)
第三节 同盟会的成立	(517)
一、同盟会的成立及“三民主义”的发表	(517)
二、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	(522)
三、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	(527)
第四节 预备立宪和革命形式的发展	(535)
一、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的失败	(535)
二、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	(543)

三、保路运动	(545)
第五节 辛亥革命	(548)
一、武昌起义	(548)
二、革命形势在全国的迅速发展	(552)
三、中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及南北议和	(557)
四、中华民国的成立	(560)
五、袁世凯窃取政权	(563)
六、辛亥革命历史意义	(569)

第八章 近代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

第一节 社会思潮	(572)
一、社会思潮的出现	(572)
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572)
二、西学的继续输入	(577)
第二节 史学、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的发展	(579)
第三节 科学技术	(585)
一、近代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兴起	(585)
二、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在数学、化学上的贡献	(587)
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589)
四、飞机设计师冯如	(591)

后

清

篇

第一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战前的 国内外形势与禁烟运动

一、战前的中国与世界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丝织、棉纺织、陶瓷、冶炼、造纸等部门，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发

展缓慢。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如乾隆年间，直隶怀柔县郝氏，有“膏腴万顷”；乾隆、嘉庆之际，大学士和珅占地 8000 余顷；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占地 2.5 万余顷。至于占地几千、几万亩的地主，为数就更多了。大量土地的集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随着土地的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愈加沉重，当时的地租率竟高达 50% 以上。农民日益贫困，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过速的人口增长，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全国人员约为 2.56 亿人，1812 年（嘉庆十七年）增至 3.33 亿万人，到 1835 年（道光十五年）达 4 亿多人。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而耕地面积不可能成倍增长。嘉庆年间全国人均耕地二亩多，道光年间已下降到不足二亩。这也造成流民增多，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自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吏治日益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炽盛，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乾隆时揽朝政 20 多年的权臣和珅，用各种手段积累的不义之财竟达 4 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8 年的财政总收入。地方官吏巧取豪夺，更是无孔不入。道光时诗人张际亮在给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信中，对吏治的败坏作了生动的揭露：“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乱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

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其家产而后已。”在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下，人民生活十分悲惨。

军队也很腐化，武备废弛。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拥有 22 万八旗兵和 66 万绿营兵。但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已腐败不堪。军官不理营务，剋粮冒饷，花天酒地。士兵不勤操练，许多人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京城的八旗兵，“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外省军队，甚至出现了骑兵没有马，水勇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失修的严重现象；若遇检阅操演，骑兵便临时雇寻马匹，水勇雇寻渔户冒名顶替。至于沿海水师，也大都老弱无用，战船多半是薄板旧钉钉成的，“遇击即破”。这样腐败的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

广大人民生活每下愈况，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自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1796 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绵延近十年。1813 年爆发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等省。林清率领北京郊区的一支 200 人的起义队伍，在宫内太监的协助下，一举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嘉庆皇帝惊呼这是“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祸”。

清朝在闭关锁国 政策中落后于世界潮流

纪元前我国黄河流域的农业首先有所发展，而外围其他

兄弟民族地区尚在摸索“刀耕火种”，或停留在游牧生活里。为保卫人类既有文明不受破坏，提出“华夷之辨”，以免于生产倒退，有其积极意义；孔丘说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正是反映着这一个方面的历史真实。但后世儒生迎合封建帝王需要，推行狭隘的民族主义，惟我独尊，不分好歹地排除一切少数民族的外来影响，把活教义变成了死教条，为社会发展设置了障碍。“严夷夏之大防”这种思想起着支配作用，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倾向封闭。尤其是进入17世纪后，西欧资本主义如日方升，东方包括所有的“华、夷”日益相形落后；而闭塞固陋的帝皇家仍对两千年前的“华夷之辨”死抱着不放，这就铸成了大错。

清廷第一次正式同西欧政府打交道在18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派使者马戈尔尼来到中国，馈送贡品，向乾隆帝祝寿。乾隆晚年，清廷早已外强中干，但仍架子十足。英政府为要求通商，竭力迁就，在跪拜一事上先闹了很大别扭。马戈尔尼无可奈何，用“单腿跪下”这一不中不西的方式敷衍了过去，83岁的皇帝仍是不很满意。后由和珅接待谈判，把马戈尔尼提出的订约通商和互派使节要求，全部拒绝了。乾隆闭塞无知到何等地步，从他写给英王的信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写道：“……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本来就不靠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你使臣请在天朝京城另立一商行，为你国收贮和买卖货物，更是荒唐之要求”，措词是极为傲慢的。可是，他一方面夸称“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朝，种种奇珍异品，纷纷来献，无所不有，何须你国制办东西”；同时却又让来使把各种新奇的科学仪器、机械在圆明园里安装了下来。

其实，反映西洋情况的书，明代就有，只因清廷八股取士，使整个知识界的眼睛全盲了。利玛窦早为明廷介绍了《坤輿万国全图》，艾儒略又为我们讲述了《职方外纪》，但是皓首穷经的士人们大都对此视为“异端”，不值得他们一顾。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搜罗到了《职方外纪》，大概为了“聊备一格”也选入了。当时被称为一代儒师的纪晓岚为此书作的提要这样写道：“五洲四海”之说“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诘。”这位谈狐说鬼的专门家是把它当作“奇谈异闻”来看的，他又似乎宽宏大度地说：“天下之大，何所有不，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异闻者，海外奇谈也，类同谈狐说鬼。宰相的见解如此卑陋，皇帝更不用说了。

19 世纪初叶世界上科学文明起了划时代的变革，英国已向帝国主义发展；而清廷从嘉庆到道光，还是遵循着“圣帝明皇创法教诲”，闭着眼睛，认为西方国家全是“化外之民”，对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紧闭着大门。嘉庆时广东有人出版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书，以便于商人翻译外文，被官府禁止发行。他们坚决闭目塞听，关门落锁。待到战争将要爆发，英国侵略者入侵的警报看花了皇帝的眼睛时，道光这才问起：“英国地方在那里？”人家告诉他，在中国之西，道光忙问：“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整个朝廷就这样昏聩糊涂，全不晓得即将大祸临头。有其君必有其臣，欧洲国家到广州拜访总督请求通商，这位大臣厌烦地对人说：“葡萄有牙，西班牙有牙……世界那来这么多国家，还不是夷鬼子捏造出来蒙惑我们的吗！”

随后海外商务日繁，尽管清廷的海禁那么严，也限制不

住。粤人谢清高随外国商人远航，遍历南洋、印度和欧洲等地，达14年之久才回国，因双目失明，在澳门以口译为生。同乡人杨炳南请他口述经历英吉利（英）、佛郎机（法）、布路叭士（普鲁士）、米里干（美）10余国情况，涉及一些近代文明风物，书名《海录》，在道光初刊印问世。这种书当然也被士大夫看作“异闻”，难于放上缙绅先生案头，因此穆彰阿和道光帝对海外始终只能是个睁眼瞎。

在这个背景下，就更加看得出来林则徐的可贵了。

林则徐早年虽在鸦片问题上已能具有正确的见解，但传统的偏见仍是有的。他也曾认为“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他又曾认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警告外国人“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他初到广州，看到了西方人的军队，认为“夷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林则徐新旧思想的变化，到达广州后有了一个飞跃。他进一步认识了西方文化，他在外交上萌发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他接触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恍然大悟：“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于是下定决心，务必探访敌情，知其虚实。据魏源追忆，林在广州期间，“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租借地作为了解敌情的耳目，在禁烟一事上实行联葡制英，因此他曾经专程到澳门进行了一次隆重的访问，以不亢不卑的态度折服了葡萄牙人。这时林则徐的胸襟与见识大不相同于南下前的林则徐了。林氏“勤访夷情”的具体史料不多，但从反面教员的记述里可以取得助证。琦善

继林为广督，一反林氏所为：“有探报洋情者，则斥之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

范文澜称赞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恰如其分。林氏自非“生而知之者”，他的认识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林则徐把从澳门弄来的资料请人辑成《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尤其是《四洲志》，根据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史地等知识，记述颇为详尽。但都没有来得及刊印问世，他就遭贬革职，发配新疆。路过镇江，他找到刚从两江总督裕谦幕府退下来的魏源，旧友重逢，“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在国家民族遭受忧患的严重时刻，这位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把随身携带的一大捆书稿和资料全部送给了他的后继人。

二、中英贸易与鸦片走私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

清朝建立初期，曾实行海禁。统一台湾以后，在 1685 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外国人到广州、漳州、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宁波四口通商。后来，由于欧美来华商人不断在中国沿海各口进行违法活动，清政府在 1757 年下令封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海关，只允许在广州一口通商；并且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它事务必须经过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又陆续颁发各种条例章程，对外商在华活动进行严格限制；这就是“闭关政策”。闭关政策是一种

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它阻止了中外必要的经济以及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同时它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封建经济的延续，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也不利于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力求抵制这一政策。早在 1793 年和 1816 年，英国就先后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和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节团来华，向清廷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划出舟山附近海岛一处屯货，拨广州附近的地方一处给英商居住，降低和减免英国货税等侵略要求。但是，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83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礼士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及传教士郭士立等，一行 70 余人乘坐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北航，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侦察活动，刺探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城市和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测量港湾水道，绘制航海地图，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

1834 年 4 月，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和管理权，派遣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管理英国在华商人，并办理和清政府的交涉事务。律劳卑来华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两次给予训令，要他到中国开辟商埠，取得海军据点，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7 月 25 日，律劳卑到达广州，投递公函，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卢坤认为这是违反惯例，声明必须改具禀帖交公行转呈。律劳卑拒绝，卢坤下令封航，停止中英贸易。律劳卑在 9 月 5 日命令英舰闯

入海口，轰击虎门炮台，后又闯入黄浦，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国恢复贸易，因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加之兵力不足，只得退回澳门。29日，中国解除贸易禁令。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

1836年，查理·义律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一贯主张用强硬手段对付中国，他根据自己在广州将近7个月的活动，写信给巴麦尊，主张必须使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答应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

1838年7月，英国政府派遣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率领军舰到达广州口外进行威胁。义律从澳门到广州，准备进行挑衅活动，由于英国只有3艘军舰，兵力有限，而虎门业已设防，才未敢制造事端。但英国侵略者妄图挑起战争的事态已经日趋严重。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贸易，中英贸易占首要地位。在正当的贸易中，英国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从中国输入茶叶、生丝、土布、瓷器、药材等。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外国商品有很大的抵制力，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在小块土地上劳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生活极端贫困，既无需要也无可能来购买外国商品。清政府又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英国商品很难在中国销售。但中国的茶叶、蚕丝和丝织品却大量地输入英国。“1781年到1790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33元。英国输华的商品，从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纺织、洋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值1687.1592元。”英国输华的全部商品总值，不抵中国输英茶

价的 1/6。由于中国居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国资本家每年不得不运来大量白银换取中国的茶、丝等产品。为了扭转中英贸易中的逆差，打开中国市场，英国资产阶级竟非法向中国大量贩运鸦片。

鸦片泛滥

鸦片，亦名罌粟，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最初是当作药材传入中国的。由于鸦片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吸食成瘾，难以断绝。从 18 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约 200 箱左右。1757 年英国占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后，便竭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10 年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每年 1000 箱（每箱鸦片重 100 或 120 斤）。1773 年，英印殖民政府确立了大量种植及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并给予东印度公司制造和专卖的特权。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罌粟，在加尔各答等地设立加工厂，制造适合中国吸食者口味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以高于成本 10 倍的垄断价格将鸦片卖给英国烟贩，烟贩又以 50% 以上的利率运到中国销售。

自 19 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他们贿赂清朝官吏兵弁，勾结中国私贩，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据不完全统计，1800 至 1804 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 3500 箱；1820 年 1824 年间，每年平均增至 7800 余箱。30 年代迅速增加，到

1838 年至 1839 年度，竟达 3.55 万箱。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一方面扩展了英国在印度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开辟了英国在中国的市场。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棉纺品及其他工业品，以购买印度的鸦片，然后再将鸦片输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在英——印——中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个三角贸易中，鸦片起着重要作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是抓住鸦片贸易这个环节，把“三角贸易”的链条带动起来，从而使自己获取大利。

由于鸦片输入量的激增，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而且这种差额越来越大。30 年代起，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一项竟占了一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数百万元。“使鸦片成为 19 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犯。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的 40 年间，外国侵略者偷运至中国的鸦片不下 42.7 万箱，总价值约 3 亿元以上。

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族殃及绅商百姓以及军队官兵，烟民人数越来越多。据 1835 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 200 万以上。战前的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等省，已开始种植土烟。吸食鸦片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危害，对此魏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英国人

蒙哥马利·马丁也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的肉体。”

由于官吏吸鸦片对吏治和世风都有恶劣的影响，所以清廷屡次下令禁止，并采取了一些查禁措施，有的措施相当严厉，有的则极为有损官员体面，但仍难以禁断。不少官吏想方设法逃避查禁，有的宁愿被革职或者主动辞职也不愿戒烟。以晚清而论，其查禁措施主要有：1. 凡官员吸鸦片被参者，皆革职永不续用。2. 对已染有烟瘾者限定六个月内戒除，否则处罪。3. 在京师和各地设立禁烟公所，查验官吏是否吸烟或有烟瘾者是否戒除。京师的禁烟公所由一亲王主管，各地禁烟公所的事宜，督抚等大吏要过问。清代官吏恽毓鼎在日记中曾写到禁烟公所的情况：凡京官侍郎、副都统以下至三四品京官，外官巡抚司道，都要到禁烟公所接受检查。检查的方法是，在公所内建一镶有大玻璃的浴堂，令被检者脱衣入浴，检查人员在窗外窥视，验其是否身带鸦片，然后令其换上禁烟公所自制的衣服，再监视七天到十天，看其是否有烟瘾。恽毓鼎本人是个烟鬼，对这种查验方法极为不满，便愤然辞去了官职，仍旧照吸不误。又有某嗜烟的大员，为能度过在禁烟公所里难熬的日子，暗中将烟泡藏在一个能启闭的特制大钮扣中，带进了禁烟公所。但仍被有经验的查验人员查了出来。福州某鞋店为了赚吸烟官吏的钱，特制了一种能藏烟泡的空底鞋，高价卖给要到禁烟公所受验的官吏。闽县

县令叶新第穿此种鞋受验时被查了出来，立即被革职。

清廷的禁烟措施有不少漏洞，而且一些当权者自己就是瘾君子，根本不会去认真禁烟。如禁烟措施中没有规定一品官须到禁烟公所受检，所以官至一品者便可放胆狂吸。有人提出，这样上下有别不公平，马上又有人为之辩解说：这是依古制而行，你没看见唐诗里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吗？又如清末两江总督署曾召开会议，拟商禁鸦片事。总督沈葆楨与诸僚属皆已至署，唯独不见布政使，派人去催，许久才至。布政使一进署便说：“你们为何催得这样急，我还有两三口鸦片没吸呢，议事打不起精神。”总督一看布政使首先犯禁，谈何禁烟，于是只好改变了会议内容，草草结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写道，有人出主意说，为使烟民断绝，可实行抽“吃烟税”和将吸烟者注册成烟户（烟户不准考试做官、不准开大买卖）的政策，“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那一个肯建议这个政策作法自毙呢！”

鸦片泛滥还严重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1821年至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10。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8世纪末，一两白银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上涨到1700文。按清政府规定，完粮纳税须用白银，因而劳动人民实际要多交60%的赋税。

鸦片泛滥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大量的白银外流，银

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国库储备越来越少，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官吏、兵丁吸食鸦片和在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甚至清朝宫廷内部也有吸食鸦片者。清政府虽三令五申查禁鸦片，但英国无视中国法令，贿赂清朝官员，进行武装走私。1826年，两广总督设巡船查缉，结果是“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以水师积习不可挽，后裁巡船。1837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三、林则徐禁烟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历官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巡抚，以干练廉明名重于时。1838年7月，他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

程》六条，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说：“（吸烟）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林则徐在两湖地区厉行禁烟，成绩斐然。同年9月，他再陈道光皇帝，痛切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言行，使他成为主张禁烟的著名代表人物。

道光皇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威胁，10月，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毋以虚饰图功，毋以苟且贻患”；并将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以示其禁烟决心。11月，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计禁烟方略。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广大人民群众深感鸦片之害，痛恨贩卖鸦片的外国侵略者，支持地方官员的严禁措施。在鸦片走私最为猖獗的广州，人民群众曾多次掀起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当局决定在外国商人居住的商馆附近广场处决一名中国贩烟罪犯。英、美鸦片贩子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捣乱刑场，气焰嚣张。广州市民近万人闻讯赶来，举行示威，包围了商馆，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极大愤慨，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强烈要求。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当时，广州群众反对鸦片走私的情绪和禁烟的正义呼声十分高昂。林则徐“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

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并于3月16日晓谕外国烟贩，限期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毅然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特别是在鸦片走私的重要航道虎门，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一发现走私鸦片商船，立刻遍吹螺号，集合渔船，前后拦截，顺风纵火，将其烧毁。由此，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

但是，中国正义的禁烟运动遭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抵制和破坏。3月24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具结保证书。林则徐派兵包围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交通，并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义律即改换手法，命令英商缴烟，同时劝告美商缴烟，声称烟价一律由英国政府付给。义律以此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禁烟斗争的威力下，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烟贩被迫缴出鸦片19187箱（其中美国烟贩1540箱），又2119麻袋，共计重237万余斤。

在林则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门“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直

到6月25日，全部销毁干净。各群众闻讯赶来观看，万众欢腾，无不称快。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争，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第二节 反对 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

一、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1839年8月初，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纷纷致书英国政府，狂妄叫嚷：“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有的甚至宣称：“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只有表现充分的武力，才能有希望得到。”9月30日，英国曼彻斯特与对华贸易有关的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声称：“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要用侵略战争把中国变成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原料的

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接着，伦敦、利物浦、里兹、利斯特等大城市有关厂商也大叫大喊，主张立即发动侵华战争。

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鸦片战争前的 1837 年至 1838 年间，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这一时期，英国工商业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商品积压，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英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因而不不断高涨。以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成为其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1839 年 9 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召见逃回英国的鸦片贩子查顿等人，商讨拟定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具体计划，包括侵华舰艇的数量、陆军人数及必要的运输船只等等。

中国禁烟成为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1839 年 10 月 1 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主张立即调遣军舰封锁中国沿海。陆军大臣麦考莱也坚决主张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英内阁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11 月初，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向巴麦尊提出了更为系统、详尽的作战方案，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侵华要求：开放与茶丝产地相近并盛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协定关税；割占中国沿海岛屿等。

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一直严守秘密。迟

至 1840 年 4 月，出兵中国的决定才在议会辩论，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付军费案，派兵侵略中国。

1840 年 6 月，乔治·懿律率领由兵船 16 艘、武装汽船 4 艘、运输船 28 艘、士兵 4000 余人（后增至 1.5 万人）、大炮 540 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顿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的第一阶段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阶段，自 1840 年 6 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 1841 年 1 月下旬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约 7 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中国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抗战的态度。由于道光皇帝采取“羁縻”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割地丧权的所谓“穿鼻草约”。

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实行封锁。由于广东军民早有戒备，侵略者无隙可乘。6 月 30 日，懿律和义律率英军按其原定计划北犯。7 月，英军进攻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又北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8 月，英军继续北犯，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定海失陷，清政府大为震动。道光皇帝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他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

果无桀傲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这种消极思想，在沿海各督抚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当时沿海各省的督抚除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已调任闽浙总督）等少数人以外，在军事上都没有作任何部署。在京师重要门户的天津，仅有守军八百。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可用的大炮都没有。琦善竟称“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甚至说：“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海口断不能守。”当英军抵达天津海口，清朝文武官员更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妥协派趁势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林则徐、邓廷桢。他们把英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归罪于林则徐在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至激变。”道光皇帝本无抗战决心，加之妥协派在耳旁的鼓噪，便任命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宣扬失败情绪，说英人“船坚炮利”，是无法战胜的，即使是今年打胜了，明年还会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在谈判中，他向英国侵略者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持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保证要“重治其罪”，要求英军撤回广东，等候清政府派遣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懿律得此答复，认为实现了以武力要挟清政府谈判的目标，又因北方天气渐冷，海港即将封冻，遂于9月中旬率军南下。

道光皇帝于9月17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在道光皇帝的“羁縻”政策指导下，11月6日，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道光皇帝旋即颁布开放烟禁上谕，以此向侵略者表明

其谋求妥协的诚意。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的做法，下令撤除珠江附近的防御设施，裁减水师，遣散乡勇，排挤坚持抵抗的地方官员，以讨好英国侵略者。12月，琦善与英军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交还定海。琦善同意赔烟价600万元，但增开口岸只应在广州之外再增设一处，不准寄居，应先交还定海后签约。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1841年1月初，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陈举鹏父子（土家族）及土家、苗等族守台官兵6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在近代中国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陈连升是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后，义律于1月20日在澳门发表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25日，英国侵略军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同时，义律与琦善又进行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所谓“穿鼻草药”谈判。但琦善此时已自身难保，不敢再谈签约事，谈判停止。

战争的第二阶段

战争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政府对英宣战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皇帝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

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

琦善、伊里布等人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浙江，镇海、定海居民纷纷谴责伊里布撤退镇海守军的措施，并要求收复定海；在广东，广州的爱国士绅联合请愿，特别是“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在清政府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纷纷奏请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主持抗英斗争。英国要求割地、赔款的条件，也大大超出了道光皇帝可能接受的程度。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看到定海尚未交还，英军又在广东发动进攻，十分恼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接着，道光皇帝将琦善革职拿问，以祁埏为两广总督；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接替伊里布；同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往广东。于是，中英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

虎门天险，由水师提督关天培坐镇戍守。

道光帝对英宣战，义律急于在清军从外省调兵增援之前拿下广州，便立即谋划攻占虎门。1841年2月中旬先派出兵船5只、小舢板3只，闯到下横档后山侦察水情。当时，琦善已被革职，奕山尚未到任，所谓官兵大都没有开到。琦善面对战事即将爆发，召集由广州将军阿精阿、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怡良、汉军副都统英隆等高级将领和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后，令总兵段永福率兵1000人，开赴虎门后山太平墟一带防守；令提督祥福率官兵600人，加强乌涌口的兵力，并和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巡查了从虎门到广州的防务；在兵

力薄弱之处，雇佣了工役乡勇。

英军调集 10 只兵船、3 只武装轮船，于 25 日包围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派出部分兵力堵截清军各路援军之水道。26 日晨，南风盛发，英军集中兵力，对横档和永安炮台发起攻击。守台副将庆宇、达帮阿、刘大荣等，督率官兵奋力还击，上午 11 时左右，清军官兵力竭，英军登陆，两台失守。清军阵亡 250 余人，伤百人，被俘千人。当天上午，英兵船伯兰汗号、麦里威尔号、汽船皇后号等合击虎门靖远、镇远、威远和巩固四座炮台。关天培坐镇靖远炮台，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指挥部队发炮还击，给英军以重大杀伤。在作战最危急的时刻，许多官兵伤亡了，他亲自点燃火炮，轰击敌人，自己数次身中敌炮，遍体鳞伤，士兵把他负在肩上，要撤出阵地，而关天培坚决不同意，仍在指挥，当胸又中一弹，久立不倒，为祖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四座炮台先后为英军占领。关天培是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我国第一位高级将领。他坚决站在林则徐一边，赞成禁烟，主张抵抗英军入侵，对琦善疏于戒备、一意求和的行为非常不满。在战前，他曾为虎门请求增兵，没有得到琦善同意，悲愤痛哭。“守台仅羸兵二百，公自度众寡不敌；且藩篱既撤，孤立无援，乃决为死计，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漂衣襟。”关天培的英雄行为，连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最杰出的元帅”。同关天培一起牺牲的还有游击麦廷章。林则徐称颂他们两人是为国捐躯的“双忠”。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形势危急。

3 月，参赞大臣杨芳率军先期到达广州。义律从商业利益出发，向杨芳提出休战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广州恢复

贸易。4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他不用粤勇，而召募水勇于福建；不信粤兵，而依靠外省“客军”；甚至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在作战上，他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5月21日，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奕山贸然发动一次夜袭，清军大败，英军乘势反扑，占领了城郊重要据点，包围并炮轰广州城。26日，英军准备攻城，奕山等慌作一团，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27日，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军六天内撤至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缴纳600万元“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第二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三阶段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溃败后便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

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大为不满，认为从这个“条约”中所获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率英军再次北犯。8月27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阵亡，厦门陷落。9月，英军

继续北犯定海。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下令加强防御，坚决抵抗。他对众宣誓：“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回族）、王锡朋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10月1日再度失陷。镇海位于甬江北岸，招宝山雄峙海口，山上有明代防御倭寇的威远城堡。金鸡山在甬江南岸，和招宝山互为犄角，尤为重要。甬江口外10余里处，笠山、虎蹲、蛟门诸岛为镇海之屏障。裕谦于1841年2月27日从上海抵达镇海后，在加强定海防务的同时，对镇海的防务也做了很大努力。镇海清军总兵力为4000人，招宝山由游击张从龙带兵驻守，提督余步云统领清兵驻守招宝山下的东岳宫。东岳宫西的拦口埠炮台，由总兵李廷扬率兵驻守。总兵谢朝恩、候补知府黄冕驻守金鸡山。海口两岸，密排火舟，伏有水勇。裕谦督领宁绍台鹿道长、镇海知县叶堃坐镇镇海县城。

9月下旬，英军连檣驶抵定海、镇海洋面，战争迫在眉睫，裕谦表示：不管形势多么艰危，他决不离开镇海一步，也不以保全民命为借口，向英军妥协。10月8日，英军从定海开进到镇海途中的黄牛礁，璞鼎查等潜至笠山、虎蹲一带窥察情况。9日晨，英军的舰队进泊镇海口外。10日黎明，英舰复仇神号载官兵400余名在甬江南岸登陆，汽船弗莱吉森号载官兵在小港口登陆，夹击金鸡山炮台。总兵谢朝恩正在指挥官兵开炮轰击，被敌炮击中，落海牺牲。清军英勇还击，短兵相接。伤亡较大，金鸡山终为敌人所占。英舰威里士厘号、

伯兰汗号猛烈轰击招宝山炮台，汽轮皇后号、复仇神号来往接应，上午 11 时许，英军 700 余名在招宝山麓登陆，另一部用小舢板绕至招宝山后，攀援而上，仰攻我威远城堡，清军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裕谦亲临第一线，在镇海东门督率官兵，点炮轰击敌人。在激烈战斗中，提督余步云擅离北岸，突然登城，以保全百万生灵为借口，请求裕谦派人求和。裕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不久，余步云再次登城，哀告自己家中有老小 30 余口，坐以待毙，实属可怜，裕谦不为所惑。余步云不顾民族和国家利益，临阵脱逃，退守上虞。英军从东城缘绳而入，城破，清军溃乱。裕谦见大势已去，望阙叩头，跳入泮池殉国，英军攻占镇海。裕谦是鸦片战争中清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爱国将领，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镇海县丞李向阳，守备王万隆，把总汪宗宾、解天培，外委林庚、吴廷江等。清军阵亡官兵千余人，英军被打死 16 人，受伤甚多。13 日，英军攻宁波，余步云先一日弃城走上虞，宁波不战而陷。与此同时，英军还多次侵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在台湾各族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打退了英军的多次进犯。

浙东三城在短短的半个月里轻易易手，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为了挽回败局，道光皇帝下令重新迎战，以示“天朝兵威”。10 月 18 日，道光皇帝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从各省调集军队近 2 万人，赶赴浙江前线。

奕经离京后，一路上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勒索地方，铺张糜费。到苏州后更是花天酒地，竟驻足不进。以致民怨沸

腾，言官弹劾。奕经不得已被迫离开苏州，于1842年2月达到绍兴。从北京出发到此，已过了4个月。

奕经的言行，与奕山在广州所为如出一辙。他诬蔑“水勇、乡勇，或系无业游民，或系乡村笨汉，所持兵械，不过稻杈木棒，无事或可壮声威，遇敌则必先溃散”，认为“浙省兵丁、浙省乡勇均不可用”。他到浙江前线后，依然不认真筹划抗敌措施，却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3月上旬，在不了解敌情和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奕经命令清军从绍兴分三路出师，冒雨夜袭宁波、镇海、定海，竟想一举收得三城。因日期泄露，英军早有准备，清军三路皆败，全军溃散。英军乘机反扑，慈溪失陷。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却慌报军情，掩败为胜，力主对英求和。

清政府在广东和浙江的两次出师，都惨遭失败，朝臣中妥协派官员又活跃起来。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皇帝上奏折，宣称英人炮火“猛烈异常，无可抵御”，沿海各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他认为如果继续开战，国内将会出现各地人民揭竿而起的危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和妥协派的喧嚣，促使道光皇帝从忽战忽和转而一意求和。他哀叹清军“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于是，他命令停止进兵，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令他们驰往浙江寻求谈判途径。英国侵略者认为它的军事打击尚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拒绝和谈，决定仍照原计划，大举侵入长

江流域下游地区。

1842年5月，英军退出宁波和镇海，集中兵力进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乍浦位于杭州湾之北，是浙江的军事重镇。英军欲占镇江，决心首先拿下乍浦。清军在乍浦的总兵力6000余人，整个防务由副都统长禧、总兵德坤和杭嘉湖道的宋国经统领。

乍浦城外有沙滩数里，大船不能靠岸，火炮从海上能轰到城里。乍浦东南西山嘴突出海外，原有炮台1座，鸦片战争中又添筑1座。南门外天后宫，地位重要，清军在那里加宽了海塘，在上面堆砌多个土墩，中间安设大炮，后面驻守兵勇。

英军于1842年5月7日放弃宁波，5月17日，以皋华丽号等7艘战舰、4艘武装轮船，分三路进犯乍浦。右路由陆军中校马利斯指挥，率领官兵960余人；中央由中校蒙哥马利指挥，率领官兵380人；左路由陆军少将叔得指挥，率官兵870人。进攻前，英军各船排列在天后宫、西山嘴、唐家湾、独山寨一带，先用舢板数十只，每船各载数十人，在舰炮掩护下，分路向我逼进。清军在唐家湾、灯光山一带连续打退三次登陆之敌，伤亡官兵200余人。南门外天尊庙战斗，尤为壮烈。200多名八旗满兵在佐领隆福指挥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激战3小时，清军陷于重围，官兵宁死不屈，誓与阵地共存亡。隆福自刎，未战死之士兵，自殉报国。英军占领天尊庙以后，会合从灯光山登陆的英军，进攻东门，缘梯登城，乍浦失守。英军军官死2人，伤6人；士兵死8人，伤44人。清军牺牲的将弁有长禧、隆福、伊勒哈

奋、根顺等 15 人，阵亡士兵 680 人。在乍浦战斗中，满族官兵在敌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惊人勇气和献身精神，极为感人。西方史书评论说：“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浦，英军对满州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6 月，英军侵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吴淞属宝山县，位于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处，是由外海进入长江第一道门户，为英军进攻镇江必经之地。

耆英等认为，乍浦陷落，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伊里布致书郭富，要求和谈戢兵，被拒绝，英军立即进攻吴淞。

吴淞的最高指挥官是江南提督陈化成。吴淞清军的总兵力有 8000 人。江苏巡抚梁章钜提出“寓兵于农，按亩出伏”的主张，在宝山县征得壮勇 5000 人。从吴淞到宝山县城的两岸，添筑土塘，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在土塘之上，修筑铁牛，形比雉堞，安设大小火炮。西岸为设防的重点地区，筑有西炮台，安设大炮 154 门，由陈化成督率官兵千余名镇守。东岸筑有东炮台，设大炮 27 门，由总兵崔吉瑞、周世荣率官兵 500 余名防守。在英军便于登陆的庙港、三颗银杏树，驻有官兵 1000 余人，堵御英军。从宝山县东门到小沙背一带，层层设炮，节节设防，由徐州总兵王志元防守。吴淞镇以南、温藻浜以北，修筑石质半环形炮台 1 座，设大炮 24 门。吴淞镇对岸修圆形砖质炮台 1 座，安炮 21 门。从吴淞到上海之东沟，江面狭窄，在两岸添设大炮数十门，埋伏官兵四五百人，挖壕筑台，用麻袋装土，堆积城堡，掩护

士兵作战。雇觅沙船渔户，多备船只柴草，相机火攻英船。水师新造了明轮船，船的两边各有两把用坚固木料制成的轮桨，用齿轮推动，时速比一般船快。每只船上安设二三门铜炮，给兵勇配备若干支大抬枪、火绳枪和部分长矛、大刀。

侵略军于 1842 年 6 月 16 日上午进犯吴淞。英军将武装轮船同兵船连结起来，在巴加指挥下，直扑吴淞。英军采取了用战舰攻我炮台，掩护舢板攻打清军侧翼的战术。在清军炮台英勇还击下，旗舰皋华丽号被我击中多次，后樯被击中 3 炮。布郎底号被击中 14 次，希威特海军中尉被炮弹打死；西索斯梯号被击中 11 次，其它舰只也被击中多次。两江总督牛鉴，在战斗开始时在小沙背一带指挥，炮弹在他的附近炸裂，随兵被击毙 10 余人，他恐慌已极，令士兵穿戴他的冠服，坐他的轿子，自己混在溃军中逃回宝山县城。提督陈化成，福建同安人，时年 67 岁，久历戎行，积军功为水师提督，是著名勇将。他面对来犯之敌，毫无惧色，手执旗帜，身先士卒，指挥炮兵坚决打击敌人，身上 8 处受伤，拔出佩刀，坚持作战，腹部又中弹，最后壮烈战死在战斗岗位上，成为又一个为后人永志不忘的高级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吴淞失守，牛鉴偕知县周恭寿弃宝山县城逃跑。英军入城。此战，清军阵亡将弁 8 人，士兵牺牲 81 人。英军被打死军官 4 人，士兵死亡 20 余人。

第二天，英军由开莱特舰长率领武装轮船两只逆黄浦江而上，于 6 月 19 日，分水陆两路进犯上海。上海道巫宜契、知县刘光斗早在 16 日逃离。典史杨庆恩无力防守，觅小船渡浦东，投水而死。英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进入上海，在上海

6天，勒索赎城费100万元（只缴50万元），官兵奸淫妇女，抢夺财物，无恶不作。英国侵略军又欠下了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继续溯长江西上。7月21日，进攻镇江，镇江保卫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壮烈的最后一战。驻防旗兵副都统海龄是镇江的最高指挥官。他主张坚决抗击英国的侵略，面对险恶形势，毫不屈服，誓与敌人战斗到底。镇江的守军，在城内有驻防旗兵1200名，青州应援旗兵400名；城外有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统领之四川官兵700名，广西官兵200名，总兵李锜统领之江西官兵1000名，江南提督刘允孝统领之湖北官兵1000名，全部守军约5000人。

英军进攻镇江的海军官兵5100人，各种兵舰、船只共73艘，编成6个纵队：

先行纵队：有军舰7艘，武装轮船5艘。

第一纵队：有战舰、武装轮船各1艘，运输船10只，由古柏舰长指挥；

第二纵队：有战舰、武装轮船各1艘，运输船10只，由胞诨舰长指挥；

第三纵队：有运兵船2艘、运输船10只，由孔木舰长指挥；

第四纵队：有战舰、武装轮船各1艘，运输船13只，由革雷舰长指挥；

第五纵队：有战舰、武装轮船各1艘，运兵船2艘，运输船8只，由凯培尔舰长指挥。

参战陆军6900人。组成4个旅：

炮兵旅有官兵 600 人，由蒙哥马利陆军中校指挥；

第一旅有官兵 2300 人，由萨勒顿少将指挥；

第二旅有官兵 1300 人，由叔得少将指挥；

第三旅有官兵 2150 人，由巴特雷少将指挥。

英国侵略军于 7 月 6 日自吴淞启航，12 日至江阴鹅鼻嘴，14 日至圖山。16 日由巴加和郭富率威克逊号·麦都萨号开过镇江，驶抵长江大运河入口处。20 日，英军全部抵达镇江城下。21 日拂晓，英军进攻镇江。他们原以为镇江孤城，垂手可得。但是，他们遭到清军顽强抵抗，遭受到预想不到的重大杀伤。萨勒顿率第一旅和部分炮兵攻击镇江西城。叔得率第二旅攻击北城。巴特雷率第三旅包抄镇江之西南。城外齐慎、刘允考所率守军，稍事抵抗，就败退到镇江东 45 里的新丰镇。唯有镇江副都统海龄，临危不惧，率领八旗官兵，孤军奋战。英军用优势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冲开西门和南门，一拥而入，守城官兵用极其原始的武器，同敌人顽强拼搏。协领多连统率 400 名山东青州满兵，在巷战中伤亡十之八九。海龄见大势已去，把堂印交给骁骑校祥云，便和自己的妻子，19 岁的次孙，自缢尽节。祥云满门殉难，他怀印投井而死。英国侵略者占领镇江后，大肆蹂躏，使繁华的镇江成了一片废墟的死城。

镇江保卫战中，清军阵亡官兵 240 人，受伤 263 人，失踪 156 人。英军军官被打死 3 人，伤 14 人；士兵死 31 人，伤 93 人，失踪 3 人。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高度赞扬了镇江保卫战中的英雄们，他说：“英国人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

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象就已经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英军于 8 月初侵入南京下关江南。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英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固然比清军先进优越，但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其兵力严重不足。当时英国分布在本国及其广大殖民地上的军队总共 10 万人，能够投入对华作战的兵力，最初只有 4000 余人，最多时也只有 15000 人。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 4 个月；从印度航行到中国，至少要一个月。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得到了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支持。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学技术的落后，在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历程，也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

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抗英

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首先在广东爆发。英国军队的侵略

暴行，清政府无耻的卖国行径，给广东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广东人民恨透了这批侵略者和认贼作父的卖国贼，反英、反清斗争特别猛烈。早在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和武装反击英国侵略军的时候，广东人民纷纷组织团练和参加水勇，与军队配合作战。奕山到广州后，阻止和反对人民参加抗英斗争，最终还向英国侵略者屈膝求和。但是，广大群众却自发地组织起来，继续坚持反侵略斗争。

三元里是广州北郊的一个村落，离城约5里，贴近四方炮台。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国侵略军头子义律、卧乌古（英国侵略军陆军司令）纵容英军成群结队地带着武器在三元里一带横冲直撞。他们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野蛮到盗掘坟墓，打开棺材，把陪葬物品掠夺一空，连死尸也遭劫难，真是无恶不作！可是甘当英国侵略者孝子贤孙的奕山等一伙民族败类，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发出布告，保护敌人，不许人民抵抗，如果违令，就按军法治罪。

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俯首对屠刀！三元里一带的广大群众无不义愤满腔，他们摩拳擦掌，整好古老的武器，决心要痛击蹂躏祖国大地的豺狼。

5月29日早上，一群英国侵略军到三元里行凶时，当地群众奋不顾身把他们包围起来，当场打死了八九个侵略者，这是罪有应得。漏网的侵略军抱头鼠窜逃掉。

三元里人民料定凶残的敌人决不会甘休，一定要来疯狂报复。当时，菜农韦绍光首先挺身而出，号召全村群众团结起来，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在韦绍光的带领下，全村群众

在村北古庙前集会，声讨英国侵略军的罪行，商议反抗侵略的斗争步骤。他们从庙里捧出三星旗，对旗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这誓词头两句是进退信号，末一句表达了他们要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三元里人民清楚地知道，要打败英国侵略军，粉碎敌人的骚扰，决不是一两个村落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和敌人战斗，韦绍光派出代表到附近各村联络。广州城北各乡群众，在三元里代表的串联下，迅速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英武装力量。这支队伍中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渔民，也有爱国士绅，而以农民人数最多，成了斗争的主力军。

当天下午，103乡代表在广州城北12里的牛栏冈开会，商讨组织群众和战斗部署。会议决定：（一）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作战单位，各备大旗一面，各选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众乡都出动；（三）各乡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四）和敌人作战，不采取正面进攻方式，而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包围战术；（五）以丘陵起伏、宜于埋伏的牛栏冈，作为聚歼敌人的地点。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1841年5月30日清晨，三元里一带沸腾起来了！高举着抗英大旗的几千人的队伍向英国侵略军营地——四方炮台挺进。正在吃早饭的英军，为突如其来的如雷的鼓声、震天的吼声大吃一惊。英军伸头一望，只见手执大刀、长矛、弓箭、盾牌、土枪、锄头、铁锹、石锤的群众，漫山遍野地冲上前来，这使卧乌古顾不

得吃完早饭，就慌忙下令吹号集合，出动近 2000 名军队，携枪带炮，仓皇应战。侵略者的洋枪洋炮只能吓唬奴颜媚骨的清政府，却丝毫动摇不了顶天立地的中华好儿女。群众见英国侵略军象蝗虫一样拥来，一无惧色，并以极快速度按原定计划朝三元里以北方向撤退，诱敌深入。骄狂不可一世的英国侵略者，以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穷追不舍。当这一群象瞎狼似的侵略者被引到牛栏冈下时，突然，群众的队伍消失在丘陵之中。狡猾的卧乌古知道中计，立即下令后撤，可是，已经晚了，侵略军自投罗网，钻进了群众专门为他们设置的死亡圈。

这时，前面不远的山冈中，一直在聚精会神了望敌情的韦绍光，立即高举三星令旗，用力向下一挥，紧接着，“轰”的一声冲天炮响，锣鼓齐鸣。埋伏在牛栏冈上的七八千紧握着古老武器和农具的群众一跃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猛冲下来，还没等侵略军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土枪土炮的子弹、羽箭、梭枪等，就象倾盆大雨猛落到他们头上，喊杀的吼声，震得地动山摇。义愤填膺的群众迅捷地冲到敌人面前，用大刀、长矛、石锤、锄头等向敌人狠砍、剧戳、痛击、猛挥。大刀狠砍脑袋落，银锄猛挥血满地。在疾风暴雨般的袭击下，英国侵略军慌作一团，手上虽拿着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也顾不得使用，只是往四下里逃窜，活象一群被赶掉了魂的老鼠。过去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卧乌古，现在连连摇着他那只冒着豆大汗珠的脑袋，神色仓惶，他用力拉开领口，粗着脖子，无可奈何地下令分两路突围，向四方炮台撤退。群众立即跟上前去，从两翼包抄敌人后队，加以围歼。

当天下午，丧魂落魄的英国侵略军在遁逃时，天色忽然剧变，团团乌云从各方裹拢而来，顿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倾下瓢泼似的大雨。不一会，大地便化成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稻田、洼地、道路、水塘。狼狈逃命的敌人，面对汪洋一片的田野，寸步难移。暴风雨却增添了英雄人民的战斗豪情。三元里一带 103 乡的人民，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精神抖擞地冲上前去，用轻捷锐利的古老武器和各种农具猛烈砍杀敌人，愈战愈勇。敌人妄图用刺刀抵挡，然而他们终于哀叹：“刺刀对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

这时，原来规定要撤退的妇女老少，也挥着锄头、铁耙前来助战或上阵喊杀助威。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这一切，正如当时人们所描写的“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组成了一幅人民战争雄伟壮丽的画卷。

在群众的追击下，敌人有的丧了命，有的陷在水稻田里爬不起来，有的一头钻进瓜棚豆篱下，有的再也顾不得大英帝国的“荣誉”，学着清政府三跪九叩首的礼节，跪在地上举枪向群众讨饶，求命之声震山谷。所谓“海上霸王”的英国军队，在中国人民面前原来不过就是这等模样！

当天下午 4 时左右，在四方炮台留守敌军的接应下，侥幸活命的英国侵略军才连滚带爬地逃回四方炮台。这时他们发现有一个连失踪了。原来，这个连在后退时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他们为了逃命，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一步地向后移动，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被歼灭的命运。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英勇机智的中国人民，却创造了用带钩的长矛，将敌人

从方阵里钩出来的巧妙战术来收拾他们。一个又一个英国侵略军被群众从方阵里钩出来后，夺下他们的洋枪，然后锄头、铁耙齐下，把他们砸得粉身碎骨。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1841年5月30日这天的三元里一仗，战果辉煌，打死英国侵略军200名以上，伤者更多，还活捉了不少俘虏，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胜利的喜讯传遍四面八方，人民的斗志更加激励昂扬。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广州城郊人民潮水般地冲向四方炮台，只见旗帜似海，刀矛如林，约10万群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领受过中国人民大刀、锄头滋味的英国侵略军，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广大群众，束手无策，只得龟缩在炮台里。

就在英国侵略者面临广大群众重重包围的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根据《广州和约》规定的撤离省城60里的投降条款，象送葬的队伍从广州城里撤出来。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有人过去招呼，要士兵们投入这里火热的抗英斗争，但被军官阻止。这边是斗志昂扬，英勇杀敌；那边是屈膝投降，卖国逃跑。人民群众的抵抗路线和清政府统治集团的投降路线，是如此截然不同！

被围困的义律、卧乌古眼见清军按《广州和约》撤离广州，很守信用，顿时愁眉舒展，立即派汉奸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卧乌古在信里使用了“征服者”所惯用的威胁语言：要清政府立即解散群众队伍，否则就解除《广州和约》，向前攻城，烧掉附近各个村镇。实际上，当时陷入重围，成了瓮中之鳖的英国侵略军，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向前攻城，无非是对清政府吓唬一番罢了。然而，奕山之类的软

骨虫，却被这封信吓得魂不附体，马上派余保纯出城为英军解围。

汉奸余保纯匆匆忙忙跑到四方炮台，先向义律、卧乌古再三郑重声明，当局并不知道这种敌意行动，保证没有一个清兵参加，请求谅解。余保纯也知道众怒难犯，就假意地左打躬右作揖，央求群众撤围，胡说什么现在已经讲和，洋人不会再欺负你们了，你们就放了他们罢！广大群众恨透了这个卖国贼，立即把他包围起来，“汉奸！卖国贼！”的怒斥声响成一片。余保纯见势不妙，便转身去找士绅，要他们设法解散群众，并且威胁说：包围炮台这件事是你们和乡民一起搞的，如果乡民不退，将来出了事，一切由你们负责，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也要由你们出。这些士绅本来是激于一时义愤，而且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财产，才跟随广大群众参加这次抗英斗争。他们是地主阶级分子，和清政府官吏本是一体，当然不会抗官。他们经余保纯一威胁，便动摇了，有的滑脚溜走，有的掉转身子，站到余保纯一边，帮助他来“劝散”群众。当时，广大群众对参加到抗英队伍里来的士绅的妥协性、动摇性和欺骗性，还缺乏认识。一场轰轰烈烈、惊天地动的群众抗英斗争就这样被卖国的清政府官员和动摇妥协的士绅破坏了。

英国侵略军在广州人民铁拳的打击下，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呆在广州，就在四方炮台解围后的第二天，夹着尾巴悄悄地乘船逃离广州。

义律为了掩饰惨败，打肿脸孔充胖子，在撤退时，竟无耻地出了一张所谓布告，诬蔑群众是“刁顽”，说什么这次宽

容你们，以后不许再犯。群众看了又气又好笑，立即针锋相对地在洋馆门前回敬了他一张告示。告示尖锐揭露英国侵略军的累累罪行，指出侵略军所以能窜入内河，完全是那批汉奸卖国贼开门揖盗的结果，并严厉警告侵略者，如果不早退出虎门，我们自有千百种烧船妙法，把你们的船只烧得个片帆不留。群众充满战胜敌人的信心，在告示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不靠官兵，不用政府的钱，我们自己出力，就能把你们这批猪狗杀得精光。并一再声明，我们一言既出，决不收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这篇反侵略战斗的檄文，激扬文字，气壮山河，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英国侵略者为之胆寒。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地武装起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个战斗，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大江南北的群众自发抗英斗争

英军铁蹄所到的地方，烧杀淫掠，十室九空。但是，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福建、浙江以及长江下游的人民，也和广东人民一样，在这次反侵略斗争中，不畏强暴，燃点起炽烈的抗英烽火，表现了勇敢的战斗精神。

1841年8月，英国侵略军攻占厦门，四出抢劫。人民自发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武装力量，用土枪对抗使用车炮的几千侵略军，打死打伤敌人无数，使敌人不敢久占厦门，退据鼓浪屿。

英国侵略军进攻镇海，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封锁、防守海岸，击退敌人的侦察船，砍伤和俘获了不少侵略军。

英军侵占镇海、宁波后，当地人民组成“黑水党”，奋起反抗。“黑水党”的成员以渔民、船夫和水手为主，后来又增加了一些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黑水党”以宁波为活动中心，经常在夜间袭击城里的英军。他们预先埋伏在城墙下面，等敌人在城墙上巡逻经过的时候，就发出一种怪声，引诱敌人探头张望。这时他们就用藤环准确地套住敌人的脑袋，把敌人从城墙上拉下来，后面的敌人还以为是失足跌下去的，伸头朝下望，结果也被拽下城墙。就这样，他们活捉了不少侵略军。有时，他们还装扮成洋人，等巡街的洋人走近时，故意上前搭话，乘他不备时，一刀砍下他的脑袋。他们还经常驾着来去如飞的八桨小船，四出打击敌人，有一位勇士先后就杀死了15个敌人。英国侵略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在岸上怕被杀被俘，在船上又担心遭受袭击，弄得畏首畏尾，日夜不安。

英国侵略军侵占吴淞、宝山、上海时，当地农民几十人一群，用锄头、木棍、竹竿当武器予以狙击。他们还冲进城去袭击敌人。英国侵略军企图沿苏州河进犯苏州，强迫松江渔民王在坤给三艘英舰引航。王在坤看到敌舰吃水深，就机智地把它诱入湖水不深的泖湖。结果敌舰搁了浅，再也没有办法前进，迫使敌人放弃进犯苏州的计划。

镇江失陷前后，沿江人民巧妙地用稻草阻挡敌人。他们准备了很多装满稻草的船只，当敌舰闯来时，就把稻草推向江里。霎时间，江面一片金黄色，一层厚厚的稻草铺满了江

面，直朝敌舰急淌去。英国侵略者虽有一二百年在海外进行侵略战争的经历，可弄不懂这满江稻草是怎么回事，他们张嘴结舌，摸不着头脑。不断淌下的稻草密密地把敌舰围住。稻草钻到敌舰下面，把敌舰泼水的叶子堵死了，敌舰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就这样被钉煞在江里，急得英国侵略军哇哇乱叫。夜晚，当地群众又采用顺风施放火筏、火船的办法，袭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打击敌人的方法，给敌人以无休止的困扰。一个侵略军军官在回忆录中供认，占领镇江后，他们不时遭到袭击，根本得不到什么休息，哀叹这是最伤脑筋的事。

当一队英国侵略军闯到靖江掳掠时，有人大呼：“洋鬼来了！”一位勇敢的少年在城墙上拾起一块砖，狠狠地扔向敌人，有个闯入城内侦探虚实的侵略军被砸得脑袋迸裂，倒地丧命。为了对付前来报复的敌人，靖江人民连夜组成一支约千人的群众武装力量，固守堤岸，迎击敌人。第二天，英国侵略军果然开来靖江妄图报复，全城人民奋力抵抗，击退敌人，迫使敌人不敢再犯靖江。

英国侵略军侵占镇江后，瓜洲、仪征一带盐民也组织起来，攻击敌人，烧毁英船多艘。

大江南北人民自发的抗英运动普遍而迅速地发展，在1842年6月到8月短短的时间内，大江南北人民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以上，足见当时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的高涨。

各地人民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和顽强反抗的革命精神。

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道光年间，台湾属福建省。鸦片战争中，台湾最高官员是总兵达洪阿和按察使衔台湾道姚莹。

英军对台湾早有觊觎之心，在鸦片战争中，多次入侵台湾。达洪阿、姚莹等都认为，对台湾防务必须早作准备。敌人来犯，要独立作战，依靠自身的力量，把敌人赶走。

台湾总兵力有 1.2 万余人，在澎湖列岛驻 2 个营，后山噶玛蓝驻 1 个营，其余部队分驻沿海各要口。为发动民众共同保卫台湾，在台北由绅士铺户募壮勇 2000 余人，协同兵弁，分守八门，巡防街道，保障治安。安平北的国赛港，南之三鲲身、喜树等地，都委派壮健乡勇，设伏以待。

台湾设防的重点地区在基隆、沪尾和安平一带，1840 年在沪尾添建石炮台 1 座，将基隆炮墩改建成石炮台，两侧添建石墙防护。安平系土城，不够坚固，在外面用大毛竹编成高 5 尺，宽 1 丈多、中实以沙土的夹墙一道，夹墙外挖长壕保护。安平北 6 华里为四草，在此修砌石壁夹墙 220 余米，内设炮位。从福建运来 8000 斤大炮 4 门、6000 斤大炮 2 门，分别架设在基隆、沪尾和安平等 3 个炮台。台湾当地自己赶制小铜炮多门，改造炮子，增大杀伤力。在鹿耳门、国赛港、三鲲身等地，修葺旧哨船 4 只，购买民船 5 只，准备大量巨石，随时塞港，防止英军闯入。台北原系土城，由知府熊一本负责加修。沿海一面，外城早已倒坍，由姚莹亲督阎焘，再修造 2000 多米木栅一道，安设义勇，以资捍卫。

1840年6月，英船曾到台湾鹿耳门外活动，被我官兵赶走。后来，台澎外洋时有英船窥视，达洪阿、姚莹严密防守，英军终未得逞。

璞鼎查率舰北犯闽浙时，曾派出兵船3只骚扰台湾，因风浪大，2只未能开到，只有纳尔不达号于1841年9月30日驶入基隆口外万人堆洋面，对我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参将邱镇功令二沙湾炮台还击，英舰船桅被我打断后触礁，英军惊恐万状，有的爬上小岛，有的驾驶舢板，四处逃窜。邱镇功率守备许长明、欧阳宝，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指挥士兵驾驶快船，兜抄英军，生擒43人，毙4人。县丞宓惟康带领乡勇，俘敌31人。总理谢集成、董事吴助友和义勇首领等又俘敌25人，毙1人；同知曹谨亲属郝芝，带领家丁，活捉英军5人；千总陈大坤会同德化县典史陶荣在沪尾开炮击沉南逃之敌舢板1只，活捉18人，打死1人。翌日晨，英军20余人驾驶舢板1只，在观音山一带被清军赶上，刺死19人，活捉7人，夺得大炮4门。士兵谢捷升和2名乡勇，作战勇敢，均受伤。谢捷升伤后身亡。在外洋草屿，清军又打死英军7人。此次共活捉敌军133人，毙敌27人，溺毙75人，缴获大炮10门。

1841年10月19日上午，一艘英船在基隆口外，初挂红旗，继挂白旗，下午3时驶进万人堆洋面。参将邱镇功、同知曹谨、通判范学恒分赴各要隘，调屯丁250名，加强基隆、沪尾防守。傍晚，英军舢板2只向清军索要被俘英人，清军拒绝。27日，该船直扑二沙湾炮台，猛烈开炮，清军回击，将敌打退。这次战斗，我方损坏大炮5门，烧毁哨船1只，受

伤数人。

1842年3月5日，英军兵船阿纳号在淡水、鹿港接壤处的五义港外洋游弋，达洪阿、姚莹遵奉朝廷不与海上争锋，惟宜诱其搁浅设法歼擒之策，由淡水同知曹谨、鹿港同知魏瀛、通判范学恒、彰化知县黄开基、副将关桂等雇募渔船，在北路一带埋伏。11日，阿纳号随带舢板4只，在谈、彰交界的大安港外洋准备入口。关桂、安定帮等指挥军兵，驰往堵御，英军攻扑不进，未能进港，又退出外洋，后被清军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关桂、安定帮督令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率士兵奋力攻击，将敌船击破，全歼该敌，生擒敌军49人、汉奸5人，溺毙3人，缴获大炮10门、鸟枪5枝、腰刀10把。

英军前后数次侵犯台湾均在两国开战之际，清廷早已对英宣战。英军在我国沿海攻我城市，夺我领土，残害人民，台湾军民对来犯英军的武装船只进行攻击，理所当然。可是，在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时，璞鼎查节外生枝，咨会耆英，指控达洪阿、姚莹在台湾无故攻击搁浅之英船，混行杀戮，要求将达洪阿抵罪。道光帝坚决不同意，他在廷寄中说，“两军交战之时，明攻暗袭，势所必然”，“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民不加诛戮耶？”耆英、伊里布等生怕台湾问题有碍全局，再起战端，坚持派人查处。道光帝于1843年1月11日派遣闽浙总督怡良赴台调查。怡良在3月31日的调查报告中说，达洪阿等在台湾缴获的枪炮刀械、号衣和各种文件，都是英军从镇海、宁波抢来的，只是达洪阿、姚莹等一意铺张，奏报不实，故将他们撤职，递解北京。军机处会同刑部审讯，达洪

阿、姚莹坚称，英人前后屡次犯台，两次破获英船，抓得俘虏，获得炮械图册印文属实，本系由璞鼎查派来滋扰之兵船，只是在奏报时未曾详细核实，令英人借端生事，难以论是非，自请其罪。审讯完毕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台湾两次擒获英俘正法，皆文武士民之力，达洪阿、姚莹何敢邀功？英人屡犯台湾未获一利，反被破舟擒斩，衔恨实深，达洪阿、姚莹考虑粗疏，未能事先预料，才找了麻烦。道光帝指示内阁：达洪阿、姚莹在台湾多年，微劳足录，只是未亲至访查核实，率行入奏。维持原革职之议，不再另行追查。问题就这样了结了。

第三节 中国开始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

要内容有：

（一）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及所属家眷在上述五地寄居，同时准许英国派驻领事馆等官。这些通商口岸的开放，不是平等互利的，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据点。

（二）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香港从此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在那里设官治理，把它进一步变成了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三）中国赔偿英国的款项总数为 2100 万元，其中军费 1200 万元，鸦片费 600 万元，商欠 300 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赎城费 600 万元不包括在内。

（四）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就是说，中国海关无权自行确定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这项规定，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便利条件。

（五）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需要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有关问题，中英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 年 7 月 22 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并在香港公布。10 月 8 日，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是这一条约的一部分。

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权：

(一) 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这项规定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先例，使他们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二) 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在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亦准英人一体均沾”。此项条款为英国和其他国家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互相援引，攫取各种侵略权益开创了恶例。

(三) 居住及租地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后来，外国侵略者利用这项特权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并逐渐发展为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特别区域。

另外，《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其中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 50% 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 90%。《海关税则》还规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进出口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英国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海关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虽然都未提及鸦片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中英两国谈判的重要问题之一。《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璞鼎查正式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耆英在书面答复中说：“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实质上是允许继续鸦片走私。《虎门条约》签订前，英国政府仍要求

将鸦片贸易合法化。1843年6月，璞鼎查建议将广东南澳和福建泉州两地作为鸦片贸易集散地。随后，他又派马礼逊出面交涉。马礼逊诱骗清朝官员说，中国对鸦片“名禁实不禁”，“名为禁烟，实为免税”，“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对于缴纳鸦片税问题，耆英虽心存疑虑，但仍表示若英国若保证每年缴纳500万两鸦片税银，他便奏请道光皇帝批准。璞鼎查不同意这项条件，因而谈判未获协议。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走私较战前更加猖獗。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1843年，美国首先派专使顾盛来华。顾盛到达澳门后，利用清政府的恐惧心理，采取种种恫吓手段，甚至以战争相威胁。他照会护理两广总督程裔采称：“不日进京”，“约一月之间，兵船满载粮食，即驶往天津白河口而去。”程裔采奏报清廷说：“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已可概见。”1844年7月3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享有除割地、赔款以外的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同时还新增了以下几项重要的侵略权益：（一）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不得过问。（二）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

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三) 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四) 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

《望厦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也采取同样的伎俩，派专使拉萼尼来中国进行讹诈。1844年10月24日，清政府派耆英在广州附近的黄埔与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在《黄埔条约》中，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增加了一条：“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主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实际上是它迫使清政府放弃对天主教禁令的开始。至1846年，法国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基督教随后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战后社会经济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产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多英镑，1845年竟达239.4万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与此同时，美国输华商品也有显著增加。

但是，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倾销商品的情景，并没有像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美好。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像潮水般涌来的西方工业新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广泛的销路。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委员会的报告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西方资产阶级又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够，于是他们便叫嚣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鸦片走私仍是西方侵略者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鸦片走私实际上变成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按：当时英国人称广州以北地方为北方）消费量占五发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鸦片输入量的激增，进一步激化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19世纪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严重的五口通商地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发生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而中国手工业的最重要的部门也正是纺织业。因此，最早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便是五口通商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绵纱棉布的源源输入，这里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据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梭市，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在福建厦门一带，原来这里的商人将漳州、同安的土产棉布运往宁波、上海、天津、辽宁及台湾一带销售，又在宁波等地购买江浙的棉布及其他货物运回厦门销售，生意十分兴隆。但自英国在厦门开市通商后，“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门运入各府销变，

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在广州附近，“（顺德县）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佛山）1854年后……纺业停顿”。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万多包。由于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浙江的南浔镇辑里丝开始大量出口。湖南、福建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缓慢过程相比较，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主要是五个通商口岸）却于战后迅速畸形繁荣起来，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便利，又距丝、茶产地很近。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战后就开始将经济侵略的重点转向上海。自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848年和

1849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它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还保有干预权，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排斥国中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中国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在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开设洋行，强划租界，享有治外法权，鸦片贩子、投机商、流氓、骗子等等蜂拥而至，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说，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通商口岸还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华工的罪恶勾当，英国人称之为“苦力贸易”。实际上，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的奴隶贸易是同样性质的。外国侵略者以拐骗和武装绑架等卑劣手段，掠夺华工，在其胸部烙上印记。他们在运往美洲各地的途中，被锁在狭小而又拥挤的船舱里，死亡率很高，幸存下来的，到国外后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从1845年在中国出现第一批契约华工起，10年之中，出口华工达15万人以上。自1850年以后的25年间，猛增到228万人。这项灭绝人性的罪恶贸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852年11月，在人口贩子较为集中的厦门，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掠夺华工的斗争。另外，华工的船上暴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

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40年代，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很多，但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由于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开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原是广州同顺行的行商，略谙英语，与外国人交往甚密，五口通商后到上海，出资捐得候补道，1848年3月奉清政府的命令协同上海道咸龄镇压青浦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年，他署理上海道，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牵线人物之一。另一个由广州同孚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以白银8万两捐得候补道，后来由两广总督耆英委派帮同广东巡抚黄恩彤办理“夷务”，很受重视。这些情况说明，有些买办商人已开始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法、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1843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1845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英人在上海创办《字林西报》；此后，英、美又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广东人民

在战后 10 年间，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反对英国在广州强行租地的斗争，以及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他们提出了与英国侵略者“不共戴天，誓灭英夷”的豪言壮语，十分痛恨官僚卖国，“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他们认识到：“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侵略者面前，人民群众崇高的爱国思想同清朝统治者妥协媚外的投降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是农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战后思想、学风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著名代表人物除林则徐外，还有魏源、姚

莹、徐继畲、梁廷楠等。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后与龚自珍齐名。他讲求经世致用，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漕运、水利、盐政诸事。他在鸦片战争前即认为鸦片贸易是使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鸦片战争期间，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参与筹划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他撰《圣武记》，历述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思想。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魏源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

魏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

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封建的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地由民众选举，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这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对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过不小影响。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道光初年，他结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私交颇厚。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员，严禁鸦片入口，积极组织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他的抗英活动被诬告为“冒功欺罔”，被贬官四川。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姚莹即已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战争的失败，使姚莹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说：“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怀着悲愤的心情，他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1845年，姚莹撰写的《康輶纪行》一书问世。该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了考察，而且对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书中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

者，就必须了解敌情，知己知彼，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情况，“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他很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虽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了解很肤浅，然而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徐继畲（1795—1873年），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任按察使、巡抚等职。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徐继畲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人，广泛搜集西方书籍，“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1848年，他撰成《瀛环志略》10卷。与《海国图志》一样，《瀛环志略》也是近代中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所记述。徐继畲还在书中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给予称赞，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进步思想。

梁廷楠（1796—1861年），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曾任澄海县训导等职。鸦片战争期间，他热情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梁廷楠在鸦片战争前即注意“采集海外旧闻”，探究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1844年后，他陆续撰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岑偶说》、《粤道贡国说》，1846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合省国

即美利坚合众国，兰峇即英国首都伦敦，此处泛指英国。《合省国说》和《兰峇偶说》就是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简要记叙，而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尤多。这有助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面貌的了解，开阔人们的视野。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边疆局势趋于严重，于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究心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写出专门的著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张穆（1805—1849年），字石洲，山西平安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示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卷。何秋涛（1824—1862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授刑部主事。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壤，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编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许多学者来记述这次战争的经过，探讨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唤醒人们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系统记述鸦片战争史实最早的一部著作。梁廷楠的《夷氛闻记》五卷，也是记载这次战争经过的，尤详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和《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等地人民继续坚持反英侵略斗争的事迹。此后，夏燮编撰了《中西纪事》一书。这些著作都表现了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妥协投降，称颂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是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如诗歌，著名的作者有魏源、张维屏、张际亮等。魏源的《寰海》诗，歌颂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反抗英国侵略军，斥责清政府官僚的妥协投降。张维屏（1780—1859年），字南山，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道光进士，历官知县、知府等。以善诗闻名。他的《三元里》诗，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雄伟声势，英国侵略者在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丧魂落魄的丑态；《三将军歌》则歌颂了葛云飞、陈连升、陈化成三位“捐躯报国”的英雄人物。张际亮（1796—1843年），字亨甫，福建建宁人。以诗名于时。他的《东阳县》诗，谴责英国侵略军在宁波奸淫掳掠的残暴罪行，揭示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民间的揭帖和歌谣，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争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年），字澹斋，河南固始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广东南海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他在总结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

望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年），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詵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又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介绍了蒸汽机、火轮船等西方新式器物的原理和制造方法。

第二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一、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后，封建压迫和外国侵略交互为恶，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使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失业者增多；鸦片输入激增，银贵钱贱的状况更加严重，至 1850 年，已上涨至每两白银换钱二千二三百文，比战前又提高了 40%；清政府的军费 7000 万两，连同赔款 2100 万元，也都转化为捐税和赋收，压到劳动人民身上；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苛重的地租和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

1846 年至 1850 年，许多地区连续遭到水旱灾荒。

“人祸”、“天灾”，促使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鸦片战争后的10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税斗争，不下100余次，遍及全国。北方各省的白莲教、天理教，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的捻党，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斋教以及遍及长江及珠江流域的天地会等，均积极活动，举行起义。其中两广及湖南一带受到鸦片战争的危害最深，清政府在这三省征调的兵力、粮饷最多，战后又将壮勇就地裁遣，加上连续天灾，饥民流离失所，因此，不断发生起义和暴动。如1847年，天地会首领雷再浩在湖南新宁领导汉、瑶等族起义，转战于湘、桂边界；1849年，李沅发又在原地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纵横湘、桂、黔三省边境10余县。至1850年，广西天地会和饥民起义，已遍布全省，在这种形势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了。

二、洪秀全、 冯云山等人的早期活动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7岁入村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等。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业师和家庭都对他期望殷切，相信他能及时取得功名，以“显父母，光宗族”。“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所走的道路，洪秀全早年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

1828年，洪秀全初次到广州应考秀才，没有考取。此后，他一面当村塾教师，一面努力读书，又几次去广州应试，但

都名落孙山。

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就在 1843 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书是 7 年前他在广州应考时得到的，内容是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洪秀全读后反应强烈，“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于是他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这在他一生中成为重要的转折点。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首先受洗。不久，他们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了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结果他们失掉了塾师的职位。

1844 年，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农民受洗礼入教 100 多人。9 月，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11 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撰写诗文来进一步阐发宗教教义。

在乡居期间，洪秀全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原道救世歌》宣传天父上帝是中外古今共同的独一真神，主宰万事万物，人间的一丝一缕、一饮一食都是上帝的赐与，因此，人人应该敬拜上帝，不拜菩萨邪神。这篇长歌，还着重劝人要作“正人”，为善积福，反对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等不正行为。《原道醒世训》批评了相夺相斗相杀的世道人

心，提出天下男女都是上帝生养保佑的兄弟姐妹，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起尔吞我并之念，而当实行像唐虞三代那样，“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的“大同”社会。至于如何实现这样的社会，洪秀全在这篇作品中指出的办法仍归结于个人的身心修养，只要人人能“循上帝之真道”，“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就可以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1847年春，洪秀全离开花县前往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教全学习基督教义，得读《新旧约圣经》。罗教全认为洪秀全的思想不纯，不是“合格”的教徒，拒绝为他进行洗礼。洪秀全在广州只住了几个月，便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去找冯云山。

紫荆山是个大山区，地势险要。居民大多数以耕地、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冯云山于1844年来到那里，以做工、当塾师为生，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壮族）。1847年8月，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后，看到冯云山已经开辟了这块基地，拜上帝会的教义在群众中得到传播，信心大增。为了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他们还派人进壮、瑶等人民居住的山村进行宣传，扩大组织，并带领群众捣毁甘王庙等庙宇，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

在广西期间，洪秀全又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

天日》。《原道觉世训》除加强宣传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功能，要人们朝夕敬拜外，还提出同“皇上帝”相对立的“阎罗妖”，作为一切妖神的代表，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应当共同击灭之。由此，它抨击历代帝王妄改皇上帝尊号，指出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人间君主不得僭越，表现了对君主的蔑视。《太平天日》记述洪秀全 1837 年病中异梦及后来两次去广西活动的事迹，它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是“真命天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表露了洪秀全的反清思想。

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1848 年 1 月，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县官将冯云山投入监狱。这时，洪秀全正在贵县，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

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发生混乱。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被拜上帝会会众营救出狱后，1848 年冬往广东寻

找洪秀全。1849年7月，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广西到处发生天地会领导的群众反抗斗争。而清方在这里的统治力量又很薄弱。巡抚郑祖琛“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逢迎其意，一味敷衍。提督闵正凤也是“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在有利的形势下，拜上帝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汉、壮、瑶等族的农民，还有矿工、手工业者、挑夫、小贩以及无业游民等。此外，还有一些农村知识分子和家境富裕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也参加进来。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壮族）和石达开。

拜上帝会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在获得消息后，各地会众扶老携幼，1万多人陆续到金田会合，途中不断与拦阻的清军、团练发生战斗。

金田团营前后，会众根据“同食同穿”的精神，“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种制度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起义初期，对于保持起义队伍的团结和纪律，发扬艰苦战斗的精神，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廷得到广西到处起事的消息，颇为重视，先后将闵正凤、郑祖琛革职，调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署广西巡抚，赴桂主持军务。1850

年11月，林则徐行至广东普宁县途次病故，清廷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

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事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12月底，在平南县思旺击溃清军。1851年1月1日，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杀副将伊克坦布。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

第二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

一、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

1850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是洪秀全38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军纪五条：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雠（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五条军纪，对加强太平军的团结和战斗力，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争取战争的不断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为了壮大起义队伍的力量，洪秀全主动争取桂平一带的天地会加入太平军。天地会山堂分立，成分较复杂，对太平军的态度各不相同。罗大纲、苏三娘分别率所部参加太平军，

建立战功，成为太平军著名的男女将领。张钊、田芳等一度加入，因不愿遵守太平军的纪律，随即离开，叛变投敌。张嘉祥则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就已投降清军，改名张国樑，成为农民起义的叛徒，始终与太平军为敌。

在这之前，清政府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并不了解，认为是“乌合之众”，把主要力量用来镇压天地会起义。钦差大臣李星沅奉命进入广西时，金田起义已经爆发，才发现太平军“实为群贼之尤”，不得不据实上报，并主张“聚集精兵，全国攻剿”。他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1万多人派往桂平，广西提督向荣亲至前线指挥。

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作战，在大湟江口攻破清军。3月间，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基。大约同时，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

5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钦差大臣赛尚阿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并调蒙古都统巴清德等协同指挥军队，对太平军进行围攻。太平军撤离东乡，辗转进至平南。8月，在平南宫村击溃向荣部队，取得了大胜利。于是乘胜前进，一举攻克了永安州（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颁行了天历，制订各种制度。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初步形成，这对于加

强领导、发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诏令还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

清统治者在加紧军事上围攻太平军的同时，还采取“多购间谍，解散党羽，计诱贼首，（使之）自相携贰”的阴谋手法，妄图从内部瓦解太平军。对此，洪秀全教育太平将士要警惕“妖魔多端诱惑”，必须“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对于那些投降变节分子则予以严厉镇压，清除了暗中投敌的周锡能等人。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清军3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突围北上。清军虽“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但“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在突围战斗中，太平军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滚下崖涧，仅免一死。这一胜利打乱了清军围剿的部署。太平军北上途中，所向披靡，直逼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省会，清军负隅顽抗。太平军猛攻一个月，未能攻克，于是转进全州。6月3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攻打全州时，冯云山不幸中炮，身负重伤，不久于蓑衣渡去世，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和组织者。

太平军撤离全州后，即从广西入湖南，于6月12日攻克道州。在道州休整两月，扩充队伍，铸造大炮等兵器。这期间，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讨胡救世安民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揭露清政府黑暗统治，“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务期肃

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8月17日，太平军进克湖南重镇郴州。在道州与郴州，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的，为数很多。太平军男女人数，包括非作战人员，至此已约有10万人。新参加的人中间有许多是挖煤工人，他们组成土营，凡遇攻坚，负责挖地道，放置地雷，轰塌城墙，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郴州，洪秀全、杨秀清派萧朝贵率军从间道疾行北上，于9月11日直逼湖南省城长沙。次日，萧朝贵在攻城时不幸中炮负伤，随后去世。继冯云山之后，太平天国又失去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赶赴长沙增援。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攻城未下。11月30日，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攻打长沙的行动，移营转进。12月，攻克益阳，轻取岳州，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组织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这对于后来进军长江中下游起了重要作用。

1852年底，太平军由岳州进入湖北。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城。清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

武昌是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重镇，湖北省会。太平军第一次攻占一座省城，影响很大。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加紧进行战争部署，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挽回节节败退的危局。

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1853年2月，洪秀全、杨

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蔽江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和州等地。3月8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水陆连营，“直望无际”，“既众且整”，使南京城里的敌人“望之夺气”。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20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完全占领了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3月31日，罗大纲等率军攻克江南重镇江；4月1日，林凤祥、李开芳（均壮族）率军攻克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后，仅仅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席卷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最后奠都南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胜利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破除神佛偶像及孔丘牌位，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太平军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了迅猛发展。

二、清政府的疯狂反扑

1850年2月，道光帝死去，其子奕訢继位，次年改元咸

丰。太平军的巨大胜利，引起了清政府的极端恐慌，咸丰帝急忙采取对策，以挽救危机。

1853年2月，清廷任命广西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令其全力镇压太平天国。3月31日，向荣率军万余人，尾随太平军之后，到达天京城外，在东郊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以阻止太平军东下，并随时威胁天京。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与直隶提督陈金绶等率领来自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2万余人，屯驻扬州附近邵伯埭、帽儿墩、雷塘集等处，建立“江北大营”，以阻止太平军北上，封锁太平天国北面交通。两个大营共有兵力3万余人，后来又有所增加，其中江南大营多为绿营兵，江北大营多为八旗兵，他们战斗力虽然不强，但人多器精，盘踞天京南、北两面，对太平天国造成威胁，牵制太平军的行动。

同时，清廷又抽调西北、东北各地军队进驻河南、山东，并将盛京、黑龙江的防军移驻北京附近，妄图阻止太平军北进。

清廷因八旗兵、绿营兵屡战屡败，便采取过去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办法，在1853年初命令长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协助地方当局举办团练。团练是一种地主武装，分“乡勇”和“团勇”两种形式。随营打仗，由官府发给口粮的是乡勇；地主筑堡防守，由地方自筹口粮的是团勇。1853年1月至3月间，在湖南、安徽等10个省，咸丰帝先后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曾国藩（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后升至侍郎。他笃信

程朱理学，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1852年任礼部右侍郎时，因丧母回家守孝。1853年1月，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认为团练这个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无法与建立了政权和强大军队的太平天国相抗衡，于是便利用团练大臣的权力来另创新军。他以湘乡秀才罗泽南、王鑫等所带领的湘乡团练千人为基础，效仿明代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将湘乡团练分为左、中、右3个营，逐日操练，在1853年2月初编练成最初的湘军。后来，又增募湘乡、新宁等地农民，将湘军扩充至10个营。1853年秋，又在衡州、湘潭设厂造船，配置洋炮，建立水师。至1854年2月25日，湘军正式建成，计有陆军13个营、水师10个营，陆勇、水勇各5000余人；连同夫役等共1.7万余人，陆军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水师以褚汝航为各营统帅。

湘军在组织上，以湖南地主豪绅和封建文人作为骨干，以同乡、同学、宗族、亲友、师生等封建关系作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内部联系，建立严格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自选什长，什长自选兵丁。由是自兵丁起，各人对其上级，“皆如子弟之视其父兄”，各级官弁层层相依，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纠正了绿营散漫的弊病，也开创了中国近代军阀军队的先例。在思想上，湘军以程朱理学作为精神支柱，以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相标榜，官员常以封建卫道者自居，兵丁多为山野农民，被灌输忠义思想，成为清廷的武装工具。在军事上，购买洋枪、洋炮，并设置船厂，制造战船，装备自己。这样，曾国藩及其湘军就成为太平天国

最凶残的敌人和最主要的对手。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饷，千方百计地榨取人民。除了扩大捐纳，卖官鬻爵和广开捐输，勒索商民报效，以及对国赋采取附征和漕粮勒折浮收等外，主要的措施是设厘金、发票钞、行大钱。

厘金是一种工商税，分为两种：一种是行商的货物通过税，称为行厘，又称活厘；一种是坐贾的商品交易税，称为坐厘，又称板厘。按价征收，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为“厘金”。1853年10月，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埭等镇设厘金所开征，充作军饷，半年后即征收钱2万串。第二年，厘金制推行到许多地区，清廷令各省仿行，至50年代末已遍及全国，成为清末固定的税收制度，直至民国期间，即1931年方始裁撤。清政府通过厘金，每年搜括到数以千万两的白银。厘金不仅对工商业者和劳动人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而且严重阻碍商品经济和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还于1853年发票钞，行大钱。票是指“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名“银票”，票面载有银两数，分1两、2两、3两、5两、10两、50两等。钞是指“大清宝钞”，以钱文为单位，又名“钱票”，票面载有制钱数，分500文、1000文、1500文……，直至一百千文等，规定官票银两抵钱2000文，宝钞2000文抵银1两，全国通行。至1860年止，清政府共发行官票、宝钞合银2330余万两。与此同时，还铸造劣质铜、铁大钱，铜大钱分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6种；铁大钱分当一、当五、当十，3种。至1861

年止，仅户、工两部铸造的大钱共合银 826 万余两。由于清廷滥发票钞，滥铸大钱，引起了“百物腾贵”和货币贬值。1858—1859 年间，当十铜大钱每枚仅制钱一二文，人民深受其害。

三、太平军北伐、西征

太平天国除在天京严密设防外，1853 年 5 月又分兵北伐和西征，对清政府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北伐的总目标是直捣清朝的都城北京。1853 年 5 月 8 日，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军约一万数千人，自扬州出发，开始了北伐进军。北伐军在浦口上岸，经安徽北上，一路连破州县，6 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毙伤清军 3000 余人。北伐军沿黄河南岸西进，攻省城开封，不克。于是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7 月进围怀庆（今沁阳）。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 2 万人防堵。北伐军在这里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围攻将近两个月，未能攻克。9 月，北伐军遂撤围，入山西，复经河南入直隶，克军事重镇临洺关，讷尔经额军被击溃。10 月，进占深州。咸丰皇帝命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调集军队阻挡北伐军。京中官绅逃迁者 3 万多户，情况极为混乱。北伐军乘虚东进，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屯据静海、独流。时届隆冬，北伐军粮尽衣缺，于 1854 年 2 月南撤，5 月转据东光县连镇待援。天京派出的援军，曾到达山东境内，不幸在临清失败。北伐军

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南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在两地，处境更为困难。连镇被清军合围，林凤祥及太平军将士同敌人英勇战斗，坚持至1855年3月粮尽失守。林凤祥受伤被俘，在北京惨遭杀害。连镇陷落后，扼守高唐州的北伐军由李开芳率领南下，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屡次突围都未能成功。5月31日，李开芳就俘，北伐最后失败。

太平军的北伐，是太平天国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北伐军在2年内横扫6省，转战5000里，连克数十城，直抵清朝的心脏地区，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给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了有利的形势。但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远离根据地，得不到后方的有力支援，又没有主动联系和发动群众，因而最后陷于失败。这使清政府得到喘息时间，稳住阵脚，重新纠集兵力，实行反扑。

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还派兵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在于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发展在南中国的势力。

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壮族）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当月即攻克安庆，进围南昌。9月，撤南昌之围，攻下九江。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

一支由胡以晃等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1854年1月，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杀。太平军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给养地，在军事上、经济上一直是举足

轻重的战略要地。

另一支由韦俊等率领，自九江沿江西上，1853年10月再克汉口、汉阳，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于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水而死。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6月再克武昌。

西征军在湖北获得辉煌胜利后，攻入湖南，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顽抗。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以动员一切反对势力起来镇压太平天国。

进入湖南的太平军于4月再占岳州，大败湘军，并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太平军同湘军水陆激战7天，伤亡很大。5月，湘潭沦陷，太平军突围走靖港。这时，靖港的太平军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没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钳制长沙消灭湘军的计划，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曾国藩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准备反扑。7月湘军重新出动，攻陷岳州。

这年10月，湘军和湖北兵勇反扑武汉。太平军迎击，战斗一整天，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停泊在汉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军焚毁。1855年1月，湘军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军在

西征战场上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曾国藩的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面对这个局势，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先集中力量打击西线湘军。1855年1月，由石达开为统帅，率大军西援。西征援军到达湖口后，用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灵活战术，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使敌军“辎重丧失，不复成军”。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太平军乘胜西进，2月底占汉阳，4月第三次克复武昌。这年年底，太平军向江西进军，至翌年3月间，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江西13府中的7府1州50余县，都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国藩困守的南昌，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呼救无人”，“魂梦屡惊”。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又在天京外围组织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镇江开始的。清军于1855年围困镇江，吴如孝坚守待援。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奉命自上游赴援。4月，吴如孝与秦日纲内处夹击，大败清军。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大败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军，连克扬州、浦口，江北大营120余座营垒纷纷溃散。6月，太平军又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又乘胜攻破江南大营，向荣率残军逃至丹阳毙命。太平军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3年之久的军事压力，取得了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太平天国通过3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长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的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第三节 太平天国 前期的制度和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每亩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好坏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同时，还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办法。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业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生产和分配，都由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一“两”。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

在分配问题上，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

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²⁵ 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库供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

《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

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二、巩固政权的各项措施

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建制时，开始建立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定都天京后，又进一步完善。

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为天王，天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皆为世袭制；另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卒长、两司马 12 级职官。王侯与职官均军政兼管，不分文武，既处理政务，又领兵出战。

太平天国政权机构分为中央、省、郡、县 4 级。由于东王杨秀清具有“节制诸王”的权力，各级官员除奏谢恩赏可直达天王外，军政大事都要先汇总经东王裁处，然后上达天王，由天王最后决断。东王府实际上成为太平天国前期总理国务的中央机关，东王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首称尚书，掌握天国军政实权。

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五等职官称“朝内官”。由中央任命。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分省、郡、县 3 级，均由中央任

命，称“守土官”。省级官员大多由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

县以下地方基层政权，官员由各地公举或上级委派本地人担任，称“乡官”。基层政权是仿行太平军的编制，以5家为伍，设伍长，5伍为两，设两司马；4两为卒，设卒长；5卒为旅，设旅帅；5旅为师，设师帅；5师为军，设军帅。每1军帅管1.3156家，每25家组成1两，两是基层政权中的最基本单位，两司马是乡官中最低级官员。

乡官的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供应军需，清查户口，维持地方治安，管理民政和诉讼，征集乡民等等。

圣库制度始于1850年金田团营，此后即在太平军中推行，建都天京后，又在天京城内推广。它是一种一切财产归公和大体上平均分配的收藏、保管、分配、供给的制度。

太平天国自1851年攻克永安后，即迭次颁布命令，禁止太平军将士私藏金银绸帛宝物，一切缴获均归圣库。定都天京后，又明文规定：“凡私藏金银即是变妖，定斩不留”。所以在太平军中，天京城内，人人不准积蓄私财，一切财物均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供给。

天京居民按照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妻不得同居。男女除参加军队外，均要参加生产劳动和在衙门中服役，老弱病残编入牌尾馆，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检拾字纸、打扫街道等。

太平天国在天京水西门内成立“天朝圣库”，内设“总圣库”4人，“总圣库协理”2人，总管天朝公有财产，统筹天京全城军民生活。每礼拜日，各官开单赴各典官衙领礼拜钱、

粮米、油盐及祭上帝物品。官员每人每 7 日给钱 100 文，士兵 50 文。每 25 人每 7 日给米 200 斤，油盐各 7 斤。无论是文职官员、太平军将士，还是天京居民，基本上均是如此，一律由圣库供给衣食器物。

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对于吸引贫苦群众参加太平军，维护官兵团结，发挥艰苦奋斗作风曾起了积极作用。但它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依靠政治权力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平均分配，必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生产。因此，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便日趋破坏，名存实亡。

太平天国初期，在天京城内废除商业、贸易，城内军民生活日用所需，均由圣库定额供给。这种做法，使得物质匮乏，1854 年便改变办法，在天京北门桥一带开设公营商店，接着又在天京城外设立买卖街，作为城内军民向城外人民买卖货物的场所，准许私人经营商业。

后来，太平天国不仅允许在天京城内，而且也允许在其他州县城外，商人自由经商。开店者，发给“商凭”；贩运者，发给“路凭”。采取鼓励和保护商业的政策。同时也自己经营商业，开设公营商店和买卖贩运货物。

天京政府对手工业实行分工管理，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分为木营、土营、金匠营、镌刻营、金靴营、绣锦营七种，百工衙分为典炮衙、豆腐衙、铸钱衙、缝衣衙、刷书衙等数十种。集中了各种手工业者，其中也有不少是天京的一般居民，从事集体生产，产品全部交公，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官营手工业，对于保障供给，

满足政府和军队的需要起了一定作用，但却妨碍了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女子不仅可以和男子同样分得土地，参加各项生产劳动，也可以参军、当官、参加考试，去礼拜堂礼拜，参加社会活动，接受教育，有才干的还被选拔担任女丞相、女监军等。并且废除封建买卖婚姻，明令禁止娼妓、纳妾、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恶习。但是它又宣扬了“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在天国领导人中，还保留嫔妃制。这些都表明妇女政策的局限性。

在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赞成平等贸易，反对外国侵略的原则。1853年4月，英国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到天京“访问”时，曾在28日将中英《南京条约》的中文本送给太平天国，希望得到承认；尔后，又于5月2日发出照会，再次要求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华特权，并且公然威胁，如不同意就要诉诸武力。太平天国均置之不理，还明确宣布“不应再卖鸦片”。1854年6月28日，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所提³¹条时说：“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鸦片）为禁”。表明了太平天国愿意与外国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和赞成通商的政策。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它与清政府奴颜婢膝的卖国投降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对于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还没有足够认识，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竟错误地将外国侵略者当作

“大家都是兄弟”，因而放松了对外国侵略者的警惕性。

太平天国的文化教育是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服务的。因此，对于维护清朝统治的迷信一律清除。对于儒家的封建思想，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起义后，为了配合军事进攻，采取了激烈的反儒政策，将孔子看作“邪神”，将儒家经书视为“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奠都天京后，采取了改造政策，即删改儒家经典的文字，改定其思想内容，以符合太平天国的要求。

太平天国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为革命利益服务的“拜上帝会”的政治、宗教教育，即必须信奉“独一真神唯上帝”，反对一切“阎罗妖”。因为上帝是一切善良的根源，是维护人民利益的真神，是农民反封建、反外国侵略势力的集中表现；阎罗妖则是地主、孔子直至清朝皇帝等一切封建势力的代表。这种政治、宗教教育对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曾起了重要作用，特别在革命初期，对于培养人民的革命意识，维护军事纪律，激发战斗勇气等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到了后期，宗教迷信成份越来越多，对革命又产生了消极作用。

为了政治、宗教教育的需要，太平天国还出版了不少官书，作为教育的重要教材，除去经过太平天国修改过的基督教《新、旧约圣经》（《新遗诏圣书》和《旧遗诏圣书》）外，《真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等都是重要的教材。到了后期，经过删改的四书、五经也是一种重要读物。武职人员还要学习《武略》及《兵要四则》等。

太平天国重视儿童、妇女、人民群众的教育，要求男女老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儿童每天均到礼拜堂听讲道理”。讲道理是一种宣传教育的演讲工作，有属于宗教性质的，也有属于政治或军事性质的，它是太平天国对人民群众和士兵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另外，还在天京“设立育才书院，延师教各官子弟读”，以培养人才。

为了使文化教育更适合人民大众的需求，太平天国进行了文字文风的改革。在公文书籍里使用了简体字，如“虫”、“条”、“窃”、“庄”等，不下百余字。官印采用宋体正书，改革过去官印一直沿用篆书作法，使人易于认识。在文书中一律加上标点符号，如逗号、句号、人名号、地名号等，便于阅读。

在文风改革方面提倡“明白畅晓，以便人人易解”的语体文。到了后期，正式颁布了《戒浮文巧言谕》，主张文以记实、言贵从心，反对封建统治者用以限制或愚弄人民思想的浮文、巧言，指出“浮文在所必删”，“巧言由来当禁”，以免“诱惑人心，紊乱真道”。如阿谀奉承之词“龙德”、“龙颜”、“鹤算”、“龟年”等一律废除。

太平天国对于艺术也很重视，建都天京后，设立“绣锦衙”管理艺术事业，将画匠、画师组织起来，从事绘画艺术创作。遗留至今的有门画、墙画和堂壁画，其中有不少是歌颂革命战争的画面，使艺术为革命服务。不过，也有一些壁画渗透着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英法联合发动侵华战争

“修约”讹诈与“亚罗号事件”

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后，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已经打开中国市场，可以取得巨额利润。但是它们运到中国市场的大批商品却销售不出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在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广大农民无钱购买商品；同时鸦片继续大量涌入中国，白银外流更加严重，限制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然而，英国资产阶级却认为是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太少，攫取的特权不多所致。于是，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早在1849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的报告中就曾建议：“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

最初，英国勾结法、美两国，企图故意歪曲《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中关于12年后在贸易条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南京条约》虽无此项规定，但英国援引“最惠国待

遇”条款，也要求届满 12 年时修改条约。1854 年，英、法、美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主要内容为：开放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征收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驻北京等等。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助剿”太平天国，诱使清政府接受“修约”要求，但遭到拒绝。当时英、法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无力对中国出兵动武。1856 年，三国又要求修约，清政府仍坚持“大段断无更改”的态度，只允许“择其无碍大局者、酌量变通一二条”。修约再次遭到拒绝，而此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于是英、法决定用战争来实现其侵略要求。

英国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于 1856 年 10 月借口“亚罗”号事件又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是中国的船。船的主人叫苏亚成。他曾经在香港购买过一张登记证，因为期满，所以没有挂英国国旗。10 月 8 日，亚罗号从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黄埔。广东水师千总梁定国接到一份报告，说有几名海盗藏在这条船上，逮捕了船上 12 名中国水手。

这时，英国驻广东领事巴夏礼横蛮无理地加以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人上船捕人是违反了中英条约。并且说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的侮辱。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捕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根本与英国毫无关系。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制造事端，是为了寻找一块踏脚石，发动侵略战争。为此目的，巴夏礼在英国公使包令的指使下，向清政府提出了“有礼貌地送还被捕水手；书

面道歉；担保以后尊敬英国国旗”3项无理要求，限令48小时答复。同时，巴夏礼亲自到包令那里接受指示，决定借此机会向清政府发动武装进攻。

抗击英国炮轰广州城

1856年10月23日，3艘英舰由西马糜各里上将（一说少将）率领，溯珠江边开炮边前进，驻守在猎德、中流沙炮台的守兵并非毫无还击之力，只因奉叶名琛“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之令，在英舰炮击声中，被迫撤离。炮台火力点被英舰摧毁。当晚，英舰未遭任何拦击，闯入珠江的十三行码头。叶名琛对形势估计错误，仍认为英军此举，仅是威吓性质，“必无事，日暮自走”，未及时采取应变防范措施。此时，英方参战舰艇共4艘，舰炮34门，兵力约700人，而广州城内外的清军共约万人，占明显优势，炮台共有32座，炮位也超过英舰，质量虽不如英军舰炮，但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仍可与之一战，在清王朝“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加以叶名琛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没有采取临战应变措施，英国侵略者认为软弱可欺，遂蓄意扩大战事。

英军的作战意图是，先摧毁广州外围的炮台，使清军失去还击能力，尔后集中火力炮击两广总督衙门，迫使叶名琛屈服。10月24日中午，英舰以密集炮火摧毁了珠江南岸的凤凰冈炮台。叶名琛在部属的坚请下，才勉强同意派兵1500名，赶赴北门外四方炮台，以加强广州城的防卫。第二天，又调近郊乡勇5000人入城，分驻城东、城西。英军于是日继而占

领了海珠炮台。

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广州人民，在城乡内外，遍贴红纸，相约剿杀入侵之敌。2 万名地方团练，也在十三行一带列队示威，以壮声势。

英军不战而占广州城外各炮台，但并未达到胁迫叶名琛就范的目的，乃于 26 日扬言，即日将炮击广州城。26 日起的 3 天之内，英舰炮以及已被英军占领的海珠炮台的炮火，集中袭击叶名琛的衙署。28 日，火烧临近督署的靖海门外一带。29 日，叶名琛从总督衙署撤至内城的巡抚衙门办公。英舰一面以更密集的炮火集中轰击督署，一面以部分兵力登岸攻扑广州外城，巴夏礼声称“定破此城”。广大清军忍无可忍，奋起抗击，展开了英舰炮击广州以来的第一场激战。抚标中军参将（一说副将）凌芳亲自发射火枪，击毙英军多名，在鏖战中不幸中弹伤重而死，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第一位清军将领。驻守城东万寿宫一带的乡勇，以长枪与登岸英军搏斗，毙敌数人。在爱国官兵和乡勇的激励下，叶名琛也传令“杀敌一名，赏百金”。英军入新城者不满百人，伤亡已近 30，在军民奋起抗击下，不敢久留，有几个人在总督衙门转了一圈，就匆匆退回船上。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炮击与谈判并举，英方想以炮火为后盾，在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但并没有如愿。11 月 6 日晨，英舰炮击东定炮台，清军水师 23 只战船驶近敌舰，炮战半个多小时，炮台守军也发炮还击，共毙敌百余名。

11 月 8 日拂晓以前，四只点燃的火筏，从珠江顺流而下，烧着了一艘英舰。西马糜各里为加强舰艇的安全，将沙船布

于英舰四周，但仍无济于事。在 12 日那天，有一只沙船就被从中国船上掷来的一个火药罐烧毁。第二天，两只装有水雷的中国艇船突然在英舰旁爆炸，使英国侵略者防不胜防。

为了进行报复，英舰炮击广州城东猎德炮台，守台炮兵也发炮还击，由于炮台火炮的射程近，威力小，未能遏止英舰炮的轰击，英军一群陆战队员在炮火掩护下，乘机登岸，抄袭炮台后路。在敌人前后夹击的不利形势下，守兵被迫撤退，猎德炮台遂为英军强占。接着，英舰又向虎门要塞发起进攻，蛮横要求清军撤离横档、威远、镇远、靖远等炮台，为守炮台官兵严词拒绝，守台官兵警告英方，如英舰驶近各炮台，誓必还击。英舰竟开进炮台附近江面，经一小时的激烈炮战，一部英军冒炮火登岸，守军经顽强阻击后，才边战边撤。这样，英国侵略军控制了从虎门到广州沿线的珠江江面。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从军事实力上看，中英双方的兵力差距已明显缩小。英方参战的舰艇 6 艘，官兵已超过 1000 人；而清军守横档炮台的官兵约 700 人，其它炮台共计 1000 余人，在数量上已不占多少优势，而英舰的火炮共 179 门，清军各炮台的炮位在数量上既不占优势，质量上又处于劣势。再加上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动不灵，后备力量不足，弹药供应不及，虽经守军奋勇抵抗，最后仍导致失利。

清军虽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及时改变了战法，从阵地战、炮战转入分散的游击作战，发挥了夜战的威力，使英国侵略军顾此失彼，惶惶不可终日。11 日 15 日黎明前，江面上大雾迷漫，一些中国战船以浓雾这一天幕作掩护，悄悄驶近两艘英舰，向敌舰突然猛烈开火达半小时之久，等到英

舰还击，清军的战船已巧妙地消失在咫尺莫辨的浓雾之中。20日，六只清军战船又开近敌舰，一阵炮火袭击后，迅速退入英舰无法进入的小河道中。

在英国侵略军经常出没之处，民众积极行动起来，袭扰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游击作战。而这种袭击，往往是在夜幕降临以后进行的。25日，有一条英国货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埔港，晚上，有一只小艇驶到货船边，说要“送书舟长，且必面见而与之”，船长古柏正在接信的刹那间，小艇中突然钻出六个壮汉，把英国船长架到小艇中，飞也似地开跑了，商船派几条小船四出追寻，连影子也找不到。两天后的晚上，在虎门又展开了一场拦截英国邮轮的激战。英国邮轮提斯特尔号的一条拖船，满载从广州抢来的珍宝，停靠在虎门。半夜，忽然有200多条中国小艇，半数向邮轮靠近，半数作为掩护，密集的枪弹射向邮轮，邮轮被迫割断缆绳，匆忙逃走，但那条满载珍宝的英国拖船却被缴获。一个月后，该邮轮从广州开往香港途中，又遇事先埋伏在船上的数名乡勇的截杀，并放火烧船，使该船受重创。

许多清军爱国官兵在困难条件下，主动袭击英军，打了不少胜仗：12月1日，千总苏海率领35艘战船，在二虎洋大败英军，叶名琛立即奖励官兵们1250元大洋，以表彰他们的功绩。3日，一群英军从广州城东的河上登岸，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奋力抵御，激战2小时，毙伤敌数10名，英军狼狈遁逃回船。同时，壮勇也埋伏在英军途经的两旁空屋，从窗户里施放冷枪，直打得英军晕头转向。1857年1月4日，清军出动了300多只沙船，向英国舰船发起猛烈进攻。一路约有

100 只配备大炮的大小沙船的船队，在临近英舰时炮弹齐发，到江水涨潮时，这支船队安全撤至小河中。另一路约 200 只沙船的船队，连同从小河驶来的另 20 多只沙船，当接近英舰时，集中向英舰开炮。经一小时的河上炮战，清军沙船才撤回小河中。英方也不得不惊呼：“中国人打仗，向无如此大胆，其战法亦较前为胜。”西马糜各里恼羞成怒，派军队纵火焚烧了广州附近几千家民房，但是这支纵火队在走近城墙时，突然遭到射击，死伤 15 人，给英国侵略军以应得的惩罚。清军和乡勇还每于深夜驾小艇袭击英军据点，从江上、陆上，广泛开展袭扰战。敌酋西马糜各里已经“饱受数以百计的中国舢板的袭扰”和“火船以及其他设计巧妙而又凶险的兵器的攻击”，只得于 1 月下旬，将入侵的英舰撤出珠江内河，退往虎门口外的大黄濠炮台一带待援。

广大官兵不顾清王朝不得扩大事端指令的约束，针对英舰船坚炮利，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在江上以夜间袭击为主，在岸上则以短兵相接，配以冷枪冷炮，发挥了巨大威力，英国侵略者入广州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珠江袭击英舰之战

英国侵略者虽被迫从广州城下撤走，但其侵略野心不死，舰队仍集结虎门口外，不时派舰船溯珠江游弋，并在虎门车密炮台屯兵一部，只是由于兵力不足，才后撤以待增援。

1857 年上半年，从广州至佛山的珠江江面，战火未熄，5 月间，由宋浩湘与绅士林福盛等带领的 20 余只巡船，在新塘河面与 3 艘英船遭遇，展开了一场炮战。5 月 25 日至 27 日之

间，清军水师船队，抗击了由英舰队司令埃利奥特指挥的 20 余艘汽艇的进攻，有几条水师沙船甲板上装满了火药，引火绳接通岸上，绳索一点燃，沙船爆炸了，几乎把一般英船炸毁。而水师官兵则集结在岸上的房子里，用火枪射击英舰上的水兵。

江上激战发生在 6 月 1 日黎明。在叶名琛的布置下，琼州镇总兵黄开广征调船只，集合部众，赴平洲待命出击。黄开广募到红单船 60 多只，加上师船共 100 余只，停泊在距大黄濠很近的平洲三山江面，待机出击，企图把英舰驱逐出珠江。据参与是役的英舰管理信号的见习生西摩尔的记述：中国水师的 100 多条战船分成两队，一队在江面，一队靠岛屿，每条船配备好几门火炮，并在桅杆高处装置了盛窒息物的臭壶，以便在英舰靠近时抛掷。英国舰队出动各种舰船 17 艘，官兵 2600 名，由西马糜各里亲自指挥，分别由海军准将凯佩尔和埃利奥特率领，于 5 月 31 日傍晚在珠江江面集结，意图是维持珠江江面航行的畅通。6 月 1 日拂晓，英舰炮首先向驻守在江中沙岛的清军炮兵射击，以图扫除上溯珠江的障碍。清军水师以密集的炮火向敌舰还击，并敲锣叫喊以助威，有的英舰被击中沉没，有的受重创。凯佩尔的坐舰也中弹沉没。英舰高飞号的一名军官被一发炮弹击中炸成两段，抛向空中，使英军遭到开战以来极严重的损失。有的记载说：“每十个英军就有一个人被打中”，有的说伤亡 84 人。清军水师的沙船也损失不小。英舰为实施报复，竟追至佛山江面，发射火箭焚烧江边铺户，但未敢登岸。之后，英舰除留三四艘泊大黄濠，其余的都退到虎门。清军的高昂士气与顽强斗志使敌人为之

惊叹：“中国人在自卫战中显示了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据一名法国作家评论说“这次战斗揭开了中国战史上的新纪元：中国人在防御方面极为灵活，而且很有勇气。”

这一仗，敌我双方都说是主动出击，属于预有准备的战斗，从兵力看，双方相当，而炮火、舰船，则英方远胜，是敌强我弱。可是，只要战法得当，以弱击强，照样可以战胜“船坚炮利”的英国侵略军。

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扩大侵略战争的提案，并且任命额尔金为全权大使，率一支侵略军前来中国。同时还向法、美、沙俄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

法国政府如获至宝，早在“亚罗号”事件之前，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在1853年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借传教为名，勾结官府，包庇教徒，行凶作恶，激起民愤。1856年2月西林县新任知县张鸣凤将马赖等不法教徒等26人逮捕，并将马赖及教徒二人处死，这就是“马神甫事件”。法国政府接到英国照会，借“马神甫事件”，打起“为保护圣教而战”的幌子，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并派一支侵略军队开往中国。美、俄两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的机会，也派出了全权大使，同英、法密切配合，从中渔利。1857年秋，英、法、美、俄四国强盗会集在香港，阴谋策划“联合行动”。

大沽口战役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清政府对条约也很不满意，特

别认为“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咸丰皇帝曾令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达上海。他们拒绝同清政府希望在上海换约而派去等候的桂良会商，而加紧准备北上。6月20日，普鲁斯、布尔布隆与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20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并限期撤防。英舰队司令何伯声称：“我们将稳操胜券，那么我们就应该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

1859年6月，集结在大沽口外的英法联合舰队共有各种舰艇22艘，其中英舰20艘，包括巡洋舰、护卫舰各1艘，各式炮舰艇16艘，余为运兵船，舰上官兵共2000余人，各种口径火炮共150门左右。法舰巡洋舰、炮舰各1艘，官兵约百人。另有美舰3艘也停泊、游弋于附近海面。联军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以深水舰艇的炮火正面袭击大沽炮台，并以部分浅水炮艇开道，越过横江铁链及其他设有障碍物的江面，驶抵大沽炮台上方河道，从侧后向炮台射击，以摧毁清军的炮台。然后组织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在炮火掩护下，用轻

武器向炮台守军攻击，以占领炮台，使守军后撤，从而达到扫除武装换约道路上的障碍。负责登陆作战指挥的是英军舰队司令贺布，英国投入的舰艇和兵力均占联军总数的绝大多数，是这次进攻作战的主凶。法国则是伙同制订作战计划、密切协同作战的帮凶。法国特使布尔布隆在给法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一旦冲突发生，我们的旗帜就应该和英国的旗帜在一起飘扬。”

由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一指挥的前线清军总兵力共计约2万名，除了驻屯在山海关作为机动的5000名外，驻守在大沽南北各炮台的第一线守军约4000名，各种口径的火炮共60门。另有3000名则分驻在附近的石缝炮台、新城、新河、草头沽等处，随时可作炮台守军的援应。此外，在大沽炮台北的北塘一带尚有驻军2000名，由都统西凌阿管辖，受僧格林沁统一调度。为防止联军万一登岸后长驱直入天津，还在地势高的双港沿河两岸，共驻兵6000，火炮80余门。可见，这次临战前的防御部署，较之上年，大有改观，做好了在海口、在炮台、在陆上还击英法联军的准备。

联军企图打通海口通道的活动在前几天已经开始，而双方展开激战则是在6月25日。这天上午，联军10余只舰艇驶至清军在海面铺设的铁钺附近，另有3艘联军舰艇直逼南岸炮台附近海面。其中1艘名为负鼠号的英国浅水蒸汽炮艇悄悄地靠近铁钺边，派数人潜入水中。用缆绳套紧其中一架，然后炮艇开倒车，拖着铁钺把它放到一边，前后共拉倒10余架，然后放下浮标，以标记开辟的通道。僧格林沁为避免扩大事端，一再派大坐船前往晓喻，指出如英法特使果为换约

而来，为何屡次破坏我大沽沿海防卫设施；告以此地系军事禁地，如需赴津，可由北塘登岸，当由清方官吏迎候护送。联军不听劝阻，舰队越过铁钺继进，一再冲撞炮台附近的铁链，未能越过。下午 1 时 30 分，贺布向联军下达了攻击令，炮火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大沽南北各炮台。贺布本人则在旗舰“鸽鸟号”上指挥作战。他们前几天用望远镜窥看炮台情况，只见火炮都用草席盖着，也不见守军踪影，满以为清军并无戒备，可以和上年一样，一举摧毁，从容登陆，兵临京津。殊不知僧格林沁早已预有准备，尤其注意伪装隐蔽，在炮台白天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守军却于暗处，无时不在密切注视敌军动静，故虽处于守势，却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以逸待劳、后发制人，任凭联军放炮试探，守军并不还击。25 日，联军舰炮以密集的炮火，企图一举摧毁我炮台时，僧格林沁见还击时机已到，遂令迅速撤除火炮上的掩盖草帘，按前已精确计算过的距离，各炮台的花炮向英法战舰猛烈还击，很快就压住了舰炮的火力。据参战联军目击者记载：“炮艇刚开始攻击第一道障碍物，炮台的炮眼就顿时全打开了，这支小小的舰队遂遭到打得准且又打得猛的炮火的袭击。过不一会，有好几艘船就被打得不能动了，人员在炮火下也越打越少，”旗舰“鸽鸟号”的舰长拉桑被弹片击中而毙命，舰队司令贺布也受了伤。炮击战持续到下午 5 时，参战的英法舰艇全被击伤，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清军的炮火击中沉没，有的舰艇在滩头搁浅，成为死目标，无法撤出战斗。在现场观战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战后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中说：“中国人炮火的命中是这样致命地熟练，而且完全集中于英国舰队司令座舰以及

最邻近他的船只。由于他的旗舰已进退无力而水兵又受重创，逼着受伤的贺布司令一再转移旗舰的标志旗，但是，他转移到那条船上，炮弹也就随之倾泻而来”。可见大沽清军炮兵操纵火炮的能力已大为提高，即使对海上的浮动目标，其射击命中率也使敌军大为震惊。贺布 7 月 4 日从切撒皮克号上给英国海军大臣的报告中承认：“由于敌人炮火瞄准的优良和持久不变，使海军中队遭到惨重的伤亡。阵亡官兵 25 人，93 人受伤”。各炮台始终在清军掌握之中。

在这场激烈的大沽炮战中，直隶提督史荣椿率部坚守南岸中炮台，指挥以炮火还击，击沉敌舰，忽腹部中弹，仍指挥部众，大呼杀贼而死。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守北岸前炮台，亲自点火发炮还击，因胸部中弹，牺牲在炮台上。清军这两位高级将领，以前曾奉命与太平军作过战，但最后在反侵略战争中，血洒海疆，为国捐躯，不愧是舍生取义的英雄。此战还有都司、千总、把总等武官与兵弁 32 人阵亡，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胜利。

6 月 25 日下午，英法联合舰队已溃不成军，有的战舰沉没，有的搁浅，有的击伤，舰队已难以发挥威力，各舰艇的官兵也死伤枕藉，丧失了战斗力，眼看败局已定，舰队司令贺布不甘心就此罢手，仍按预定计划组织陆战队强行登岸。在零星炮火的掩护下，联军登陆部队分乘吃水浅的艇船和事先搜刮来的一批舢板船，向炮台南岸驶近。声称“中立”的美国军舰也牵引登陆船只，帮助运送联军伤员。联军的登陆部队共有 1500 多人，他们携带轻武器，在泥泞的海滩上跳下了船。据一名参战的英国军官费舍回忆说：“在小船搁浅时，士

兵们立即奋勇地跳出船外，很多人不从吃水浅的船头跳，而从吃水深的船尾跳，以致掉入深水中，弄湿了弹药并把步枪搞得无法使用。一部分部队作为散兵向前推进，而其他人员则挣扎搬运云梯和便桥来备作跨过沟濠之用。由于守军在沿海滩头事先就开挖了濠沟、土墙等防御工事，致使联军一登陆就陷入困境。等联军陆战队已到守军枪炮的射程以内，火炮、抬枪、鸟枪齐发，联军无还击之力，纷纷中弹倒地，有的匍匐在苇丛中和沟岸边，不敢前进。不久，传来了一个命令，要我们尽可能在隐蔽下停留到天黑，到这时候会涨潮，会有船只来载运我们撤退。”夜幕渐渐笼罩大地，守军发射火弹喷筒，火光闪耀，联军无法藏身。守军狙击手准确地瞄准敌人，几乎弹无虚发，一批批顽敌应声而倒。有 50 几名敌军官兵，冒死冲到了离炮台围墙不远的第三道水濠的边缘，“箭笔直地射来，再加射击不断，迫使这支精锐部队只得蜷伏在水濠旁，他们在等待着增援”。结果，敌军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击伤，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勒蒙上校也身负重伤。这支陆战队已完全丧失了夺取炮台的能力，只得狼狈退却。“在撤退的时候，损失的人可能比前进的时候还要多。因为中国人放出的焰火能准确地知道我们这些蹒跚而行、精疲力尽的人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就象打鸟一样地把我们一个一个地都打倒。”联军陆战队“术穷力尽”，不敢恋战，向船逃窜。清军至天明，始行收队。僧格林沁发往清廷的报告中说：“沿河夷尸堆积，除该夷抬运上船外，尚余一百数十具，并洋枪四十一杆”，生擒联军士兵 2 名。据俘虏供述，此战登岸的联军官兵共 1500 多人，死者甚众。贺布向英国海军大臣的报告中透露，“在岸上的攻

击中，阵亡官兵 64 名，252 名受伤，其中 162 人重伤”。连炮战在内，英军共亡 89 人，伤 345 人。法国军队共 60 人参战，死伤也达 14 人之多。侵略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咸丰帝生怕影响日后和局，一再告诫僧格林沁：“驾驭外夷，终为议抚，若专意用兵，终非了局。”大沽守军若不是受咸丰帝的约束，顾全谈判大局，英法联军已可全军覆没。被称为中国通的丁韪良，当时任美国公使列卫廉的翻译，他在《中国六十年》一书中就此战真相评述说：“战火重起，大家都责难中国人，说是他们的背信弃义挑动了这场战争。然而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他们不过是阻拦了通往未被开放的城市的去路而已。难道联军公使又有权乘轮船前去天津吗？他们根本没有千方百计地想通过任何条款来获得这一权利，不仅因为他们打了第一枪，所以是侵略者，在整个事件中他们也都是错的。”7 月间，英法公使以及他们的残舰败兵，终于灰溜溜地南逃了。

中国军队为保卫祖国，在大沽口痛击侵略者，这是完全正义的行动。马克思在论述这次战役时指出：“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的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

二、广州失陷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1857 年 10 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到达香港。12 月，英法联军 5600 余人（其中法军 1000 人）在珠江口集结。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24、27 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等发出通牒，第二

次通牒限 48 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28 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 年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城中敌人胆颤心惊。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罢业，以示抗议。

英国联军根据其本国政府在出兵时的指示，要和北京直接打交道，以迫使清政府就范，决定北上，进攻大沽。1858 年 4 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到大沽谈判，英、法竟蛮横地限令六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诉诸动力。5 月 20 日，英、法军舰闯入白河，炮轰大沽炮台。守台将士英勇还击，然而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西逃，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北上，26 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

6 月初，谈判开始。英国代表骄横要挟，俄、美公使则扮演“调停人”角色，从中渔利。俄使普提雅廷施展奸诈手段，诱逼清政府于 6 月 12 日首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

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美使列卫廉于6月18日逼签了中美《天津条约》，也攫取了许多特权。

6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主要内容有：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④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⑤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⑥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①鸦片贸易合法化；②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③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④洋货运销内地，只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三、侵略战争的扩大 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英法联军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他们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借以“教训中国人”，让英国人“成为中国人的主人”。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

领英军 18000 余人，法军约 7000 人，船舰 200 余艘，来华扩大侵略战争。4 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 月、6 月，英军占大连，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使华若翰也于 7 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

清政府在大沽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罢兵言和。当英、法舰队逼近大沽海口时，咸丰皇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贪功挑衅”，“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僧格林沁认为北塘左右皆系盐滩，敌军“登岸不易”；即使越过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伊格纳季耶夫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 月 1 日，英、法军舰 30 多艘，由“俄夷引路，占据北塘”。12 月，侵略军大举向新河、军粮城发动进攻。僧格林沁所部蒙古骑兵英勇冲锋反击，在侵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精锐耗竭”。14 日，塘沽失陷。21 日，联军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战斗直到晚上，炮台终于失守，乐善和爱国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驻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在咸丰皇帝“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的谕示下，于当晚将防守官兵全部撤走。大沽陷落。侵略军长驱直入，24 日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在谈判中，英、法提出，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等。清政府坚持先退兵，并不许带兵进京换约，谈判破裂。俄使伊格纳季耶夫竭力煽动英法联军

“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僧格林沁）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9月初，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

9月18日，英法联军进攻张家湾，清军顽强抵抗，伤亡很大，通州陷落。21日，清军与敌军在八里桥激战，“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主帅僧格林沁等撤队反奔，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22日，咸丰皇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留下其弟恭亲王奕訢负责议和。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有关情报和北京平面图。10月初，侵略军占领圆明园。这座经营了150多年，综合中西建筑艺术成就，聚集了今艺术珍品和历代图书典籍，世界上少有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在惨遭侵略军大肆抢掠后，又被纵火焚毁。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

英法联军扬言还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奕訢乞请俄国公使从中斡旋。俄使伊格纳季耶夫提出解决俄中边界作为他调解的先决条件，然后对奕訢说，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奕訢在英、法动力逼迫和俄国恫吓挟制下，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①增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

至 800 万两，恤金英国 50 万两，法国 20 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定，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第五节 沙俄吞并 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沙俄在东北、西北边疆的扩张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紧向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大肆进行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

1847 年 9 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加紧推行武装鲸吞我国黑龙江流域的计划。1849 年，涅维尔斯科伊等沙俄海军军官乘炮舰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并非法命名黑龙江河口湾附近北岸的两处港湾为“幸福湾”、“圣尼古拉湾”。1850 年 8 月，沙俄侵占我国黑龙江口的重镇庙街，并以沙皇的名字把庙街更为尼古拉耶夫斯克。至 1853 年底，沙俄侵略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兴袞河和黑龙江下游两岸以及口外整个中国领海，并占据了库页岛。

在我国西北地区，沙俄于 1846 年武装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今卡拉塔尔河）。19 世纪 50 年代，它越过伊犁河继续向南扩张，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1851 年 8 月 6 日，在沙俄的强迫下，伊犁将军奕山代表清政府与沙俄代表签定了中俄《伊犁塔巴尔哈台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设立领事、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建立贸易圈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侵略特权。沙俄代表在订约后供认，这个不平等条约对沙俄“不仅是在商业关系上，而且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成为深入中亚细亚继续进攻活动的强有力的动力。”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中俄《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

沙俄侵占了庙街和库页岛等地后，继续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1854 年 1 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批准了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武装航行黑龙江”计划。5 月，穆拉维约夫率领舰船 70 余艘，运载俄兵近千名，不顾清政府的抗议，强行越过石勒喀河中俄边界，闯过雅克萨、璦琿等地，横穿中国领土 2000 多公里，并在黑龙江下游阔吞屯（沙俄改称马林斯克）等处屯兵筑垒，实行军事占领。1855 年 5 月，沙俄再次武装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在左岸强行建立俄国居民点。1856 年末，沙俄竟将霸占的我国吉林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副都统所辖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

页岛划为它的“滨海省”，设首府于庙街（沙俄改称尼古拉耶夫斯克）。1857年，穆拉维约夫派兵向黑龙江中、下游推进，在瑗珲城对岸屯驻。

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瑗珲，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归属俄国，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奕山辩驳说，中俄边界在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早经中俄《尼布楚条约》明文规定，从无更改，只有乌第河未经定界，有待议定。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奕山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瑗珲对岸精奇里江（今俄国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往来，别国不得航行。清政府没有批准《瑗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沙俄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瑗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布拉戈维申斯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特颁嘉奖，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

当英法联军直扑天津，清政府派人在天津议和时，沙俄又伙同美国出面调停，诱使清政府投降，并于1858年6月13日抢在英、法、美之前，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7

处口岸通商的权利以及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还特别规定中俄两国“以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以此为日后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的借口。

《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穆拉维约夫率部侵入我国乌苏里江流域。6月12日占领伯力。后来在江东地区建立二十几个军人村镇，派兵3000驻守，将中国官员、岗哨赶往西岸。1860年7月，进一步非法侵占中国重要海港海参威，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至此已实际占领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中俄《北京条约》和《堪分西北界约记》

1859年6月，沙俄新任公使伊格纳切夫到达北京，向清政府提出中俄《天津条约》续补条约，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伊格纳切夫便赶往上海，与英法侵略者勾结，积极充当帮凶。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伊格纳切夫又以调停人的身份，胁迫清政府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1860年10月底，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自称“调停有功”，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诱饵，向奕訢提交了一份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逼迫奕訢“一字不能更易”地接受，否则“兵端不难屡兴”。11月14日，奕訢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除迫使清政府确认《璦琿条约》外，还规定：（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惟“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二）中俄西部未定

边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哨所）等处，及1728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湖，自此往西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三）俄国取得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把《璦琿条约》规定划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而且又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条约还为俄扩大对华商品输出和进一步侵略新疆、蒙古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沙俄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政府拒绝签字。

1861年6月，中俄双方代表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的江中的确切位置。在勘界和立界牌中，俄方力图多占中国领土。勘界立牌后，又不断蚕食我方土地，搬移界牌，肆行侵占。

自1862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和沙俄政府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勒喀什池（今俄国巴尔喀什湖）。自18世纪初叶起，沙俄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俄国伊塞

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中国境内山隘、要津,垒石立界,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态度蛮横,硬要中方接受其划界方案,并多次出动军队袭击博罗胡吉尔等卡伦,甚至扬言攻取喀什噶尔和伊犁。明谊严正拒绝俄方方案,谈判中断。

1864年10月,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派兵威逼塔城卡外,巴布科夫坚持中国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负责总理衙门的奕訢一再指令明谊妥协让步,惟恐如不接受俄方议单,“将兵连祸结,必致更难收拾”。10月7日,明谊签订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具体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今俄境)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计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它通过《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的勘界条约,侵占了我们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六节 中外 反动势力的正式结盟

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本无正式外交机构,中国对外交涉,

均由两广总督负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公使根据《天津条约》，入驻北京。清政府的“天朝尊严”丧失殆尽，完全属于封建性的国家机关的礼部、理藩院等已不能胜任与外国交涉任务。于是咸丰十年（1860年）冬，清政府一度设抚夷局，任命恭亲王奕訢负责与外国办理“和议”事宜。同年10月，奕訢代表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向朝廷提出：外国只是清朝的“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而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对西方各国应当采取“信义笼络”的策略。此时外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清政府，则纷纷要求在清朝中央设立专门对外交涉的机构。为此，奕訢派专人向外国公使征询意见，受到各国公使的欢迎和嘉许。咸丰十年（1861年）1月3日奕訢等人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得到曾国藩等封疆大吏的支持。20日，咸丰帝予以批准，但职权限制在通商范围，即“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并任命奕訢为大臣。奕訢等感到职权太小，更怕惹起外国的不满，竭力要求取消“通商”二字。不久之后，得到咸丰帝同意，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此之前奕訢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文中说：“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这样看来，总理衙门设立，最初用意是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机构，然而实际上它并没有“即行裁撤”，而是存在了40年。

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只管外交、商务，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但是随着外国在华势力的扩大，洋务运动的开展，加之恭亲王奕訢为总理衙门的第一把手，使之逐渐总揽了练兵、筹饷、海防、税务、购买

军火、设立工厂、开办路矿和电报、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考选官吏等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大权，成为凌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上的重要决策机关。总理衙门的活动经费几乎完全依靠外国控制的海关供给。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待遇高、升官快、地位突出，由此也就引起了其它衙门不满。后来，皇帝不得不出来辩解：“总理衙门，办理的都是外国事情，自然和别的衙门不同。”到戊戌变法时，刑部郎中沈瑞林曾以“实兼综乎六部”为由，上书皇帝，主张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总理衙门内部组织主要分一厅、一房、五股。同治三年（1864年）将收掌处改为司务厅，并于同年设清档房。最初只有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增设了海防股，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后又将之改为日本股。总理衙门重要的下属机构有京师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并且管辖三口通商大臣（后改北洋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后改南洋通商大臣），此外还选派出任各国大臣。总理衙门的官制仿照军机处。大臣有亲王一人总领其事，其他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或部院大臣兼领。大臣无定额，初仅3人，其后人数略增，经常是七八人，多时10余人。总理大臣负责与各国订约，并遵条约办事，凡通商贸易、关税、交聘、定界、海防、传教、文书往来等事，都由大臣等议办，重要事务要奏报皇帝裁决。从事具体工作的主要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和额外章京等数十人。在设立总理衙门期间，总领大臣由恭亲王奕訢任职时间最长，计28年（1861—1884年，1894—1898年）；其次是庆亲王奕

F9A5, 计 12 年 (1884—1894, 1898—1900 年)。总理衙门大臣中, 以军机大臣兼领者权力较大, 往往为决定政策的主要人物。文祥可为代表。继之, 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等人 (均军机大臣兼领总理衙门大臣) 皆守其成规。

外国称总理衙门为“帝国政府 (指清政府) 的内阁”。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九月, 清政府与 11 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 按规定,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首”。总理衙门的设立, 是清朝封建政权向半殖民地化转变的重要标志。

二、“借师助剿”方针的提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中国社会矛盾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英法联军进犯津、京, 清政府逃往热河;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仍然雄踞长江中下游, 北方的捻军也异常活跃, 构成了对清王朝的巨大威胁。清政府始终把太平天国和捻军看成是心腹之患, 外国侵略只是“肘腋之忧”。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外国侵略者认识到应当扶植清政府作为他们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而太平天国则是他们侵略中国的障碍, 因此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法国侵华军全权代表葛罗在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一周后, 就向奕訢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也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的当日, 即 1860 年 11 月 14 日, 以及 19、21 日三次向奕訢表示要送枪炮给中国, 并教会中国铸造枪炮, 协助清

军进攻江南太平军。后来，英、美两国也表示愿意支持清政府。但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助剿”的看法还不一致。

清政府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就“借师助剿”问题，征询在北京的奕訢和地方上有关督抚的意见。江苏巡抚薛焕、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先后在1860年12月及1861年1月奏报，表示拥护。

当时，负责北京议和的奕訢、桂良和文祥看到《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退，并不想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是要清政府履行条约，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他们认为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而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才是“心腹之害”。他们主张对外国侵略者应当保持“和好”，“可以信义笼络”，并且向咸丰帝建议：“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要咸丰帝像蜀国联吴抗魏那样，联合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不久，总理衙门成立，奕訢等人担任总理大臣，他们在1861年7月7日再次奏请咸丰帝，“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而睡我，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的“借师助剿”方针，就此确立；并且得到地方实力派的赞成和支持。但是奕訢等一派入当时尚未掌握清政府的实权，因此这一方针未能作为一项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当时清政府的实权是掌握在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另一派人手中。这一派人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

垣和郑亲王端华为首。他们同奕訢等人在坚决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没有两样，但对于外国侵略者还心存疑忌，并且骄傲自大，仍以天朝自居，极端守旧，主张排外。他们对咸丰帝的影响很大，奕訢等人曾一再奏请咸丰帝回北京，以削弱他们的影响，但肃顺等人却极力劝阻。

三、辛酉政变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烧到天津，8月，英法联军在通州打败僧格林沁所部清军，向北京进发。那个曾经信誓旦旦、扬言要御驾亲征的咸丰帝，任命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与侵略者接洽投降停战，自己却带着大批随员逃往热河行宫。咸丰帝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次出逃，再也没有活着回到北京。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公历8月22日），咸丰帝奕訢死于热河。他死后，清廷连续发生一系列重大事变。

咸丰年间，清朝统治在内忧外患的频频冲击下，已显出大厦将倾的征兆。在内，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在外，资本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步步紧逼，奕訢简直没有做过几天安稳的皇帝。起初，他还试图振作，想有所作为，后来他发现，不但内忧外患他平息不了，就是官场积弊他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不思进取沉溺于酒色之中。他身边的亲信大臣肃顺、载垣等人，对他的这种行为不加谏止，反而百般迎合，以便控制朝中大权。过分放纵使不到30岁的咸丰帝身体渐渐垮了下来，逃往热河以后，他一如既往，纵情声色，直至几次呕血

仍不思悔改，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奕訢宣布以他唯一的儿子载淳为太子，继承皇位，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帝，主持朝政。

奕訢死后几天，载淳在八位辅政大臣拥戴下继位为帝，改元祺祥。然而，载淳年仅6岁，当然不能理政，朝廷上下立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当时，看来最强的要属八位辅政大臣，他们控制着朝政大权，大小臣工的奏章都要经他们批阅，皇帝的谕旨也由他们代拟，这样无论大小事务，包括官吏升黜，均掌握在他们手中，而实际上最强的倒是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实力派。奕訢是咸丰的六弟，咸丰继位，他心怀不满，兄弟之间屡次发生矛盾。咸丰逃往热河，他留守北京，在与英法联军谈判中深得外国侵略者赞赏；在内，当时掌握重兵的胜保等人也积极支持他，使之成为强有力的权力竞争者。与英法联军停战以后，奕訢几次奏请咸丰回銮，以便进一步接近权力中心，但肃顺、载垣一派看出奕訢用心，他们尽力满足咸丰的声色之欲，并以圣体欠安为由，使之留驻热河，以便他们挟天子以命天下。咸丰一死，双方立刻展开一场权力角逐。

然而，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肃顺和奕訢双方似乎都忽略了另一个权力竞争者，这便是两宫太后。说是“太后”，实际是两个极年轻的女人，25岁的东太后慈安，27岁的西太后慈禧。慈安太后，姓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她在咸丰登位以前即侍奉咸丰。咸丰二年封贞嫔，后晋为贞贵妃，最后册立为皇后。曾生有一女，宫中称为“大公主”。咸丰帝一死，她以正宫皇后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晋封为太后。慈禧太

后，姓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征之女，咸丰二年入宫，封懿贵人。咸丰六年生载淳，母以子贵，晋封懿妃，次年又进为懿贵妃。慈禧工于心计，权欲极强，早在咸丰在世时便多次设法参预朝政，均为肃顺等大臣阻止。咸丰帝死后，她以幼帝生母身份成为太后，立即着手谋取权力。慈安对肃顺等人专权亦早已心怀不满，因而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她与慈禧结为一派，成为慈禧夺权的得力支持者。按理，两宫太后地位虽高，但却无参政先例，想要加入权力角逐十分不易。但是，她们控制着幼帝载淳，又有咸丰帝批阅奏章，发布谕旨的两方御印——“御赏”印和“同道堂”印在手，很快成为权力角逐中的重要力量。

原来，这两方印章都是咸丰帝的私章，清代诸帝，多有私章小玺，但极少用于政治活动。咸丰帝却常用他这两方私章颁发上谕。咸丰临终，为防止大臣或妃嫔篡权，将“御赏”印交给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同道堂”交给小儿子载淳。咸丰死后，襄政八大臣明确规定了朝廷下达命令，呈太后及小皇帝，于前后分别加盖“御赏”，“同道堂”印。然而，这却增加了两宫太后在权力斗争中的筹码。本来，西太后居东太后之下，无权参预政务，即慈安的参预在辅政大臣看来也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但慈禧不甘寂寞，抢先以载淳生母的身份将“同道堂”印控制在手中。她的参预，立刻改变权力角逐的形势。两宫太后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逐渐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起初，辅政大臣只是与两宫太后发生摩擦，在北京的奕訢一派并未正面加入，只是暗中积极准备。后来，斗争的逐渐

激烈，却使慈禧开始与奕訢一派勾结。1861年9月，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请求两宫太后暂时处理政务，并在亲近宗支中选任贤能亲王参预主持朝政。据说，董的这个奏疏，是奕訢派指使他上的，目的当然是使奕訢派接近权力核心，疏中还直接对载垣、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攻击。辅政大臣得疏后，立该拟旨斥责董元醇，慈禧觉得董支持自己主持政务，拒绝在御旨上钤印。随后，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八大臣当面痛斥慈禧的说法，声色俱厉，以至把幼帝载淳吓得尿了裤子。第二天，御旨仍未盖钤下发，八大臣即停止办事，以罢工的形式逼迫两宫太后。不得已，慈禧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只得钤印下发。这件事使八大臣更加得意，把慈禧及奕訢两方都不放在眼中，而慈禧则开始暗中与奕訢联合。

本来，咸丰帝死后，八大臣以遗嘱的形式，下令奕訢留在北京主持各项事务，不许赴热河。但奕訢不顾八大臣之命，径直奔赴行宫，9月，他到达后直奔梓宫哭祭咸丰，堵住了八大臣的嘴。而后，两宫太后想召见奕訢，遭到八大臣拒绝，但是慈禧还是设法单独召见了奕訢，秘密商议铲除八位辅政大臣之策，随后奕訢返京。董元醇奏章事后，慈禧利用八大臣的大意疏忽，密遣自己的亲信太监安得海往来热河北京之间，加紧了与奕訢联系，做好了政变准备。

10月，咸丰帝灵柩由热河启程运往北京。两宫太后携同幼帝载淳，间道而进，11月1日先期到达北京。这时，奕訢在京已经作好政变的准备。两宫太后及小皇帝抵京，政变立即进入实质性阶段，而肃顺等人还拥着灵柩在返京途中。同

日，宫中颁下御旨，将八大臣中的载垣、肃顺、端华解职，其余五人退出军机处，令恭亲王奕訢率同各部大臣讨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礼仪。载垣不知这是对方早已安排下的步骤，出面阻止奕訢入宫议事，内廷下谕将载垣革职拿问。随后，又下一道谕旨，将载垣、肃顺、端华革职下狱，严行议罪。当夜，一支人马在密云逮捕了护送咸丰灵柩的肃顺等人。随后，下令赐死载垣、端华，将肃顺“斩立决”。其余诸人一律革职或革职发配。

11月3日，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以议政王身份主持朝政，政变宣告成功。因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历史上也称为“辛酉政变”。原拟次年使用的祺祥年号，在政变后，改拟为“同治”，意为两宫太后共同治理国家。实际上由西太后一人操纵。从此，慈禧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权⁴⁰余年。慈禧及奕訢等人上台，英国公使普鲁斯向外交大臣罗素报告说：“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这是“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因此北京政变，慈禧掌权，是得到外国侵略者的赞赏和支持的，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勾结的开始。

1862年1月，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慈禧及奕訢等感到恐慌，2月8日，发布上谕说：“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业经谕令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至此，借师助剿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项

政策而得到贯彻执行。外国侵略者也扯去“中立”的假面具，与清政府进行军事合作，共同镇压中国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和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面临更加复杂和艰苦的局面。

第七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和分裂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 1856 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危害。1854 年在天京破获的由张继庚策划的叛乱

事件，就是一项显著的事例。张继庚本为清朝廪生，太平军攻打南京时，他在城内参与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芝发，混入太平军北典舆衙，潜伏下来，散播谣言，挑拨两广籍和两湖籍战士之间的关系，妄图使太平军内部自相残杀。他串通潜藏的反动分子吴蔚堂等，拉拢收买了织营、土营、木营中的少数人以及水西等门的部分守军，并暗中与江南大营向荣联系，多次密送情报，约期在清军攻城时充当内应。1854年3月，太平天国及时破获了这叛乱案件，张继庚及其同伙被捕处死。

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或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益浓厚。太平天国颁布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处。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企图借助于封建的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巩固天国的秩序。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素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工劳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

围10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场，不知自忌”。他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或处死，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纳等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甚至因洪秀全粗暴对待妃嫔和女官，杨秀清竟借“天父下凡”，要予杖责。杨秀清这样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他的兄弟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宅，他甚至要处其兄以五马分尸酷刑。韦昌辉讨好杨秀清的目的，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 3000 多人于 9 月 1 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 2 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 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 11 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 200 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 2 个月的恐怖统治。

11 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存有疑忌，所以封他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被迫于 1857 年 6 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便利了敌人的进攻。

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 1859 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

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江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队只剩下7000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5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2000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净尽，其余已经遣散的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

二、太平天国危局的暂时缓解

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的大好形势急剧逆转，但此时，各地的反清斗争还在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中外反动势力尚未完全勾结，清廷对湘军仍有猜忌，曾国藩亦未曾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些客观情况对太平天国来说，均属有利条件，使洪秀全得以作出各种努力，挽救危局。

1857年10月，洪秀全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右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共同主持军政。1858年又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并捐弃前嫌，赦免韦昌辉的胞弟韦俊失守武昌之罪，任命他为右军主将。稍后，在当年9月，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回到安庆时，又

以他替代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至此，蒙得恩以正掌率主持朝政，陈玉成、李秀成等五人统领各军，洪秀全则亲自总掌军政，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陈玉成、李秀成等在淮南等地积极扩大军队，使受到严重损耗的太平军得以补充。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来到天京，立即受到重用。5月间，洪仁玕被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接着在6月和12月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14岁参加金田起义，为童子兵。作战勇敢，战功累累，逐步提升为统帅，1855年任冬官正丞相，1857年封成天豫，又正掌率，1858年封成天安、前军主将，当时主要指挥鄂、皖、苏等省长江以北太平军，1859年6月封英王。

李秀成，广西藤县人。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为圣兵，英勇善战，屡次升迁。1856年任地官正丞相，1857年先后封合天侯，副掌率，1858年又封合天义、后军主将，当时负责保护天京和指挥长江以南的部队，1859年9月封忠王。

1858年8月上旬，陈玉成与李秀成及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西南）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共解天京之围。会后，陈玉成率部于8月23日攻克庐州，9月25日在滁州乌衣镇与李秀成部会师，合击江北大营德兴阿和胜保的军队，歼灭4000余人。26日，又在江浦小店（今永宁镇）歼灭江南大营援军5000人，进军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清军“死于浦口一万余人”，并于9月底攻占江浦、天长。10月间，占领扬州、六合，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稳定了天京的形势。

正当太平军进攻江北大营并乘机肃清江北敌军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乘机攻陷皖北、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进犯太平军的重要据点庐州的三河镇。洪秀全命令陈玉成、李秀成率部救援，1858年11月7日，陈玉成率军到达庐江县西面的白石山和三河镇南面的金牛镇，切断李续宾的后路。同时，命令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截击自舒城出犯的敌援军。李秀成也率部赶来，屯兵于白石山作为后援。11月14日，陈、李大军夹攻李续宾大营，15日，湘军反扑，陈玉成诱敌人入包围圈、陈、李大军汇合从三河镇出击的吴定规部，将李续宾所部团团围住，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弟）等文武官员400余人和湘军6000人。

三河大捷后，围攻安庆的湘军仓惶逃走，陈玉成、李秀成乘胜进兵，收复了桐城、潜山、太湖等地，皖北复归太平军所有。当年12月，李世贤在皖南宁国湾沚镇大破清军；杨辅清在江西占领景德镇，屡败清军。天京上游局势暂时得到稳定，基本上扭转了领导集团分裂后的军事危机。但从总的形势来看，战略防御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

1858年下半年，太平军浦口、三河战役的胜利，使革命形势有了好转，并迫使清政府无力再建立江北大营，在1859年3月明令将它撤销。但是江南大营加紧围困天京，东线形势复趋恶化。西线曾国藩湘军自三河战败后，仍坚持夺取安庆的计划。1859年10月22日，韦俊又献池州降敌，翌年4月，湘军进犯安庆。

1860年1月，太平军在芜湖召集会议，洪仁玕与李秀成定计，联合各军，采用佯攻杭州，调虎离山，然后粉碎江南

大营的作战方案。洪秀全批准了这一方案。2月，李秀成、李世贤率军分别由皖南直趋浙江，两军于29日占领安吉，3月5日占长兴后，又分为二，李世贤攻湖州；李秀成军则冒充敌军旗帜号衣，沿莫干山东麓，自妙西、武康进袭杭州。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抵杭州城下，19日，攻占杭州。苏杭是江南的粮饷基地，江南大营不得不分兵1.3万余人前往救援，清军援兵在23日方才到达杭州城外。李秀成大军便在24日夜撤离杭州，由小路急返天京。4月8日，在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此时，陈玉成已经率部自皖西经庐州、全椒进攻滁州，正在全椒一带活动，等待时机进援天京。4月底，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五路大军10余万人齐集天京城外。5月2日，猛攻江南大营，城内守军也分头出击，6日，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大营中所存饷银数十万两及军火局的枪炮、火药、铅子等均为太平军所获，击溃清军3万余人，天京解围。

围歼江南大营后，洪秀全于1860年5月间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批准了洪仁玕提出的先取苏、杭，然后挥师沿江西上，分南北两路进攻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

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率军东进，当日攻克句容，19日占领丹阳，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国樑落水而死。接着连克常州、无锡，钦差大臣和春在浒墅关自杀。天京城外江南大营的营垒长壕，均被太平军荡平。自此，清政府再也无法恢复江南大营。清军从丹阳、常州一带溃逃时，抢劫烧杀，退至苏州后，又在繁盛的阊门、金门之外纵火焚烧三昼夜，以期阻止太平军。清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当地人民义愤，6月初，

当李秀成大军压境时，苏州人民积极配合，使太平军于6月2日顺利地占领苏州，同时又占领江阴。稍后，又在当月攻克昆山、太仓、嘉定、青浦等地，7月1日占领松江，大军直至上海近郊，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此时，陈玉成也率部渡江，先后进攻扬州、全椒。7月下旬南下，自天京经宜兴攻入浙江，连克安吉、于潜、临安、余杭、富阳等地，8月初进抵杭州卖鱼桥。后因上游情况紧急，陈玉成于8月9日自余杭一带撤去。

三、《资政新篇》

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王玕迫于清军缉捕，于1852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亲自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又因与外国传教士往来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深。他到天京后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将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先后封陈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余的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浚河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

保险等。他还主张奖励民间开矿、制造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礼拜堂、育婴堂，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了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服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喻》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资政新篇》除洪秀全表示大多赞同外，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也没有实行过。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

四、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洪秀全未能从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等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对周围的许多人不再信任，滋长了任人唯亲的不良倾向，听任庸碌无能的安王、福王胡作非为，他们的10个儿

子均被封王，洪秀全的3个“附马”也被重用。在朝内，除洪仁玕以外，没有一个出色人才。

太平天国后期战局的险恶使洪秀全更加沉溺于逃避现实的宗教幻觉之中，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再次显示奇迹。诏书的大量内容是要人们相信他是受到“上帝”、“耶稣”、“天兵天将”保佑的。洪秀全曾一度改国号为“上帝天国”，后来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反复宣传“爷哥朕幼，父子公孙，同坐天国”，使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色彩日益浓厚。

洪秀全为了维系人心，控制将领，又采取了广封爵赏的办法。结果，助长了将领们对名利地位的追求，“一月三迁而尤未足。”最后只得以滥封王位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王位已封至2700余人。从而加剧了太平军将领分裂割据的倾向，使早已存在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等问题更加严重。

太平天国后期，地方军事将领既领兵，又理政，由于洪秀全的滥封诸王，1862年以后，他们大都获得王爵，权势更大，往往拥兵自重，地方割据和分散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各将领的封建特权也恶性膨胀，封建腐朽习气越来越重，诸王诸将甚至“衣亦不自穿，食不自举”，早期的艰苦朴素和平等观念已经丧失殆尽，革命内部分裂加剧。

苏福省和浙江省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基地，在这两省里没有省、郡、县三级政权，推行乡官制。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保护耕牛，扶助贫民经商等等。有的地方由于地主被镇压、逃亡，农民减轻了地租剥削，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生产也得到了发展。但是乡官成分严重不纯，不少地方是由地主富人来担任，在苏南

的无锡、金匱（今无锡）等地，“勒令绅士充当军帅”，在浙江象山，“胁各处殷实士绅充当乡官”。因此有些地方政权便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对于地主团练武装也只满足于招降，而不是坚决镇压，某些地区的地主团练全盘不动地保存下来，实行封建割据。苏、锡、常一带，地主团练十分猖獗，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甚至公然叛乱，例如长洲徐少遽，金匱华翼伦等曾勾结清军密谋内应。同时，太平天国在这一地区，沿袭了旧的土地赋税政策，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的情况改变不大。因此，苏浙根据地并不巩固。

太平天国前期实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对土地私有制的承认，后期仍旧执行这一政策。在苏浙根据地，一开始曾经短期实行过计亩造册，“照田完纳”或“着佃收粮”的政策，即佃农不向地主交租，直接按田亩向太平天国交纳钱粮。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因田亩数字不足，钱粮收入没有保证等原因，而在1861年改为业主收租缴粮的政策，招业主认田，发给地主和自耕农以田凭，保护其田产。并发布许多文告规定“佃农照常输租”，严禁农民抗租抗霸，违者“本人处斩”，此外，还设立了租局或粮局帮助地主收租完粮。对于农民的抗租斗争进行镇压，这在1862年以后已经屡见不鲜。凡此种种，都说明太平天国的土地、赋税政策已开始背离农民阶级，转向维护地主阶级利益。

太平天国后期对工商业继续采取保护与扶助的方针，在苏福省，贫苦人民经商无资本者可以“具呈请领本钱”，或者“呈明何业认领何等货物，仍估定货价，于售卖后，缴还钱七成，留三成”，以便继续经商。在杭州对“无本资生”的贫户，则“借其本而救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鼓励人

民经商。对工商店铺作坊等进行管理，规定要先领取临时性营业许可证——“印照”，方得营业，经过查核资本和营业性质后，再发给正式营业执照——“商凭”，正式批准营业。商凭上载明颁发日期、店名和店主姓名以及商业政策、应守条规。行商外出贩运货物要领路凭，如果需要进入清统治区要领剃头凭，允许剃发。太平天国严禁吸食和贩运鸦片、水烟、旱烟，不准开设出售迷信品的商店。

太平天国还重视对外贸易。据怡和洋行上海分行负责人惠涛的报告，在1860年太平天国占领苏州后3个月，“作为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商品的生丝贸易，在太平天国大力扶持之下，就‘非常昌旺’，其他各方面的贸易，比起清朝统治时代，也都‘大有进展’”。例如，1849年至1850年度，中国生丝出口总额为1.6万余包，茶叶为5390余万磅。在太平军占领了绝大部分产丝地区和产茶地区后，1861年至1862年度，生丝的出口增至7.3万余包，茶叶增至1.07余亿磅；到1862至1863年度，更分别增至8.3万余包和1.18余亿磅。

第八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一、第二次西征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东下苏杭，占领苏南、浙西许多

州县，而此时英法联军又再次扩大侵略战争，进攻大沽，京津岌岌可危。清廷为了挽回江南败局，于1860年6月8日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10日，改为实授，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湘军的势力自此急剧扩大。曾国藩军政大权在握，调集湘军及清军约8万人加紧围攻安庆，天京上游形势紧张。安庆是天京的西北屏障，太平军必守的战略据点。

1860年9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在天京会商，决定仍按5月间天京会议所定计划，由陈、李分兵南北两路同时西上，另增李世贤、杨辅清两军在长江南岸配合，并规定南北两路军于1861年4月在武昌会师，迫使湘军救援湖北，以解安庆之围。这一防御性的进攻，就是第二次西征。

陈玉成率领的北路军，于1860年9月30日，自天京渡江北上，向安徽进发。10月，在皖北与捻军联合，声势大振，号称10万。于是，暂不向西，南进庐州、桐城，试图顺道解安庆之围。11月下旬，在桐城挂车河一带为多隆阿、李续宜所部清军战败，只得引兵到庐江整顿，决意继续西征，奔袭武汉。1861年3月，攻克霍山，越过大别山，挺进湖北，17日克蕪水（今浠水），18日占领黄州（今黄冈），离武汉仅150余里。当时黄州以西清军十分空虚，湖北巡抚胡林翼正帮助曾国藩围攻安庆，得到消息以后，急得吐血。此时，英国侵华舰队司令阿伯，参赞巴夏礼，带领舰队到达汉口，筹划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进行开市事宜。英国侵略者为了维护侵华利益，出面干涉和阻挠太平军向汉口进军。巴夏礼到黄州会见陈玉成，以保护武汉商务为名，要太平军远离该埠，以

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陈玉成受到英国侵略者的阻止，又因李秀成未能如期赶到会战，便停止进攻武汉，率领大军北上攻克麻城、德安、隋州等城。这时，安庆十分危急，陈玉成派赖文光等留守黄州，等待李秀成，自己在4月22日率军万余人驰救安庆。

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军于1860年10月下旬从安徽太平（今当涂）出发，11月16日方才到达芜湖，经繁昌、南陵、石埭等地，于12月1日攻破黟县羊栈岭，离曾国藩老巢祁门大营仅80里，曾国藩因兵力单薄，惊恐万状，写下遗嘱，准备自杀。但李秀成不了解敌情，以为敌人屯驻大军，反而绕道浙江，使曾国藩绝处逢生。李秀成直至1861年2月才率部攻入江西，6月进至湖北，鄂南起义群众纷纷响应，参军者多达30万人。6月15日，攻克黄州对岸的武昌县（今鄂城）。此时，北岸陈玉成已在4月下旬东返救援安庆，只留下赖文光驻守黄州。与李秀成配合西进的李世贤部也在4月下旬于江西乐平被左宗棠战败，回军浙江。杨辅清则一直在皖南活动，未曾北上。再加上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到兴国（今阳新）阻挠太平军进攻武汉，于是李秀成便放弃进攻武汉的计划，7月间从武昌退兵，经江西进取浙江。第二次西征功败垂成，安庆形势也就更加恶化。

二、安庆保卫战

安庆自1860年6月中旬枞阳失守后，就被包围。曾国藩命其胞弟曾国荃率湘军1.5万余人担任主攻，在城外挖长壕

3道，以深沟高垒，围困安庆。至1861年4月，围城之敌已增至4万人，城内守军在叶芸来等率领下仅1万余人。

1861年4月中旬，陈玉成率领西征军大部由湖北驰至安庆外围重要据点集贤关。调驻守六合、天长的吴定彩和黄金爱至安庆，并命吴定彩率千余人入城助守。此时洪仁玕、林绍璋奉天王之命，率部2万余人自天京前来增援，吴如孝自庐江、桐城，黄文金自芜湖，也前来救援。但这些援军于5月2日至6日，先后在挂车河一带为事先驻扎安庆、桐城间，担负专打太平军援军任务的多隆阿部所败。5月30日，集贤关守将程学启叛降清军，6月8日至9日，湘军鲍超部利用大雨攻陷集贤关外赤冈岭要地，太平军勇将刘垓琳及4000精锐守军壮烈牺牲。从此，安庆守军与城外援军无法互通消息。7月间，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照会英、俄、法公使，要求停止洋船接济安庆太平军。当月23日，英国公使普鲁斯训令上海领事麦华陀，禁止英船接济安庆太平军，并由英舰封锁江面，断绝了洋商运粮至安庆出售。

8月7日，陈玉成与天京援军杨辅清、黄文金、林绍璋、吴如孝等分西、北、东三路进援安庆。陈玉成等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奋战半个多月，在24日冲入集贤关，27日攻破湘军第一层长濠，城内守军也曾奋勇出击，激战多次，均未能打破包围。此时湘军加紧攻城，9月5日，敌军利用城中粮绝之际，以地雷轰塌城墙，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英勇牺牲，安庆失陷。安庆失守以后，太平天国上游重镇皆陷敌手，天京失去屏障，更加不易据守，太平军在安徽的优势顿失，丢掉了重要的兵源、粮源基地，特别是陈玉成所

部精锐损失殆尽，这对太平天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安庆保卫战期间，李秀成率部退出湖北，返回江西。1861年9月，李秀成部在江西铅山会合自广西返回的石达开部10余万人，进入浙江。此时，李世贤部也因4月间在江西乐平受挫于左宗棠，返回浙江，到1861年10月间，已先后攻克金华、武义、遂昌、处州、严州等地，控制了浙江西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李秀成部与李世贤部汇合，11月1日攻克绍兴，12月9日占领宁波，29日克复杭州。1861年底，浙江省大部均为太平军占领，建立了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与苏南根据地联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年中的重要基地。苏、浙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支撑太平天国后期的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丢失安庆，使湘军据以有利形势，围困天京。从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安庆沦陷后，陈玉成退守庐州。1862年2月，陈玉成命令陈得才、赖文光率部与捻军配合，远征河南、陕西，扩充部队，以图收复皖省。这支部队后来转战西北豫、鲁各省，天京陷落后，还继续和清军战斗四年之久，但在当时却未能挽回安徽败局。5月13日，清军攻陷庐州。陈玉成等先一日率部向北突围，到达寿州时，受地主团练头子苗沛霖的欺骗，被诱捕，解送清军胜保营中。审讯时，胜保妄图劝降，陈玉成大义凛然，“立而不跪，大笑曰：‘尔乃我手中败将，尚覼然高坐以讯我乎’”！列数胜保败绩，以讥诮之。1862年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遇害，时年26岁。“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从此，太平天国西线崩溃，江北根据地丧失殆尽。

三、抗击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

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一次上海之战

1860年5月，太平军再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为发展胜利，巩固天京，太平天国统帅部作出乘胜扩大战果，开拓江山，进军苏、常的决定。6月，由忠王李秀成统率的太平军，连下常州、无锡、苏州等东南富庶之地，并向松、沪进逼。

上海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重要基地，当太平军攻克苏州，威胁上海之时，英、法等国与清王朝地方当局串通一气，准备以武力阻挡太平军收复上海及其邻近地区。通过上海道台吴煦和买办杨坊，雇请了美国一炮舰的大副华尔，招募在沪外国逃兵、水手等亡命之徒100多人，装备洋枪洋炮，组成一支“洋枪队”，由华尔充任领队，以对抗太平军。同时，英法等国还增加了在上海地区的舰船和正规军，分别驻扎在吴淞口和英法租界，准备伙同“洋枪队”与太平军为敌。

太平军同“洋枪队”的首次交锋，是从“洋枪队”企图夺取太平军手中的松江城开始的。7月初，华尔率“洋枪队”约300人，进犯松江。行前，华尔以重赏为诱饵，为那些亡命之徒打气。他们先乘轮船到松江附近，然后步行到城墙脚下，准备在黎明前用云梯攀登城墙，进行突然袭击。“洋枪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在集结地喧哗，早已暴露了目标。守城的太平军在陆顺德统率下，不动声色，严阵以待。等到

“洋枪队”竖起云梯，喝得醉熏熏的酒鬼蜂拥攀梯而上时，守军以密集的火力扫射，不到 10 分钟，“洋枪队”徒纷纷中弹坠地，当场击毙 90 人，击伤百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华尔的残兵狼狈溜回上海。

华尔与太平军第一次交锋惨败以后，又重新招募菲律宾以及英、法、美等国在沪的流氓，兵力增加到 600 人，并配火炮 10 门。于 7 月 16 日出动 200 余人，火炮 10 门，卷土重来，再犯松江。为了转移太平军的注意力，华尔诡称前往青浦。入夜，浓雾笼罩大地，华尔忽然改道径奔松江。晚上 10 点，“洋枪队”进抵松江东门外，构筑炮阵地，将火炮对准东门。太平军守军未曾发觉。将近 11 点，炮火突然猛轰东门，华尔命“洋枪队”架云梯越过护城河，以便登城。这时，守军发觉敌情，立即集中火力，封锁护城河，阻敌前进，“洋枪队”两次冲锋都被打退。华尔于是改用炸药爆破，城门被炸开可容一人进入的通道，华尔率队从通道鱼贯而入。太平军与入城的“洋枪队”展开肉搏，血战 2 小时，太平军的炮阵地被敌攻占，之后，又组织多次反击，未能成功。第二天清晨，松江守军从西门、北门撤退。“洋枪队”侵占了松江城，但却付出重大代价，伤亡过半。此战，太平军毙敌 62 人，伤敌 101 人。太平军的枪弹击伤了“洋枪队”领队华尔的左肩，副领队法尔思德也受重伤。

“洋枪队”以松江为基地，窥测动向。为阻遏太平军从苏州东进，采取先发制人，以夺取青浦作为前沿据点。太平军得悉“洋枪队”动向后，统帅忠王李秀成立即派兵从苏州增援。8 月 8 日，“洋枪队”头目法尔思德、白齐文率队攻青浦。

9日，太平军以优势兵力，分路出城迎战，大败“洋枪队”。太平军乘胜猛追，于8日12日收复松江，并从青浦、松江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向上海进军。

太平军统帅李秀成及时向上海居民发出谕，晓示此行目的，要求地方官绅“洗心革面，作速投诚”，太平军“自当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如胆敢以武力相抗，“岂区区弹丸之地所能抗拒者乎”？面对太平军的威力，外国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英法当局以驻沪海军长官名义，向李秀成发出一份通告，声称：“上海县城及外人居留地，已由英法两国联军实行军事占领，倘有武装队伍（指太平军）攻击或趋近联军防地者，当视为敌对联军行动之开始，即将遭受断然之对付。”针对外国侵略者的威胁，李秀成通告驻沪各国领事，太平天国“只与清妖敌对，而与诸外国则并无争执”，“若尔等意欲制造纠纷，挑动战争，则我军所向披靡，……胜负之数，指日可待。”太平天国对侵华欧美各国，虽误认为同信基督教，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经过松江、青浦之战，逐步认识了外国侵略者的真面目，从盲目和好转向先礼后兵，反侵略的立场渐趋鲜明。

8月18日，太平军前锋抵徐家汇，逼近上海西、南二门。太平军不顾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决计进兵上海。集结在西门、南门一带的英法联军突然向太平军开火，如雨点般的枪弹持续达两小时。这时，李秀成仅带3000近卫部队，为表示“不扰外人”的诚意，李秀成命令勿开枪还击，太平军士卒伤亡甚众，旋即后撤。20日，太平军3万后队抵沪，向“英租界”跑马厅一带逼近，英军放枪炮拦阻，苏州河面的英海军

舰船也发炮助战，李秀成为炮弹击伤面颊，太平军退至徐家汇，24日撤出战斗，分别返回松江、青浦。

“洋枪队”进袭松江、英法联军在上海逞凶之后，表明英法侵略者从此撕下了伪装中立的外衣，直接派兵与太平军作战。到1860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更是把太平军视为在华夺取种种特权的重要障碍。从此，太平军揭开了奋勇反击外国侵略军的新篇章。

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二次上海之战

1861年，太平军投入主要兵力经略浙江和保卫长江中游地区，一时无力发兵进取上海。外国侵略者深知上海为太平军既定的攻占目标，目前只是作战间隙的暂时宁静，便乘机逐步增加在沪部队，并同清政府地方当局筹办中外会防局，进一步串通一气，以抗拒太平军。1862年上半年，上海地区的战斗又起。在这一时期，太平军前后投入四五万队伍参加作战，而外国侵略军加上“洋枪队”，兵力最多时将近万人，加上清军，总数已超过太平军在上海地区的兵力。1862年1月7日，李秀成自率大军，从江、浙水陆并进，直奔上海，至20日，各路太平军分别攻占了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前锋到达宝山、吴淞、高桥，对上海形成了包围之势。从此，围绕着上海的攻守，在其周围地区展开了比前年更为频繁而激烈的战斗。

2月16日，“洋枪队”领队华尔，伙同英驻沪海军长官何伯，化装潜入高桥太平军阵地前沿侦察后，于24日，由何伯和法驻华海军长官卜罗德，率联军780名，火炮7门，乘11

艘舰船，攻扑高桥。“洋枪队”700名也从松江调来参战。在这场激战中，太平军击伤“洋枪队”副领队白齐文。英法联军凭借火力优势侵占了高桥，将全镇付之一炬。侵略军在高桥得手后，发现太平军在闵行附近的萧塘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于3月1日调集1300多名海军陆战队和炮兵，偷袭萧塘。太平军以劣势武器装备，与侵略军鏖战1小时，最后展开肉搏，毙伤侵略军50余人后，太平军撤出萧塘。

高桥、萧塘战斗失利后，太平军改变了进攻上海的计划，提出了四面包围、稳扎稳打、待机攻取的作战方略。他们认为，要取上海，必先击败“洋枪队”，铲除它的老巢松江。为此，首先要切断松江与上海的联系，占领其间的必经通道七宝和泗泾。太平军“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令该妖内中自变，方可乘机计取。”这一连营固守、伺机出击之计，使侵略军得以从容出击，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侵略军出击、太平军防御的局面。

1862年3月，英军少将（一说准将）士迪佛立自天津率援军抵上海，并任与太平军作战的总指挥。侵略军探悉太平军向七宝方向运动，遂抢先发动攻势。4月3日，英法陆海军以及“洋枪队”一部共2100余人，还有几十名俄军参加，携大炮13门，从上海出发，直扑七宝。4日晨，侵略军会齐后，利用浓雾作掩护，向太平军七宝王家寺大营推进，径抵距太平军防线仅数百米处。太平军营内有10至12道木栅，每道木栅周围掘有壕沟。联军以猛烈的炮火狂轰太平军营垒，工事纷纷倒塌。在坚守1小时后，守军被迫撤离王家寺大营。下午，何伯、华尔分率侵略军与“洋枪队”500人，攻扑王家寺

附近的罗家港太平军营垒。当侵略军企图通过一座石桥时，遭到太平军炮火的猛烈射击，侵略军几次组织强行过桥都被击退。此战，太平军毙伤联军官兵 75 人，侵略军头目何伯被击伤。5 日，英法海军陆战队以优势炮火轰毁了罗家港太平军营垒，太平军毙伤敌军 12 名，然后有秩序地撤退，未能实现牢牢控制松沪通道的预定目标。

4 月 17 日，英法侵略军伙同“洋枪队”出动 2400 余名，大炮 14 门，由士迪佛立率领，进攻太平军在浦东的据点周浦镇。太平军在周浦构筑了由三道木栅和两条水沟组成的坚固防御工事，足以阻遏侵略军步兵的进击，但仍难以抵挡强大的炮火袭击。晨 6 时，侵略军由黄浦江乘船，8 时半登陆，然后步行 2 小时，抵达周浦前线。当士迪佛立携其参谋对太平军阵地进行侦察时，遭到狙击手的射击。下午 2 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不久，太平军的炮火被压制，防御工事被摧毁，遂向川沙方向退却。侵略军在撤出战斗后，又放火把周浦镇焚烧一空。

接着，侵略军头子士迪佛立、何伯、卜罗德等人又商定侵占上海周围要地嘉定、青浦、南桥和柘林的作战计划。4 月 28 日夜，侵略军同“洋枪队”共 4600 人，配备 30 门大炮，在梵王渡集结待命，第二天闯入南翔太平军防区，并于夜间向嘉定城挺进。嘉定原有坚固的城墙，周围有宽阔的护城河。5 月 1 日黎明，侵略军用大炮猛轰南门城墙，守军发炮还击。之后，侵略军用小船搭成浮桥渡过了护城河，并在东门和南门之间攀登城墙。守军奋勇作战后，从西、北门撤走。据太平军的“洋兄弟”呤喇记载，在嘉定之战中，防守南门的 100 多

名童子兵，作战极其勇敢。他们“为了延缓敌人攻城，掩护自己军队撤退，勇敢光荣地坚守城内，准备为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一个友人曾亲眼见到三个小家伙，每个人拿着一杆小火绳枪，冒着联军射过来的可以炸毁一大片墙的大炮弹，一直冲到前面，用他们那小小的武器对着敌人开火。”

5月12日，英法侵略军与“洋枪队”4600余人，携带来复重弹炮在内的各种火炮35门，向扼守青浦的2万太平军进犯。黎明，侵略军开始炮击青浦城，守军发炮还击，并用大型抬枪和毛瑟枪射击逼近城垣之敌。侵略军的炮火，把城墙轰开两个宽阔的缺口，然后越过护城河。经过四次反复争夺，青浦终为侵略军攻陷。

5月17日，侵略军进犯奉贤南桥镇，依仗火炮的优势，于下午炮轰南桥工事。太平军一面发炮还击，一面组织部队隐蔽在城墙后面和底部的火力死角区，待机狙击敌人。当侵略军逼近时，突然大声呐喊，一齐奔上城墙，用小型火器，瞄准侵略军射击。一发子弹击中法国驻沪海军长官卜罗德胸部，伤重毙命。这是太平军在反侵略作战中击毙的第一个敌军高级指挥官。当时的民谣说：“南桥南桥，两下兵交。活捉洋鬼，洋枪当柴烧。”18日，“洋枪队”沿河而上，进犯柘林。从黎明直到中午，他们首先用大炮猛轰，然后不断冲锋。但每次冲锋都被太平军击退。太平军在接连遭到侵略军威力强大的炮火杀伤后，已经找到防避炮弹的措施。他们挖掘了众多的散兵壕，用厚木板封顶，上面再堆积几尺厚的泥土，用来隐蔽自己，从而大大减少了炮火袭击时的伤亡。战斗直至20日

黎明，“洋枪队”采用袭击战术，突破了柘林守军的防线，冲入镇内。

太平军在上海周围与侵略军、“洋枪队”鏖战两月，在频繁的战斗中，虽在作战兵力上始终占优势，但由于抵挡不住敌军新式重炮的轰击，却一再失利，未能进入上海。但他们反对侵略者的顽强精神和良好的作战技能，连敌人也为之惊叹不已，认为“对太平军作战决不是‘军人旅行’，而是涉及真正的严肃的战术。”太平军从挫折中总结了经验，针对侵略军炮火猛烈的特点，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并为尔后痛击侵略军创造了条件。

5月18日，太平军统帅李秀成以主力进攻嘉定，分兵出击宝山、青浦，同时派兵绕至嘉定后路要地南翔，以牵制、阻截敌之援军。侵略军头目士迪佛立获悉嘉定告急后，立即调集英法联军驰援嘉定。24日，侵略军行至南翔，太平军奋起狙击，敌军伤亡累累，进入嘉定时已成惊弓之鸟，胆战心惊，不敢驻留，“焚城”逃窜。26日，太平军收复嘉定，军威大振。接着，李秀成率太平军2万主力进攻青浦。为了孤立青浦，李秀成以一部分太平军插入青浦与松江之间的泗泾，又以另一部进攻“洋枪队”老巢松江。包围青浦城的太平军在城外构筑营垒，把青浦团团围住。青浦城内的侵略军，有“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部1500百人，坐困孤城，从上海前往救援的英法侵略军在途中被太平军拦截，华尔的“洋枪队”虽冒死冲入城内，但见孤城难守，遂同守军突围。太平军重创“洋枪队”，并活捉了法尔思德。6月10日，太平军收复青浦城，并乘胜攻破泗泾至松江的敌营100余座，缴获大量洋炮

洋枪和火药，前锋直抵上海城下。李秀成回忆在上海地区反击侵略军的战况时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80多年后，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还说：“太平军人数如此之多，实力如此之强，忠王指挥如此英明，只用几千人与他们作战，犹如拳击羽毛被褥一样，你在一点施加压力使它凹入，但凹处由于四周弹力的反作用立即凸了出来。”

正当上海外围太平军处于先挫后胜、中外反动派计穷力竭的有利形势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又被湘军曾国藩部围困，天王洪秀全严令李秀成从上海撤兵回救天京，致使攻复上海之战功败垂成。

太平军与外国 侵略军浙江宁绍地区之战

太平军于1862年上半年在上海地区与侵略军鏖战的前后，还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同“洋枪队”和外国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太平军名将黄呈忠、范汝增，奉忠王李秀成之命，于1861年秋，统率数万大军，开辟浙东基地，主要目标是攻取沿海重镇宁波。宁波自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后被辟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商埠，外国侵略者在甬江北岸设有“居留地”（租界），作为侵华的据点。这样，太平军在进军宁波的起始，就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文武两条战线的斗争。

早在1861年5月，当外国侵略者探悉太平军有进击浙东的意向后，英国当局就令驻华海军舰长咭乐德克赶往宁波，协助清军布防，并威胁太平军不得进攻其通商口岸宁波，否则

将用武力制止。英国侵略者蛮横无理的要求，遭到太平军当局的断然拒绝，并于12月9日进驻宁波。

1862年4月，宁波太平军鸣放礼炮欢迎主将范汝增从外地回来，英国舰长咭乐德克以礼炮流弹落入江北岸“租界”为借口，竟狂妄要求太平军拆除面向“租界”的炮台，为太平军严词拒绝。守军作好了坚守自卫的准备。5月上旬，英法侵略者与清政府地方当局反复密议，决定10日向太平军进犯。清早，咭乐德克率恩康脱号兵舰向守卫宁波城垣的太平军发炮，接着，港内所有英法战舰齐向城内发炮轰击，守军立即发炮还击。侵略军依仗新式重炮，击毁了太平军的炮台和其他防御设施，但守军仍毫不畏惧。当侵略军用云梯爬城时，太平军以粪罐、火弹、石块等作武器，与敌肉搏。下午3时，咭乐德克率突击队登城，范汝增率400士卒迎击，“天地暗色，屋宇震荡”，巷战持续至薄暮，守城将士才次第从南门和西门撤出。此战，太平军予侵略军以重创，击毙法海军舰长耿尼、英军官科诺华等28人，击伤英舰长克莱吉等。在英法联军之役耀武扬威的英炮舰茶隼号也被太平军的炮弹打穿了68个洞。侵略军因人数太少，又怕太平军杀回马枪，未敢尾追。太平军撤至慈溪、余姚一带集结。

外国侵略者为加强宁波地区的力量，商调华尔率“洋枪队”一部协守宁波城，同时仿照上海组织“洋枪队”的办法，组成了中英、中法混合军，分别称作“定胜军”、“常捷军”，联合向浙东太平军控制区推进。太平军在余姚接连三次打退了侵略军的进攻，并决定集合重兵，分南北两路再攻宁波。北路黄呈忠部于9月18日克慈溪，华尔率“洋枪队”500人于

20 日晨反扑西门，守军在城上对扑城的洋鬼子密集射击，击中手拿望远镜向城内了望的“洋枪队”头子华尔的胸部，他以右手按住腰部，踉跄了几步便倒在地上，于第二天拂晓前毙命。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刽子手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太平军继击毙卜罗德之后打死的第二个侵略军头子。南部练业坤部于 9 月 20 日收复奉化，10 月 9 日，大败进犯奉化的侵略军，毙敌 24 人。太平军两路反攻宁波虽未实现，却杀得侵略军损兵折将，惶恐不安。

侵略军在宁波一线得手后，又开始进犯绍兴。太平军绍兴守将陆顺德等事先作了周密布防，在外围驻重兵以作前哨阵地，在城内，建炮台，筑土城，广建防御工事，士气极旺。1863 年 1 月 17 日“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率部攻城，太平军枪炮齐放，当场将勒伯勒东打死。侵略军眼见主将丧命，纷纷逃窜至上虞。侵略军经过一番调整，于 2 月由恬乐德克任总指挥，再犯绍兴。19 日，守军在城边又将“常捷军”继任统领达尔第福击毙，侵略军死伤百余人，恬乐德克也被上司撤职。太平军坚守绍兴达 4 个月之久，直至 3 月 15 日才退往萧山。当时，接连损兵折将的侵略军终日躲在营垒内，不敢轻易出动，连太平军主动撤出绍兴城，他们还蒙在鼓里。

太平军苏南城镇保卫战

到了 1863 年，在中外反动武装的夹击下，太平军在浙江的基地大部丧失，湘军加紧了对天京的合围，各部太平军转战在外，呼应不灵，难以休整，洪秀全已无力将太平军捏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太平天国所能控制的邻近天京的地盘，只

是江苏南部的若干城镇，已处于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如果说前几年外国侵略军和“洋枪队”与太平军交战的目的，主要是维护他们在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那么，如今他们同清政府进一步勾结，是为了把太平天国彻底打垮，扶持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以实现其在历次不平等条约中所夺取的种种特权，并进而使清政府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的指挥棒下，他们决不甘心让富庶的苏南地区仍控制在太平军手里，加紧了武力侵犯。这样，在苏南保卫战中，太平军的处境就更为艰难。

1863年的苏南保卫战，是从“洋枪队”伙同清军进犯太平军的重要基地太仓城开始的。“洋枪队”领队华尔在慈溪被太平军击毙后，由英国一名上尉军官奥伦代理。2月14日，奥伦率“洋枪队”2500名，携各种火炮22门，在清军配合下，气势汹汹地进犯太仓。镇守苏州的太平军主将谭绍光获悉后，立即派增援部队前往太仓，配合守军防御。奥伦依仗炮火优势，企图一举摧毁城墙。在密集的炮火下，只见火焰冲天，砖石横飞，城墙上却空无一人，奥伦以为太平军已无力抵抗，遂令“洋枪队”从被炸开的城墙缺口处扑城，当他们接近缺口时，守城太平军枪炮连发，砖石齐下，“洋枪队”避退不及，纷纷倒地，一些从浮桥越过城壕的“洋枪队”员，全部被歼。正当“洋枪队”乱作一团，准备撤退时，守军从城内冲出，奋勇杀敌，先后打死“洋枪队”官兵400余人，缴获大炮2门，“洋枪队”狼狈回窜。奥伦被撤去代理领队职务，而以英国军官戈登上校接任，并扩军至5000人。

在击退侵犯之敌后，太仓军民在守将蔡元隆的领导下，抢

修加固城防工事，在城内挖了地窖以防炮击，在城外筑了两道护城的高墙，随时准备迎击再犯之敌。5月2日，戈登率“洋枪队”2800人再次进犯太仓，步兵在炮火掩护下，逐渐向城垣推进。下午2时，各种火炮齐发，轰塌了城墙多处，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洋枪队”蜂拥而上，遭太平军炮火的阻拦。守军堵住缺口，坚守城墙，并以密集的火力向“洋枪队”扫射。“洋枪队”难以立足，往后退缩，并再次炮击城墙。太平军经反复战斗，予敌重创后撤离太仓。这一仗击毙“洋枪队”少校班农等20人，打伤“洋枪队”官兵142人。6月1日，侵略军出动炮兵600人，“洋枪队”2500人，占据了邻近太仓的昆山。7月29日，侵略军攻陷吴江。这样，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省会苏州就暴露在敌军面前。

从11月下旬起，揭开了苏州城防战序幕。戈登率“洋枪队”5000余人，伙同清军对苏州城实施包围。太平军凭借城高池深，由谭绍光率部坚守，一时相持不下。戈登决定袭击娄门外土山上的太平军石垒，企图先突破外围防御工事。土山上太平军筑了很多砖砌的炮台，山坡上密密麻麻地钉上竹桩，周围开挖了三道极深的壕沟，堤岸上遍插锋利的竹签和铁钉。壕沟后，还有一长列围桩。面对太平军的坚固工事，戈登决定于27日晚进行偷袭。“洋枪队”的士兵都分发白头巾，以便在黑暗中能够互相辨认。午夜1时许，戈登亲率两连士兵，潜近外围的长桩，其余部队也按预定信号前进。这时，四野寂静，他们认为太平军并未发觉，当突击队爬进胸墙时，太平军突然开火，“洋枪队”陷入太平军的火网，顿时一片混乱。戈登见太平军已有防备，急令部队退却，将大批伤亡士兵遗

弃在战场，至少有 200 多官兵被打死打伤。戈登恼羞成怒，于 29 日晨又以重炮猛轰该地太平军石垒。在这次进攻中，太平军切断了戈登的退路，差点把他捉住。这一天，“洋枪队”又遭惨重伤亡，至少有 9 名尉级军官被打死。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洋枪队”的进犯一次次被粉碎。孰料正在这紧急关头，太平军内部一些将领却悲观失望，贪生怕死，背着主将谭绍光，秘密和中外反动派勾结，准备献城投降。12 月 4 日，太平军苏州守将郜云宽、汪安钧、周文嘉等人在会议厅将谭绍光刺死，向反动派投降。这样，苏州城就不战而陷了。叛徒们满以为可以卖主求荣，结果在两天之后，这 8 名叛将统统被江苏巡抚李鸿章杀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苏州失陷后，广大太平军将士并未放下武器，他们决心破釜沉舟，与侵略军血战到底。1864 年 3 月中旬，戈登率“洋枪队”由溧阳至金坛，准备攻城。太平军在刘官芳率领下，展开了英勇的保卫战。21 日，“洋枪队”炮轰金坛，守军不动声色，等到“洋枪队”越过城壕至城根准备从缺口处登城时，守军忽起，纷纷以刀、矛、砖石、火药包砍击登城之敌，先后击退“洋枪队”的三次冲锋。太平军还乘势从缺口出击，与敌展开肉搏，打死打伤“洋枪队”军官 14 人、士兵数百人，连戈登腿上也吃了一枪，晕倒在地，“洋枪队”溃退溧阳。这就是闻名远近的金坛“砖瓦战”。

在太平天国苏南战场反击侵略军之时，太平军还深入敌后展开反击作战。坚守常州的太平军主将陈坤书派兵一部，插入常熟、江阴、无锡境内，寻机杀敌，吓得侵略军惊呼“天落长毛”。1864 年 3 月下旬，江阴华墅之战是其中最著名的一

役。31日，戈登率“洋枪队”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连在无锡、江阴地区寻找太平军决战。他发现太平军主力集结于江阴华墅。即率队乘坐船只，分路逼近太平军阵地，却不见太平军踪影。正在彷徨之际，太平军实施突袭，击毁了“洋枪队”的运载船只。太平军还乘“洋枪队”步兵分散出击之机，居高临下，从邻近的山丘上呼啸而下，骑兵也从隐蔽地冲杀出来，手持大刀，左右冲杀，把“洋枪队”团团围住，附近农民也用锄头、木棍协助太平军拦击逃跑之敌。这一仗，800名“洋枪队”全军覆没。戈登带了少数士卒，仓皇逃窜，才免一死。据外人记载，“这是戈登生平所遭遇到的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经这次惨败，“洋枪队”士气低落，被迫整顿。

1864年4、5月间展开的常州之战是太平军与“洋枪队”最后一次交锋。4月中旬，戈登统率步兵、炮兵共3000人，作为攻打常州的先锋。太平军守将陈坤书率8000子弟坚守常州城。24日，常州保卫战在隆隆炮声中拉开战幕。“洋枪队”用巨炮轰开了西门缺口，守军前仆后继，一再把缺口堵住。陈坤书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子弹打光了，太平军战士就用砖石击敌。“洋枪队”不得其门而入。接着，南门、北门的城墙也炸塌了，守军在缺口处组成人墙，一批倒下了，后一批继续接上。一直坚持到5月11日，城墙又被炸塌几十丈，守军已难以填补，戈登率“洋枪队”蜂拥而上，攻进城内，展开了逐屋争夺的巷战，一直打到陈坤书衙门口，太平军将士一个个倒下，陈坤书受伤死难。城中的几百名太平军还埋伏在僻巷深院，手持戈矛与“洋枪队”格斗，直到最后一息。在

悲壮的常州保卫战中，太平军 8000 将士浴血苦战，壮怀激烈，可歌可泣，予“洋枪队”以重创。戈登自己也承认：“常州太平军是一支最能拼死作战的队伍”，“洋枪队”的 100 名军官中有 48 人死伤，3500 名兵士伤亡一半。”

至此，太平军在苏南的基地丧失殆尽。

四、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天京的陷落

从 1862 年 11 月底天京会战失败后，天京仍被围困，洪秀全在 12 月制定了“进北攻南”计划，命令李秀成率军渡江北征，进军皖鄂，迫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师救援上游，以便乘机歼灭湘军，解除天京之围。1862 年 12 月及次年 2 月，李秀成部分两批渡江，在皖北一带作战，由于该地被清军和地主团练烧杀劫掠一空，军队无衣无食，饥饿疲惫，“病者甚多，”而清军只采取“专守为稳，以逸待劳”的方针，故进展不大。1863 年 6 月 13 日，湘军攻陷雨花台，进逼天京城南，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救天京，于是李秀成在当月 16 日率军东返，20 日在江浦渡江时，遭到湘军袭击，损失惨重，回到天京时，只剩下了 1.5 万人。至 1863 年下半年，苏南、浙江战场已呈瓦解之势，天京被包围，仅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在 12 月间向天王提出“让城别走”的正确方案。但此时洪秀全思想已经十分僵化，只信上帝，固执死守，并派洪仁玕外出征粮调援，以解天京之围。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陷了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和神策门外。从此天京完全被包围，城中粮食断绝。6月3日，洪秀全病死，长子洪天贵福在6日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19日，敌人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冲入城内，守军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傍晚，天京陷落，湘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抢劫，繁华的京城顿成废墟。

城陷后，李秀成保护幼天王从城墙缺口冲出，并把自己的战马换给幼天王，不幸被敌人冲散，在天京东南方山丁村被俘。他在敌人囚笼里写下了几万字的“自供”，提出了“收齐章程”10条。即“招降十要”。写完后，即被曾国藩杀害于南京。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和重要支柱，在历次重大战役以及开辟苏浙根据地，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均建立功勋，作出贡献，但在最后生死关键时刻，却在自己所写的自供里，不乏对清廷阿谀奉承和对天国自贬自污之词，尤其是要为曾国藩招降太平军，“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民”。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节行为，应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污点。

幼天王突围至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转战皖浙边界，9月下旬进入江西，10月间兵败被俘，11月先后被杀害。洪仁玕慷慨就义时，吟诗明志，其最后四句为：“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和坚贞不移的崇高气节。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从主观上来说，它

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农民阶级是分散的小生产者，而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它的阶级局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先，它无法摧毁封建经济基础，变革封建制度。由于无法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只好从企图否定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到不得不承认封建生产关系，在整个革命中，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演变都是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终于导致农民政权的日益封建化，而使革命失败。

其次，它的阶级局限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思想上，太平天国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提不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来发动群众。作为太平天国指导思想的拜上帝教的理论，尤其是洪秀全的著述，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和平均主义思想，并且渗杂着封建伦理观念，特别是后期，更是宣扬宗教迷信，它既不能继续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无法再进一步动员和组织群众。

在组织上，宗派主义思想十分严重。领导集团内部闹不团结，进行派系斗争，无论是天京变乱，还是后期洪氏集团当政，都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损害。对于其他农民起义组织，大都不愿以平等态度进行合作，因而未能很好地联合各地的反清力量，共同对敌。

在政治上，实行过激政策，轻视、排挤知识分子；将传统文化当作“妖书”，加以销毁；强迫推行上帝教，杀僧道，焚寺庙，摧毁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这种令人反感的过激政策，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在对外关系上，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初期曾

经因为宗教形式相似的缘故，错将侵略者当作洋兄弟，希望他们能严守中立。在第二次西征时，由于侵略者的干涉而停止进攻武汉，在两次进攻上海时，对侵略者与清政府相互勾结缺乏警惕，因而在军事上受到损失。

在军事上，常以攻占城市、击溃敌人为满足，忽视打歼灭战。不重视军队建设，部队素质日降，后期更差。战略上失误较多，如定都天京后，未能及时消灭江南、江北大营，却错误地同时开辟三个战场，分散了兵力，造成北伐军孤军深入，全军覆没；并常因天京被围陷于被动，影响全局。后期在二破江南大营后，未能立即西进武昌，解救安庆，错误地采用了先东进后西征的方针，既延误了战机，又形成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第二次西征，由于对夺取上游武昌、安庆等战略要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一致，因而功败垂成，导致安庆失守，整个形势急据恶化。天京被围后，又一味死守，不肯“让城别走”，导致覆灭的厄运。

从客观上来说，太平天国的敌人除去封建的清朝统治者以外，还有一个凶恶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它们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北京政变以后，相互勾结，合伙对付太平天国。反革命的力量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太平天国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下遭到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要推翻国内的封建统治，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统治。太平天国英雄们的业绩，证明了农民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但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使它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 14 年，遍及 18 省，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军所到，扫荡了地主势力，在天国辖区内，部分农民减轻了地租负担，或者进行了抗租斗争，并且由于地主的逃走死亡，有些农民获得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土地关系，冲击了封建地主经济。

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被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阀的湘军、淮军所代替，军权由满族贵族转入汉族地主手中。由于长期战争，湘、淮军转战各地，汉族军阀势力向地方渗透，担任督抚、提镇等地方军政大员，他们手中有兵有将，“兵饷皆有专”，清廷不得不对他们迁就让步，产生了地方分离的倾向，从而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

太平天国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否认侵略者在中国的特权，严禁贩卖鸦片，以及反对侵略者的顽强战斗，均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妄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阴谋。

19 世纪中叶，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统治，亚洲爆发了波斯巴勃教派起义（1848—1852 年）、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起义（1851—1856 年）以及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 年）等民族解放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这些斗争打击了亚洲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西方殖民主义者，它们相互推动，在亚洲出现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和深远影响，还激励着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许多爱国志士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启发，矢志革命，发动起义。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就曾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并且建议刘成禺编撰《太平天国战争》一书，亲自作序，强调“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要“世守其志”。太平天国播下的革命火种不断地燃烧，终于在 40 多年后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刻，顿成燎原之势，燔毁了封建帝制。

第九节

太平天国运动影响 下的其他农民起义斗争

一、小刀会起义

清乾隆年间，小刀会在福建漳浦云霄地区产生。它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秘密从事反清活动。

道光三十年（1850 年）夏，福建华侨陈庆真（又称陈正成）在厦门旗杆脚五祖庙内与王泉、刘标等 10 人重建小刀会。后来又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发展组织。小刀会继承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歌诀、口号和“腰凭”（会员证）等皆与天地

会相同，并采用天地会在东南亚的代号“文公司”或“顺天洪英义兴公司”。会员以小刀为标志。主要成员为农民，在城市中的组织有手工业工人、水手、搬运工人、其他城市劳动人民和游民以及少数工商业主参加。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又将秘密团体“天地会”，以及“庙帮”、“塘桥帮”（“庙帮”、“塘桥帮”先合并为“百龙党”）和“罗汉党”等合并起来，力量日益壮大，成为会党中的新组织。内部分为“七帮”或“七党”，属于福建小刀会系统的是建帮和兴华帮，属于广东天地会系统的是广帮、潮帮和嘉应帮，属于浙江秘密团体的是宁波帮，属于当地秘密团体的则是上海帮。粤籍天地会的首领刘丽川为第一领袖，闽籍小刀会首领李咸池为第二领袖。有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小刀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上互助帮助，并在一定时期中发动武装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不久，福建海澄一带的小刀会准备发动起义，因事机不密，江源、陈正成等相继被捕杀，会务由黄威（又称黄位）等人主持。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黄威与黄德美率领会众在海澄起义，旋克漳州，击毙总兵曹三祝、汀漳道龙文秀。继而又分军克长泰，并进克同安、厦门、漳浦等地。所经之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起义军攻克厦门后建立了政权，推举黄威为汉大明统兵大元帅。所发布的文告称“大明天德皇帝体天行仁，奉旨征厦，应天顺人”。反映了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传统。清政府闻讯后，急忙增调重兵反扑厦门。黄威率众坚持抵抗，并派专使赶赴天京与太平天国联络，但遭清军追捕没有成功。后终因粮绝饷断，于十

一月自动弃守厦门，黄威率众退居闽粤海面，坚持斗争。黄德美退至龙溪，被地主团练俘获。

同年三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枪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团练内部，在团练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

八月十七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春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度占领嘉定县城。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40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九月七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礼大典之际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小刀会起义军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红旗，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活捉吴健彰。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之后，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军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严明军纪，深得群众拥护。随后，刘丽川、周立春立即由

上海、嘉定分兵出击，在 12 天内，起义军相继攻占了宝山、南汇等 6 座县城，声威大振。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又派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指挥下一致行动。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并于九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这时小刀会起义军总数已达万余人。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官兵、捐资募勇，派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赶赴上海镇压，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攻上海县城。九月二十日，丁国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之进行激烈巷战，两天后撤离县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的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在苏州被杀。这时，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十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武装，夹击上海县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这时起义军虽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到来。十月初，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发炮轰击，并多次发起进攻，均

被起义军击退。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六日晨，清军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筒喷射火焰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200余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12门和许多抬枪，胜利返城。五月二十五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200名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击伤、击沉。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击退。此时英美法三国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放弃“中立”立场，公开与清军联合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清军于十月至十一月底，筑一条东起黄埔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在严酷的形势下，起义军的少数将领或者出走，或者投降，而刘丽川等仍率部坚持斗争。咸丰五年（1855年）年初，法国军队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起进攻。法舰以及领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发炮，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250名法军首先冲入城内，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此次战役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2000余名。由于起义军长期困守孤城，内无粮弹、外无援兵，便于二月十七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出城后，刘丽川在西郊虹桥附近与敌遭遇，在战斗中牺牲，只有潘起亮和少

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另一部分突围后，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农村，在以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积极配合作战。

二、回民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回族人民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主要有云南回民起义、西北回民起义和贵州白旗起义。

咸丰四年（1854年），云南临安的汉族豪绅与回民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因而掀起了汉回的互斗。第二年，殴斗继续扩大，禄丰、罗次、镇南各地回民被杀甚多，而且愈演愈烈。于是，回民首领马凌汉起来组织回民自卫武装，并到昆明申诉。而云南的官吏却认为是“造反”。竟在昆明也制造了屠杀回民的惨案。巡抚舒兴阿且密令各府、厅、州、县的官吏和地主豪绅集团屠杀回民。这样，云南回民被迫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

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姚州回民首先起事，攻占了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蔡发春起于顺宁，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明，徐元吉起于徵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遍及云南全境。

滇东、滇南各族人民起义之初，组织比较分散，各自为

战。随着起义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便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咸丰七年（1857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2万人向昆明进发，七月十二日，起义军兵临昆明城下，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云南清军全力阻截。次年五月，清军收买了马德新、马如龙等人，采取“以回杀回”的策略，利用他们屠杀其他各支回民起义军，不久，昆明附近的起义军相继失败。滇东、滇南的起义被镇压下去。

此时，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杜文秀乘云南提督文祥率兵离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时机，在蒙化率众起义。九月七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起义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会合，大败清军。几天后，起义军占领了大理城。杜文秀组织指挥部队击退了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对大理的进攻，并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杜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十月二十三日，滇西回民起义军齐集大理校军场，筑坛拜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政权。授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以示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此后，他们又制定了各种法律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善民族关系；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

大理政权建立后，杜文秀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修营筑垒，屯集粮草，做好防御清军进攻的准备，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多次的武装“进剿”。

在杜文秀指挥下，滇西起义军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几年之内，滇西 20 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同治六年（1867 年），杜文秀乘清军从云南调往贵州镇压苗民起义之机，发兵 10 万大举东征，由十八大司统率，兵分四路，向云南省城昆明进攻。尽管围攻楚雄的起义军暂时受阻，但其余各部进展颇为顺利。九月间，起义军占领黑、白、琅等盐井，控制了盐井的税收，断绝了云南当局至关重要的财源。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切断了楚雄与昆明的联系。楚雄孤立无援，军火粮饷皆缺。十二月十八日，起义军一举攻占该城。至此，起义军控制了滇西全境。后路毫无牵掣，军锋直指昆明。起义军在昆明外围的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同治八年（1869 年），清军调集重兵救援省城。起义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由于战线过长，粮弹短缺，加之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久攻昆明不下，斗志大受影响，士气消沉，在清军“剿抚”兼施威逼下，滇西回民起义军东征彻底失败。

此后清军相继攻占了南安、楚雄、定远等地，岑毓英指挥清军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为了保卫大理，阻止清军长驱直进，杜文秀采取重兵防守姚州、镇南等地，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的方针，击退了清军多次进攻。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清军进逼大理，清军曾多次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拼死反击，但情况一天比一天险恶。十二月，杜文秀见大势已去，乃服毒后往投清营，企希保全城中百姓，被杀。

清军又相继攻占了顺宁、云州。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起义军最后一座城市滕越失守。至此，坚持了17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陕、甘、宁、青等地的回族人民，在太平军和捻军的影响下，先后发动了反清起义。

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军陈得才部西征攻打西安之时，回民领袖任武、赫明堂、洪兴等人领导了华州和渭河两岸的起义，同当地的汉族地主武装——团练展开了斗争。起义军攻占了孝义镇、羌白镇等地，起义势力已控制了渭南、大荔两县的大部地区。起义军组成了18大营，由赫明堂、任武等分别统率，并推洪兴、任武为元帅，统一指挥。起义军以渭南、大荔为根据地、分兵四出，进而围攻凤翔、西安两府，一时形成了“东西南北、云合响应”的顺利发展局势。

清政府派胜保为钦差大臣来陕镇压，被回民军打败，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前来镇压，仍被起义军屡次击败。于是多隆阿便使用分化起义军的手段，派人去“招抚”。有些起义军将领动摇，接受了“招抚”。这样，清军轻而易举地就进占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羌白镇，给起义军带来了不利。最后起义军不得不退到陕西。甘肃边境的董志原，联合甘肃回民起义军，继续与清军战斗。与此同时，甘肃回民在平凉起义，很快占领了灵州、河州、西宁等地。起义军在斗争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起义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起义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起义军屡败清军，切断了陕西同甘肃的交通，占领了很多地方，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摇摇欲坠。

同治六年（1867年），清政府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大批清军从湖北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军。他在“先秦（陕西）后陇（甘肃）、”“先捻（捻军）后回（回民军）”的方针指导下，把捻军镇压下去以后，便集中全力进攻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军。在重兵进攻下，董志原的回民军向西撤退到金积堡一带与马化龙起义军联合。

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的北路军猛攻金积堡。在长期围困下，金积堡的起义军粮尽援绝。但起义军誓死抵抗，在“堡塞将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掷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但马化龙却在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投降了清朝。左宗棠在受降后，对放下武器的回民，纵兵大杀不留一人，马化龙也被“凌迟处死”。

同年，左宗棠的南路军被马占鳌打败，损兵折将，但不久后马占鳌又率部投降。

第二年，左宗棠又集中兵力围困肃州，经过18个月，最后占领了肃州，马文禄叛变后被杀。

陕甘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坚持了12年之久。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内部又不断有将领受招抚，结果遭到失败。

咸丰八年（1858年），贵州的普安大坡铺一带的回民起义，推举张凌翔、马河图与金万照等为首领，起义军以白巾帕首，自称白旗。几年后占有新城、兴义、普安、安南、贞丰、归化等州县，人数达10余万，在新城建立政权。

同治三年（1864年），贵州提督赵德昌率军进攻，起义军战败，张凌翔、马河图被杀。其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同治九年（1870年）贵州巡抚曾璧光合云贵两省军力进攻起义军。由于寡不抵众，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的白旗起义军终于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彻底失败。领导人金万照被捕遇难。

三、天地会和云南彝民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后，东南沿海各省和长江流域的天地会纷纷响应。天地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清秘密团体。

广西南宁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在1852年9月率众起义。朱洪英称镇南王。1855年3月应罗大纲之召，率军北上与太平军会师。5月间，攻入湖南时，遭到湘军袭击，9月，胡有禄在新宁被俘牺牲，朱洪英率军退回广西，转战湘、桂、黔三省地区，后于1874年在湖南宜章被捕就义。余部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与李文茂于1854年7月先后在佛山镇及广州北郊佛岭寺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称“红巾军”，会合后，分三路围攻广州城，达半年之久。两广总督叶名琛纠合地主武装，并在英、美、法侵略者的帮助下镇压起义军。1855年1月，起义军被迫撤围，后攻入广西，9月占

领浔州府城（今桂平），建立“大成国”，设官铸钱，分配土地，打击地主，展开长期的反清斗争，直到1861年8月才告失败。

1856年5月，云南哀牢山彝族雇农李文学率领彝、汉族农民在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起义。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发布檄文，提出“铲除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的口号，采取“彝汉庶民，共襄义举”的方针。苗、回、傣、白、傈僳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6月间，清军进攻大理回族起义军时，李文学率军三千北上救援，大败清军，解除大理之围。

李文学领导的彝族起义，到1868年，控制了哀牢地区的部分州县，他在所占地区实行土地为耕者所有和减轻田赋的政策，并且组织和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1870年以后，清军大举进攻哀牢山区，起义军主要将领王泰阶、田四浪等先后牺牲。1872年，李文学率军北上救援被围在大理的杜文秀回民军，1874年3月兵败被俘，英勇就义。后由李学东继续领导战斗，1876年6月，李学东病死，起义失败。前后共计20年。

四、贵州苗、教、号军起义

1855年春，台拱厅（今台江）张秀眉率领苗民抗税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两年之间，起义军连克黔东南、黔东诸府县。同时，布依族杨元保于独山，水族潘新简于九阡（今三都），侗族姜映芳于天柱，也分别起义。诸路起义军与张秀

眉相互配合，整个黔东与黔东南各族起义军联成一片。

1857年8月，汉族刘义顺、胡二黑在石阡荆竹园起义，称号军。他们与苗民起义军互相支援，先后攻下了思南府属的一些州县。

斋教军是何得胜、潘民杰领导的一支汉、苗、布依各族混合组成的起义队伍，人数逾万。数年中，斋教军占领了省会贵阳周围的十几个城池。

1857年，黔西威宁的苗、彝农民万余人，借宗教聚会方式起义。他们以陶新春、陶三春兄弟为首，在毕节县猪拱箐建立据点。不久，黔东南苗民起义军岩大五部进入黔西。他们联为一体，攻毕节，克大定，又攻占了云南镇雄、四川高县、珙县等城，并在海马姑开拓了新的根据地。

贵州各支起义军在斗争中此呼彼应，互相支援。当张秀眉向黔东进军时，天柱、思州等地数百屯汉族农民，“蓄发相从，输金纳赋，千里应声”。号军攻打城池，苗民主动运粮接济；或小挫，“则苗、教大出救援，钲声满山谷”。清方记载说：“攻苗匪则号匪梗其中，击号匪则教匪继其后。”

1867年湘军入黔，挟洋枪洋炮的优势，轰毁义军堡砦。次年2月，湘军攻破荆竹园，将号军“俘斩略净”。接着向南进犯，连下30余砦，张秀眉转至湘西。苗军在湘西连获胜仗，湘军被迫东还。清政府增派湘军精锐万余人阻截苗军归路，使苗军西返时遭到重大损失。

在黔西，滇、川清军合狼陶新春兄弟起义军。经过半年战斗，猪拱箐、海马姑先后被攻破，陶新春兄弟被俘牺牲。黔中的教军，亦遭失败。

此后，张秀眉苗军陷于孤立。湘军深入寻战，所过村寨，烧杀殆尽。苗军据险坚守，并不时主动出击。1869年5月，张秀眉、包大度集合苗军万余设伏于黄平县的黄飘夹谷，一举歼灭湘军七八千人，毙敌将领数十员。清军不断增援，于1870年11月攻陷台拱。1871年5月，义军被迫撤出凯里，退保雷公山。1872年3月，再退乌鸦坡。最后，包大度受伤牺牲，张秀眉被俘遇难。

五、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这是1859~1865年间，爆发于云南、活动于四川陕西等地、最终失败于甘肃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抗暴起义

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族人民起义所需的巨大军饷，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被统治阶级视为“完富之区”的四川省，每年要拨解京饷和协济用兵省份150余万两。因此统治者在省内普遍实行按粮津贴、抽取厘捐等办法，聚敛钱财，甚至对鸦片等也采取听商贸易、征收税厘的政策，人民苦不堪言。云南出产鸦片，四川盛产井盐，贩卖鸦片和食盐的商贩、脚夫往来于滇川之间，滇川两省的贪官污吏乘收取税厘的机会，巧立名目，敲诈勒索；诈取不遂，则诬良为盗，任意捕杀，草菅人命。民众与官府的矛盾日趋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1859年（清咸丰九年）夏，以护运鸦片为生的云南昭通

烟帮中的两个人在四川宜宾被官府无故杀害，群情激愤。烟帮首领蓝朝鼎（蓝二顺）乘机在云南昭通大关牛皮寨率众起义，正领导贫苦农民进行抗粮、抗捐斗争的李永和率众与之联合，队伍由数十人扩充至数百人。

由滇入川，分军转战

1859年，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等少数民族反清武装起义正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由于民族、地域等等方面的原因，李、蓝起义军决定离开云南旧地，向地域广阔、以汉族为主的四川进军。十月初，李、蓝率领六七百人的队伍，过老鸦滩（今盐津），进入四川，六天之内，连克筠连、高县、庆符三县。起义军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号召，队伍得以迅速扩大。起义军渡过金沙江，于16日围攻叙州府（今宜宾市）府城。虽然在城外打过几次胜仗，但久攻不克。而救援叙州的清军万余人，正从东、西、北三面向起义军进逼。为摆脱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起义军于12月8日乘夜暗掩护，主动撤围，分军作战。

李永和率部进入宜宾县青山地区；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直趋位于乐山、犍为交界的五通桥、牛华溪、马踏井三角地带的犍乐盐场。这里是四川主要产盐区之一，起义军在盐场获取大量的资财，并吸收大批农民和盐工参军。尔后，蓝朝鼎率军西渡岷江，南下宜宾，与李永和部会合。然后又东渡岷江，进至铁山地区。起义军着手建设铁山根据地。1860年1月23日（咸丰十年正月初一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起义军两万余人利用清军躲在营房里过年的机会，出敌

不意地经富顺、荣县向自贡盐场进军，于 26 日突然占领了自流井、贡井，控制了大量物资，队伍亦发展到 10 余万人。

3 月 7 日深夜，起义军主动撤离自贡盐场，回到五通桥。为了调动和分散清军兵力，李、蓝再一次分军。

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占青神、彭山，然后调转军锋，西攻邛州（今邛崃），克蒲江、名山，连营数十里，切断了成都与雅州府（今雅安）的通道。4 月下旬起，攻雅州 20 余天不克，遂撤围南下，待清军调兵拦截，又出敌不意地回军西上，于 8 月间驻军于离成都仅 70 余里的崇庆元通场，分兵四出，逐渐向川北转战。11 月，由金堂进入川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蓝朝鼎率部转战于川西、川北，不但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调动了大量清军，减轻了对李永和部的压力。

在这期间，李永和先是驻军于五通桥，分兵四出，后屯兵五里浩，转战于川南各州县，部将张第才（国福）则率兵一部进入富顺、南溪、隆昌等地。

牛佛渡会师

李永和、蓝朝鼎两大部起义军经过半年多的分军作战以后，于 11 月在富顺、隆昌交界沱江北岸的牛佛渡胜利会师。20 余万起义军齐集在一起，连营百余座，清军无一兵一卒敢于来此进行骚扰。这种情况，使得起义军的将领们对敌己力量的对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过高地估计了起义军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清军的力量，因而又一次做出了分军作战，围攻坚城的战略决策：李永和等率部依托铁山地区，围攻青神、眉州；蓝朝鼎等率军由川东折回川北，向绵州一带发展，张第

才等率部经营川东。

牛佛渡会师后不久，各部起义军即按照既定的决策，奔赴各地，拉开了绵州之战和眉州之战的序幕。

绵州之战

1860年12月，蓝朝鼎率部攻克荣昌，经大足、铜梁北上，先后围攻遂宁、潼川（今三台）。次年4月底，蓝朝鼎自潼川撤围，率10余万起义军北上，在潼川与绵州（今绵阳）交界的福源寺击溃绵州知州唐炯所部兵勇。起义军没有乘胜追击，直攻绵州，而是在离绵州城35里的丰谷井盘桓两日，使清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进行“逐次部署”（《绵阳县志》卷六）。5月4日，起义军进至绵州城下。绵州城内清军甚少，但城垣坚固。知州唐炯凭险固守，静以待援。起义军屯兵于坚城之下，错误地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依山沿河修筑营垒，修造攻城器具，临时铸造千斤大炮轰城，筑堤坝阻水灌城。在四个多月里百计攻城，均未能得手。

与此同时，李永和亦率军10余万人围攻眉州（今眉山）。

5月26日，骆秉章率湘军5000余人入川，驻军顺庆，为进攻起义军进行战前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决定由四川提督蒋玉龙所部川军在川南眉州一带牵制李永和部起义军，不使其北上，而以湘军为主力，集中兵力进攻蓝朝鼎部，由北而南，先蓝后李，各个击破。

8月31日，在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一切就绪之后，骆秉章率所部湘军进驻潼川。正在围攻绵州的10余万起义军对湘军缺乏应有的警惕，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敌进攻面

前，既没有果断地转移，也没有采取必要地应变措施。9月5日，清军1.9万人，分数路发起进攻。起义军固守阵地，与清军展开激战，结果人员大量伤亡，被迫收缩兵力，坚守西山观、青衣坝一带。9月18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占领西山观。起义军战败，损失惨重。蓝朝鼎率余部经安县南下，退往绵竹、什邡、彭县一带，最后仅剩万余人。

绵州之战是李蓝起义战争的转折点。由于蓝朝鼎指挥和决策失误，使正处于上升势头的起义军力量损耗过大，因而处处被动，战略上也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眉州之战

牛佛渡会师后，李永和率所部继续在川南活动。1861年4月，李永和部起义军先后攻占仁寿、青神，一改以往对城市“攻而不守”的政策，派周庭光以大都统名义留守青神，同时分军游击于资州（今资中）、资阳、富顺、宜宾、名山、蒲江等州县，李永和自率大军围攻眉州城，但久攻不下。

绵州之战失利后，蓝朝鼎率余部万余人南下，向李永和部靠拢。李永和派何崇政率万余人前往迎接。两部会师后于10月20日联合攻占丹棱县城，与眉州成犄角之势。

眉州东临岷江，西接丹棱，南通青神，北连彭山，为省城西南的门户之一。李永和部起义军10余万人，主力部署在城南攻城，一部在岷江东岸，控制水陆交通。骆秉章认为应该迅速攻击李永和部，以解除其对成都的威胁。他令提督蒋玉龙派川军一部牵制丹棱蓝朝鼎部，防其东援眉州李永和部，北走蒲江、邛崃；以湘军1.2万人进攻岷江西岸围城的李永

和部，另以川军 6000 余人攻岷江东岸起义军，阻止西岸起义军渡河东走。

11 月初，清军陆续到达。李永和收缩兵力，将岷江东岸起义军调至河西。蓝朝鼎亦派出一部兵力威胁清军后路。骆秉章先派湘军进攻蓝朝鼎部援军，迫其退走；随即于 13 日以全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冲入李永和部大营。起义军在退却途中屡遭清军截杀，伤亡达 3 万余人。当夜退据青神。

骆秉章认为，此时如南攻青神，驻丹棱的蓝朝鼎部可能威胁其后路，故决定改变计划，移师进攻丹棱。丹棱城四面依山，不便于进攻；起义军 4 万余人连营 40 余座，长壕高垒，防守严密。12 月初，清军发起进攻。由于起义军据垒顽强坚守，清军“计穷力尽，竟不能拔一垒。”（《骆文忠公奏稿》四川稿卷二）。清军强攻受挫，及时改变战术，在各要道掘长壕，设木城，出游骑，断粮道，以为坐困之计。蓝朝鼎发觉清军企图，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于 12 日夜从西门冲破川军封锁，突围北走。蓝朝鼎督后队掩护，13 日晨在战斗中阵亡。起义军余部由蓝朝鼎兄蓝朝柱（蓝大顺）率领，经蒲江北上。

李永和从眉州退至青神，与留守的周庭光会合，兵力仍有七八万人，而围城清军仅川军万人左右。但起义军因为刚刚战败，战斗意志大受影响，仅以保守青神为目的，在清军围攻丹棱时竟毫无作为，听任清军对起义军各个击破。12 月下旬，李永和几次突围未成。骆秉章为防其逃走，急令湘军舍蓝部起义军于不顾，回师青神。1862 年（同治元年）1 月 17 日，湘军回到眉州。李永和趁其尚未抵达青神之机，于当晚与卯得兴率主力突出城围，返回犍为东北的铁山地区。

铁山地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李永和部起义军入川不久即入据铁山，大力经营。这时骆秉章一面令各地团练阻断通向铁山的道路和隘口，一面督湘军跟踪猛攻。由于粮绝，李永和被迫于3月31日率部转移，途中遇清军截击，被冲为两股，遂分军转战，李永和率八九千人进驻富顺、隆昌交界的天洋坪，卯得兴率万人扎宜宾属八角寨。两地相距200余里，起义军兵力分散，配合困难，又一次给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当李永和认识到这一问题时，部队已大受损失。5月13日夜，李永和率3000余人离天洋坪，沿途遭团练截杀，最后仅率百余人进入八角寨与卯得兴会合。

骆秉章集中全部兵力围攻八角寨。该地林深径仄，山径陡险，易守难攻。清军全力围攻数月，毫无进展。9月6日，由于粮尽，李永和、卯得兴率众又转移至铁山龙孔场。但随即被跟踵而至的清军严密包围。清军围攻月余不成，派人前往诱降又遭拒绝，竟修坝阻水，淹灌龙孔场。10月18日，李永和、卯得兴等4700余人被俘，先后遇害。

至此，李、蓝起义军主力已损失殆尽。

转战陕甘和阶州保卫战

绵州、眉州两次失败后，散处各地的李、蓝起义军余部在四川难以立足，纷纷向川、鄂、陕边境地区转移，后来大部进入陕西。

蓝朝鼎牺牲后，蓝朝柱率领其余部经过半年的艰苦转战，到达川、陕边界的太平厅（今万源）。1862年6月初，离太平入陕，连克定远（今镇巴）、西乡二城，乘胜进军洋县。当地

群众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城。蓝朝柱改洋县为靖川，建立政权，设官安民，自称“大汉显王”，封袭用“蓝二顺”名号的蔡昌龄为怡王。其间，先期入陕的邓天王和后来入陕的曹灿章等先后率部到洋县与蓝朝柱（蓝大顺）会合。12月，起义军包围汉中府城。次年初，与再次入陕的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部联合作战，于10月攻克汉中、城固。按照与太平军达成的协议，蓝朝柱退出汉中盆地，回扎洋县，分兵略地，占领佛坪、留坝等地，设官理事，以稳定后方，自率部分兵力北上，于11月占领盩厔（今周至），威胁省城西安。西安将军多隆阿一面督优势兵力攻城，一面派兵阻截起义军援军。蓝朝柱率部坚守，击退清军数十次进攻，毙伤敌3000余人。但因援军不至，势孤力单，遂于3月中旬以后多次组织突围。30日，又一次击退清军的强攻，击伤多隆阿头部（不久因伤重而死）。当晚，蓝朝柱率部从地道撤出城外，但在转移途中于4月11日在安康紫溪河遇伏牺牲。所部由曹灿章率领转战于镇安、安康一带，损失甚大，曹灿章亦在郿县（今户县）被俘遇害。

长期在陕、鄂、豫交界地区转战的蔡昌龄，与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原石达开中旗余部会合，组成四五万人的大军，进入陕西为蓝朝柱报仇。起义军由镇安北趋孝义（今柞水），6月6日出大峪口，威逼西安，继又折而西入郿县、盩厔。在清军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之下，起义军人数锐减。但蔡昌龄、梁成富顶住逆流，坚持斗争，粉碎了陕西巡抚刘蓉将起义军“一鼓聚歼”的企图。8月中旬，数千名起义军冒雨从盩厔焦家巷突围，越过秦岭，经洋县、城固、略阳进入甘肃境，9月

18 日一举攻占阶州（今武都）。

阶州地处甘、陕、川三省边界，三省当局各有打算，不能尽全力团结一致地对付起义军。起义军乘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很快从 4000 人发展到 3 万余人。虽然他们作战异常顽强，但失去了其他起义军的配合，孤城终难久守。清军在强攻外围诸垒受挫之后，即扼守粮道，诱起义军出战，同时大搞诱降活动，逐渐占领城外各垒。6 月 6 日，清军用地雷炸塌城墙，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清军展开巷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蔡昌龄受伤倒地被杀，梁成富伤重被俘后在成都遇害。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最后失败。

六、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斗争

捻军，原称捻党或者捻子，是清初以来，以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组成的秘密团体。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和江苏北部一带，他们往往数千人或数百人为一股，称为“一捻”，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斗争。

1852 年初，捻党首领张洛行在雒河集（今安徽涡阳县）聚众万人起义，一度攻克河南永城。1853 年，太平军北伐经过安徽、河南时，各地捻党纷纷起义响应，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也推动了捻军起义的发展。1855 年 8 月，张洛行在雒河集召集各路捻军首领会盟，被推为盟主，称大汉永王，制定《行军条例》19 条，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从此，捻军势力迅速扩大。

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虽然已告失败，但是，大江南北

还有数 10 万太平军和捻军，他们英勇不屈，继续战斗，历时达 4 年之久。

1864 年春，侍王李世贤奉命率苏、浙、皖等省的太平军到江西取粮就饥，准备秋后返救天京。6 月，李世贤闻天京已破，与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等转到福建，9 月攻克汀州、漳州等城。他们以漳州为根据地，整军练武，建立政权，保护农商，恢复生产。清政府派左宗棠督湘军从江西、浙江分道攻入福建，又派淮军用外国侵略者提供的轮船由海道从厦门登陆。1865 年 5 月，太平军寡不敌众，撤出漳州。不久，汪海洋将李世贤杀害，引军经江西入广东，突袭嘉应州（今梅州），攻克州城。左宗棠急调诸路清军前来包围。在激烈战斗中，太平军挫败清军，但汪海洋中弹重伤而死。太平军诸将推举谭体元继主军事，终因孤城难以久守，遂潜师而出，东南走黄沙嶂。黄沙嶂丛山菁密，太平军在山中迷路，数日不得出，将士皆饥疲不堪，遂为湘军鲍超等追及。1866 年 2 月，谭体元率余军奋战力竭，坠崖被捕牺牲。江南太平军余部至此失败。

江北太平军和捻军多年以来就相互支援，协同作战。捻军领袖张洛行被洪秀全封为沃王，其他诸将也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1862 年初，英王陈玉成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会同捻军西进河南，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以图恢复。同年秋，清政府派僧格林沁大举进攻皖北。张洛行作战不利，亳州、宿州皆失守。1863 年春，捻军主要根据地雒河集也被僧军攻破，张洛行不久被俘殉难。1864 年初，天京危急，西北太平军星夜兼程回救，一路上会合了捻军张宗禹、陈大喜等

部，众至数十万，声势甚壮。他们转战鄂、皖之间，遭到僧格林沁所部骑兵的阻截。天京的陷落，使东归的太平军士气受到莫大的打击。他们在鄂东受阻，11月又在霍山兵败，扶王陈得才自杀。在这危殆之时，遵王赖文光得到捻军将士的信任，接受重任。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重新组织捻军，使其改变过去“忽分忽合，不相统属”的松懈状态；又用太平军的兵制训练部署捻军，增强其战斗力。为适应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他采取了“易步为骑”的措施，扩大骑兵，在战略战术上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为主。捻军经过这番整顿和战术的转变，大大提高了素质和战斗力。

1865年初，清军以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采用运动战术，一日驰数百里，使僧军疲于奔命；又往往选择有利时机和地点，狠狠打击僧军。因此，僧军一退河南光山，再退邓州，对捻军束手无策，无可奈何。1865年5月18日，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他驱驰猛突，仍不能解围，部众死伤惨重。日暮，僧格林沁伏田垄间，被捻军战士击毙。

高楼寨之役，全歼僧军，捻军声势大振。清廷十分惊慌，连忙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曾国藩针对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战略，企图制止捻军的运动。他调集10万重兵，配以新式枪炮，在淮水北、运河西、沙河及贾鲁河以东，沿岸设防，想逐步收紧，把捻军消灭在包围之中。但是，捻军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多次重创清军，纵横驰骋于豫、鲁、苏、皖之间。1866年9月，赖文光

部与张宗禹部在开封境内会师，一举突破了曾国藩布置的沙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乘胜而东，又大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10月，自山东回军，再破清军河防，重入河南。曾国藩苦心经营的合围“剿捻”计划被捻军所粉碎，不得不承认“打捻无功”。清政府改调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

捻军虽多次打破包围圈，但斗争已处于低潮。外国侵略者此时又极力支持李鸿章，他们不仅源源供给他新式武器，而且还派遣教官和顾问协助淮军剿杀捻军。李鸿章所采取的是“扼地兜剿”的战略，想把捻军“蹙之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1866年冬，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军为东西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西北，往联回众，是为西捻军。捻军分东西两支，目的在于开辟新战场，发展势力，以便取犄角之势，互相支援。但在总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兵力分散，容易被清军割断联系，各处击破。

分军后，东捻军由许州东向，企图抢渡运河进入“频年岁稔”的山东，以取得军需给养和扩大队伍。由于清军严守运河各渡口，这一目的未能实现，只好西折转入湖北，连克应城、云梦等县，夺取安陆府的臼口镇，驻军尹隆河一带。1867年1月，东捻军大败淮军悍将郭松林，打死总兵张树珊。2月，敌人援军四集合围，捻军腹背受敌，终于大败，损失2万人以上。尹隆河战役失败后，东捻军放弃了进兵川、陕与西捻军会合的计划，反而被引入了淮军的战略圈套，进入山东山

区。11月，在潍县、赣榆等战役中一再受挫，任化邦在作战中被叛徒杀害。12月，东捻军在山东寿光受到淮军层层围击。在突围中，牺牲2万多人，被俘近万人，主力损失殆尽。赖文光率余部南入江苏，至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遭到袭击，伤重被俘。1868年1月10日，在扬州慷慨就义，坚贞不屈。

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率领的西捻军6万余人进入陕西，联合回民起义军。1867年1月，西捻军大败清军于西安近郊，击毙总兵萧德扬等。10月底，又在陕北中部（今黄陵）击败左宗棠的刘松山部。同年年底，西捻军为了救援东捻军，东渡黄河，插入清王朝的腹心畿辅之地。当时东捻军业已失败，西捻军成了深入敌后的孤军。直隶饶阳一战，张禹爵和邱远才殉难。1868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陷入重重围困之中，广大捻军战士奋力作战，悲壮牺牲。

第三章

洋务运动

第一节 洋务运动的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由于清朝统治者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济、贸易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也就是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掌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等人，并没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因为镇压太平天国为清朝立了殊勋，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因此，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

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年8月，他又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的这个主张得到了奕訢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在奕訢的支持下，曾国藩在1861年攻下安庆后，即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弹药。虽因采用手工生产，效果不显，但是却任用了一批近代早斯的著名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另一个洋务的热心倡导者李鸿章，1862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赞不绝口，视为“神技”。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对此他感到忧虑，愤愤而言：“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鞶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此类议论，在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的言论中，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面临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曾、李、左等人看到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他们继承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二

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胥。奕訢是清朝中史统治集团中最先倡导洋务的首领，他处理“内乱”和“外患”时的方针是：“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在内政方面，则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顺可以相安，逆则可备，以期经久无患。”总起来说，就是“讲求洋器”，平定发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而其重点则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这一时期，对洋务宗旨说得最完整、最透彻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系列政论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指导思想，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

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清朝统治集团一部分当权人物和某些开明的士大夫中间，尽管在师法西方以求自强的认识上还有某些差异，但是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政治主张和时代思潮。主张举办洋务的倡导者，在清朝中央政府有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焘等。在他们的周围又有一批比较了解国内国外形势，希望通过兴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官僚和

开明人士。这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在镇压平太天国的战争中和在与外国侵略者的直接交涉中，都为保住清朝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手握中央和地方的军政、经济实权。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于是就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政治派别，习惯上被称为洋务派。而洋务派一经形成，历时 30 多年的洋务运动也就随之兴起。

第二节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清政府的领导层中，还有一股与洋务派相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反对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拒绝任何变革，主张继续闭关锁国，因此被称之为顽固派。其代表人物为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对于洋务派所提倡的学习西方的措施，顽固派横加指责、阻挠。1866 年总理衙门为培养洋务人材，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聘请外国人为教习，招收科举人员入馆学习。倭仁立即上奏反对这一措施。他认为如果学习西方就会使读书人“变而从夷”。奕訢则反驳倭仁，指出他那种认为忠信、礼义可以战胜敌人的理论，实在荒唐可笑，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来虽然倭仁不得不撤回奏呈，天文算学馆成立了，但由于倭仁力阻所造成的舆论影响，报考的人很少。倭仁等顽固派还把轮船、火车、大炮、火器等近代科技产物，称之为“奇技

淫巧”加以反对。洋务派指责倭仁等是“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865年英人杜兰德在北京前门修了一条3公里的铁路，1876年英人在上海投资修建了一条从吴淞口到虹口10多公里长的铁路。这些在中国最早出现的铁路，都在顽固派的干预下，被清政府下令用钱买来拆毁。1880年刘铭传提出修筑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以及汉口经河南至北京两条铁路的计划，就因顽固派的攻击阻挠而未能实现。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这场争论，不仅是两派的权利之争，也是涉及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一问题的一场论争。

“北京政变”慈禧太后是得到奕訢和英、法等国的支持而上台掌权的。因此，慈禧太后不得不依靠洋务派，从而使洋务运动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但是，她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大，难以驾驭，所以又纵容顽固派攻击洋务派，阻挠洋务运动的开展。她玩弄权术，在两派之间保持平衡，以巩固自己的最高地位，致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节 在洋务运动兴起的近代工商业

一、军事工业

洋务运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编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制

造枪炮船舰、建立外交机构、举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洋务运动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大体说来，60、70年代，以“求强”为主，即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70、80年代，在继续“求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主张，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把“求强”和“求富”作为洋务事业的总体目标。

洋务派办的军事工业，是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三所洋炮局开始的。由于当时正是湘、淮军与太平军的最后决战时期，事属草创，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技术设备也十分简陋。除英人马格里主持的一所炮局后来购进很少一部分机器外，其他各厂并无机器。事实证明，用手工业生产是不可能造出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因此，曾、李决心购买国外机器设备，并特别注意引进“制造机器之机器”，仿照西方近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军工生产。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丁日昌的积极倡议下，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从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中等规模的也有5个，即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其他11个局厂规模较小，它们是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金陵制造洋火药局、浙江机器局、云南机器局、山西机器局、广东机器局、台湾机器局。由于这

些军事工业的建设，清朝军队的装备改变了从前全用刀矛弓箭、木船土炮的落后状况，特别是对打败和扑灭太平军和捻军，维护清朝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军事工业的兴办，也多少增强了清朝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后期兴办民用工业起到一种开路 and 引导作用。但是，这些军事工业都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和特性。当时几个主要军事工业局、厂的情况分别为：

（一）江南制造总局

1865 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美商旗记铁厂。他将这座能够修造轮船枪炮的工厂与原来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7 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扩大规模。

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产品：一是枪枝。最初只能制造旧式前膛枪，1871 年改制林明敦式后膛枪，两年以后又加造黎意枪。由于这些枪枝已陈旧落后，故于 1890 年制新式快枪。二是大炮。炮厂建于 1878 年，除制造旧式山炮外，还制造各种口径的新式大炮。三是弹药。包括各种枪弹、炮弹和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四是钢铁。炼钢厂建于 1890 年，除炼钢外，还压轧钢板、钢轴、枪坯、炮坯等。五是造船。船厂和船坞建于 1867 年，至 1885 年先后制造大小轮船十余艘。此后停造轮船，专门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制造总局的创办经费，包括购厂、购地建厂、薪金和购买物料，以及容闳在美国采购机器费用在内，共用白银 54.3

万两。常年轻费，最初由李鸿章在淮军军需项下随时拨给，每月约1万两。1867年，经曾国藩奏准，从江海关洋税中的酌留二成，以一成专造轮船，一成拨充军饷。1869年，马新贻又奏准以二成洋税全归局用。从1874年至1894年，每年经费最多时达90.7万余两，最低时也有35.3万余两。1892年至1895年，为建造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等项工程，清政府又拨发扩建经费40万两。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二）金陵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加以扩充后，改名金陵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的经费最初亦由淮军军饷调拨，每年5万两。自1879年起，每年由江海关拨银5万两，江南筹防局拨银3万两，扬州淮军粮台拨银2万两，常年额费共10万两。1883年起，南洋又加拨1万两。其规模虽小于江南制造总局，但在当时军工局厂中，仍属比较重要的一个。

金陵制造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及北洋三省。由于经费短缺，技术设备陈旧和管理混乱，该局所产大炮，质量低劣。1875年1月，大沽炮台试射该局制造的两门68磅重炮弹的大炮时，发生爆炸，炸死炸伤官兵18人。李鸿章将马格里召至天津，令其亲自试放，亦同样发生爆炸。但他拒绝认借，结果李鸿章将其撤职。该局此后不再雇用洋匠，局内管理事宜，由龚仰遽（照瑗）指挥调度。

（三）福州船政局

1866 年，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这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用以制造和修理水师武器装备。

左宗棠的建造船厂，酝酿较早。1864 年，他曾在杭州制成一艘小轮船，“试之西湖，行驶不速”。1866 年，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以后，着手筹建船厂。他奏称：“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同时指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显然，他把建设船厂看成是富国强兵、利民惠商不缺少的重要。经清廷批准，他便同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商订合同，议定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 16 艘，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厂址设在福州马尾罗星塔地方。除开铁厂和船厂之外，船政局还设立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分前后两堂，前堂学习法文，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后堂学习英文，以培养驾驶人才为主。

1866 年 9 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楨任总理船政大臣。

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于 1869 年 6 月下水。至 1874 年 2 月，共造轮船 15 艘。至此，日意格等及法籍工匠数十人照原合同规定从船厂撤退，厂务和技术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新造诸船，俱用华人驾驶”。后来虽然也雇用一些洋匠，但人数很少，雇用时间也很短。

福州船政局建厂费用 40 余万两，由闽海关四成结款拨

付。常年轻费每年 60 万两，亦由闽海关以六成洋税项下按月以 5 万两拨付。后来又由闽省茶税项下和沈葆楨兼办台湾防务的费用中以“养船经费”名目，按月拨付 2 万两。至 1874 年，共用银 535 万余两。1878 年以后，闽海关不能按照原来规定按期拨款，积欠甚多，以致造成经费短缺，生产困难。自 1874 年至 1895 年，生产萎缩，20 多年中共造船约 20 艘，平均每年不到 1 艘。

船政局在办厂过程中，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在造船技术方面则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制造 150 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 1887 年则制成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为复合机，马力由 150 增至 2400，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四）天津机器局

1866 年，奕訢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各种军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策划。次年，崇厚建立了天津机器局。这是清朝在北洋设立的第一个兵工厂。建厂之初，一面派曾任丹麦及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英国人密妥士购买机器，觅雇工匠，一面在津选定厂址，建造厂房。最初的厂址在城东贾家沽，号称东局；继在城南海光寺设立分厂，号称西局，开办经费共 20 余万两，常年轻费由津海关和东海关四成洋税协济，平均每年 30 余万两。

1870 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接办该局，并大力扩充，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来沈保靖总理该局事务，津海关道陈钦兼任会办。1872 年，李鸿章进一步整顿局务，辞退一些“技艺未精”之洋匠，并将总管洋员密妥士撤差。整顿后，东局专

造洋火药、洋枪炮、各式子弹，西局则专造军用西洋器具、各种部件及开花子弹。东局规模较大。两局合计共有工人二千六七百人。1875、1876 两年，该局曾一度制造后膛枪，因成本太高，价格高出外洋一倍还多，随即停止生产。1891 年，该局又动工兴建一个炼钢厂，1893 年正式投产。

（五）湖北枪炮厂

湖北枪炮厂系张之洞建立。张之洞（1837—1909 年），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81 年由国子监司业升任山西巡抚。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后，由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负责供应台湾和滇、桂前线的饷械。当时，沪、津两地各局所产军火供应不足，他只得向上海外国洋行及美、德等国采购。洋商乘机抬价，使他深感为难。他认为向外国购买军火，吃亏受制，决心自己制造。中法战争后，他上奏清廷，提“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等项主张。强调“自强之本，以权操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此时，张之洞已由早年的“清流派”重要代表人物转化为洋务派，并且成为洋务运动后斯的重要首领之一。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原定在广州创办枪炮厂，并通过驻德公使洪钧在德国购买机器设备。1889 年，他调补湖广总督，遂主张将枪炮厂连同筹建中的钢铁厂移至湖北。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不愿在粤办厂，李鸿章则主张将机器北运，在天津附近设厂。张之洞坚持迁鄂。在奕譞的支持下，张的主张得到清廷批准。最后将厂址选在汉阳，于 1891 年开始购地建厂，

1893 年初步建成，1894 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试造枪炮。

湖北枪炮厂在当时的军事企业中，规模庞大，设备最新，但建厂工程进展缓慢。因为张之洞将该厂经费很大一部分用于汉阳铁厂。从 1892 年至 1895 年，汉阳铁厂挪用枪炮厂经费达 130 余万两，致使枪炮厂的生产大受影响。

洋务派在 1865 年以后创办的军事工业，都采用机器生产，尽管当时机械化的程度不高，在生产中仍然大量采用手工劳动，但毕竟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大生产方式。这对于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来说，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变革。这些军事工业普遍实行雇佣劳动，工人的工资基本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定，劳动强度虽然很大，但加班作业，亦加给工资。这些军事工业企业中的工人，是中国近代早期的产业工人。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办性质。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产品，不是普通的商品，不进入市场进行交换，而是作为军火和军事装备用品由清政府调拨给湘、淮军及沿海各省军用。80 年代以后，由于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产品调拨办法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预付船价的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何省需船，就由何省筹款，均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在每年的收入中，也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生产某些武器的成本和售价，过多的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就停止生产。这说

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不能完全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也逐步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是，这些官办的军事工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都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而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局、厂的总办、会办、提调、委员、司事等管理人员，也同厘金局、善后局等官僚机构的职别、等级毫无区别。负责生产技术的人员，大的局、厂有华洋监督、总工程师、工程师、监工等。此外，还有一批挂名支薪、并不到职任事的官僚。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派人查访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后说：“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

由于把封建官僚衙门的一套官场恶习搬到局、厂，腐败现象就在所难免。生产效率普遍低下，成本高昂，管理混乱。以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该局每年的经费的支出中，薪水、工食、修建、办公等项费用几乎占了全部经费的一半左右。在各项支出中，修建和办公费用所占无几，因为购置地产、修建厂房，早在60年代后期即已完成；办公费用不过是纸张文具和桌椅之类，为数更微。薪水、工食占了支出的绝大比重。由于大量经费用于非生产性开支，添购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的费用必然减少。福州船政局的情况更糟，该局每月“洋员匠薪”、“监工员绅薪水”以及工人杂役的伙食、口粮等项，即需支出在3.9万余两。而当时

该局每月定额经费只有 5 万两，“薪水工食”竟占全部经费的 80%。因此，造船费用远远高于向外国购船费用。

局、厂中的工人，虽然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但在有些局、厂，他们依然受到超经济的剥削和人身自由的限制。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不令随意去留”。福州船政局设有“健丁营”，对工人实行军事管理。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比起来，尽管具有垄断性、落后性和封建性，但在古老的中国却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官督商办企业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陆海军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而最主要的是财政困难。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赔款，再加上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庞大军费开支和战争的破坏，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竭蹶。而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军队，都需要巨额财政经费，清政府虽然多方筹措罗掘，仍然不能保证需要。军事工业的兴办又需要充足的原材料和燃料供给；新建陆海军需要后勤保障，同时也需要有近代的交通运输与电讯等建设的配合，不解决这些问题，新的防务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处，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

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基于这种认识，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事业。自70年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取官办方法，个别的（如湖北织布局）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外，其余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基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

（一）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当时外国资本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河航运，我国旧式的航运业面临破产，而军事工业也由于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轮船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

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朱其昂最初主张官商合办，但由于当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无商船可以作“官股”，所以提出“由官设立商局招徕”。李鸿章也认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12月，朱其昂等议定“条规”，经李鸿章批准施行。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

朱其昂多方奔走，招募投资股本，但仅得沙船商人郁熙绳入股现银 1 万两，其他虽有商人认股 10 余万两，但未缴现款。李鸿章只批准从直隶编练局借用官款 13.5 万两，年息七厘，而且“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当时中国尚无近代股份制企业，商人不愿投资，轮船招商局最初主要是靠官款创办的。

朱其昂既募不到商股，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以致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亏损 4 万余两，因而引咎辞职。1873 年 7 月，李鸿章札委唐廷枢任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等四人先后被札季为会办。唐、徐分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局规”规定：（一）资本为 100 万两，总局和各局分别由股东推举商总和商董主持，但总局须将商总和各商董的职位、姓名等报海关道转呈北洋大臣备案，更换商总和商董亦须“禀请大宪”。这是官督商办的具体体现。（二）股票及取息手折均需编号，填写持股者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股东出让股票，必须到局注册，“不准让与洋人”。项规定保证了招商局由中国人自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虽有总办、会办 5 人，实权却在唐廷枢、徐润手里，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总办和会办），又是股东的代表（商总和商董），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二人都出身于洋行买办，但是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脱离洋行，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由于他们富于洋行经商经验，招募股本，开展业务，颇为顺利。1874 年实收股金 47 万余两，1877 年又以 220 万两收购旗晶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由 12 艘增至 30 余艘。外

国轮船公司唯恐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就以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致使其债台高筑，处境艰难。由于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延期归还官款等一系列措施，才使招商局得以站稳脚跟，并扭亏为盈。1881年，募足股本100万两。次年又计划增募100万两，因为业务兴旺，应募者十分踊跃，很快足额。

1883年，中法战争前夕，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局资金周转不灵，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到沪，乘机排挤唐、徐，次年，唐、徐挪用局款被揭发，先后离局。中法战争期间，经马建忠之手将招商局暂时售于旗昌洋行。1885年又收回局产，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盛宣怀重新制订章程，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这就使得盛宣怀以督办“大员”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从而“商办”色彩大为减弱，“官督”的权力明显加强。

（二）开平矿务局

军事工业的基本原料、燃料是铁和煤，每年都用巨款从外国购买煤、铁，因此洋务派亟欲开采铁矿，以塞漏卮。1874、1875两年，李鸿章先后派人到直隶磁州和湖北兴国勘探矿产，但未能开采。1876年11月，他又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带回煤块铁石样品，经京师同文馆及英国化学家化验证明，品位甚佳。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赞开平矿产蕴藏丰富，质地优良，同时建议修筑开平至芦台的铁路，采煤、炼铁、筑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为80万两。他提出把开采开平煤矿和发展轮船招商局业务联系起来，

强调“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于是李鸿章于1877年派唐廷枢主持开平煤矿的筹备工作，并派津海关道黎兆棠和前天津道丁寿昌会同督办。

1878年8月，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根据唐廷枢所拟的“章程”，开平矿务局“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采取商办企业经营方式。开办后一面招股，一面钻井。1878年只募股金20余万两，直到1882年才募足百万两。煤矿钻井虽然进展顺利，但炼铁成本过重，又缺乏冶炼专门人才，结果只好停办铁矿，专采煤矿。

1881年，开平煤矿开始投产。经李鸿章奏准，该矿所产煤炭，按照台湾、湖北等地成例，纳税由每吨6钱7分3厘减为一钱，目的是为了“恤华商而敌洋煤”。这样，开平煤矿的成本降低，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该矿投产当年，产煤3600余吨，1882年增至3.8万余吨，1883年增至7.5万余吨，1889年增至20.7万余吨。为了适应煤产量的不断提高和运输需要，1882年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1886年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1888年又将该路修筑至大沽。除铁路运输之处，1889年购买了一艘运煤轮船，往来于天津、牛庄、烟台等地，1894年增至2艘。

1892年，唐廷枢病逝，由张翼继任总办。张翼原为醇亲王奕譞府中侍役，捐得江苏候补道头衔。他通过奕譞与李鸿章的关系，谋得开平矿务局总办的“肥缺”。这是一个昏聩贪鄙的“暴发”官僚，在他主持局务之后，由于管理混乱，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开平矿务局结束了它的鼎盛时期。

（三）电报总局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楨率兵援台。从军事行动的实践中，他感到“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虽经奏准创办，但因顽固势力反对和洋商敲诈，终无结果。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天津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便以“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以设立电报，以通气脉”为理由，提议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内筹垫。建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这项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业人才，同时又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为会办，并在大沽口、紫竹林、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立分局。架线工程于1881年4月开始，11月竣工，共用资金湘平银17.87万两。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五年后分年续缴银2万两，其余垫款（9.8万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收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亦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之忱”。津沪间为保护电线而设的兵弁和巡路费用，五年内仍继续由淮军协饷内开支。

津沪电线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格维纳趁机要求敷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的陆上电线，“以

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1883年，电报总局拟增募资本80万元，但因当时金融恐慌，仅募得50万元。1884年，上海至广东的线路竣工，电报总局也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线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重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欠北洋垫款，至1884年即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由于爆发中法战争，头等官报日增，商报锐减，以致赔累不堪。1887年，该局要求将原定清政府各种头等官报的费用，一半由“众商报效”，一半“归出使经费下按月核给”；各省将军、督抚所发头等官报，亦由“众商报效一半，其余一半各就情形筹发现资”。这项办法一直实行到20世纪初年电报“国有化”时为止。

（四）上海机器织布局

外国棉纺织品在中国的倾销，很快占领了广大的市场。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曾派魏纶先出面筹办织布事宜，但魏在上海无法筹集资金，计划未能实现。1878年，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在上海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禀帖，请求设立机器织布局。不久，他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说明建厂计划，李遂委派他和郑观应等负责筹建。彭汝琮在上海筹集到股本，次年又同郑观应发生龃龉，彭被李鸿章辞退。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另订“章程”。“章程”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它还规定：拟募股金40万两，分为4000股，每股100两。“在局同人”共集2000股

(戴恒、蔡鸿仪、李培松、郑观应等四人各认 500 股)，其余 2000 股公开招募。其后因资金不够周转，又续招股 10 万两。股金按票面金额的 70% 收款，实收现银 35.28 万两。

上海机器织布局设在杨树浦，订购了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在筹建之初，郑观应就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而且要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经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别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

郑观应经手招募的股份最多，又独揽局中银钱帐目。1883 年，他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离沪赴粤。此后织布局主要负责人几经更换，最后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接办，但因股金不足，并无起色。1889 年，李鸿章又改派马建忠接办，并允许他借用轮船招商局及仁济和保险公司的款项 30 万两。但维持不久，局务即改由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于 1890 年开始部分投产，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高。1893 年夏，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向英国订购机器。同年 10 月 19 日，因失火全厂烧毁，损失 70 余万两。11 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槩负责恢复织布局，重新募集资本 100 万两，在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后取名“华盛”），仍为官督商办。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 10 个分厂。至 1894 年 9 月，华盛机器织布总厂

部分投产。

官督商办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长期封建经济结构的束缚，社会生产力低下而且发展缓慢，而封建顽固势力又百般阻挠和抵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以致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了种种经济特权，也极力排挤和打击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下艰难产生的。它既要依靠洋务派“官”的支持和扶植，又要依靠“商”的经济投资和经营管理。从建立和发展近代工商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方面来说，官督商办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但是，它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不可能成立独立的近代工商业体系，因此又具有消极落后的一面。

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又这是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压抑者和限制者。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抵制了顽固势力的攻击挑剔，坚持反对把招商局改归官办，在政治上加以保护，在经济上给以支援，使招商局得以生存，并站稳脚跟。然而，洋务派又以“官督”之权，把持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利用权力和该局资金广为投资，多方操纵控制，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包括轮船、电报、纺织等企业垄断集团。有些官督商办企业，还以“商人报效”为由，为清政府特殊需要服务。如电报总局对有关洋务、军务的电报优先拍发，电报费虽由该局所欠官款内扣除，但官款扣清后仍不收费，因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诸如此类，都阻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在外国经济势力和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势力双重制约之下，官督商办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的能力。这也就是经营了 20 余年，声势不小但收效不大的原因所在。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以“求强”、“求富”为鹄的的创办近代工业的同时，还主持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强大情况有所了解，承认中国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在这一点上，他们要比顽固派明智而清醒。但是，洋务派及其代表人物李鸿章，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外国侵略者相安无事。然而，严酷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绝对不会坐视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但终究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

三、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

在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些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商办企业主要是由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而来的，也还有一些

是从原来的旧式手工业工场、作坊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自 1869 年至 1894 年，商办企业只有 50 多个，资本共有 500 余万元。虽然数量很少，实力甚微，但它却是一种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869 年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是由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开始采用车床而出现的。它的主要生产业务是为外商船厂制造配修零件。由于沿海和长江航运兴起，它的业务发展也比较迅速，到 1877 年，已能生产轮船机器和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80 年代，它还兼营进口五金，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1872 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一家继昌隆机器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工人六七百人，产线精美，行销国外。两年之后，南海又建立了 4 家缫丝厂，至 80 年代初增至 11 家，共有缫车 2400 架，每年产丝 1200 包。到 90 年代，顺德县的丝厂也很快发展起来，丝厂多达 35 家。

1878 年，轮船招商局会朱其昂在天津设立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 10 余人，用机器生产面粉，“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磨面的旧式生产方式。

1879 年，汕头的一家豆饼厂开始用机器榨油和压制豆饼，第一年每日生产豆饼 200 块，次年增至 300 块，1881 年又增至 400 块。1883 年又增设一厂，日产豆饼 600 块，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豆饼所用原料大豆，均从华北购进，制成品则在本地和台湾市场销售。

1881 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公和永缫丝厂，资本 10 万两，丝车 100 部，次年投产。开始数年，营业不佳。1887 年

后，生产逐渐发展，丝车增至 900 部。此后，上海缫丝业日益兴起，至 1894 年已有丝厂 5 家，其中最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 20 万两。

1882 年，徐鸿复、徐润等在上海设立同文书局，购置石印机 20 台，雇用职工 500 人，先后翻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古籍。1893 年，该局不幸失火，损失颇重，但因事先投了火灾保险，得到赔偿，仓库、宿舍亦未殃及。后来由于积压资金过多，遂于 1893 年停办。

1886 年，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资设立“自来火公司”（火柴厂），资本 1.8 万两。1891 年投产不久，即发生火灾，厂房被焚。后来又公开招股，资本增至 4.5 万两，由吴懋鼎任总办，聘请英、俄商人购办机器，并帮同管理帐目，但洋商并不参股。火柴多行销于河南等地。

1887 年，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轧花厂，资本 5 万两，购置日本生产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另有 40 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1891 年，该厂出售轧成棉花 3 万担。

1890 年，上海商人设立燮昌火柴公司，资本 5 万两，生产木梗火柴，所需化学原料从欧洲购买，木梗、箱材等使用日货，每日生产硫磺火柴 20 余箱，但质量较差。产品多销售于江西、安徽等内地省份。

此外，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还有少数小规模商办企业，有些忽开忽停，举步艰难。

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代特征

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历时 20 多年，在中国出现的近代商办企业，可说是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经济汪洋大海中的若干小岛，不但进程缓慢，而且投资和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也主要是日用轻工业商品。但它们毕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极其困难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辟了多处通商口岸，操纵了中国的海关，降低进出口税率，控制了沿海和内河航运，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这种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都不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形成的，外国资本主义不但不能促进和支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凭藉种种特权限制和打击这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在产品销售或原料收购方面，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当这些初生企业的产品出现于市场的时候，外国侵略势力不惜采取降价倾销的办法，予以打击。中国企业所需的原料，也受到外国洋行抢购的威胁。外国洋行通过中国买办商人，在原料产地广设采购站，力量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无法与竞争。事实证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扼制打击之下，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在受到外国侵略势力打击的同时，还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摧残。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

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任何法律的保障，完全听任地方官吏随意处置摆布。例如，1881年南海知县徐麋陞以继昌隆丝厂“专利病民”、“夺人生业”、“男女（工人）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为由，下令予以封闭，该厂被迫迁往澳门。直到徐麋陞调离后，才又迁回南海。又如1893年武举出身的李福明在北京东便门设立机器磨坊，被清朝官吏视为“不安本分”的“刁商”，“经都察院奏准，飭令撤去”。而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办企业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困扼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免遭破产，不是乞求外国资本主义的庇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奥援。对这种庇护和奥援，都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有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又有其先天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中国无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

级力量，它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引起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兴建各种建筑工程，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至 1894 年，除了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之外，产业工人共有 10 万人左右。在约 10 万工人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 35%；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 37%；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的工人约占 28%。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因此，从产生的时间上说，中国无产阶级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 30 年。而中国近代工业大部分不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也主要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工人转化而来，而是破产的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早期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几年，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另一个来源则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这两部分人，形成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大都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与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其中不少人都在清政府的一些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者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官亦商或绅商兼备的多重身份。例如，1887年创办宁波通久源纱厂等企业的严信厚，1891年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的唐松岩、聂缉槩，在天津创办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1881年在上海创办人公和永丝厂的黄佐卿等等，就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性人物。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所办的企业，一般规模都较小，资金也较少，有的则是由手工工场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虽然也采用机器生产，但大都机器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状况也远远不如资产阶级上层所办的企业。他们不但得不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官僚势力的帮助和扶植，而且还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矛盾比上层较大，联系比上层为少。尽管他们也想让自己的企业得到发展，但是却很少有这种可能和条件。早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自己的经济力量，并且必然要成为新的政治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它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坚决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

族资产阶级,既带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同时又带有先天的较弱性和动摇性。

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洋务运动的产物。而这两个新的社会阶级的产生,结果又导致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反抗和对洋务运动的否定。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没有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意图行进,洋务派“求强”、“求富”的主观意图也没有实现。新的阶级将要开辟新的社会道路。

第四节 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新式陆海军

训练新式陆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所在。1861年1月,奕訢、文祥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次年,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接着,上海、广州、福州等地亦按照天津练兵章程成立洋枪队。当时的外国教练,主要是英法两国军官。1864年,总理神机营事务奕譞等在北京建立了“威远队”,演练枪炮及“洋人阵式”。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在直隶选练六军,共1.5万人,称为“练军”。

湘军和淮军已成为当时清朝军队的主力。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由安庆到达上海,盛赞英、法军队“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并致书曾国藩,表示要及时“资取洋人长技”。

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他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和充足饷源，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用洋人教习，极力扩充军队。至 1865 年底，淮军已由原来的 6000 余人，骤增至 5 万余人，而且“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另外还有炮队四营。此时的淮军已成为清军精锐，李鸿章凭藉淮军实力，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迅速加强。曾国藩统率的湘军，早在 50 年代便开始从香港购买洋炮，60 年代初，他又提出大购船炮的主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以为内可“平乱”，外可御侮。但是，湘军的将领大都思想守旧，对洋人的后膛枪不感兴趣，甚至不相信洋枪洋炮的威力，拒绝学习使用。因此，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淮军。1864 年湘军攻陷南京，曾国藩为了表示对清朝的忠诚和避免因“拥军自重”而得祸，将湘军大加裁撤，其弟曾国荃也一度“解甲归田”。又由于曾国藩于 1872 年病死，曾系湘军势力逐渐衰落。湘军另一支主要力量左宗棠所部，于 1862 年进入浙江宁波，随即着手建立洋枪队；1867 年进军西北，派胡光墉驻上海采购外国枪弹，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成为新式陆军的另一支主力。

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是洋务事业的又一个重要措施，从 70 年代开始即着手进行。

1874 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以赔款妥协。日本此举使清政府深为震惊，筹办海防之议随之兴起。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6 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和南洋三支海军，各军设提督一人。北洋提督驻天津，负责直、鲁两省沿海防务；东洋提督驻吴淞，负责江、浙两省的

沿海防务；南洋提督驻南澳，负责粤、闽两省沿海防务。每支海军各配备大兵舰 6 艘，炮船 10 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三洋联为一气”。总理衙门虽然基本同意丁日昌的建议，但以“财力未充，势难大举”为由，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经过筹划，于 1875 年 5 月任命沈葆楨和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海防经费，每年由粤海、闽海等关及江、浙等六省厘金项下拨解 400 万两，南、北各得其半。但各省拨款多不足额，短缺其多，不能按原定规划实行。清政府一开始即以创北洋海军为重点，筹建海军主要由李鸿章负责。海军舰只除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外，主要购自英、德两国。至 1894 年，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船舰六七十艘，已具有相当规模。

福建水师由闽浙总督管辖，绝大部分舰只都是福州船政局 70 年代制造的，只有少数几艘购自英、美。排水量一般在 1000 吨和 1500 吨之间。平时很少训练，战斗力很差。在 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虽略有增补，但难以成军。

南洋水师归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管辖，最初由沈葆楨一手擘划。1875 年，沈葆楨同意将每年 400 万两专款全部解交北洋使用，至 1878 年才请求将其中的 200 万两拨归南洋，添置船舰。1879 年沈葆楨病死，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先后继任两江总督，南洋水师即一直由湘系大员控制。它的舰只大都由闽、沪两局制造，亦有少数购自德国，其中有 5 艘巡洋舰排水量超过 2000 吨。南洋水师实力虽不及北洋，

但比福建水师却大得多。

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它从创办到 1895 年全军覆没，一直归李鸿章管辖，是李鸿章经营最久、用费最多、也最为得意的一项重要洋务事业。它的兴衰不仅和淮系集团势力的消长密不可分，而且也同整个洋务事业的成败相始终。

李鸿章在 70 年代主要向英国购买舰船，自 80 年代起逐渐转向德国购买。北洋海军的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及 8 艘巡洋舰中的“济远”、“经远”、“来远”各舰都是购自德国。1879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由周馥主持，马建忠负责处理日常事物。1881 年，又奏准任命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

新式海军是 1875 年根据奕訢等的建议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海防。李鸿章多次强调：“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方今强邻环逼，藩属倾危，岂可稍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中法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总结海军失利的教训，提出“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为了统一海军的指挥权，于 1885 年 10 月在北京成立海军衙门，任命奕訢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善庆、曾纪泽为帮办。此后 3 年间，北洋海军得到较大发展。

1888 年，经过几次增购铁甲等舰，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大小舰只 20 余艘（不包括鱼雷艇及辅助船只），又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确定了人员编制，并规定每隔 3 年会操一次。80 年代，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

布置防务，修筑炮台，并在旅顺建设船坞。旅顺口和威海卫成为北洋海军的两个主要基地。当时，北洋海军已成为一支实力较强的近代海军。但从 1888 年之后，未再增添任何新式军舰。1881 年后，因海防经费被挪用修筑颐和园，连枪炮弹药也停止购买。北洋海军本来主要为抵御日本侵略而建，但由于清政府腐败，结果这支苦心经营的近代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彻底粉碎。

第五节 洋务运动中 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

一、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

“洋务”本来就是与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外交等各方面有关的事务，也是学习西方近代国防、经济、技术各项事务的措施。要兴办洋务，就需要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都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培养洋务人才，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 1862 年奕訢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和 1863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到 1894 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 年多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 24 所，其

中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有 7 所；培养工程、兵器制造、轮船驾驶等人才的有 11 所；培养电报、通讯人才的有 3 所；培养陆军、矿务、军医人才的各有 1 所。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和经费、设备，学生人数并不很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起到开通风气的作用。

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和稍后，有的官员还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但一直搁置未办。到了 1868 年，经蒲安臣之手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才明确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同年，早年赴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抱着“教育救国”的志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1870 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派江南制造局、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为留美学生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又经与李鸿章磋商之后，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 条。1872 年 8 月，第一批 30 名幼童乘轮船离上海赴美。1873、1874、1875 年，每年又各派 30 名。这四批幼童赴美入学之后，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深得美国社会人士赞许。但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等与留美学生屡生冲突，并且也同容闳不能合作，于是以留学生“抛荒中学”、“多半入耶稣教”、沾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等为由，建议总理衙门逐渐将留学生撤回。结果，总理衙门定义“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1881 年，94 名中国留美学生分三批回国。在回国的 94 人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其中一人就是著名的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就在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之后第二年（1873 年），总理福州

船政大臣沈葆楨也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派学堂的优秀学生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派后学堂中的优秀学生，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楨的建议。1874年，他又提出了实施方案，并设计了留法、留英学生的学习大纲。1877年春，议定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同年3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和学生、艺徒前后共35人出洋。其中留英学生12名，除1人因病先期回国外，其余11名均取得优良成绩，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林永生、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都是这批留英学生中的佼佼者。在14名留法学生中，除1名病故外，其余都取得能胜任总工程师的文凭，其中魏瀚、陈兆翱尤为成绩突出。而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则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1879年经李鸿章奏请，于1881年又派出留欧学生8名，其中留法5名，留英2名，留德1名。1886年又派出第三批船政出洋学生34名，其中包括天津水师学堂优秀学生刘冠雄等10名。20名留英学习海军，14名留法学习造船、建筑、法律等。这批留学生，经六年努力学习，也都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许多都成为北洋水师的指挥骨干，在参加甲午中日黄海大战的12艘北洋水师战舰的重要指挥官中，就有半数为首届船政留学生。

二、设立京师同文馆

咸丰十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简称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事务。次年，咸丰皇帝准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的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附属于总理衙门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培养对外人员。是年5月，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开办，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规定招收学生10人，最多不超过24人。只招收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由总理衙门考察录取，依次传补。1863年，变通章程，改为每馆招收10人。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皇帝，要增设天文、算学科目，聘请洋人来教习，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陆续增设了算学（包括天文）、化学、格致（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医学四馆。录取学生的方法也相应变动。规定由京内外各衙门保举30岁以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举人、贡士等未仕人员，最后由总理衙门考取入学。同时规定“三年考列到高等者，按升阶优保班次，以示鼓励。”学生的生活待遇从优，先是每月每人给膏火银3两，后改为每人每月薪水银10两，并供给饭食。

同文馆设立之初遭到清政府内极端守旧派人士的反对。

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强盛中国的办法依旧是尧舜之道，只有通过精读孔孟之书，明体达用，才能使国家规模宏大，所以他极力反对向洋人学习制造轮船、洋枪技术，主张朝廷命官一定要用科甲正途者。接着，大学士倭仁也不断提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在同文馆的设立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倭仁在

当时声望在学界很高，是理学权威，他一出来反对，响应者颇多，这样，京师同文馆虽然设立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投考的人却寥寥无几。

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大肆倡导，办洋务已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同文馆也随之逐步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曾增设了德文馆。这以后又增设了东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规定学生增加到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学制3年为8年，分前馆5年，后馆3年。课程包括汉文、外文、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世界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此外设有为教学服务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博物馆、天文台等。在此之前，还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设立了印书处，有中体和罗马体活字4套，手摇机7部，承印同文馆和总理衙门所翻译的数、理、化、医学历史等书籍和文件等。

同文馆设管理大臣、由总理大臣委派，初由1人担任，以后时有由2人担任，负责主持管理同文馆事务。其下设提调1人，助调2人，负责安排课程及督察学生勤惰之事，同文馆的教课人员有总教习1人，洋教习若干人，还有汉教习和汉文教习3人。总教习多由外国人担任。同文馆的经费、人事等方面多为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控制。同文馆先后聘请了外国传教士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担任教习或总教习，其中由赫德提名的总教习美国传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30年。按规定，同文馆不允许传播西方宗教，但实际上洋教习们总是借机进行传播。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内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文科目。

三、翻译西书和创办报刊

洋务既然是西方的近代事物，兴办洋务就需要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在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等建立以前，除了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过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外，中国人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极少，而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也十分陌生，甚至格格不入。因此翻译西书，就成为兴办洋务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特别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成为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的译书机构。

译书是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一。1888年以前，该馆师生共译辑各种书籍22种，包括法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公法会通》、《法国律例》、《新加坡律例》等），经济学（如《富国策》），外国历史（如《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物理学（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化学（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数学（如《算学课艺》），天文学（如《天文发轫》），生理学（如《全体通考》），外交知识（如《星轺指掌》），外国语文（如《英文举隅》、《汉德字汇》等），历法（1877年——1879年《中西合历》）。这些书籍为教材性质，也可以说是一些“西学”的入门书。

上海广方言馆也培养了一些外语翻译人才，而翻译西书成绩最显著的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据英人傅兰雅《江

南制造总局翻译西方事略》记载，从1871年到1880年，已刊印译书98种，235册。译成未印者45种，140余册，尚有13种未全部译完。在已刊和未刊的译书中，绝大多数为自然科学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虽然数量有限，内容浅近，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却是一种新知识和新学问。后来许多投入维新变法的骨干人物，大多都是从这些译书中受到启发和影响。它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些译书本身的价值。

在自然科学技术的译述和介绍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善兰（1810—1882年），字壬叔，浙江海宁县人，对数学造诣颇深。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学》、《重学》等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所著《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其中《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华衡芳（1833—1902年），字若汀，江苏金匱县（今无锡市）人，翻译了代数、三角、微积分、概率论等书，共60多卷。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江苏无锡县人，研究物理、化学和机械制造。他同华衡芳等编译了这几方面的科学著作，数量很大，刊行的有13种，其中《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较为著名，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与翻译西书同时，创办报刊也是洋务运动期间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业。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是由外国创办的。其后伍廷芳虽然在1858年创办了《中外新报》，但因为刊行于香港，对内地影响不大。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近代社会信息传播工具的报刊，也开始在中国出现。1872年在广州

创办了《羊城采新实录》，1873年在汉口创刊了《昭文新报》，1874年在上海创办了《汇录》，1876年又在上海创了《新报》。这些由中国人办的近代早斯的报纸，虽然不可能与外国人办的《申报》、《新闻报》相抗衡，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闻事业。随着时代的变化，近代报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后来的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创办报纸杂志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工具。

第六节 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早期改良思潮

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原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发展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

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韬，字紫铨，号仲弢，江苏长洲（吴县）人。秀才出身，后屡试不中，离家赴上海受雇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曾因避清政府通缉，在英国领事庇护下逃往香港，后赴英、法、俄等国游学，悉心研究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牋》等。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贡生出身。曾当曾国藩幕僚八年，协助曾镇压过捻军起义。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光绪五年（1879年）著《筹洋刍议》，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光绪十四年（1888年）担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写了大量文章和日记，不断向国内介绍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后，不久病逝。其著作经后人编为《庸庵全集》。

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举人出身，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等职。曾遍历沿海各埠及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积极钻研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光绪十九年（1893年）发愤撰成《庸书》内外百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发表《续富国策》。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少年在上海时，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光绪二年（1876年）赴法留学，兼驻法使馆翻译，得博士学位。他掌握拉丁、希腊、英、法等文，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回国后为李鸿章幕僚，累保道员。参与洋务活动。一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晚年回家从事著述。其政治思想集中地反映在所著《适可斋纪言纪行》一书。又著《马氏文通》，亦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7岁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近20年，并投资轮船公司。捐资得道员衔。同治

元年（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同治十年（1871年）又改名《易言》刊行。光绪六年（1880年）后，由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更注意研究时务。中法战争结束后，集中精力增补修改《易言》，光绪十九年（1893年）定名《盛世危言》分五卷出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增订新编十四卷出版。

王韬与冯桂芬有过交往，思想受到他的一些影响。他看到“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将来中国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表示“一息尚存，尚思报国”。马建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郑观应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太息痛苦流涕”，“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见唐虞盛世”。薛福成主张通过修约取消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当听说洋务派准备推荐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军时，急忙上书李鸿章，说赫德为人“阴鸷而专利”，如再掌握兵权，就要“酿无穷之患”。在中法战争期间，他担任浙江绍台道，曾在镇海亲自参与击退法舰之战。此时，郑观应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只身入暹罗（泰国）、金边、西贡侦察敌情，在香港、厦门办理援台抗法事宜，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陈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国势危殆，更益坚其变法之志。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强学会，担任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

戊变法失败后，受到很大打击，经常“高歌痛哭”。次年竟在家乡忧愤中死去。

王韬建议“握利权”，使“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指责顽固派“动循古昔，不知变通”，认为“变古以通今者势也”。批评“重农而轻商”，提出“商为国本”、“富强即治之本”。主张“行泰西之法”，必须“先富而后强”，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任、造轮船，大力发展新式商业。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民办”，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殫其力”，以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早年曾反对“君民同治”，后来则转而认为“惟君民共治”，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晚年回上海主持格致书院，并任《申报》编纂主任，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往甚密，对洋务活动既献计又批评。

薛福成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处今日之世，“坏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故应“以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他称赞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认为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而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握四民之纲”，又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但欧洲人口密度更高，因“能浚其生财之源”虽人满亦富。中国则要以导民生财和导民出洋，来解决人口问题。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工商实业，作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提倡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提出“圣人正不讳

言利”，“人人欲其私”等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论点。

陈炽认为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是“强兵富国”的根源，主张革命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但又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之说。反对外国侵略者“盘踞要津”，攫取各种特权，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农民起义是由于“户口加多而土地不加辟”，无以谋生所致，而不是民情好乱；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出路。提出振兴“商务”以反对列强侵略的经济理论，即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各部门经济，“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在工”。谴责反对发展机器工业的顽固派是使中国贫弱的大罪人，揭露其口不言利的虚伪性。对洋务派的“摧折华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主张成立商部、制订商律、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等保商措施。

马建忠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的“富民”思想。主张提高关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以扩大商品出口。提出废除厘金、“将厘金尽行裁撤”，以利“华商”。主张发展新式工业，“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建议由“商人纤股设立公司”，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介绍并倾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之政体，谓其“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所以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作某些改革，“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郑观应批判顽固派泥古不化，甘心愚陋而受制于人；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对西方“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不

能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器由道出”，“道”由中国“列圣相传”，“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主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并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还认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而“十万豪商，胜于有百万之劲旅”，此乃“一国兴亡之所系”。强调“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以商战为主”，建立机器制造业。指出“官督商办”是“官夺商权”，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要求清政府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商人可举为议员及发给“称颂功牌”等护商措施。要求清政府提倡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并组织力量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工艺学、社会政治学等书籍出版。他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故极力宣传“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的论点，赞扬英国“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要求改革内政。九十年代后，他的思想趋于保守，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敌视革命运动。晚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厌恶军阀混战。

以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为主要代表的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清政府限制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腐败和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的改良者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亦为后来的维新派向西方学习架起了桥梁。

第四章

中国边疆危机

第一节 十九世纪 中后期的国际国内形势

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竞争时期开始向垄断时期过渡。英、法、俄、美，以及后来崛起的日、德等国，出于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原料、输出资本的需要，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侵略日益加剧，从而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分割世界领土的狂潮。在远东，它们加紧把中国四周邻邦琉球、朝鲜、越南、缅甸等国攫为殖民地和保护国，使古老的中国也随之产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这一时期，清政府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化。北京政变后，慈禧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一度笼络、重用恭亲王奕訢，其后，奕訢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威望迅速提高，并形成了一股以他为首的洋务派势力，这又引起了慈

禧的嫉忌。1875年1月，同治帝病死，无子继位，慈禧立咸丰帝的胞弟、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年仅4岁的儿子载湉为皇帝，改元光绪，继承帝位，慈禧仍以太后身份再次垂帘听政，掌握清朝实权。为了压制奕訢的势力，慈禧极力拉拢与奕訢政见不合思想保守、懦弱无能的奕譞，利用他排挤奕訢。一些夤缘趋势的人也竞相奔走于奕譞门下，使奕訢的势力日益缩小。在奕訢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内部，李鸿藻等顽固派也联络以张佩伦、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流派士大夫，利用他们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清议”言论来攻击洋务派官僚，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慈禧则暗中放任清流派，借他们抨击奕訢的对外软弱妥协来打击洋务派。正是由于慈禧的纵容和支持，顽固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总之，慈禧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既不能不依靠洋务派，又担心洋务派的势力过于膨胀，所以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保持平衡，使他们互相牵制，自己则从中加以操纵和利用，从而在表面上维持着清政府的“统一”。

第二节 左宗棠收复新疆

一、阿古柏入侵新疆

19世纪70年代，中国邻邦缅甸，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先后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英国吞并印度后，继续向北扩

张，沙俄也极力向南扩张，使中国边疆不断出现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清朝驻新疆办事大臣与当地封建佰克相互勾结，不断向当地群众增加新税，他们贿赂官位，极度贪污；高利贷十分盛行。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等各族人民相继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并迅速占领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封建割据政权，其中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和卓即黄和卓神权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或称妥得馱）封建神权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依比布拉汗封建神权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柯尔克孜族司迪克封建地主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齐苏丹封建君主政权。他们彼此间又发生了割据混战。与此同时俄国为把中亚弄到手，陆续占领了哈萨克平原浩罕汗国属境和布哈尔汗国的全部地区，并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统治这一带地区。由于俄国强占中亚，使得英国担心俄国再向印度伸手，因此，英俄两国在新疆问题上产生了矛盾。

同治四年（1865年）夏季，割据喀什噶尔的柯尔克孜族司迪克久攻疏勒不下，便派回族封建领主金相印赴中亚浩罕汗国，向阿力木库里汗乞求把在浩罕汗国的原中国人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遣回做为新疆的汗王。于是，阿力木库里汗就遣派布素鲁克和卓回新疆任汗王，以便复辟“叶尔羌汗国”，并派塔吉克族阿古柏（原名叫穆罕默德·亚库甫）担任他的军队首领入侵南疆。阿古柏来到喀什噶尔之后，名义上把布素鲁克和卓奉为汗王，但是实际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阿古柏手里。阿古柏让自己带来的亲信担任军政要职，使用贿赂当地佰克或派人暗杀的手段，日益巩固了他自己的政权。同

时，向来受到英国殖民主义影响的阿古柏又立刻与英国取得联系。随后，阿古柏占领了英吉沙尔、疏勒、叶尔羌。转年又诱杀了依比布拉汗，吞并了以和阗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并开始向北进军。这时布素鲁克和卓周围的人虽进行了反阿古柏的秘密活动，但事情很快被暴露了出来，许多人被杀害，阿古柏强迫布素鲁克去圣地朝觐，这样就把他驱逐到麦加。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相继攻占了阿克苏、库车等地，兼并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割据政权，继而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即又称“七城汗国”（包括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和阗、吐鲁番），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又攻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消灭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割据政权，将势力扩展到玛纳斯。从此，阿古柏占有全部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实行军事封建采邑“苏王尔阿利”制度。他们强占土地，勒索财物，征调劳役，严刑厚敛，税及园树，迫使农民变卖土地，牲畜交纳税款，甚至变卖家中锅碗去交纳税款，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英俄在19世纪后半期，就竞相争夺新疆，此时，都想借阿古柏之手达到侵略目的。于是英国笼络收买阿古柏，通过各种形式把势力渗透到新疆，还派遣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为首的特别使团，携带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承认阿古柏政权，并馈赠大量军火。阿古柏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英国订立了《英阿条约》，准许英国人自由出入新疆经商贸易，不久之后，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由南疆向北疆侵犯，先后占领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俄国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

犯，于是就派军队进行干涉，相继占领了中国伊犁地区九城，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清政府闻知消息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部队入新疆平叛。

二、左宗棠“舁橐出关”

左宗棠学识渊博，但很长时期是个会试不第的举人，他晚年得以任为协办大学士，乃是破格的擢升（大学士要翰林出身才合格）。他早年所以屡试不第，是由于喜爱经世之学，不能适应考官的胃口。有次赴京会试落第，听到沙俄在西陲蠢动的风声，他吟诗抒怀：“西域环兵不计年，当年立国重开边……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废度支钱。”他师承了龚自珍主张新疆置省屯边的思想。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返里探亲，路过长沙；左宗棠因在陶澍家中当过塾师，所以有机会以“白身”获见他素所钦服的抗英大臣。两人在船上纵谈今昔，无所不及，直谈到东方出现曙光。林则徐告诉他谪戍新疆见闻，“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林氏以未竟事功为憾事，相与慨叹不已。从上述一些情况，可以了解到左氏晚年那么忠诚为国的思想根源。他坚决抗俄，既非急功图名，一时激动，更非清流派一类的盲目排外所可比。他虽是百年前的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却有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师承，有独立思考。

六七十年代之交，英国正从印度偷偷地由藏边渗入，利用来自中亚细亚的外来侵略者阿古柏盘踞南疆若干城；帝俄则已染指伊犁，声言要永久占有。当此紧急关头，京师内以

“海防”与“塞防”孰重为议题展开了论辩。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重视海防，他说：“海防密迩京师，一旦有事，京师动摇；维新疆不守，亦难危及京师。”曾国藩提出应以全力肃清回民起义，把玉门关以外暂时放一放再说，李鸿章连忙赞为“老成谋国”之见。于是有人进而提出具体办法：承认阿古柏所占八城，任他与俄订约，封为“外藩”。督抚中不以为然的也有，如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南巡抚王文韶等坚决主张西征平乱，但仅少数，且发言影响不大。当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手中控有重兵，处于西陲前哨地位，军机处不能不征询他的意见。左宗棠针对曾、李放弃西陲的论点驳斥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师。”他认为若要确保京师，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不可偏废。怎样对付阿古柏，他说如不及时规复，而任其刈据，这是自撤藩篱。他说：“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并表示他有把握收拾这只“盘雕”。军机大臣文祥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

1875年4月清廷决定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当时中外议论大多认为：阿古柏入侵盘踞南疆已久，一直有英国撑腰，又同俄国搭上了关系，其实力非同小可。尤其是沙漠地带用兵，非南人所能习惯，左宗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要打问号。李鸿章恨恨地散布失败主义论调说：“左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他在等待西征军的失败了。

左宗棠已经64岁，他写信告诉儿子：“我年已衰，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不安。”于是整饬部下，申以纪律，严禁杀掠，要对被解救的少数民

族“如去其虎口而归父母”，指挥大将刘锦棠发兵北逾天山。他掌握敌情，阿古柏基础较厚，北路叛逆白彦虎无论装备和实力都较南路为弱，从而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诱使阿古柏出援而邀击之。在战术上，因长途沙漠中行军，提出“缓进急战”原则，不轻率求战，打则必胜。一切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一鼓而解决了白彦虎，除伊犁外全部收复了沦陷的各城。回师南下时，英使威妥玛通过外交途径代阿古柏乞和，请求“称为喀王，俾作属国”，自然还附带一些威胁之辞。左宗棠据理驳斥，坚决用兵，把阿古柏盘踞了二三十年之久的老窠，从阿克苏到和阗等八城全部拔除，在攻克库尔勒时逼使阿古柏兵败自杀。一直扬言要出兵应援的英、俄两国，看到形势不妙，反倒规规矩矩起来，按兵不动。清廷为收复伊犁事，派遣大臣崇厚赴俄谈判，命令左宗棠不得径自动用武力。左即停止进军，严密监视，静待谈判消息。

伊犁在北疆西部，是西路第一重镇，包括宁远、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拱辰、瞻德、塔勒尔等九城，纵横相联。清政府设伊犁将军，驻宁远城。伊犁地区兼得伊犁河、特克斯河的灌溉之利，农牧相宜，民丰物阜，是新疆富饶的地区之一。沙俄对伊犁垂涎已久。在 1871 年用武力侵占伊犁后，企图长期霸占，便毁弃大城，在宁远东 90 里之金顶寺，另修长 20 里街市，划归俄国阿尔玛图的地方官科尔伯科夫斯基管辖。沙俄政府原以为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没有能力把盘踞在天山南北的阿古柏侵略军赶走。俄国驻北京公使倭良嘎哩曾代表沙俄政府向清廷总理衙门表示，只要中国从阿古柏手中收回被占领土，他们就把伊犁还给中国。1876 年 4 月

西征军入疆，沙俄政府发觉阿古柏难以抵挡清军的进攻，倭良嘎哩的讲话使沙俄很被动。阿古柏如被击败，清政府将会根据他们曾经许下的“诺言”，向俄国收回伊犁。俄国陆军大臣米留金为此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确定：如果阿古柏失败，俄国必须获得在中国内地通商的权利，并且从中国边境割取土地以后，才能交还伊犁。西征军进军新疆，沙俄便支持阿古柏对抗清军。1877年1月，俄国派出特别代表团到库尔勒，鼓励阿古柏负隅顽抗。阿古柏军战败，沙俄别有用心地收容了白彦虎和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并支持他们多次从俄境骚扰南疆。

左宗棠有巩固西陲的长期打算，他改变屯边原有作法，划兵农为二，老弱者、宜农者留屯，能战者严加操练，专任军事。他关心各族农牧生产，积极辅助，大力提倡种植业和养殖蚕桑。不是这样，10余万大军在破碎的局面下是难以维持的。他设想改善行军条件，在交通要道从河西走廊起，夹道种上柳树，二三年就绿如帷幄，连绵通达吐鲁番、乌鲁木齐。诗人为之歌唱道：“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度玉关。”

不幸，脓包崇厚在彼得格勒为沙俄政府所欺，签订了一个出卖土地的条约。左宗棠坚决不答应，清廷宣布崇厚签约无效，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左宗棠宣言：“先之议论尚是空谈，继之兵威乃有结束也。”他入关已两年，1880年5月，他准备好棺木一同抬出了玉门关（史称“舁柩出关”），驻节哈密，具体部署收复伊犁事宜。沙俄闻讯，也急速增调援兵，但我方始终占有优势。清廷意在等候谈判消息，担心左宗棠耐

不住，就借口把他召回北京。左氏驰书告诉刘锦棠：“俄事非决战不可，克日通盘筹划，无论胜负如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原来，康熙朝尼布楚条约所定疆界，经沙俄数十年不断蚕食，早已面目全非，这在爱国志士心头自然是一日不能忘怀的。

倘使没有左、刘部署“继之兵威”，曾纪泽在彼得格勒只能是空谈。谈判结果，虽然仍是沙俄占了许多便宜去，而伊犁终于物归原主。不久，新疆正式建成行省，浩荡春风吹度了玉门关，沙俄暂时稍为规矩了一阵子。

第三节 日美侵犯台湾

在我国西北边疆危机的同时，侵略者又在我国东南海疆和西南边疆造成了严重危机。

早在 1853 年，美国海军将领皮雷率舰队窜到我国台湾，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1856 年，美驻华专使巴驾向其国务院提出一项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和朝鲜的计划。1867 年，美船“罗佛”号在台湾南部琅玕（今恒春）附近触礁沉没，船长等十余人被高山族人所杀。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海军到琅玕寻衅，被击退。美国再派海军将领贝尔率军舰两艘入侵，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玕登陆，高山族人民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

1871年11月，有琉球渔船因遇飓风飘流至台湾，被高山族人误杀船员50余人，12名生存者由中国政府送回琉球。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日本竟以此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1872年，日本要求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的封号。1873年，日本向清政府进行讹诈，清政府说明此事与日本无关。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000余侵犯台湾，日本在琅玕劫掠焚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跨龟山，设立都督府。清政府一面和日本交涉，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率军赴台，部署防务。10月，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条约》），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日本利用《北京专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字样，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1879年，日本以武力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第四节 西南边疆危机

一、《烟台条约》 及英俄对西藏的入侵

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境出现

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英国先后在 1863 年、1868 年派出“勘探队”窥伺我滇西地区。1874 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 200 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 年 1 月，马嘉理在八莫与柏郎会合，带领武装探路队于 2 月初擅自入境，分两路窜至腾起（今腾冲）地区。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力阻英人通过。21 日，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名，群众也打死马嘉理。与此同时，景颇、傣、汉等族群众在班西山下阻击柏郎率领的英兵，把他们逐回缅甸。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英国利用“滇案”向清政府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相恫吓。威妥玛还与俄国公使密商筹谋英、俄分别由云南、伊犁进兵。清政府屠杀了 23 名景颇族同胞，将当地文武官员革职，接受了英国所提出的苛刻条件。1876 年 9 月 13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山东烟台与威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规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以及外贸免纳各项内地税、扩大领事领事裁判权等。《烟台条约》中的这些不平等条款，在许多方面扩大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

英国早就企图从印度向我国西藏扩张。60 年代初，英国侵略势力在进一步伸入中国的两个邻邦哲孟雄（即锡金）和

不丹之后，不断派遣侵略分子以传教、游历为名入藏活动。西藏地方官吏和僧俗人民屡加阻挡、驱逐，清政府也下令截回从内地潜赴西藏的外国传教士。《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迫使清政府同意它派员入藏“探路”。1884年，英印政府官员马科雷率领一支约300人的武装队伍从锡金越境，闯入西藏，在干坝地方被藏族人民所阻。1886年，又派出大批军队结集西藏亚东以南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西藏地方政府呈文驻藏大臣，历数英国的侵略罪行，表示西藏僧俗人等，“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并在热纳宗隆吐山要隘建卡设防。1888年，英军悍然向隆吐山发动进攻。我西藏爱国军民英勇抗击后，转移至亚东山谷。在隆吐山战役中，西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誓死抵御，决无二心”的誓言。

清政府一再命令西藏军民撤出隆吐山边卡，罢黜了力争热纳宗属于我国西藏地方和积极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说他“识见乖谬，不顾大局”，改派升泰为驻藏驻办大臣，与英国“罢兵定界”；并派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之弟赫政充作升泰的助手。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英国侵略势力伸进了西藏。

沙俄也不断进窥我国西藏。从1870年开始，十多年间，沙俄派“调查团”先后五次潜入我国西部地区活动，曾两度潜入西藏境内。19世纪末，“累年以来，俄人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山，测量地形，举动至为叵测”。沙俄还从和藏族共同

信仰喇嘛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中培植间谍分子，派往西藏，长期潜伏。其中，伪装最巧、潜伏最久的是阿旺·德尔智（俄名道尔济也夫，藏名洛桑姑马）。他利用担任达赖十三世经师的权位，发展亲俄势力，并向达赖灌输“英人将来侵略西藏可畏，中国政府亦不足赖，唯俄罗斯是将来喇嘛的唯一保护者”的思想，唆使达赖投靠沙俄。1899年沙皇遣使到拉萨“访问”达赖十三世。1900、1901年，达赖两次派德尔智等去彼得堡晋见尼古拉二世。沙俄对达赖集团的影响不断扩大。

二、堆拉之战

英国侵略者的欲壑并非到此为止，他的侵略阴谋是牢牢控制西藏，妄图使之脱离中国的版图。

1903年10月初，英国侵略者拟订了一个攻占江孜、拉萨的作战计划。他们集结了1万多兵力，配备了大量步枪、机关枪和火炮，由麦克唐纳少将为总指挥，分两路实施进攻。麦克唐纳统率以印度锡克族步兵为主的主力部队，从锡金越过则利拉山口入藏，占领春丕（今亚东南），然后北上向江孜进攻。另一路英军进入干坝，以牵制藏军，然后再向春丕方向运动，在春丕与江孜间会合。

西藏的地方部队，包括绿营兵和西藏地方军，总兵力约4000千人，主要集中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绿营兵配备有步枪、火炮等火器，藏军则以土枪与冷兵器为主。由于平时缺乏训练，战斗力较弱。尽管如此，面对英国侵略军压境，他们还是作了防御的准备，集中主要兵力于干坝一线。

1903年12月11日，麦克唐纳率1000余名英军，按预定计划越过则利拉山口，于14日进占了未及设防的通向江孜的要地春丕。藏军急趋帕里一带加强防守。20日，麦克唐纳率800精兵，夺取了帕里地方政府的火药库和武器库。由于气候严寒，英军难以继续前进，遂留少数部队驻屯帕里，主力折回春丕，补充装备给养，待机而行。藏军囿于驻藏大臣裕钢不准追击的禁令，未予拦截。1904年1月初，英军又从春丕出发，经帕里，至堆拉，不少人冻伤，患病者亦不少，企图以与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之机，进行休整。这时，3000余名藏军在总指挥降巴丹增率领下，已先后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古鲁一带，构筑石墙，组织防御。西藏代表多次要求英军撤至亚东，进行谈判，而英方则提出至江孜谈判，和谈终于破裂。3月底，麦克唐纳率领1300余人，从堆拉分路北进，当进至曲眉仙角藏军阵地附近，英方忽提出停火谈判，而暗中却令1个步兵营迂回至藏军阵地侧后，抢占山头有利位置。藏军为使谈判顺利进行，遂停止还击，结果中计，被迫从山上阵地撤至石墙以内。这时，英军的步、骑、炮兵从三面将1500余名藏军包围。藏军前线指挥官莱丁色拒绝缴械投降，用刀矛叉等原始武器与侵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毙伤英军10余人，莱丁色和700多名藏军将士，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余部撤至曲眉仙角以北的古鲁，在英军强大火力下，藏军奋起抗击，但未能阻止敌之兵锋。此战，藏军共伤亡1400百余人，接近前线兵力之半，可见战斗之残酷，但无一人向英军投降。西藏军队为捍卫乡土而殊死搏斗，充分显示了中国各族人民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三、江孜保卫战

英国侵略军在堆拉一线战斗中得手后，得寸进尺，积极作进犯江孜的准备。西藏驻军并没有因初战失利而气馁，也作了继续抗击侵略军的准备。

四、拉萨城下订约

1904年7月14日，英军步骑2000人，在麦克唐纳带领下，从江孜向拉萨进犯。西藏地方政府见无力挽回颓势，竟令西藏民军停止武力抵抗，侵略军遂长驱直入，8月3日占领拉萨。英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4日，清政府驻藏大臣升泰，竟亲自到英军驻地，息兵求和，慰劳英军。9月6日，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在布达拉宫签订了辱国丧权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50万英镑，辟江孜、亚东等地为商埠，撤去边境驻防军，西藏政务须请示英国，等等。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清政府感到此约一签，西藏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清政府令驻藏大臣升泰不得签字。直至1906年4月，中英在北京续订藏印条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挫败了英国侵略者的狂妄野心。

第五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第一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侵略越南与 清政府内部的主战主和之争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出兵侵略越南。1862 年 6 月，它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 年，法军进而侵犯河内地区。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率领活跃在中越边境的黑旗军援越抗法。黑旗军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邨。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1880 年 9 月，镇压巴黎公社“最可耻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并策划以此为跳板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确立法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1880 年 4 月，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

直窥云南。刘永福誓死不肯相让，将法军围困在河内周围一年多，并在城西纸桥一战击毙其继任统兵官李维业，打乱了法军的北侵计划。刘永福被升为三宣提督。清政府为了阻止法军继续侵略越南，曾先后请求英、美、德等国出面调解，但都遭到拒绝。法国利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快了侵略步伐。

1883年8月，茹费理内阁扩大侵越战争，终于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便把矛头指向中国，一面封锁东京湾，命令侵越法军向北进犯；一面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中法矛盾日趋尖锐。

面对法国的武力进逼，清军机处态度软弱，步调纷乱。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和他在军机处的支持者宝鋆，惧怕法国的武力优势，没有抵抗的决心。他授意驻法公使曾纪泽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向法国政府和法国驻华代表寻求妥协，力求避免战争。然而，曾纪泽却屡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清政府保护刘永福，增援抗法。在他看来，中法的军事力量虽然对比悬殊，但只要我海陆军相互配合，扬长避短，持久作战，法国必将知难而退。李鸿章的政见和奕訢相同。他在和法国驻华代表的接触中，屈从于法国的愿望，建议政府召回中国驻军和刘永福，免去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他强调中国“兵单饷匱”，“海防空虚”，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哉”，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李与曾的分歧，既有方针上的不同，又有派系间的鸿沟。奕訢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命

曾纪泽专为驻英、俄公使，免去了他驻法公使的头衔。

李鸿章抑曾求和及奕訢对他的支持，引起了湘系首领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的强烈不满。有些御史也上书弹劾李鸿章“张夷声势，同喝朝廷”，“保位贪荣，因循畏蒞”。他们都极力主战，并强调指出：法国恃强相逼，恣意侵袭，正是李鸿章因循、偷安和长期避战和造成的结果。

军机大臣李鸿藻及清流派也抨击李鸿章，要求增兵西南，对法作战，并举荐唐炯和徐延旭分别任云南、广西巡抚，指挥在越境抗法战争。但唐、徐指挥无能，作战连遭失败，法军很快占山相，北宁，陷太原，于 1884 年 3 月逼近中越边界。

二、中法首战山西

中法首战山西

法军为占领北圻，把第一个攻击目标选在山西。

山西位于河内以西近百里，系滇军之前哨，北宁之犄角，红江中上游之战略要地。城垣紧靠红江南岸，分内外两城，内城砖石所垒，外城堆土而筑，城围约 20 里，距河岸约 5 里。黑旗军于 1883 年 9 月退守山西后，不断加强城防和沿岸河堤的工事。河岸筑有炮台，配有大炮，水面设有竹筏，以阻塞河道。刘永福、唐景崧率黑旗军 10 营、桂军 2 营、滇军 3 个营，共 5000 余人扼守，越将黄佐炎率越军 2000 余人，配合作战。兵力的部署是：城北为主要防御方向，由黑旗军 6 个营、桂军 1 个营，占领既设阵地，控制河道，阻敌向北门进

攻。城东的地位也很重要，由黑旗军 5 个营组成两道阵地，防敌从陆路攻击东门。唐景崧商调滇军督带张永清，率 3 个营由兴化到山西，防守西门。黑旗军 1 个营、桂军 1 个营配置于南门外，以备机动。越军黄佐炎部部署在南门外乡村中，相机策应。刘永福驻外城、唐景崧驻内城，督战指挥。

1883 年 12 月 11 日，孤拔率兵 6000 人，分水陆两路，从河内出发，进攻山西。水路有舰艇 12 艘，民船 40 余艘，载陆军 3200 余人，溯红江西上。陆路有陆军 2600 余人，沿红江南岸，直扑山西。14 日约 9 时，法军炮击山西守军，并在城东北登岸，用舰炮摧毁了清军沿岸炮台，登陆步兵迅速展开，向黑旗军阵地接近。黑旗军依托河堤阵地，奋起还击，使法军遭受严重损失。下午，刘永福调来东门的黑旗军主力，迂回到法军的左侧，插入法军舰队与步兵之间，猛烈攻击法军的侧翼，使其两面受击，而法舰炮不敢开炮射击。孤拔见势危急，令法军转入防御，集中所有炮兵，向迂回的黑旗军轰击。黑旗军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 4 时，孤拔下令向坚守河堤的黑旗军发起猛烈攻击，黑旗军顽强扼守，以排枪大量杀伤敌人，使法军一支非洲兵大部分倒下，其余的人混乱溃退。尽管法军大炮猛轰，步兵多次冲击，黑旗军顽强地固守着阵地。当法军迫近河堤时，黑旗军跃出工事，与敌展开肉搏，经过 1 个多小时的激战，虽然法军在下午 5 点钟占领了黑旗军的工事，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甚高。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法军死伤士兵 200 人、军官 22 人。黑旗军伤亡不到法军的一半。

15 日深夜 1 时，唐景崧组织桂军和滇军反击，企图夺回

城北河堤阵地，激战4小时，三进三却，未获成功，便将城北守军撤至外城，依托土围，分段坚守。午后法军向城西运动，从城北、城西同时攻城，企图夺取城西滇军的据点。刘永福判明情况，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16日拂晓，法军多次攻击北门和西门均未得逞，北门守军伤亡较大，弹药告竭。法军进攻西门的炮火最猛，西门墙崩楼毁，滇军无坚守之阵地，形势危急。刘永福、唐景崧督军竭力坚守至夜，遂各自率军退出山西，转至兴化。17日，法军攻占山西城，大规模屠杀居民，惨不忍睹。英国驻河内的新闻记者斯各特描述当时情况时说：“这是在山西的一个恐怖的夜晚。非洲游击兵们，……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走近北门，推开门进去，除了看见几十个可怜的安南妇孺和几个更为不幸的青年人而外，就没有别人了。”

山西之战，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唐景崧率领的滇、桂军，在兵力不足，装备劣势的艰苦条件下，密切配合，顽强奋战，以牺牲千人的重大代价，坚守城池三天，重创法军精锐，使法军损失近千人，但终归失利。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迟迟不率滇军主力出关，也不派兵增援山西，致使山西守军孤军奋战。广西巡抚徐延旭畏缩不前，不积极指挥桂军出击河内，牵制法军主力，致使法军能集中兵力，进攻山西。山西首战失利，使清军失去了威胁河内的前哨阵地，丢掉了控制红江的战略要点，北宁陷于孤立，滇桂两军联系中断，为东西两线清军协同作战增加了较大困难。

北宁战役

法军攻占山西，由于伤亡较大，兵力不足，不敢轻率进

攻北宁。1884年2月，法国增派了1个步兵旅、2个炮兵队和1个工兵队到越南，使法国远征军的总兵力增加到1.7万余人，陆军少将米乐接替孤拔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返回海军舰队。米乐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向的滇军。主力第一旅集中于河内，由陆军准将波里也指挥；第二旅驻海阳，由陆军准将尼格里指挥；北圻江防舰队的主力驻海阳，由海军中校莫列波约指挥。米乐的总司令部驻河内，加紧进攻北宁的准备。

北宁是清军在北圻据守的战略要地。南可拒河内，北屏蔽谅山，西接连山西，东临近海阳，为北圻之枢纽，系中法两军必争之地。山西失陷后，北宁清军受到来自海阳、河内、山西三个方向法军的严重威胁，清廷十分惊恐，叠次谕旨，饬防军固守北宁，力保北圻，“北宁境内凡我力所能及、势所应防，断不可稍留罅隙。”命令前敌主帅广西巡抚徐延旭添募营勇，增补军械粮饷，出关督率防军严密扼守，以固边疆门户。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命云贵总督岑毓英，迅速率兵出关，拒守兴化、宣光、临洮。左宗棠令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招募定边军8个营，出关入越。清军力图固守北宁，阻止法军继续向滇桂边界发展，并相机收复山西和河内。

北宁守军由左路统领广西提督黄桂兰、右路统领广西道员赵沃共同指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事不断加强，兵力逐步增加，到战役开始前，总兵力已达58营，2.4万余人。其兵力部署是：副将党敏宣率8营防守北宁东60余里的三江口，以阻法军溯六头江包抄北宁后路；总兵陈德贵率4营，扼

守北宁东北的扶郎，以阻敌舰船沿江进攻涌球，威胁北宁；副将韦和礼率 10 营分守北宁东南的桂阳和左河；刘永福黑旗军 12 营守揽山，阻敌陆路主力进攻北宁；总兵陈德朝率兵 8 营驻守北宁南 50 余里的新河口和慈山，以阻敌沿慈山大路进攻北宁；参将李应章率 1 营防守北宁西的金英，以扼山西入北宁的通道；总兵陈朝纲率 2 营防守北宁城北 8 里的涌球。涌球北面临河，有两座土山，是北宁的屏障和安危相关要点；副将周炳林率 4 营防守涌球东 5 里的塞河处，以阻法军沿河而上，攻击涌球；黄桂兰、赵沃率亲兵 2 营、参将蒋大章率 1 营另 2 哨，防守北宁城池。清军总指挥部设在城中。

1884 年 3 月 7 日，法军经过充分准备，发起了对北宁的进攻。米乐、波里也率第一旅 6000 余人渡过红江，以一部兵力由嘉林佯渡新河，制造法军沿慈山大路进攻北宁的假象，其主力则沿新河南岸向东疾驶。尼格里率舰船 20 余艘 6000 余人，从海阳沿太平江北上。8 日上午 9 时许，法军攻击扶郎，清军陈德贵部战至黄昏，破出敌围，败退六七里，扶郎失陷，清军外围防线被突破，北宁侧后受到严重威胁。12 日，法军水陆并进，分三路向北宁进攻。一路由城南的新河北攻，一路由城东西攻，一路乘舰船进攻涌球。陆路法军的主力西渡新河，向桂阳、北宁实施攻击，在桂阳、揽山、左河等地与清军激战。黑旗军也参加了战斗，法军受阻。而沿江北上的法军舰队，拔起塞河大元木，猛攻涌球土山。驻守涌球之陈朝纲两营，闻炮顿溃，在附近的周炳林营亦溃，法军占领涌球土山，将大炮安置在山上，直接轰击北宁城。此时守城兵力薄弱，仅参将蒋大章 1 营、千总黄效贤 2 哨。黄桂兰、赵

沃正在阵前，惊闻后路有失，急率亲兵回城，调慈山各军来援，慈山之军不能应急。副将党敏宣8个营远避六头江外，屡调不至，总指挥部又没有掌握战役预备队，无法增援受威胁最大的涌球方向，也无力坚守北宁城池，只有弃城而逃，退守太原、谅江一带。12日晚法军进入北宁城，13日继续追击清军，连夺太原、谅江、郎甲等地。北宁战役历时5天，清军伤亡1000余人。4月初，法军移兵进攻西线的滇军，岑毓英不战而退，撤至中越边界的河口、保胜一带。兴化、临洮、宣光相继失陷。

北宁战役是中法战争初期阶段的主力决战，清军的失败，使法军实现了控制红江三角洲的战略目标。消息传到国内，朝野大哗，清廷震怒，严责徐延旭平日办事粉饰，北宁吃紧时拖延不进，株守谅山，于前敌紧急情形一无所知，贻误大局，“传旨将徐延旭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黄桂兰、赵沃“不能实力堵御，罪无可辞，著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总兵陈德贵防守扶郎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著即在军前正法。”

《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的签订

北宁等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惊，责言四起。但奕訢主持的军队处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敌办法，仅将徐延旭、唐炯两人革职逮捕，派湖南巡抚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贵州巡抚张凯嵩接任云南巡抚。起用原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速赴关外统军。一直与奕訢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决计借山

西、北宁、太原失守事把战败责任全部推给奕訢，乘机将其赶出权力中枢，以独握大权。她在4月3日召见军机大臣时，就严词指责他们因循失职，为罢黜奕訢埋下伏笔。同一天，左庶子盛昱上摺弹劾李鸿藻保举非人，建议给予处分；并说奕訢、宝鋆并非不知内情，却不加阻止，应负连带责任。盛昱上摺的本意，是想让奕訢等人振作起来，加强抗法措施。但慈禧太后却利用这份奏摺大做文章，同与奕訢对立的醇亲王奕譞一起策划，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把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和一概逐出军机处，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等五人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又命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改变了领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做法，以分其权力。慈禧太后罢黜奕訢后，立即谕令军机处遇有紧急事件，会同奕劻商办，从此以后，军机处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奕劻和他的心腹孙毓汶中。

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慈禧太后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似乎是要与法国大战一场。但是，新的军机处并没有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战守，只是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担任军职。陈宝琛、吴大澂分任南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任福建会办大臣，协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率福建水师。慈禧太后长期纵容台谏词垣议论时政，完全是为了扼制奕訢等人，并不真正重视他们的意见。如今奕訢已被罢黜，再不需要这批人在耳边鼓噪生非了，便借“满足”他们的主战愿望为名，“使书生典戎”，把这几位清流派的要角赶出京城。

奕譞原来曾全盘否定奕訢的对外政策，这时也同样希望尽快把大事化小，苟安目前，执行的仍然是奕訢的妥协退让政策，而且走的更远。他掌权不久即久排众议，授权李鸿章设法向法国寻求妥协。李鸿章再次请求英国出面调停。英国这时见法国在越南的胜利和封锁东京湾的行动，已损害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便不再沉默观望，开始就法越战争与法国外交部接触，建议由某欧洲国家或由美国“仲裁”中法争端，以此阻止战争的扩大。法国在德国的暗中支持下，断然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但又向英国政府保证：法国舰队不会主动攻击中国的通商口岸，不会妨碍英国的对华贸易。英国于是未再作努力，只是带着警惕和厌恶的复杂心情继续观望战事的发展。

李鸿章转向德国求助，德国却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法国此时多处用兵力感不支的困难，委托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的亲信、德人德璀琳，出面为中法两国进行斡旋。在德璀琳的撮合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进行谈判，并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政府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迫不及待地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不等清军撤退的时限到期，就在6月下旬进兵谅山附近，逼令清军退回中国境内，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

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将法军打退。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而以此为借口，进行讹诈，要中国立刻从越南北就撤军，赔偿兵费 2.5 亿法郎。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通牒总理衙门，限期照办，否则法国将采取直接行动。同时，法国为扩大侵华做了军事部署，任命孤拔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州和基隆。

清政府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谨谈判；但拒绝法国索取兵费赔偿。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于僵局。奕譞完全寄希望于和谈，不顾法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局势，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

中法观音桥事件

1884 年 5 月 17 日，《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福祿诺向李鸿章递交一件补充办法，声称在 20 天后，他们就要占领谅山、高平、室溪及东京领土内背靠广东、广西境界的各个地方。在 40 天后，就要占领老街和东京领土内背靠云南的各个地方。这些期限届满后，将立即“驱逐”迟滞在东京领土上的中国防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他当时拒绝了福祿诺的要求，并告诉福祿诺，滇粤各军，分扎谅山、保胜一带，与法国毫无关碍。兹既议和，在具体条款尚未议定时，就限期中国退兵，语近挟制，实不敢应允，亦不敢入奏朝廷。规定撤兵时限，是中法停战谈判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法国单方面仅交一纸给李鸿章，李并未签字，也无明文承认，法国政府违背《中法简明条约》第五款，竟然下令驻越法军总

司令米乐进军，用武力迫使中国撤军，挑起了观音桥事件。6月上旬，米乐派遣杜森尼中校，率领900人，从河内出发，向谅山进军。23日到达观音桥（今北丽）附近，遇到中国军队。清军劝阻法军停止前进，并致信法军说，两国既已议和，大可不必再起衅端。杜森尼不听，蛮横地要清军立即撤退到中国境内去。清军表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能移动。杜森尼于下午3时通知清军说，法国部队在一小时后要继续前进。下午4时，杜森尼下令进攻清军，夺占四周山岗。清军立即还击，战至深夜，双方对持。24日晨，清军组织优势兵力反击，除以两营作为预备队留守观音桥老营外，其余6营全部投入战斗。3个营扼守大路正面抗击，1个营从右侧迂回攻击，2个营从左侧包抄断敌后路。法军三面被攻，被迫收缩。清军越战越勇，正面抗击部队闻得两翼攻击清军枪炮声激烈，即行出击，极力猛攻，法军不支被迫溃退，清军追击数里后返回驻地。此次战斗法军自称死伤100余人。英国随军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形时写道：“华军数目众多，并占地势之利。他们从前方及两翼倾射强烈的炮火。东京军队差不多立即回头逃跑。西风兵们（即非洲雇佣军）开始退却，不久就成了正式的溃退，”“差不多所有的行李及后备的军火都落在中国人手中。”这是清军在中法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越军民抗法斗争的信心。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杜森尼反诬清军破坏了《中法简明条约》，法国总理茹费理在下议院公开叫嚣，观音桥事件是中国预谋了的攻击和设伏。法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违背条约，并威胁说，中国政府要对违背条约的后果负

责，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出北圻全境，赔偿军费 2.5 亿法郎。清政府坚持严正立场，对法国无理要求，给予坚决反驳。6 月 28 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奕劻，对法国驻中国代理公使谢满禄指出：谅山是中国驻兵之地，“法兵前往谅山，扑我营盘，先行放炮，中兵不能不抵御，”又说，在《中法简明条约》之外，不存在李鸿章与福禄诺的续约，更不存在中国违反条约之事。6 月 29 日，清政府在《复法国署使臣照会》中重申，法国军队对中国防营“遽行前进攻打，核与简明条约第二款‘不虞有兹扰之事’相背。似此情形，贵国官兵应任攻打之责，认赔补之费也。”“中国万难允此无名兵费”。醇亲王奕譞认为清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的照会，“是二十余年中国第一次振作之照会。”清政府基于法国的狡诈，一面与法交涉，一面“谕令潘鼎新督饬各军，不可因胜而骄”，“益加严密，稳扎稳守”，“如彼仍来扑犯，唯有奋勇迎击，勿稍松劲”，并令东南沿海严加防犯。果然，法国政府的政治讹诈没有得逞，便图谋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中国。7 月 9 日，茹费理通知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从北圻撤军，向法国赔偿 2.5 亿法郎的军费，法国将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12 日法国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撤兵赔银两项，限 7 日内照办；不然，他们必当自取押款和赔款。13 日，法国驻中国大使巴德诺更加露骨地表示：“如果我们在各点上没有获得满足的话，我们是绝对地坚决要使用武力的。”同一天法国海军部长裴龙给孤拔的电令中说：“派遣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14 日，法国 2 艘军舰进入闽

江口。16日，孤拔率舰停泊福州马尾港，法国侵略者就这样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本土和领海。

基隆保卫战

法国政府为了实现所谓的“踞地为质”、“攫取担保”的政策，把进攻中国的目标首先指向台湾的基隆。

1884年7月14日之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将舰队陆续部署在马尾港、长门口、马祖澳、基隆港等地。舰队副司令利士比曾建议在基隆采取行动，“占据基隆的煤场和台湾的北部。”法国政府也认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法国驻中国公使巴德诺8月2日写信给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最后通牒所有的屡次期限终结了，但没有获得我们可以接受的任何提案，现在是共和国政府再作行动自由的时候了。”2日夜，利士比在马尾港的军舰上接到了进攻基隆的命令，3日傍晚即率停泊在马尾的炮舰鲁汀号和马祖澳的战列舰拉加利桑尼亚号，载陆战队400人，驶向台湾，4日到达基隆海面，与已在基隆港的巡洋舰维拉号会合，5日攻击基隆。

台湾远离大陆，是我国南北航道的锁钥，东南沿海的屏障。原有清军40营防守，由台湾兵备道刘璈指挥。新授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于7月16日到台湾，担任台湾守军主帅，直接指挥台北地区11个营，4000余人，防守基隆和淡水。基隆是台北咽喉，记名提督章高元率两营防守八尺门和东岸炮台，炮台紧扼海口，有口径173毫米大炮5门；以新募杨洪

彪 1 个营，守西岸仙洞山；总兵曹志忠 6 个营，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余部守八斗子。提督孙开华率 3 个营守沪尾（即淡水港）。8 月 4 日，利士比派副官日格密上岸递交战书，要求中国军队交出基隆防地，清军严词拒绝。5 日上午 8 时，法舰开炮猛轰基隆炮台，清军立即以炮火反击，法舰拉加利桑尼亚号、维拉号连中数弹，因炮弹威力小，未能给予致命打击，法舰仍猛攻不息。9 时许，炮台火药库爆炸，炮台被毁，清军被迫撤离。法军陆战队在舰炮掩护下登陆，占据炮台和大沙湾附近高地。6 日下午 2 时，法军企图向基隆城区进攻，遭到清军优势兵力的反击。曹志忠率副将王三星等 200 人从正面出击；刘铭传令章高元、苏德胜率百余人袭其东；令游击邓长安率亲军小队 60 人击其西。清军两路夹攻法军，士气甚壮，紧缩包围，猛攻敌军，法军不支，又怕退往海滩的后路被切断，急促溃退，逃上军舰，法军死伤百余人。利士比方知对基隆守军不可轻视，要攻占基隆至少需增兵 2000，便率队撤退，鲁汀号、维拉号分别驶向上海、马祖，留下拉加利桑尼亚号监视基隆港。

基隆保卫战是法国侵略者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的第一仗。基隆首捷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清政府拒不赔款的立场，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马尾丧师

法国鉴于基隆受挫，便把进攻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疏于防备的福建马尾军港。1884 年 8 月 22 日，孤拔即在马尾海港接到了发动进攻的命令。第二天上午，孤拔向何如璋和张佩纶

投递了最后通牒，限福建水师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何、张以昨日得到李鸿章电报告知议和已有进展，所以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仍继续听任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中午，何、张看到法舰已升待发，才开始慌张起来，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派人前往法舰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何如璋和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尽管有部分官兵临危不惧，誓死抵抗，也没能挽回全军覆灭的厄运。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达 700 余人。马尾造船厂也被炮击，一艘正要完工的快船被破坏。事后，法国军舰又沿马江从上游炮击两岸炮台。两岸炮台都是把大炮建在坚固的石灰眼里，只能向海面的一方发炮，对来自上游的敌人无法攻击，结果全被法舰轰毁。

马尾丧师三天之后，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法宣战，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令沿海各地加强战备，严防法舰入侵。到 9 月上旬，清政府又令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激励各军奋勇抗敌，并将继续坚持和议的张荫桓等六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

台湾保卫战

1884 年 9 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再次进犯台湾，强占了基隆。刘铭传被迫率部退守淡水，认真布防。10 月 1 日，孤拔亲率舰队驶逼淡水港外，次日炮轰淡水炮台，被守军击退。

孤拔不甘受挫，于8日晨再次炮轰炮台，并有800名法军强行登陆，扑向炮台。刘铭传挥师杀敌，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打死法军17人，打伤49人，其余纷纷逃回海上；因争相上船而掉在水中淹死的又有七八十人。参加这次战役的一名法国军官说：“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大家的谈话总不能脱开这么令人伤痛的话题。”

为了迫使台湾军民投降，孤拔宣布自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封锁，并执行交战国的一切权力。同时，法国还怂恿日本也对华宣战。当时中日关系因朝鲜问题正日趋紧张，法国企图联日侵华，进一步对中国增大压力，并使用日本的港口。由于日本尚无作战准备，法国未能得逞。

面对法舰封锁，刘铭传多次电请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前来解围。李鸿章仍按兵不动，还说：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难与之敌”。大陆军民痛恨李鸿章见死不救，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法舰封锁，奔赴台湾抗敌，或向台湾运送物资。正在福州前线布置战事的左宗棠，在没有轮船运输、没有海军护送的情况下，派王诗正率三营亲军乘坐渔船东渡援台。记名提督聂士成主动请缨，亲率850余名淮勇从山海关登船启程，直奔台湾。随后，南洋大臣曾国荃也在几经犹豫之后，抽调五艘战舰援台。但在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遭孤拔舰队拦截，二舰被击沉，三舰被迫返回。此外，香港的中国商人也拒绝卖给法人食物，码头工人拒绝搬运法国货物，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战舰，并计划把法舰焚毁。焚舰计划虽在香港英国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下没有成功，法舰却不敢再在香港停留，拖去日本修理。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驻防清军严守淡水，并

在基隆河上游北岸的三角地带与冒死赶来的聂士成部和王诗正部齐心合力，联合当地土勇坚持斗争4个多月。为了在基隆山地消耗法军的有生力量，刘铭传还短衣草履亲临前线，与士兵同饮共食，提高了守军的士气，几次击退自基隆向台北进犯的法军，保住了台北。

孤拔在封锁台湾的同时，又率舰队骚扰浙江镇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早在镇海海口严密布防，钉上木桩，沉下石船，虚其中以通出入。口外设水雷，并在各要隘密布地雷；在南北两岸增修长墙，添筑炮台，分兵扼险驻守。欧阳利见还亲驻南岸行营，督率兵勇奋战。沿海渔民也自动协助查获奸细。1885年3月1日，法舰炮轰镇海宝山炮台。守将周茂训当即开炮还击。双方发炮至数百发，法舰受伤而退。3日，法舰再招宝山，守备吴杰指挥兵勇再退法舰。第二天深夜，风雨交加，法舰乘机用小船偷袭港口炮台，又被守军击退。鉴于几次失利，法舰不敢冒险入口，于14日改在口外遥轰炮台。由于炮台已事先“换石为土”，炮弹入土，不易发挥威力，损失不大。孤拔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镇海军民日夜严阵以待，直到战争结束，法舰虽“欲蹈瑕伺间，以图一逞，卒不可得”。

中法船头、郎甲之战

法军在台湾北部的进攻受到挫折后，为逼使中国政府恢复有利于法国的谈判，在越南北圻战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1884年10月，波里也率法国第一、二旅主力进攻谅山以北的船头、郎甲，企图夺取战略要地谅山，直接威胁中国边境。尼

格里率法军第二旅为第一梯队，分两路进攻船头和郎甲；波里也率第一旅部分兵力为第二梯队，位于谅江，以备机动。10月6日，法军上校端尼埃率第二旅1000余人，搭乘军舰5艘，拖船10余只，沿陆南江进攻船头，到达船头西南20里的尼村时，遭到清军苏元春部的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清军抢先进入阵地，两面夹击法军。总兵陈嘉两处负伤，裹创力战，督军杀敌。法军混乱，被迫撤退。10日，法军得到增援，又发起进攻。久威利埃上尉指挥两个连，突入清军船头外围阵地。陈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拼力抵御，亲率另一部兵力，迂回攻击法军右翼，清军表现英勇，战斗十分激烈。法远征军参谋官黎贡德描述战斗境况时写道：“情形益见危急，中国军只离我们几步了，人数总是比我们多，放出激烈的炮火，发出凶猛的喊声。”“这时，久威利埃上尉为要脱出敌军的包围，乃下令冲锋。……他身中两弹……又中了第三弹，他倒毙了。数名跟他前进的兵士通被击毙；不可能去寻找他们的尸体。”端尼埃上校组织炮火猛烈轰击清军，无济于事；又派出两连兵力增援。也被清军击退，久威利埃率领进攻的两连法军大部被歼。船头一战，歼敌200余名，军民士气为之一振。

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的另一路2000余人，于10月8日进攻郎甲，约9时半，法军先头连与清军方友升、周寿昌部接战，双方展开激烈射击。尼格里一面派兵增援先头连战斗，一面占领郎甲村外的圆丘高地，并将炮兵移置丘顶，令纵队主力在圆丘的脚下和南坡，分成两线展开，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包围郎甲的守军。清军依托壕沟和围墙，与敌激战。

在郎甲以北的方友升、周寿昌组织强大兵力，对包围郎甲之敌进行反冲击，企图夺取法军炮兵阵地，解救被围部队，但两次反冲击均未成功。法军乘势攻击方友升、周寿昌部。方、周稍做抵抗，即丢下郎甲，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撤退。法军集中兵力，围攻郎甲，守军顽强抵抗，反复冲杀，与法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15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此战清军损失700余人，法军伤亡100余人，法军夏贝衣中校、勃兰特上尉毙命，第二旅司令尼格里受伤，由波里也兼统第二旅，以一部兵力驻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郎甲失败的消息传到船头后，苏元春只得放弃船头，率部撤至谷松一带。东线桂军失去郎甲、船头之后，陷于被动，使清军收复北宁、河内的反击作战，受到较大的挫折。

中法谅山之战

正当西线滇军、黑旗军在宣光城下同法军鏖战之时，东线桂军进行了补充，调整了部署。苏元春、陈嘉率部18营，守谷松为中路；记名提督杨玉科、方友升率9营，守观音桥为西路；王德榜率楚军10营，守车里为东路；总兵叶家祥率淮军5营，总兵董履高率桂军5营，驻守谅山为后应。此外，还有副将马盛治率桂军6营驻守新街，防敌出太原攻高平。东线清军总兵力共50余营，2万余人。为策应西线清军围攻宣光，清政府命潘鼎新督军进攻法军。潘鼎新历来怯敌，畏缩不前，仅组织小规模出击，虚作姿态。1884年12月15日，苏元春率部分官兵南进，16日在纸作社与法军巡逻队接战，苏部以优势兵力三面夹击，歼敌百余人，获得小胜。12月底，王

德榜率部进至丰谷，原计划与苏元春协同进攻船头之敌，苏元春部未如期会齐。1885年1月3日，法军4000余人进攻丰谷，王德榜部独陷重围，激战2日1夜，将士伤亡近千，未得援兵助战，败退车里。潘鼎新十分惊慌，抽出驻谅山的淮军两营，进驻那阳，以殿各军后路，并请求清廷派兵增援。清廷传旨张之洞催促冯子材、王孝祺两军迅速到防。冯子材以8营兵力，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助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一部和王孝祺部抵龙州。

1885年1月，法国政府再次增加战争拨款，增调8000军队到越南。1月底，法军统帅波里也率第一、二旅1万余人，在船头集结完毕。2月3日，法军以尼格里将军的第二旅为第一梯队，以约翰尼奈利上校的第一旅为第二梯队，由船头、陆岸进至坚老。4日，法军全力进攻中路陈嘉部在竹山的阵地，同时以一部兵力佯攻东路王德榜楚军。陈嘉率部抵抗，苦战两日，撤回谷松，6日，法军占谷松。苏元春同法军奋战数时，撤至委坡。随着中路清军的败退，东西两路也相继撤退，谅山危急。潘鼎新惊慌失措，调度失方，号令一日数更，“谷松急，潘三日十调，屡更改，先远敌，继近扎，中远捣，又回援，奔驰不及”，使王德榜、苏元春、杨玉科等部无所适从，过劳兵力。12日，法军占委坡，潘鼎新弃谅山逃入关内。13日，法军轻取战略要地谅山。前线各军见主帅先遁，纷纷撤退，苏元春部入关到幕府，王德榜部撤退至油隘，杨玉科部绕道退守文渊。波里也在取得东线作战胜利后，于17日抽调第一旅3000余人，经河内赶赴宣光解围。23日，尼格里指挥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死力抵御，杨玉科亲临一线指挥，不

幸中弹牺牲，该部溃入镇南关，潘鼎新化装逃到凭祥，连夜退避距镇南关约百里的海村。日在岸，夜住船，随时准备再跑。前线各部群龙无首，溃不成军。法军占领文渊后直达镇南关，法探骑深入关内十余里，未遇任何抵抗，祖国南大门洞开，边疆万分危急，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就在这诸军败退、人心惶惶的危难关头，爱国老将冯子材率部迎难而上，向镇南关挺进。2月25日，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率部进驻凭祥。他广集溃勇，编组营伍，团结众将，严肃军纪，安定民心，被众将公推为前敌主帅，湘、淮、桂、奥各军，愿受节制。他对诸将说：“法兵不灭，无国就是无家，大家要努力用心，保卫国家。”镇南关前线恢复了统一指挥，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观。

法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和附近工事之后，退守文渊、谅山。撤退时在镇南关废墟上竖立一个木牌，上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这种蔑视中国民众的狂妄态度，激怒了中国人民，当地军民也在同一地方竖起一个木牌，上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清军谅山战败，前线主帅潘鼎新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清军有优势的兵力，据有利之地势，潘鼎新将2万余兵力，分散部署在数十里的正面上，纵深百余里，分兵把口，各自为战，没有构成防御的重点地区和坚强的防线。特别在危急之时，潘鼎新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师弃城，保命逃生。谅山失败，导致宣光撤围，法军直接威胁中国滇、粤边境。清廷对此十分震怒，将潘鼎新革职拿问。

临洮大捷

1885年3月9日，岑毓英派王永山率部千余人开赴缅甸，沿途有1600余越南民众加入滇军行列。由于王永山部突至缅甸，法军猝不及防，滇军奋勇攻击，收复缅甸和清水、青山两县。

法军缅甸失守，即分两路由兴化进攻临洮，一路4000人包围山围社的李应珍、韦云青各营；一路2000余人进攻珂岭浮桥。当时驻守在临洮的清军有云南苗、瑶、壮族首领竹春、陶美等率领的民族军，为第一梯队，在临洮以东占领阵地；刘永福的黑旗军为第二梯队，驻守临洮；道员汤聘珍、岑毓宝率领的滇军为第三梯队，在黑旗军之后。各队均构筑壕沟、连环相扣，互为策应。3月23日上午9时，法军1000余人，首先攻击竹春营地。竹春、陶美率领各族战士，英勇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傍晚，由当地越南人民组成的临洮义勇队，在浮桥边高声呐喊，封锁法军退路，滇军和黑旗军乘势从两侧包抄夹击。法军苦战一天，欲攻不入，欲退无路，丢下武器，狼狈逃命。同一天，法军4000余人在山围社附近包围了李应珍、韦云青部。李应珍督饬兵勇伏地不动，等法军逼近时，拉响地雷。轰毙法军甚多。过一会法军又继续逼近，清军突然开火，枪炮齐鸣，给敌人大量杀伤。24日，覃修纲率3000余援军赶到，从法军后面攻击。越南地方官张文擎、陈春耘的部队亦奋力合击，大败法军，毙敌600余名，给法军以严重杀伤。

法军临洮大败。凶锋受挫，退守鹤江、越池一带。滇军

各营在越南军民配合下，乘胜反攻。4月5日，滇军韦高魁部进攻黄岗屯法军。与越南阮绘部协同作战，斩贼数十名，贼力竭，退入兴城。同一天越南张文擎、阮廷合、潘文泊的队伍，乘夜由临洮渡河，次日晨进攻广威府，与法军激战，歼敌百余人，收复广威。8、9日，滇军王玉珠所部出其不意，连克燕毛、凌霜、洞山、安德等法军四座营寨，又协同汤宗政、黄功泳部进攻梅枝关，法军溃败，遂破关，收复不拔县。李应珍会同越南山西副领兵阮文如，进攻鹤江、越池。法军弃营撤退，鹤江、越池光复，越南山西布政使阮文甲也率部收复永祥府。

随着缅甸、广威、不拔等府县的收复，通向山西、宁平、南定的道路已经打开，为了乘胜制敌，岑毓英将原包围宣光的滇军重新作了部署：移提督何秀林一军守道岸、安平府各隘，游击张世荣守河阳一面之寒莽、白木、安隆州各隘，提督杨国发、刘兴仍守浪泊、珂岭各隘，继续临视宣光之敌。其余各营由丁槐率领，出奇兵直插不拔、广威，沿途广招越南兵民参战。奠边府知府刁文撑及三个儿子，各带义军数百，愿随丁军作战。越南黎秀英、黎英明等，自告奋勇，领兵为丁军打先锋。山西、河内、兴安、宁平、南定各省的义军，共举义旗，共迎清军。岑毓英计划以丁槐部为主力，在越南义军的配合下，分兵渡河，先取宁平、南定、兴安，使山西、河内不攻自破，西线形势十分喜人。

镇南关大捷

1885年2月25日，冯子材率萃军前九营驰赴距镇南关

23 里的扎板山，又亲踏营地，率部移驻距关 10 里的关前隘。冯子材决心在关前隘地区，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实行坚守防御，待有利之机，进行反攻，击败敌人。

关前隘据镇南关通往龙州之要冲，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西面有凤尾山，也叫西岭；东面有大、小青山，也称东岭。两山相峙，中夹一条宽二三里，长四五里之盆谷。两岭均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在关前隘南各伸出一个东西相向的横岗遮断盆谷。两岭横岗连接处，形成一个隘口，南北大道均需经隘口穿盆谷而过。冯子材亲督将士在突起的横岗上，用土石修筑了一条长 3 里、高 7 尺、底厚一丈的长墙。墙上开有栅门，墙外挖宽 4 尺之深沟，在长墙北 1 里处，又筑立一条平行的土墙，也有栅门通向后方。两墙之间设有帐篷、仓库、工事和指挥台，构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东西两岭上，构筑大量大型堡垒，占据主要山头，踞高临下，对守者十分有利。小青山向南延伸到长墙之外，是主阵地的依托，长墙的屏障，是我必守、敌必攻的作战要点。冯子材在相连的 5 个山头上，各筑一个大型堡垒，和许多小堡垒，以作拱卫。大青山是关前隘地区的制高点，冯子材对在这里修筑有更大的方形堡垒，既可坚守，又可屯兵，是主阵地侧后的屏障。凤尾山的主要山头上，也都筑有堡垒，形成对主阵地右翼的保障。从凤尾山向南延伸，地势渐低，到地平面处，为龙门关，有向西斜出的偏道通往扣坡。关前隘的有利的地形，坚固的防御阵地，使清军占天时，得地利，进可攻，退可守，处于主动地位。冯子材在这里同法军展开决战充满胜利信心，他兴奋地说：“吾可立于不败矣！”

3月上旬，清军集中90余营，4万余官兵，在镇南关至龙州地区，组织防御，以阻止法军沿镇南关、凭祥向龙州进攻。第一梯队由冯子材萃军10营和总兵王孝祺勤军8营编成，配置在关前隘主要防御阵地上，萃军集中守长墙和东岭，勤军守西岭。冯子材的指挥部设在长墙内东岭半坡上。第二梯队由苏元春毅新军10营和陈嘉镇南军8营编成，配置在关前隘北5里之幕府村。总预备队由记名提督蒋宗汉广武军10营，记名提督方友升抚标亲军4个营编成，配置在关前隘北30里的凭祥。在关前隘主阵地左翼由王德榜楚军10营驻守油隘，右翼有游击杨瑞山、都司麦凤标率领的萃军5个营固守扣坡，后补道魏刚鄂军4营守茆封。潘鼎新10个营、萃军3个营留守后方的海村、龙州。唐景崧4个营、总兵马盛治6个营分守高平和牧马。冯子材集中主要兵力于法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形成多梯队大纵深的防御体系，并握有强大的预备兵力，使防御具有坚韧性。在主要防御方向的两翼，有较强的兵力掩护，既可防敌向凭祥、龙州迂回，又可随时支援主要方向作战。特别是在高平、牧马驻有6个营清军，保障了东线清军与西线黑旗军和滇军联系的通道。经过冯子材的精心谋划和前线军民共同努力，祖国南大门重新建立起来了，给敢于侵犯我国的法国侵略军布下了天罗地网。

企图向我广西龙州进攻的法军第二旅的兵力有：143团第1营，111团第1营，外籍军团第2、3营，23团第1营，萨克雪炮兵队，罗北炮兵队，马丁炮兵队，辎重队等2000余人，大炮10余门。其主力配置在文渊（同登）、谅山地区。法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清军，但在兵力上是劣势，且以谅山为

后方基地，战线过长，补充供应十分困难。法军第二旅司令尼格里在3月17日给波里也电报中说：“我估计有4万至5万人数的中国军驻扎的国境上，在龙州与同登之间。谅山与龙州间的距离为100公里。攻取龙州比谅山困难得多。”18日尼格里再次打电报给波里也说，“我认为进攻敌人这样的阵地是艰难的事体”，“在我们现刻所处的地位，我们不应当取攻势”，“如果部长定要威胁龙州，照我的意思，我们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然而，茹费里为了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胁迫清朝政府妥协，仍然命令法军进攻龙州。

1885年3月11日，冯子材接到越南人民的密报，法军将出扣波，袭芄封，攻牧马，绕过镇南关，切断唐景崧、马盛治两军归路。冯子材看到了法军这一行动对清军的严重威胁，急调苏元春一部和魏刚军赶赴芄封，又调龙州的萃军5个营到扣波迎敌。13日，法军到达芄封，清军有备，法军已失先机而惊走。同日，萃军达扣波，拦击法军，获战象一匹、象兵一名，法军退回文渊。18日，法骑兵进攻扣波，又遭痛击，狼狈逃窜。由于冯子材及时果断地调集兵力，先期占领芄封、扣波，粉碎了法军迂回威胁龙州的企图。

3月19日，冯子材又得到越南人民密报，法军定于22、23日入关攻取龙州。冯子材先发制人，于21日夜率军袭击文渊之敌。冯子材亲率萃军为主攻，从关前隘出发，由北面攻击，王孝祺勤军为后应；王德榜楚军从油隘出发，由东面攻击。驻文渊的法军夜梦中听到枪声，还以为是援军到达，当子弹打到屋顶时，方才明白这是清军的攻击。清军将士奋不顾身冲进街里，与法军展开激战，立破三座敌堡中的两座。法

军拼命抵抗，双方均有伤亡，天黑军疲，各暂收兵。22日天亮后，冯子材又调来扣波之萃军一部，从西面进攻，苏元春派兵应援。自晨至午，毙伤法军多人，午后清军各部撤回原地。此战清军主动出击，重创法军精锐，迫使尼格里不等援军到齐，就向清军坚固筑垒地域发起攻击。

23日晨，尼格里率法军第二旅进攻清军关前隘阵地。第一梯队由143团第1营，111团第1营，外籍军团第2营（狄克营），萨克雪炮兵队编成，共1100余人，大炮10门。尼格里亲率143团第1营和狄克营沿东岭向小青山、大青山方向实施主攻；以111团第1营沿大路向长墙助攻，企图在主力夺占大、小青山后两路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阵地。预备队由外籍军团第3营（寿非营）、罗北炮兵队等1000余人编成，由寿非少校指挥，配置在镇南关东南高地，并担任向油隘方向警戒。23团第1营、罗北炮队1部，由哥达少校指挥，驻守文渊，担任扣波方向警戒，并保障其后方交通线。18时30分，大雾消散，法军在大炮的掩护下，向小青山清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清军殊死力战，经过几小时的争夺，法军占领了小青山三座堡垒。冯子材在危急关头，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将士们在冯子材爱国热情激励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苏元春、陈嘉、蒋宗汉、方友升率部来援，加强东岭的防御。法军集中兵力火力急攻长墙东头的四号堡垒，战斗极为激烈，死伤相当。王德榜楚军由油隘出击法军右翼侧后，牵制了敌预备队的机动。提督张春发率队截击敌人运输队，破坏法军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岭战斗。入夜，法军暂停进攻，组织

运输队紧急抢运弹药。清军乘机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军坚守长墙，王孝祺部仍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小青山，蒋宗汉、方友升部守大青山顶峰。冯子材派人飞驰扣波调杨瑞山、麦凤标率部抄袭法军左翼，选派 300 名敢死士潜伏在长墙外的沟渠草丛之中，当地群众连夜挑水送饭，赶运弹药；士兵们磨刀擦枪，整修工事，严阵以待。前线的中越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24 日晨，尼格里派爱尔明加中校率法军一部，利用大雾作隐蔽，迂回偷袭大青山顶峰，企图突然夺取大堡，控制东岭制高点，然后前后夹攻，击溃清军。由于地形复杂，无路可行，爱尔明加费了 5 个多小时，毫无结果。尼格里以为偷袭成功，命令炮队掩护 111 团 1 营，正面攻击长墙守军。冯子材传令各部统领：“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当法军接近长墙时，冯子材手持倭刀，大呼一声，跃出墙外，其子冯相荣、冯相华紧随。将士们随主帅一齐涌出长墙，冲入敌阵，隐蔽在墙外壕沟草丛中的敢死队，从敌群中杀出，杨瑞山、麦凤标率领援军，冲出龙门关，突然攻击法军侧后。当地人民群众和部分零散兵勇，主动前来助战，在长墙前面的盆谷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清军以己之长，制敌之短，把法军打得晕头转向。这一战斗中险些丧命的法军 111 团第 2 连指挥官威底埃上尉惊恐地说道：“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 10 倍、20 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官军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路法军 111 团第 1 营 300 余

人大部被歼。下午3时，清军发起反攻，陈嘉、蒋宗汉率部夺回东岭的三座堡垒。王德榜军先击溃敌增援部队，消灭法军运输队，接着从法军右侧后夹击东岭之敌，配合陈嘉、蒋宗汉部全部夺回了被敌占领之堡垒。王孝祺军击退向西岭进攻之敌，由西包抄敌后。冯子材率部从正面出击。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不及，粮弹将尽，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狼狈逃回文渊，冯子材指挥各军追出镇南关，深夜收军。这一战歼灭了法军精锐近千人，不仅使东线清军反败为胜，而且使整个中法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军中校爱尔明加惊呼：“我从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有这么坚强的组织，打得这么好。”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不给敌喘息之机，冯子材指挥清军实施反攻，乘胜追击法军。3月26日，亲率萃军和勤军出镇南关，进攻文渊，令王德榜军由小路抄袭敌之右翼。文渊法军倾巢齐出，竭力拒战，清军将士愈战愈勇，法军头目中弹落马，余众溃散，冯子材指挥大队冲入街里，克文渊，又挥军分路追击，27日到界牌，距谅山仅15里。

尼格里企图依靠其4500兵力，坚守谅山，等待援兵，再犯镇南关。他以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高地，以一部兵力配置在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冯子材决心乘胜攻夺谅山，他认为，“贼之精锐及枪炮等多聚于谅山省城，其焰尚未衰熄；且谅城为越南距边要省，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在战术手段上，“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见功”。他与苏元春、王孝祺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27日，冯子材派杨瑞

山率部绕道而进，乘夜渡河，由小路抄至谅山，散伏城外。28日，冯子材、苏元春率主力正面进攻，王孝祺部和冯军一部，从西面进攻，王德榜部从东面进攻，三路一齐逼攻驱驴。法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负隅顽抗，清军正面攻击受阻，尼格里调动兵力向威胁最大的东面楚军反击，王德榜率部抵抗。冯子材乘法军调整部署向东反扑之机，猛攻正面，夺取了驱驴北面的高地，西面王孝祺部也攻占石洞堡。尼格里身负重伤，爱尔明加中校接替指挥，他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清军乘势冲进驱驴。谅山之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未及过河的法军，溺水逃命，溺死者甚多，法军丢弃大批装备物资，于深夜撤出谅山。埋伏在城外的杨瑞山部，乘乱攻入谅山城，法军残部狼狈逃窜。29日拂晓，清军主力徒涉淇江，胜利入城，谅山宣告克复。28日晚11时30分，波里也从河内向法国政府发电报说：“我痛苦地报告你，尼格里将军受重伤，我军撤出谅山。中国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地涌出三个纵队，势不可当地攻击我军在驱驴前面的阵地。爱尔明加中校，在这敌军数量的很大优势面前，又以弹药告尽，通知我，他不得不后退至谷松和屯梅。”

法军总司令波里也对爱尔明加丢失谅山极为不满，命令他停止撤退，坚守屯梅、谷松，爱尔明加仓促转入防御。冯子材占领谅山后，继续挥师南下。3月30日，东路陈嘉、王德榜、魏刚军合力猛攻谷松。同日，西路冯子材、王孝祺军在越南抗法武装的配合下，夜袭屯梅，爱尔明加慌忙率部逃到谷松，与寿非部会合后又撤至船头，法军在屯梅、谷松的防线又被粉碎。31日，东路各军尾追敌人到船头，西路大军

也攻下观音桥，抵近郎甲。这时，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已取得临洮大捷，正向兴化推进，唐景崧所部桂军准备出牧马攻太原。广东方面派兵出钦州，沿东海岸进攻广安。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所部 30 余营，正向龙州前进。越南抗法义军活动频繁，给法军很大牵制。河内、太原、海阳、西贡等地人民也纷纷酝酿起义，盼望清军早日南下，赶走侵略者。为了继续发展大好形势，冯子材决定于四月中旬，亲率大军，乘胜攻击北宁、河内。就在这个重要时候，清廷下达了停战撤兵命令，使冯子材的进军河内的计划未能实现。

镇南关之役，在我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是打得最为漂亮的战役之一。这次战役获胜表现了冯子材高超的指挥艺术。他针对清军兵力占优势、装备是劣势这个基本特点，采取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粉碎敌人的进攻，尔后转入反攻的作战方针。他充分调动中越广大军民作战的积极性，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发动民众支援战争，使这次战役的胜利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严格约束部队，团结各军将领，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效力用命，形成了统一集中的指挥。他集中优势兵力，掌握强大的预备兵力，采取主动出击，夜间袭击，阵前伏击，近战歼敌，包围迂回，连续追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手段，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这是冯子材的意志、胆识、才能和献身精神的集中表现。同样的队伍，同样的武器装备，同是原班将领在原来的地区作战，在徐延旭、潘鼎新指挥下，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而在冯子材指挥下，则连战皆捷，收复失地，威振四方，这就不难看出战役指挥员对战役的胜利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

三、《中法新约》的签订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引起了法国统治者的巨大震动和惊慌。3月30日，对茹费理内阁久怀不满的法国人民成千成万地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包围议会，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茹费理内阁于当天晚上倒台。

然而，正当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竟向战败的法国求和，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线停战。

原来，李鸿章等人在清政府被迫宣战后，虽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公开地进行求和活动，但暗中仍不断散布法国惯于“困愤添兵”和“不胜不休”的妥协舆论，多次建议慈禧太后适可而止。慈禧太后、奕譞等人担心战争长期打下去会激起“兵变”或“民变”，也希望能够寻找机会与法国议和。自1884年10月以后，李鸿章就在慈禧太后等人的支持下设法继续与法接触，或明或暗，一直没有停顿过。

对李鸿章的乞和，法国开始断然拒绝。但到1885年初，法国改变了态度。当时，法国正大举侵略马达加斯加，已在那里陷于困境；同时又为争夺埃及，和英国大有火并之势；侵入越北和中国的法军又不断受挫，一时难以取胜。茹费理内阁内外交困，疲惫不堪，开始愿意在有利于法国的条件下，尽快与中国议和。为此，它曾作出种种状态，诱使清政府进行谈判，诈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英、美、俄、德等国为了本身的利益，这时也都争相“调停”。他们深知结束战争的关键在于满足法国的贪欲，因

此群起压迫清政府向法国妥协。俄国见对华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内政、外交和财政上的重重困难，唯恐其盟友因对华作战失利而被削弱，使它在欧洲失去牵制德国的力量，曾多次威胁总理衙门尽快向法国妥协。德国在法国侵略中国本土以后，虽然一改幕后支持而为公开撑腰，但它不希望法国将侵华战火扩大到东南沿海，以免引起英国不满并迁怒于己，因而也劝告中国对法妥协。美国为了在东南沿海扩大贸易，并防止法国占领自己久已瞩目的台湾，几次通过驻华公使杨约翰煽动总理衙门及早结束战争。拥有对华贸易绝对优势的英国，这时既恼怒法国违背承诺炮击东南沿海，影响了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又担心抗法斗争的胜利会鼓舞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意志，急欲插手干涉。它公开反对法国扩大战事，强硬表示：“不希望中国市场由于长期战争而枯竭！”法国看到英国态度聚然强硬，又因国内已出现了兵员短缺、财政匮乏、政局不稳等许多困难，表示愿意接受英国的调停。于是，英国政府便在1885年1月初，借法军攻占谅山之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授意总税务司赫德在中法之间奔走。一直对德璀琳插手中法谈判耿耿于怀的赫德，这时抓住机会建议总理衙门，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干，让他借到巴黎交涉中国海关巡逻艇“飞虎”号在台湾海峡被法国海军劫走一事，面见茹费理，直接为中法两国进行疏通。清政府对赫德、金登干和茹费理的秘密联系十分信赖，镇南关的失守又使其对战争能否取胜失去信心，便于1885年2月27日正式授权金登干代表中国与巴黎外交部进行秘密议和。镇南关大捷前夕，金登干同法国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赫德唯恐清政府变卦，一面不断以长期作战会引起国内“民变”和列强干涉来恐吓清政府，建议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一面电促金登干相机行事，设法签字，造成既成事实。清政府在镇南关大捷后，对议和之事曾有过犹豫，担心军民反对，也怕一些大臣不满。但李鸿章等人却主张“乘胜即收”，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慈禧太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意乘胜求和，并于4月4日授权金登干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议定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在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对此，连法国政府都感到非常意外，惊呼“简直不能想象”！

4月7日，清政府命令前线各路军队于4月15日停战，25日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拔剑斫地，恨恨连声”。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说：“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并令张之洞“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惟该督是问”。冯子材、王德榜被迫奉令撤回。冯子材在停战开始的时候，给张之洞一个电报，请他上摺“诛议和之人”，表达了抗战将士的共同愿望。

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先后通电谴责和议。一些爱国人士把清政府给冯子材的退兵令比作南宋初年秦桧命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有的还赋诗填词，抒发对“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

哀”的悲愤。这类爱国诗词在当时很多，被人们争相传诵。

清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6月9日正式签订《中法新约》。条约规定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越南北圻的边界，中国以后需要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并同意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进一步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战争，但转眼之间却被清政府的妥协投降路线葬送。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使先进的中国人日益感到亡国的威胁，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四、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恶活动

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建造教堂的特权，大批传教士便涌入中国，到19世纪末，已达3300多人。在他们之间，许多人是虔诚的传教者，但也有不少传教士却干着与他们身份极不相符的勾当，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他们不但搜集情报，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甚至直接参与军事、政治侵略。外国传教士往往以“中国通”的资格，不仅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中充当翻译、秘书、向导，而且在迫使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成

了西方侵略者的重要帮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和英国的小马礼逊是从战争开始，直至签订《南京条约》的直接参与者，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们代表璞鼎查，对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几次进行讨价还价，向清政府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则是美国逼签《望厦条约》的顾盛使团的重要成员，直接策划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传教士固礼在北京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并通过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给英法联军；法国传教士德拉马作为翻译，不仅参加了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还私自在条约中文本上加添传教士可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

一些传教士还包揽诉讼，强占民田，为害乡里。外国传教士仰仗治外法权的保护，网罗教徒，勾结恶霸地痞、流氓，包庇、纵恿不法教徒，致使“凡奉教之人，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凡有讼词，教则必伸，非教必屈”。而且，传教士不论有无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山东传教士还公然冒充巡抚向地方官下令，要他们服从教堂指示，有的教堂、传教士竟私自设卡征税，发卖执照，甚至修筑碉堡，建立武装，私设法庭，俨然成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这些都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全国各地，凡有教堂的地方，几乎都发生过传教士勾结地方官吏，用强买、强占、诈骗等手段霸占人民田产、房产的事件。各地教会无不“广置田宅、经营蓄息”，许多教堂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庄园。

传教士的种种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愤慨

和反抗。由于外国教会侵略势力已成为中国人民普遍憎恶的对象，就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反击。因此，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成为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反洋教斗争从 19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了，首先是从偏僻的贵州兴起，此后便迅速扩展，逐渐遍及全国各地。据统计，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发生大小教案约 200 起左右。主要有：

南昌教案

咸丰十一年（1861 年），法国天主教士罗安当在总理衙门取得执照后，凭藉《天津条约》为护符，在江西南昌强行索地、要房，扩大传教，从而激起民愤。第二年，湖南豪绅公议驱逐天主教，撰《闾省公檄》，指出天主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甚至有采生折割等事。”消息传至南昌后，引起哄动，议论纷纷而起。人们连夜翻印檄文，在交通要道广泛张贴。3 月 17 日，南昌群众捣毁了育婴堂和一座教堂，连罗安当的坐船也被毁坏，罗安当乘夜逃去。事情发生后，法国公使到总理衙门大施恫吓，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地方官要以宾礼相待传教士，并要求总理衙门行文咨照两湖、两江总督及湖南、江西巡抚，“饬禁所属官员及士民人等，以后不得仍蹈前辙，否则惟该省督抚是问。”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楨鉴于贵州教案的交涉，也自知保护外国教会不力，自请交刑部“严加议处”。湖南、江西两省地处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所及地区，而清政府急欲勾结法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以一面对法国公使提出的无理要求全部答应，一面要求地方大吏“曲体朝廷不

得已之苦心，当于羈縻之中，默寓防范之意，断不可操之过急，别构衅端”。清政府对法国的妥协态度，引起了南昌人民的强烈不满。当时正逢乡试，士子集会，考生便张贴匿名传单，订期齐集教堂与外国人论理。28日，考生和群众拆毁城内筷子巷教堂、袁家井教堂及城外五里庙地方教堂。靠近南昌的进贤县所属溪坡山村等处教民房屋也被拆毁。南昌的士绅领衔发布《扑灭异端邪教公启》，提出“中国金银，岂能填无厌之求”，“遍告同人，共伸义愤，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患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同时，出现大量各种匿名揭贴，谴责官绅不顾百姓，只知借外力威逼小民，决心不要官绅专靠自己进行斗争。但清政府不顾人民要求，竟拨付赔款，允许罗安当再到南昌兴筑教堂。同治二年（1863年）4月，罗安当乘船由九江欲再入南昌，南昌又出现大批了揭贴。罗安当的坐船刚驶到滕王阁下，他还没来得及上岸，群众已举起“禁止法夷入城”的大旗，纷纷向坐船抛击砖石，迫使罗安当折回九江。7月，在清政府的一再催促下，指令江西巡抚沈葆楨等以禁止反对教会、重建教堂、赔款1.8万银两等条件，与法国议结此案。

天津教案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又具体规定法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各地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天津作为

被迫开放的商埠，建堂传教活动颇为兴盛。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公使哥士耆授约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订立了《天津柴竹森法国租地条款》，选择了海河北岸三岔河畔望海楼一带作为教会堂址和传教据点。教堂建成后，法国传教士把建造教堂看作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成果，将教堂取名为“胜利之后堂”。法国传教士为建堂传教，一面讹诈豪夺百姓田产房屋，一面又收罗王三、武兰珍等流氓为教民，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拐骗幼童案接连不断，从而引起天津百姓的愤怒情绪。同治九年（1870年）夏，天津不断发生幼童丢失事件，随后，人们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教堂附设的育婴堂内，发现了三十多名死亡的幼童。几天后，拐骗幼童犯武兰珍被缉拿归案，在审讯中，武兰珍承认是受天主教堂指使做的。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民情汹汹，许多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停课，反对洋教的揭帖遍布大街小巷。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吏押带拐骗犯前往天主教堂查验，天津市民近万人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前等候结果，并要求惩办凶犯。传教士对此蛮横不理，并与民众发生争论，相互抛砖殴打。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后，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官兵镇压民众，崇厚没予理睬，只派几名官弁前去过问。丰大业得知后大怒，持枪赴崇厚衙门去质问，进行辱骂和恫吓，并捣毁了衙署的器物。随后丰大业的秘书西蒙又抓住一官弁的发辫逼其同往教堂，一路上大喊大叫，扬刀开路。途中遇见天津知县刘杰，刘杰劝其息怒，丰大业竟朝刘杰开枪，打死了刘杰的随从高升，西蒙又举枪向群众射击。在场群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打死丰大业和西蒙，并将尸体投入河中。之后，居民鸣锣聚众，冲

出育英堂救出被拐骗的儿童，放火烧毁了法国望海楼教堂和仁慈堂，以及英国的布道堂和英国的讲经堂，随后又烧毁了法国领事馆，打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官员 20 名。

事情发生后，法、英、美等各国驻华人员大惊。法国公使联络英、美、德、俄、比利时、西班牙驻华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威吓清政府，要求严惩凶手，并警告今后不许发生类似事情。随后，各国又开来军舰，集结在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实行武力威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代表各国提出抵偿损失，要求赔偿银数百万，惩办凶手，并要求驻兵天津大沽口，由中国支付军需费用。法国法军提督宣称，如果上述条件不兑现，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在法、英、美等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急忙命正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曾又奏调李鸿章协同办理。此后朝廷又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去天津协助。曾、丁查办伊始，就抱定天主教会是劝人为善的，他们是仁慈为名却反而遭到残酷诽谤，所以洋人才忿忿不平，至于拐骗人口则是社会上的流氓所为，似乎与教堂有关。但是眼下洋人势力很强，“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如此一来，他们认为这样的大案，总得缉拿四五十人，分别加以惩处，这样才保全与洋人的和善全局。然而经过两个月的查办，却找不出确凿的定案证据。曾国藩、丁日昌在 8 月下旬向朝廷报告时说：“自七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期限，昼夜追求，直至中秋节前，化得应正法者七、八人。”如果“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这样就完全凭意愿将 15 人判处死刑，后又增加 5 人，充军 25 人。此外，总理衙门在北

京赔款法国 46 万两银子，允许重新建造教堂。法国公使坚持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处死。曾国藩原本不想定他们的罪，此时出于无奈，只好把他们流放。与此同时，朝廷又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派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去法国赔礼道歉。天津教案以此告终。

贵州和其他地区的教案

1861 年，天主教主教、法国人胡缚理声言有《天津条约》保护，在贵阳强行传教。并袭用中国官吏仪制，乘坐紫呢大桥，盛设鼓吹仪仗，招摇过市。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密令全省各地官员，一旦发现传教惑人的教士，可以随时驱逐。田兴恕还指挥地方武装焚毁了青岩的天主教堂，处死 4 名教徒。次年，开州知府又捕杀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法国公使为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坚持要把田兴恕等处死，后来，清政府将田兴恕撤职发配新疆，并将提督公廨拨充天主教堂，赔款 1.2 万两，才算了事。

大足教案。四川大足县群众因外国传教士横行不法，曾在 1886 年及 1887 年两次拆毁龙水镇等地的教堂、房舍。1890 年 8 月，第三次建造的教堂竣工时，恰逢龙水镇传统的灵官会期将到，教会惧怕群众像前两次那样，在“迎神赛会”期间再次拆毁教堂，于是勾结官府下令禁止赛会，并派兵守护教堂。8 月 4 日，发生打死群众和烧毁民房事件，群众再次捣毁教堂。官兵进行镇压更激起人们义愤。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联合煤窑、纸厂工人及乡民数百人竖旗起义，攻入龙水镇，

捣毁各处教堂房舍，并转战各县，发布檄文，号召人民驱逐外国教会势力。后来起义队伍被分化，余栋臣率众撤出龙水镇，退至西山，继续斗争。四川总督刘秉璋以赔银 5 万两并缉捕“凶手”结案。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到中法战争前后，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除上面几个典型教案外，其它影响较大的还有 1862 年的江楚教案，1886 年的重庆教案，1865 年和 1868 年的四川酉阳教案，1868 年和 1891 年的江苏扬州教案，1874 年、1875 年和 1879 年福建延平教案，1891 年的热河朝阳教案等。

反洋教斗争在 60 年代大多发生在南方，组织程度较差，旋起旋散，规模较小。主要矛头是指向法国的天主教，斗争手段主要是拆毁教堂、驱除传教士，官绅及封建知识分子在斗争中起了倡导、组织和舆论作用。70 年代以后，反洋教斗争逐步自南而北，遍及全国各地，由于下层群众参加者日众，规模迅速扩大，斗争矛头不仅指向法国天主教，英、美的基督教会也成为反对对象。中法战争期间，群众还把反洋教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到了八九十年代，会党逐步取代士绅的领导地位，成为斗争的中坚力量。斗争手段也由民教械斗发展到武装起义。

中法战争前后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要看到，近代教案还包含了中西礼俗、文化的冲突，这就使得反洋教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盲目性、排外性，斗争方式也比较简单。

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

一、甲午战前的形势

《征讨清国策》

19 世纪末年，正在迅速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各资本主义强国，把侵略目光越来越集中到还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少数地区。中国和邻近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日本侵略中朝两国，蓄谋已久。还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从 70 年代开始，日本就急欲吞并资源丰富的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本土扩张。1876 年，日本海陆军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从此全面向朝鲜渗透，并与清政府激烈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 年，朝鲜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互相倾轧，发生了军事政变——“壬午兵变”。日本政府借口本国使馆人员遭受损害，大举进兵朝鲜。清政府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政府，派兵进入朝鲜，迅速平定了内乱。日本侵略军见一时

无隙可乘，便以赔偿损失为借口，胁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仁川条约》，获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镇压了政变。日本政府就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于1885年4月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与清政府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必须事先相互知照。这样，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地位，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权利，朝鲜被置于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从而为日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伏笔。

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1885年6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建议，除继续向朝鲜渗透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10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年，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制订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日本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其扩充军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890年，日本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日本

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这时更加迫不及待地想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军阀头子山县有朋就在这种气氛中被推为首相。他在施政演说中赤裸裸地把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台湾等地都说成是“与日本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有权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公开煽动侵华狂热。

为了扩充军队，日本从 1890 年就拿出 60% 的国家财政收入，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海陆军。当时，中国北洋海军 2000 吨以上的战舰有 7 艘，共 2.7 万余吨；而日本海军的战舰在 2000 吨以上的仅有 5 艘，共 1.7 万吨。日本政府以超过北洋海军为目标，把添置速射炮和购买最新的巡洋舰，作为发展海军的重点。1892 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 1885 年就开始的 10 年扩军计划。次年 2 月，明治天皇又决定以 6 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拨出 30 万日元，现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 1/10，补充造船费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 6.3 万名常备兵和 23 万名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 7.2 万多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此外，日本参谋部还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

面对日本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又矛盾重重，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战备和自卫。

首先在战备意识上，清朝统治集团中存在着差距和分歧。慈禧太后虽然在 1886 年就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进而于 1889 年“归政”光绪皇帝，但始终不忘揽权，并把朝内

和地方上的实权人物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慈禧太后通过醇亲王奕譞及其亲信孙毓汶等权臣把持朝政，虽对日本在朝鲜膨胀势力深感不安，但又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一直认为日本尽管虚张声势并不敢对华大动干戈。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成以后，他们更是有恃无恐，掉以轻心。奕譞等人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加紧笼络掌握军事外交实权的李鸿章，并建议挪用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

年轻的光绪皇帝自登基以来，一直是慈禧太后手中的傀儡和工具，就是在他“亲政”以后，也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处境，他依靠自己的师傅翁同和，集结了部分官僚，与慈禧太后争衡，时人称为“帝党”。帝党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和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翁同和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銓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士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人。他们中多为词馆清显和台谏要角，既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很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又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断利用“清议”来催促政府整顿弊政和备战自卫，话锋所指又常常集中到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不满奕譞等人阻挠北洋海军的建立，也赞许帝党改革内政的部分主张。但他一直把北洋海陆军作为淮系集团的支柱和资本，生怕有所闪失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因此不满帝党官员动辄“主战”、狂议伤身，又一向惧怕慈禧太

后，并与翁同龢不和，乃在政治上倾向后党，附和奕訢的私意，移拨海军经费，停购船械。于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成军后，再未增添任何船只，1891年以后又停购枪炮弹药。这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在日本舰队之后，而且舰龄老化，行动迟缓，火力也差，缺少快舰和速射炮，已在总体实力上与日本舰队相形见绌。

帝后两党的不和，既有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矛盾，也交织着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存在的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这些矛盾与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团结对敌和自卫决策，与上下一心并积极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政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战云密布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表面上极力诱使清政府出兵，保证自己“必无他意”，暗地里却在国内秘密下达动员令，作了出兵占领朝鲜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对日本虚伪的“保证”深信不疑，于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1500人去朝鲜，并按《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通知了日本。其实，日本早在接到通知以前，就于6月5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出兵朝鲜1万余人。入朝日军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并逐渐包围驻守牙山的清军，不时乘机挑衅。

面对日军在朝鲜的优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采取同一步

调，分别与日本驻京公使和驻朝领事反复交涉，建议两国同时撤兵，以求早日“收场”。但日本蓄意扩大事态，不仅断然拒绝清方建议，反而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内政“改革”的无理要求。

战争一触即发。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备战，解救牙山被围清军，阻止日军的武装侵略。北洋海军的广大官兵也要求立即投入抗击日军的战斗。光绪皇帝不仅“一力主战”，还借助国内舆论不断电谕李鸿章“预筹战备”，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日军的侵略。然而，李鸿章这时却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他再三强调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攻”则不足，如若出境决战，还必须大力“备饷征兵”。尽管光绪皇帝随即批拨白银 300 万两作为专款，让李鸿章尽心筹划，但李鸿章为了保全地盘与实力，仍不肯将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陆军轻于一试，又力主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希望依靠第三国的力量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慈禧太后既害怕日本的武力威胁，又忙于准备自己 60 寿辰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目前。她支持李鸿章的求和主张，让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

俄国从 19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觊觎中国的旅顺、大连和朝鲜的元山，进而想控制朝鲜半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俄国一直十分警惕新兴的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力图阻止日本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免妨碍自己称霸远东。但是，俄国担心日本倒向与其争霸远东的劲敌英国，又对其“极力拉拢”。这种情况决定了俄国长期以来对日本侵朝侵华的纵容态度。但到了 1894 年春天，俄国看到日本决意侵吞朝

鲜，已直接危及自己的利益，曾表示对此再“不能置身局外”，并“在朝鲜边境增兵，在海参崴集中舰队”。李鸿章也正是看到俄日两国间的这种利害冲突，特别希望能“联俄制日”，因此于1894年6月20日首先请求俄国驻京公使喀西尼电请俄国政府出面调停。喀西尼当即欣然答应，并希望清政府和俄国“彼此同心力持”。俄国政府后来还向清政府正式作出保证，说“俄韩近邻，亦断不容倭妄行干预”，已劝告日本撤兵，如不同意，将采用“压服之法”。李鸿章把这些空头许诺当作护符，仍不积极备战。日本在断然拒绝俄国劝告的同时，却向俄国保证日本出兵朝鲜是要解除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关系，不仅“无意”占有朝鲜，而且愿意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俄国见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又对日本的保证感到满意，担心继续劝阻会把日本推向英国的怀抱，便转而讨好日本，暗中支持日本在朝鲜扩大事态，伺机趁火打劫。7月9日，喀西尼奉命明确向李鸿章表示：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未使用兵力强勒日人。

李鸿章依靠俄国“调停”的希望已经破灭，又请求英国政府出面斡旋。英国为了和劲敌俄国争霸远东，有意拉拢日本阻止俄国夺取朝鲜、染指中国东北，而损害自己在华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日本的侵朝侵华活动，采取了支持怂恿的态度，在受李鸿章之请不得不出面“调停”时，也只是表面应付。日本政府了解了英国的真实意图，即以不与俄法结盟和开战后不侵犯英国势力最大的上海及长江流域一带为条件，进一步与英国达成了“谅解”。1894年7月16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

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并提高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显然，这是英国对日本侵华的重大支持。英国外相金伯理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

此外，李鸿章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德国作为后来强国，想利用战争在远东分到殖民地，不断在私下鼓励日本对华进兵。法国这时正在我国西南各省扩展势力，也希望利用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把列强的视线引向朝鲜和中国的东北。至于英国，这时正集中力量在太平洋扩展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所以扶植日本作为它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伙伴。因此，李鸿章求他们出面“调停”，不仅毫无可能，而且连续受骗，把驻朝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丰岛海战

日军决意开战，使驻牙山的清军处于非常危急的局面。1894年7月16日，光绪帝严谕李鸿章速筹战备，“断不可意存畏葸”，如果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贻误戎机，唯李鸿章是问。

李鸿章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已经破灭，方知非战不可。7月24日，一面电令牙山叶志超和聂士成速备战守；一面派出四支援军，开赴朝鲜北部平壤一带集结，令记名提督总兵卫汝贵统带盛军6000余人为第一路，从天津小站出发，由塘沽

乘船，于8月4日到达平壤；由总兵马玉崑统带毅军2100人为第二路，从旅顺出发经义州于8月4日抵平壤；由记名提督、总兵左宝贵统带奉军3500人为第三路，从奉天出发，经九连城，于8月6日到达平壤；由侍卫丰升阿统带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共2000余人为第四路，从奉天出发，于8月9日抵达平壤。为解救牙山之急，李鸿章又从天津抽调吴育仁部仁字营一部及天津练军2个营，共2500余人，由总兵江自康统带，经海道前往牙山，增援吐志超、聂士成部，“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挡一面。”清廷调往朝鲜的清军1.7万人，除了由招商局船只赶运外，另雇英轮“爱仁”、“高升”和“飞鲸”应急。为了保护海上运兵安全，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和“威远”3舰护航。24日，“爱仁”和“飞鲸”2轮共载清军1500人，先后在牙山内岛登陆。

日本大本营通过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侦知清军从海上赴朝的机密情报。大本营决定在海上袭击清军，破坏清军的增援计划。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接到大本营作战密令，全舰队于23日，从佐世保起航，24日抵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湾。伊东命令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吉野”、“浪速”和“秋津洲”3舰在牙山海面搜索前进，“且赋与内命，谓该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我方进行攻击。”

7月24日，清舰“威远”号奉命到仁川送电报，获知日军袭击汉城、劫持国王的消息，并从英国舰长罗哲士处得知日本军舰要袭击中国军舰的情报，“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感到

事态严重，立即命令“广乙”号随同“济远”回国。25日凌晨4时许，“济远”和“广乙”2舰由牙山出口。是日晴空万里，波平如镜，能见度良好，7点30分，当2舰驶抵丰岛海面，在前方突然出现3只军舰横海而来，审视之下，乃日本的“吉野”、“浪速”和“秋津洲”3舰快速巡洋舰。由于丰岛海面南阔北狭，不便于回旋作战，日舰为了把清军的舰只引诱到丰岛南侧海面宽阔处，再行攻击，故意向右 16° ，转舵东驶。“济远”号和“广乙”号以为日舰转向东去，不致寻衅，继续向前航行，当驶至丰岛南侧海面时，日舰突然转轮西下，掉头北向，以15节的速度，成单纵阵向“济远”和“广乙”2舰迎面扑来。7时45分，日舰“吉野”号首先开炮攻击“济远”号，“济远”发炮还击。日舰“秋津洲”和“浪速”号亦炮击“济远”。霎时间，炮声震天，硝烟蔽海。中日双方的舰只，不仅日军多一艘，而且，在军舰的技术性能和武器装备上，日军也优于清军。但“济远”和“广乙”2舰的爱国官兵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优势敌人的面前，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战斗一开始，日军集中火力，攻击“济远”号。7时56分，敌炮击中“济远”的瞭望台，大副都司沈昌寿脑裂阵亡，二副守备柯建章洞胸牺牲，水手员弁阵亡13人，伤40余人。

这时，“广乙”号乘敌舰猛攻“济远”之际，开足马力，驶近日舰，正准备用鱼雷实施攻击时，先被“秋津洲”一弹击中桅楼，日舰“浪速”号也向“广乙”号猛射，又击中舰桥，“广乙”舰的鱼雷发射管被击毁，死伤20余人。“广乙”号不支，向右转舵走避，“浪速”号尾追不舍，“广乙”号发

炮猛轰，弹穿“浪速”的左舷，穿透钢甲，炸断了备用锚，击碎锚机。坪井航三以为“广乙”舰体已毁，不予追击，令“吉野”等3舰合击“济远”。“济远”号虽多处中炮，幸非要害，或左或右，寻找突围机会。8时10分，“济远”号出敌不意，巧妙地击中“吉野”号的舰首，击折前桁索。十分钟后，“济远”再次击中“吉野”的右舷，炮弹贯其钢甲，坏其发电机，穿入机器间，但未爆炸，“吉野”号免于沉没。

8时30分，“广乙”受伤东驶，远离“济远”，“济远”号也以全速向西驶避。当日本舰追击“济远”时，“高升”轮和“操江”号由西而来，日舰“浪速”号鸣炮令其停航，“操江”号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和“秋津洲”号分别追赶“高升”轮和“操江”号，自己乘坐“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一直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坚匿不出，放弃指挥，竟下令悬旗投降。官兵们对自己长官的这种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极为愤怒，开动全舰炮火，向敌舰猛烈还击。

战至11时许。“济远”号已离“吉野”号，“吉野”开足马力全速追赶。“吉野”追至“济远”2000米左右时，用右舷炮猛击“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更加惊骇，又挂起日本旗，要求投降。水手王国成、李仕茂激于民族义愤，不听方伯谦的命令，协力发尾炮攻击敌舰，连发四炮，命中三炮，击中“吉野”号要害，船头立即低俯。受创的“吉野”号，于12时43分，转舵退走。这时，“济远”号如能转舵，以舰首主炮轰击“吉野”号，有可能取得更大胜利，也能解救“操江”、“高升”两轮之困。然而方伯谦这个懦夫，逃命犹恐不及，不

敢乘胜歼敌，竟丢下“操江”和“高升”号，匆匆逃奔旅顺而去。

“操江”号是一艘 900 余吨的木质大船，行驶迟缓，时速仅 9 节，有旧式炮 5 门，无力与敌舰抗衡。“秋津洲”紧紧追赶，形势危急。管带王永发自度难以脱身，便将船中重要文件焚毁，正准备将 20 万两饷银投入大海时，“秋津洲”已接近“操江”，“操江”号被迫停轮。日舰官兵 28 人，乘舢板登上“操江”轮，将“操江”号掳至群山湾。28 日，管带王永发等 83 名官兵，被押送到佐世保，投入监狱，备受虐待。

当“操江”号被掳时，悬挂英旗的“高升”轮亦被“浪速”号截住。“高升”轮被迫抛锚，“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派军官数人，携带武器，乘舢板登上“高升”轮。当得知船上载运的是赴朝清军时，东乡平八郎命令“高升”轮按日军指示起锚，拟全部俘获清军。仁字营营务处帮办高善继，面对严峻考验，异常镇静，鼓励将士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全船官兵纷纷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高升”轮船长英人高惠梯向日军转达了清军官兵拒绝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的要求，并表示“高升”轮是英国船只，出发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应该同意该船官兵意愿，返回出发的海口。但是“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却说，这是“清军有意与我为敌，决定进行炮击，破坏该船”，命令欧洲人立即离船。“浪速”号迅即驶近“高升”轮，以右舷前部鱼雷发射管，向“高升”轮发射鱼雷，未中。东乡平八郎又下令“浪速”舰以右舷 6 门大炮一齐开火，猛烈轰击“高升”轮，“高升”轮被中多炮，

锅炉爆炸，白雾喷射，船尾下沉半小时后，沉没在丰岛西南。

就在日舰发炮轰击“高升”轮的紧急关头，船上的清军官兵临危不惧，誓死抵抗。他们用来复枪向日舰射击。高善继和二位营官，视死如归，指挥全船将士，奋力与敌人拚搏，坚持到船身沉没。“高升”轮沉没时，许多清军落入海中，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出动小船，满载武装士兵，向落入海中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官兵疯狂射击，清军除被英、法、德舰救起的 252 人外，其余 700 余人全部殉难。

在“操江”号被掳、“高升”号沉没之前，船舵被击坏的“广乙”舰，也遭到不幸的结局，在朝鲜西海岸十八岛触礁搁浅。管带林国祥等将舰上的大炮全部炸毁，凿坏锅炉，然后率官兵 70 余人登岸至牙山。时叶志超已从牙山退守公州，他们被日军扣留，后被释放回国。

丰岛海战，清军的“广乙”号搁浅自毁，“操江”号被掳，“高升”轮被击沉，清军死伤 800 多人，主要原因固然是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和消极避战。当日军步步进逼，蓄意发动战争的严重形势下，身负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不是积极筹备战守，而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明知日军增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不可避免，他却不敢以北洋舰队出黄海，制止日军向朝鲜增兵，又未能以海军必要兵力掩护牙山清军。由海上增援牙山时，只派“济远”、“广乙”少数舰只护航。丁汝昌考虑“济远”和“广乙”号在中途有遭受日舰袭击的危险，要求李鸿章准令舰队继续接应，7 月 24 日，舰队已升火起锚待发，李鸿章突然复电制止，致使运兵船和护航舰惨遭失败。

在作战中，主要将领方伯谦等人临阵退缩，也是这次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方伯谦明知日舰即将来攻，未能当机立断，带领“济远”、“广乙”2舰连夜返航，仍在牙山停泊一夜，使“济远”和“广乙”舰陷入险境，铸成大错。25日，“吉野”被“济远”号命中三炮，“济远”本应转舵，以船头大炮轰击，“以收奇捷，或可纾“高升”之急。但方伯谦只知逃命，放弃指挥，失去了击沉“吉野”的大好时机。在海战中，贪生怕死者并非只方伯谦一人，“济远”号鱼雷大副穆晋书也是一个可耻的逃将。在战斗中，他唯恐丧命，先躲进机舱，后又逃进鱼雷舱。当日舰“吉野”号逼近时，本可一雷击中，但他心慌意乱，“装气不足，放不出口”，使“吉野”号又一次逃脱了被歼的厄运。当时，“济远”号如能拚死一战，掩护“高升”号停泊蔚岛，使船上士兵登岛，也可免去两营将士葬身海底。

丰岛海战的结果，使日本海军完全控制了朝鲜西海岸水域，日军不仅增兵朝鲜畅通无阻，而且海陆两军得以互相策应。清军则断绝了通往牙山、仁川的海道，使驻牙山清军陷于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境地。

平壤保卫战

日本大本营确定了驱逐清军出朝鲜的冬季作战方案后，立即向朝鲜大举增兵。7月31日，大本营训令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第五师团余部赴朝。8月14日，大本营又命令第三师团的一半兵力组成第五混成旅团，进驻朝鲜，协助第五师团作战。9月1日，又下令把混成第五旅团与第五师团

组成一个军，共约 1.5 万人，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日本政府决定把大本营由东京迁往广岛。15 日，睦仁天皇到达广岛，亲自指挥战争。

9 月 2 日，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等议定，采取分进合击，兵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 5000，携炮 20 门，自汉城出发，沿大道从东南进攻平壤；由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率第五师团本部步骑约 5000，携炮 12 门继后，渡大同江，从西南进攻平壤；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率步骑 2000，携炮 6 门，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从东北进攻平壤；由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约步骑 3000，携炮 12 门（又称元山支队），自朝鲜东北的元山登陆，经文川、阳德、成川、顺安，从北面绕攻平壤。9 月 12 日，混成第九旅团到达大同江南岸诱战，牵制清军，元山支队到达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与朔宁支队会合，从北面加入对平壤的攻击。朔宁支队于 13 日，由麦田店渡大同江，14 日至大地境洞，由平壤东北方向发动进攻。第五师团本队自黄州西十二浦，渡大同江，出江西，进攻平壤西南。各部于 9 月 15 日前完成对平壤的包围。15 日凌晨发起总攻，准备一举攻破平壤，将清军驱逐出朝鲜。

清军是在中日两国宣战后，陆续到达平壤的。清军进驻平壤，准备与驻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相呼应，南北配合，夹击驻汉城一带的日军大岛混成旅团。7 月 29 日，成欢败后，叶志超部北退，夹击汉城日军的计划无法实现。遂按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方针，暂扎平壤，俟各营到齐，后

路布妥，再图前进。尽管光绪帝多次发上谕，催促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取”，“直攻汉城”，但李鸿章“坦然不以为意”，“总以兵力不敷为言”，拒不受命。8月22日，叶志超率牙山败军抵达平壤，矫言沿途累败日军，李鸿章据以入奏，清廷不辨真伪，传令嘉奖，犒赏官兵白银2万两。25日，又命叶志超总统平壤诸军。逃兵受赏，败将升官，消息传出，全军皆惊。

9月5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部队按计划出发，叶志超得到日军已抵成川的消息，顾虑平壤后路被切断，乃改变决心，急忙将部队调回，防守平壤。

平壤为朝鲜平安道首府，是朝鲜的旧都。北通义州，南达汉城，东临元山，西南扼大同江口，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平壤城面江枕山，形势险要，城垣高大坚实，高达10米，基厚7米，南北绵亘10余里。城有六门：南曰朱雀门、北曰玄武门、东曰长庆门、西南曰静海门、西北曰七星门、东南曰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台修筑，牡丹台紧逼城墙，是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保卫平壤的清军共有五支，总计马、步、炮兵约1.83万余人，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并贮存了足够全军食用1个月的军粮。

清军依城划分了各军防区，立即赶修工事，择险分屯。城北牡丹台筑堡垒一处，牡丹台外侧沿丘陵高地自东北向西北修堡垒4处，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奉天练军盛字营及江自康仁字营防守，由左宝贵指挥；城南外廓筑堡垒及

兵营 15 处，其南端由大同江北岸修筑长达 2000 米胸墙一道，墙下布雷，为南面第一道防线，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崑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归卫汝贵指挥；城东南大同江上搭浮桥一座，在江南岸构筑堡垒五处，由马玉崑所部毅军及卫汝贵所部盛军一部防守，由马玉崑指挥；内城至城西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驻守。

9 月 12 日，日军混成等九旅团抵达大同江左岸，开始与毅军开枪遥击。同日，朔宁支队也到达大同江，正拟由麦田店渡江时，与前来探敌的奉军 3 个营 800 人相遇，奉军列阵以拒，枪炮互击。叶志超以前路吃紧，急调 3 个营奉军回平壤，日军遂得以渡江，从北面包围了平壤。13 日，元山支队占领顺安，切断清军归路。14 日，元山支队进占平壤背面坎北山，抢占制高点，并与朔宁支队会合。左宝贵派军攻夺未克，退军入城。至此，日军对平壤完成合围。9 月 15 日，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激烈的战斗在三个方向同时展开。

黄海海战

平壤战败的第二天，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亲率 10 余艘舰艇护送援军至大东沟。17 日中午，正当北洋海军准备返航旅顺时，却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面上，遭到了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丁汝昌令“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中，为人字雁行阵迎战。日舰凭借速度快、炮位多的优势，横越“定远”、“镇远”两舰，绕攻右翼小舰，并将“致远”、“经远”、“济远”三巡洋舰隔出圈外。中国舰队逐渐处于劣势。激战中，丁汝昌从“定远”号飞桥上摔下受伤，仍坐在甲板

上鼓励士气。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定远”、“靖远”、“镇远”等舰官兵奋力战斗，重创敌舰“比叻”、“赤城”、“西京丸”，击毙“赤城”舰长板元。在激战中，“致远”，管带邓世昌发现日舰“吉野”等四艘进逼并炮击旗舰“定远”，毅然下令将舰驶出“定远”之前，迎战来敌。在战斗中，“致远”中弹累累，受伤甚重。邓世昌鼓轮猛冲敌舰“吉野”，拟同归于尽，不幸途中为鱼雷击中沉船，全舰 250 余名官兵，只有 7 人遇救。“经远”舰连遭敌舰环攻，中弹起火，在烈焰中沉没，管带林永升和全舰 200 余名官兵，除 16 人获救生还外，全部为国殉难。这时，北洋舰队只剩“定远”、“镇远”、“靖远”、“来远”4 舰，但官兵们不屈不挠，仍然英勇战斗。“定远”以重炮轰击敌旗舰“松岛”，命中其右舷下甲板，并引起该舰弹药爆炸，死伤纷纷，舰上设施被摧毁，丧失了指令和战斗能力。其他日舰也多已受伤，无力再战。“靖远”管带叶祖珪见“定远”桅楼折断，果断代替旗舰升旗集队，与日舰继续战斗，终于在日暮黄昏之时迫使日舰首先退出黄海，向南驶去。北洋舰队退返旅顺。

在黄海之战中，中日参战军舰数目相等，力量对比互有短长。结果日本舰队有 5 舰身受重创，北洋海军有 5 舰沉没黄海，损失大于日方。但它这时还拥有“定远”、“镇远”、“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李鸿章却故意夸大损失，压制广大将士巡海迎敌的要求，并以“保船制敌”的借口，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藏到威海卫军港，把黄海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海军，造成了坐守待毙的局面。

摩天岭阻击战

清廷得知鸭绿江防线被突破，决心组织力量，保卫奉天。令东三省各将军，火速率军在奉天辽阳间集结，以阻止日军占领奉天。其部署为：奉天将军裕禄，率营口新泰军步队 5 营和铁岭铁字步队 16 营开赴辽阳，景字步队 5 营增援摩天岭，靖边军步队 4 营、马队 1 营在奉天福陵集结；吉林将军长顺率靖边军步队 16 营、马队 2 营 3 哨、炮队 4 哨向奉天进发，吉字步队 8 营、马队 4 营整装待发；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步队军 10 营、齐字练军步队 4 营，齐字新军马队 3 营前来助战。由山海关东进奉天的总兵程之伟率大同军马步 8 营开赴营口；总兵蒋尚钧率豫军 5 营开赴旅顺口。另有按察使陈湜之福寿军 10 营、提督陈文炳之威靖军步队 10 营、总兵田在田之靖字军步队 6 营、提督唐仁廉及吴凤柱之凤字军步队 4 营、道台李光久之老湘军步队 2 营，共约 70 余营，正集结于天津附近待命。

11 月 1 日，宋庆率军撤至摩天岭，组织新的防线，抗击日军。由聂士成、吕本元、孙显寅等部扼守摩天岭、连山关一线，利用摩天岭之险，阻止日军由东路进攻奉天，并派兵游击于草河口一带，相机袭击凤凰城附近日军；依克唐阿镇边军驻守东起绥阳，西至赛马集、草河口一线，与聂士成部相为呼应，从侧后牵制凤凰城日军，支援摩天岭、连山关的防御作战。

摩天岭位于奉天东南，是长白山的支脉，为陆路日军由凤凰城进犯奉天的必经之路。连山关为一小村落，有居民 40

余户，在摩天岭东侧，地势险峻，是日军进犯奉天的第一关隘。聂士成派吕本元、孙显寅率盛军驻守。自1894年11月12日，日军进犯连山关开始，到翌年1月底，中日两军为争夺这条重要通道，进行了3个月的激烈战斗。主要作战地区在奉天东南的草河口、连山关、通远堡和赛马集一带。

日军第一军占领大孤山，完成了掩护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的任务，大本营令其在叆河、大洋河一带冬营。为掩护休整，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率马步3000，从大孤山进攻岫岩，由少佐源重雄率一个大队和少量骑兵，从西夹击岫岩；由立见尚文率第十旅团马步4000，从凤凰城北攻赛马集和连山关。

岫岩西通盖平，北接海城、辽阳，东连凤凰城，南达大孤山，是奉天南部的要地。驻守岫岩的清军有丰升阿盛字练军4营，聂桂林奉军步兵8营、马队4营、炮队1营，分兵北扼黄岭子，以御北路日军；南扼土门子岭、洪家堡子，以御南路之敌。11月17日11时，三原重雄部向黄岭子清军发起攻击，战斗约半小时，清军不支，弃险而走，退守兴隆沟。清军从岫岩城内派出援军千余人，与日军战至午后1时，兴隆沟继失。由南路进犯岫岩的大迫尚敏部进至岫岩南5公里处的洪家堡子，守军退入岫岩，岫岩被日军南北包围。当夜丰升阿放弃岫岩，退往析木城。18日上午，日军占领岫岩。

赛马集东近叆阳，西接连山关，由依克唐阿部镇边军驻守。11月9日，立见尚文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向赛马集和连山关进犯。20日，偷袭赛马集的日军一个小队，在南邢家沟附近受到依克唐阿镇边军的截击，击毙日军14人。12日，向连山关进攻的今田唯一大队，攻占连山关。守军吕本元、孙

显寅率盛军溃退，日军直趋摩天岭下，聂士成召集部将，晓以大义，动员固守，诸将皆感激奋发。聂士成率部反击，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进攻摩天岭的日军受挫，当夜撤回连山关。16日，立见尚文派少佐安满伸爱率一个大队前来增援，命二十二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为今田唯一大队和安满伸爱大队的司令。24日午夜，富冈三造为切断赛马集和摩天岭清军间联系，率部至草河口设阵。25日，聂士成收复连山关，依克唐阿率十余营，由赛马集分两路进攻草河口，聂士成和依克唐阿两军东西呼应，夹击日军。青年爱国将领镇边军统领、侍卫永山，表现十分英勇，亲自率部，冲锋陷阵，打死打伤日军多人。这次战斗非常激烈，枪炮互击，声震山谷，终日不止。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夹击之下，日军不得不放弃草河口，于12月5日退回凤凰城，清军大胜。

9日，聂士成和依克唐阿两军在通远堡集合20营，分两路袭取凤凰城。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由通远堡前进；另一路由镇边军分统寿山和马队统领永山率领，向东北迂回，从绥阳边门绕道凤凰城东北合击日军。这时，立见尚文接到命令，要他向摩天岭进击，配合第三师团进攻海城，12月10日，日军行至樊家台与清军相遇，激战三时许，清军后撤，日军占领樊家台。

12日，寿山、永山兄弟两人率领的清军到达凤凰城东北的长岭子，在夏家堡子一带宿营。14日凌晨，日军分两路潜渡草河来攻，清军疏于戒备，被日军攻入营地，纵火焚房，清军由睡梦中惊起，不知虚实，仓惶应战，死伤甚多。天明，日

军分三路猛扑，战至下午，清军北退长岭子，15日，在葱岭又遭日军伏击，永山身先士卒，督军力战，左臂和额颅受伤，犹复亲持枪械，击毙日军数名，督队前进时，洞胸一弹，倒地晕绝，牺牲时年仅27岁，寿山等率部撤回赛马集。

聂士成部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与敌对峙3个月，经历大小10余次苦战，使日军未能越岭西进，粉碎了日军由东路进犯奉天的图谋。但日军第三师团攻占了海城，辽阳告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辽阳，宋庆会同长顺，率部以固奉天门户。聂士成部担任辽阳以东防务。

金州旅顺之战

辽东半岛自金州斜伸入海，为旅顺后路要险，天然形胜。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的顶端，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隔海相望，互守京畿，系北洋海军重镇。旅顺北面群山环绕，旅顺港澳位于黄金山与馒头山之间。旅顺口门宽300米，水深11至13米，内澳周约40里，可容铁甲巨舰。澳之东岸建有大船坞，为北洋海军的基地。清政府于1880年开始经营旅顺港，耗资巨万，设港建坞，在周围山上营造炮台。旅顺口东西海岸有炮台9座，在北面山上另有陆路炮台9座。在各炮台之间筑有2米高、1米厚的胸墙，将各炮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堡垒团。在各堡垒团内，设有弹药库和哨所。甲午战争爆发后，又在海岸及后路增设炮台多座。当时，旅顺口共有海岸炮台20余座，架设各式大小火炮一百数十门，大都是最新式的克虏伯海岸巨炮。

旅顺后路的大连湾是天然良港，1886年，清廷开始修筑

大连湾炮台，至战争爆发尚未完工。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清廷先后从旅大地区抽调宋庆部和刘盛休部增援平壤，旅大防务空虚。李鸿章令毅军分统姜桂题募 4 营、总兵程允和募 3 个营，充实旅大地区防务。后又令总兵卫汝成募 6 营及所部马队 2 个营，总兵徐邦道募拱卫军 3 个营并所部马队 2 个营、炮队 2 个营，由天津调赴旅顺；以铭军分统赵怀业新募 6 营接替铭军防守大连湾。在日军进攻旅大前，旅大地区共有姜桂题、张光前、程允和、黄仕林、卫汝成、徐邦道、赵怀业等各军 30 余营。

黄海海战后日本政府便认为，他们的海军已经控制黄海，为了在来年同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必须攻占旅顺，在渤海湾建立根据地。日本于 9 月 21 日编成第二军，任命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10 月 8 日，大本营训令第二军同联合舰队协力占领旅顺。第二军于 15 日至 22 日，将第一师团从广岛运至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集结待命，准备在第一军发起鸭绿江战役的同时，实施对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

日军在辽东半岛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半岛东侧黄海海岸的小港花园口（今大连市庄河县高阳乡），此地西南距大连湾约 100 公里，距金州约 80 公里，地位重要，但清军疏于防范，未曾设防。10 月 23 日 9 时，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分乘运输船 16 只，由渔隐洞出发，于次日抵达花园口外。时天未明，在朝雾朦胧中，日军用汽船数十艘牵引舢板，驶向花园口登陆。次日上午，驻扎在貔子窝的捷胜营营官荣安，从捕获的日本间谍钟奇三郎口中得知日军官兵一万余人，已在花园口登陆。荣安立即报告金州副都统连顺，并将日间谍押送金州。26 日，连

顺急电李鸿章、水陆营务处候补道龚照璵及奉天将军裕禄，要求火速派兵来援，可是，在日军登陆花园口的紧急情况下，清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27日，裕禄电连顺，说东路日军已过鸭绿江，军情吃紧，不能派兵支援金旅。29日，李鸿章电令程之伟部大同军3000人，从营口兼程前往金州。程之伟部到复州，距金州仅80公里，停兵不前。连顺七次催促，程之伟仍按兵不动。11月1日，金州指挥官连顺、赵怀业又电告盛宣怀和李鸿章，请拨十数营，火速驰援，分路扼抵。盛宣怀复电“无人可调”。就这样，听任2万余名日军和大量军用物资，顺利地花园口登陆。在15天中，“我海陆军无过问者”。

早在10月31日，登陆日军占领貔子窝后不久，总兵徐邦道主张乘日军立脚未稳，主动出击，因赵怀业反对，未能实行。徐邦道以金州为旅大后路咽喉，金州失守，旅顺难保，又提议分兵援金州，以固旅顺后路。但清军“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30余营，莫之应。”徐邦道只得自率拱卫军从旅顺赶赴金州御敌。

金州城位于金州湾东侧辽东半岛蜂腰部，东有大和尚山为之屏障。金州城呈长方形，东西长600米，南北宽760米。城垣牢固，高6米，顶宽4米，城外10米处有外壕环绕，系辽东半岛重镇。当时驻守金州的清军有：徐邦道拱卫军步队3营、马队2营、炮队1营，约2000人；连顺所辖捷胜营步队1营、马队2哨，约700余人；周鼎臣怀字营2哨，约300人，守军合计有3000余人。徐邦道部及周鼎臣2哨在金州东路防守，紧急修筑工事。连顺率部守城，在城墙上安置大炮

10 余尊，并在北门外埋设地雷。

11 月 4 日，日军先行破坏了金州、复州间清军的电线，切断金州守军与外界联系。5 日，日军第一师团分兵三路进攻金州。第一路由步兵第十五联队长河野通好大佐率本队及先遣大队牵制金州东路的清军；第二路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指挥第一联队进攻清军东路阵地；第三路由第二、三联队组成的师团本队，由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率领，向东北迂回，绕至金州北三十里堡，再沿金复大道南下，从背面进攻金州。

5 日 11 时，乃木希典派两个大队，向徐邦道拱卫军阵地发起攻击。清军凭垒据守，进行反击，激战 3 小时，将日军击退。下午 4 时，日军再次进攻，又被击退。

6 日拂晓，日军在炮兵掩护下，第三次进攻拱卫军。清军伤亡较大，阵地仍在。这时，迂回到金州背后的日本师团本队攻破清军左翼防线，抄袭徐邦道军后路，拱卫军退回城内，据城固守。日军列炮于城外高地，猛轰金州守军。清军殊死抵抗，用架设在城墙上的克虏伯野炮应战。此时，炮声如雷，天地震动，经过半小时的炮战，清军炮火被压制下去，日军乘势攻城，派工兵用炸药连续爆破城门，日军攻入城内，转趋东门，东门被攻破。清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许多官兵，壮烈牺牲，连顺部退往大连、旅顺，金州失陷。

日军占领金州的当晚，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制定了进攻大连湾的作战计划。由西宽二郎少将率第三联队，向旅顺进攻；由乃木希典少将率第一联队进攻和尚岛炮台；由河野通好大佐率步兵第十五联队攻击徐家山及老龙头炮台，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在金州集结待命。

7日凌晨，日军由金州出发进攻大连湾。当日军到达清军阵地时，只有少数清军略作抵抗即行退走，大部清军已于前一天黑夜撤回旅顺，日军轻取大连湾。由于清军匆忙逃跑，许多机密文件也未能处理。日军占领清军水师营后，得到了大连湾水雷敷设图，日本军舰得以顺利驶入港内。3日之内，清军连失金州、大连两处战略要地，旅顺口后路直接暴露，形势岌岌可危。

17日，日军向旅顺发动进攻：由秋山好古少佐率骑兵一个大队为搜索队；以第一师团本队和第十二旅团组成右翼纵队，与骑兵搜索队经三十里堡进攻旅顺西北椅子山、案子山一线清军的左翼堡垒团；由第十四联队长益满德次中佐率步兵及部分骑兵、工兵、炮兵为左翼纵队伍，经苏家屯等地，进攻旅顺东北鸡冠山一线清军的右翼堡垒团。当时，驻守旅顺口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兵33营，1.27万余人，其中约9000人为新募之伍，未经战阵，仓促成军。

在金州失守后，旅大前敌总指挥龚照璘，即乘鱼雷艇逃往烟台，许多官员抢掠财物，纷纷逃走，旅顺军心涣散，人心惶惶，危在旦夕。旅顺诸将共推姜桂题为临时指挥。然而姜桂题拿不出任何对敌良策。当日军攻击时，爱国将领徐邦道率军迎战，于15日拂晓，率拱卫军在旅顺北土城子一带设伏。11时，日军骑兵搜索队进至土城子以南，徐邦道出敌不意，英勇出击，打退日军，首战告捷。18日晨，徐邦道会同姜桂题、程允和等部骑兵5000余人，在土城子附近，将日军骑兵搜索队打退。日军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在丸井正亚少佐率领下到达双台沟附近，被清军团团围住，战斗十分激烈。清

军在长岭子南的高地上架起大炮，猛轰日军，步骑兵同时攻击，日军狼狈溃退，尸体也来不及收拾。清军在土城子反击战中获胜，证明了只要清军指挥员指挥得当，各部互相配合，广大爱国官兵是能够击败敌人的。

20日，大山岩在水师营北李家屯召开会议，部署再次进攻旅顺。以第一师团本队及混成第十二旅团组成右翼纵队，攻击松树山、二龙山炮台；以第十四步兵联队为左翼纵队，攻击鸡冠山一带堡垒；骑兵搜索队以一部担任第一师团右翼警戒，另一部担任混成第十二旅团与左翼纵队之间的联络和搜索活动。

21日，日军攻击旅顺。凌晨7时，日军第二旅团集中40门火炮对清军阵地狂轰滥炸，在炮火掩护下，向案子山堡垒发起攻击。当日军进至清军阵地前沿时，清军先用各种火器猛烈射击，然后冲出炮台，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日军以重大代价，换取了案子山低炮台阵地，清军的许多爱国官兵为保卫祖国的神圣土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清军余部在程允和率领下，退守黄金山炮台。接着日军第一联队用大炮轰击松树山炮台，战斗开始不久，炮台附近的火药库被击中引起爆炸，烈火熊熊，弹片四射，清军被迫退守二龙山炮台。日军混成第十二旅团即向二龙山炮台发起进攻。日军2个中队的兵力，由山下蚁附而登，遭到姜桂题所部清军的猛烈射击，伤亡颇重，日军军官督队死攻，日军踏尸前进，当进至清军堡垒前，踩响地雷，炸死日军多人。清军坚守二龙山炮台4个多小时，在日军反复攻击下，守台清军伤亡较大，撤离阵地，二龙山炮台也被日军占领。

日军左翼纵队于21日9时攻击鸡冠山清军。守卫鸡冠山炮台的是徐邦道的拱卫军。徐邦道英勇沉着，指挥部队顽强奋战。黄金山海岸炮台用24公分重炮猛烈轰击日军侧翼，日军步兵第十四联队第一大队长花冈正贞少佐被击毙。11时许，日军一个大队前来增援。11时45分，日军攻占东鸡冠山炮台、大小坡山炮台和蟠桃山炮台，徐邦道率部退入市区。守卫在白玉山北侧的卫汝成临阵脱逃，部队无人指挥，向海岸炮台溃走，至此，旅顺后路炮台，全部被日军攻占。

当天中午大山岩以少数兵力守卫旅顺后路各炮台，主力继续向市区及海岸炮台推进。当时对日军威胁最大的是黄金山炮台。该炮台位于市区东南，居高临下，俯瞰全城，配有大小火炮20余门，其中有24公分远距离新式克虏伯重炮3门，能作全方位射击。日军派出2个步兵联队攻击该台，守将黄仕林弃台逃走，官兵无人指挥，军心涣散，坚持到下午5时许放弃炮台，日军占领黄金山、东人字墙等旅顺东海岸各炮台。这时，守卫在旅顺西海岸炮台的清军仍坚持战斗，顽强抵抗。当夜，守卫旅顺口的各路清军乘黑夜循西南海边向金州退走，与援军宋庆军会合。次日上午，日军又占领了西海岸各炮台，清政府经营多年耗资百万的旅顺口，沦入敌手。

就在日军进占旅顺的当天，宋庆和刘盛休组织7000余人，反击占领金州的日军。11月初，宋庆、刘盛休奉令驰援金州、旅顺，昼夜兼程，20日抵达金州以北的四十里堡。当时留守金州的是日军第十五联队长河野通好大佐率领的2个步兵大队，约1000人。21日11时，清军分两路包抄日军。午后1时，左翼清军奋勇攀上萧金山北面高地，居高临下，射

击日军。河野通好从金州城内派出一个中队赶来支援，用大炮轰击清军。右翼清军也在金州城西北与日军展开了激战，但由于清军在鸭绿江战役中屡次败阵，重武器全部遗弃，在进攻作战中，没有炮火支援，仅凭手中步枪拼死一搏，终难克敌，战至下午3时许，宋庆下令退军。徐邦道建议再攻金州，宋庆拒绝。27日到达盖平，金州反击战没有成功。

日寇进入旅顺，兽性大发，对旅顺居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大屠杀连续进行了4天，2万余人死在日军屠刀之下。当时目击这一惨案的英国海员阿伦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一个钱铺里，日军抢掠之后，把铺内所有的人全都杀死，但见满地死尸，有男的，女的，也有小孩子，死尸中“有没头的，亦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亦有手脚都斩去的，亦有斩做两段的，……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月的小孩。”“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这36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连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不能不承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今天，埋葬在旅顺万忠墓中2万多殉难同胞的尸骨，便是历史的见证。

威海卫防御战

争夺南邦炮台

1895年1月29日，日军继续西犯，左路纵队占领温泉汤，右路纵队占领九家疃，对威海卫南邦炮台形成包围。

26日，戴宗蹇令刘树德率绥字军3个营防守虎口山；刘超佩率巩字军2个营防守虎口山南北一带高地，以保护南邦炮台后路的安全。

30日，日军对南邦炮台发起攻击。先攻虎口山，清军居高临下，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后队赶到，架设山炮猛轰清军，步兵再次冲锋。清军顽强扼守，伤亡殆尽。日军进攻虎口山时，统领刘超佩怯战，乘船逃往刘公岛，又逃往烟台。其巩字军官兵坚守阵地，苦战敌军，因敌我众寡悬殊，势难抵御，虎口南北高地终被日军占领。在南路日军进攻虎口山的同时，北路日军也向冬青顶发起进攻。冬青顶是威海卫南邦炮台群的制高点，岭上的炮台是临时修筑的土炮台，仅有八公分口径火炮8门。当日军进攻冬青顶时，营官周家恩率1个营步兵，奋勇搏战，誓死坚守。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亲自督率部队攻打冬青顶。日军拼死冲入鹿砦，进入布雷区，踏响连环雷，日军全部丧命。日军第一次进攻失败后，紧接着又组织了第二、三次进攻，又被守军打退。最后，守垒的清军全营壮烈殉国，只有周家恩一人活着。他一脚重伤，肠子漏出腹外，宁死不做俘虏，以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往西南爬行10余里，到壁子村西北的山沟村，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大寺安纯少将带领军官多人，登上冬青顶，正不可一世，要随军记者为他拍照时，北洋舰队的舰炮突然打来，大寺安纯连同军官、随军记者等多人丧命。

日军攻占冬青顶炮台，再攻杨枫岭。守军副将陈万清指挥1个营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3小时，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日军冲不上去，就用大炮疯狂轰击，清军弹药库

被击中爆炸，守军伤亡大半，炮台被日军占领。日军随即对龙庙嘴、鹿角嘴、皂埠嘴等 3 座海岸炮台发起进攻。

龙庙嘴炮台孤立突出，防守不易。其西坡驻有水雷营，有学员二三百人。水雷营设备比较齐全，修有地下电池两座，同威海卫南路电雷、水雷相联接，但水雷营学员没有配备武器，刘超佩只顾逃命，当然不会去组织他们参加战斗。当战斗打响时，学员逃散，水雷营很快陷于敌手，威海卫以南布设的电雷全部失去作用。留在龙庙嘴炮台的 40 名清军，虽同进攻的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力量单薄，全部牺牲。日军占领龙庙嘴炮台，利用炮台上的 4 门大炮猛烈轰击鹿角嘴等炮台，鹿角嘴炮台相继失守。皂埠嘴炮台便处于日军的水陆夹击之险境。

皂埠嘴炮台是威海卫最大的海岸炮台，设有 15 至 28 公分口径大炮 6 门，控制着威海卫东口。如果炮台失守，刘公岛炮台和港内北洋舰队将受到严重威胁。1 月 30 日上午，南邦各炮台相继失陷，皂埠嘴炮台危在旦夕，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将皂埠嘴炮台炸毁。在争夺南邦炮台的战斗中，中日双方伤亡都很大，日军伤亡官兵 228 人，清军伤亡 2000 余人。

双岛河激战

1 月 31 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南邦炮台以后，第二师团长直趋威海卫的海边大道，被北洋舰队的排炮封锁，难以通过。大山岩改变计划，2 月 1 日，令第二师团第四混成旅团在贞爱亲王指挥下，绕道向威海卫西路的清军发起进攻。

驻守威海西路的清军有孙万龄、李楹、阎德胜等部 10 余营，分别驻扎在双岛河附近的孙家滩、港南、港头村一带。孙万龄部 3 个营守卫双岛河南岸大堤，从正面阻击日军；李楹率部福字军 3 个营驻港南村，守卫右翼，防备日军迂回包抄；阎德胜的河防军 5 营为左翼，扼守港头村一带，阻止敌军过河，并支援正面的孙万龄部。

1 日午后 1 时，敌军由羊亭集出发，向孙万龄部进攻。当时，双岛河面结冰，风雪扑面，日军一步一颠，匍匐前进，十分困难。清军退入林中，负险力拒，以交叉火力向敌军猛烈射击。日军发起的多次冲锋，均被击退，被打死 500 余人。日军从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便从南面包抄孙万龄部后路，又遭李楹部阻击，亦未得逞。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万没有想到阎德胜率部西逃，使孙万龄部两面受敌，不得已撤至酒馆。威海卫的通路被打开，日军于 2 月 3 日进占威海卫城。

北邦炮台的弃守

北邦炮台位于威海卫城东北一带，由西向东，依次为祭祀台、黄泥沟、北山嘴 3 个炮台，形势险要，只有一条小路可通，由戴宗蹇率绥字军 6 营驻守。戴宗蹇贪婪阴险，平时克扣兵饷，军纪败坏，军官窝娼聚赌，部队毫无战斗力。在日军进犯威海之前，戴宗蹇不仅没有认真防守，反将北邦炮台存银 8000 两，令其子携回安徽寿州老家。北邦炮台的 6 营绥军，在南邦炮台作战时就溃散 2 营，在虎口山又被戴宗蹇解散 2 营，南邦炮台失陷的当晚，又溃散 1 营，炮台上只剩 1 个营。丁汝昌在战前，派广甲舰管带吴敬荣率 200 多名水兵

前往助守。2月1日夜，最后的1营绥军也哗变溃散，吴敬荣所带协守水手亦随绥军西去。整个北邦炮台就只剩下戴宗蹇和他的十几名随从了。丁汝昌亲往北邦炮台，强令戴宗蹇上船。戴宗蹇到刘公岛后畏罪吞鸦片自杀。2日，丁汝昌派敢死队将北邦炮台炸毁，仍有大量军械物资尽落敌手，“于是威海卫之防尽堕而海军益不可支矣。”

保卫刘公岛

2月2日，日本陆军占领威海卫南北岸炮台，日本海军严密封锁港口，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海陆合围。当日军在荣成湾登陆的同一天，日军通过英国海军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交给丁汝昌一封劝降信，说什么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把北洋船舰交给日军，不过“些些小节，何足挂齿！”丁汝昌对敌人的诱降活动，置之不理，并把劝降书呈交李鸿章。

丁汝昌不肯投降敌人，大节是好的。但是，如何作战，他却犯了严重错误。1月23日，清廷曾电谕李秉衡为不堕入日军水陆夹攻之诡计，北洋舰队应相机出击，“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李鸿章也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却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月30日，李鸿章再电丁汝昌，要北洋舰队冲出威海卫，“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歼，

稍赎重愆。”当时，丁汝昌的处境确实很困难，各方面对他的责难纷至沓来，清廷将他革职问罪。丁汝昌认为：目前战事吃紧，海军不出击，固然有罪；若出击战败，舰丢防失，犹有罪。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丁汝昌选择了固守刘公岛与北洋舰队共存亡的错误决策。他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刘公岛保卫战这样开始了。

2月13日，日军以第一游击队警戒威海卫北口，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攻击刘公岛、日岛炮台和北洋舰队，本队在威海卫港外策应。日本陆军修复皂埠嘴炮台上的1门28公分口径的大炮，配合他的海军进攻清军，炮战非常激烈。丁汝昌、张文宣率领刘公岛、日岛守军奋勇抵抗，日舰不敢接近港口。下午1时，刘公岛炮台击中日舰“筑紫”号，穿透其左舷，击坏舰体。2时39分，又命中“葛城”号，日舰退走。

日军正面进攻没有成功，便决定改用偷袭的办法。5日晨4时，日军联合舰队派出鱼雷第二艇队的6只艇，偷袭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先由第三艇队为先锋。掩护第二艇队偷袭。当时，天色晦暗，第三艇队先驶至北洋舰队正面，由22号艇施放鱼雷两枚，北洋各舰开炮还击，此艇南逃，触礁倾覆。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来远”、“济远”、“平远”、“广丙”等舰，在刘公岛西南海面摆成虾须阵，随时迎战。丁汝昌正在“定远”舰上与诸将议事，士兵报告有情况即与刘步蟾急登甲板，发现在舰队左面约半海里的海面上，有日艇驶来，待距“定远”舰300公尺处，“定远”发炮命中，敌艇爆炸碎裂。这时“定远”舰已被鱼雷击中，舰体剧烈震动，海

水进入舰内。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令舰南驶，至刘公岛东南海岸浅滩处搁浅。

伊东祐亨获悉“定远”舰中雷，便下令发动第三次进攻。日舰本队及四个游击队的 22 艘战舰，环集于威海卫南北两口之外。猛烈炮击，北洋舰队与刘公岛、日岛各炮台，奋勇抵抗，将日舰拦阻口外，日舰只得退到远海。

6 日晨 4 时，日本鱼雷艇故伎重演，由第一艇队再次偷袭。当时，泊于北洋舰队右翼最东端的“来远”号，首先中雷，舰身倾覆，舰底露出，接着“威远”和差船“宝筏”号也中雷，在铁码头附近沉没。

当日下午，日舰发动了第四次进攻，日军先在威海卫北岸架设了快炮，以夹击刘公岛及港内清舰。当时北洋舰队虽有四舰中雷，损失严重，但广大海陆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抵御，又将日舰击退。

7 日晨 7 时，日军对刘公岛守军和北洋舰队发起第五次进攻，战斗空前激烈。

清军的炮击，“命中极精确，无数炮弹飞来，在我诸舰前后左右坠落。”开战不久，日舰“松岛”号被击中前舰桥，打穿烟囱。8 时零 5 分，“吉野”又中弹，击碎速射炮楯。8 时 20 分，日舰“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四舰也相继中弹，日军气焰顿挫。

不料，此时北洋舰队发生了鱼雷艇队逃跑的严重事件。6 日夜，丁汝昌决定回击敌人，命令左一号鱼雷艇管带王平，于 7 日凌晨率大小鱼雷艇 13 艘出口袭击敌舰，谁知王平早与其他鱼雷艇管带蔡廷干、穆晋书等人，密谋逃跑。这天上午 8 点

半钟，正当日舰多艘受伤，攻击力大为减弱之际，北洋舰队的鱼雷艇 13 只，以及“飞霆”、“顺利”两船，乘出口袭敌之机，从威海卫北口逃走。伊东祐亨开始误认为北洋舰队要同日本舰队进行决战，先令鱼雷艇队扰乱日本舰队，以便乘虚攻击，但他很快发现这些鱼雷艇企图逃跑，急令第一游击队从速追击，逃跑的鱼雷艇有的被击沉，有的被俘获，惟有王平的左一号逃到烟台。

鱼雷艇队的被歼，使北洋舰队的处境愈趋危殆，日军加紧进攻。刘公岛和日岛的守军，奋勇抵抗，毫不退缩。据日方记载说：“此役，敌炮台颇能战，以 8 门大炮抵抗我舰队 20 余只，运转巧妙，猛射我各舰。”在激烈的炮战中，日军在皂埠嘴炮台发炮击中日岛炮台的弹药库，弹药爆炸，接着，敌炮反击中一门地阱炮架，地阱炮倾倒，敌炮又把营房炸毁，丁汝昌遂下令放弃日岛炮台，守军撤回刘公岛。

日军为消耗北洋舰队的力量，日夜炮击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8 日，刘公岛上的水师学堂、机器厂、煤厂及民房皆遭毁伤。入夜，日舰偷入南口，以炸药爆炸清军的防御设施，破坏 400 余米防材，又以巨斧砍断铁索，南口藩篱尽撤，门户洞开。丁汝昌感到单凭刘公岛这一孤岛，势难久守，唯一的希望是陆上有援军开来，配合海军作战，刘公岛之围尚可解。他派一名可靠水手，怀密信凫水到威海卫北岸，潜去烟台，向刘含芳求援。

9 日，日军发动了第六次进攻。日本舰队大小舰艇 40 余艘，全部开到威海卫南口外排列，以战舰在前开炮，同时，又令南北两岸炮台实行夹击。丁汝昌亲登“靖远”舰，驶近南

口，与敌拼战。日舰两艘被击伤，战至中午，“靖远”舰中炮搁浅，丁汝昌和管带叶祖珪仅以身免。

10日晨，忽降大雪，日本鱼雷艇4艘乘机偷入威海卫北口，被北洋舰队发觉，用炮击退。天明后，日军再次水陆夹攻，以战舰10余只，猛冲威海南口。北洋舰队和刘公岛炮台用炮火拦截，击伤日舰两艘，伊东下令撤退。这时，威海卫港内仅存战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炮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艘，练船“康济”1艘，而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不顾处境危殆，依然奋勇搏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2月8日，北洋舰队中的一部分洋员，在刘公岛的俱乐部里开会，他们认为北洋舰队图谋恢复已不可能，要“定远”副管驾英人泰莱和教习德人瑞乃尔向丁汝昌劝降。泰莱回忆此事说：“瑞乃尔与余以夜二时往见提督，说明现时之境地，并劝其可战则战，若兵士不愿战，则纳降实为适当之步骤。”又说：“事势至此，徒多杀生灵，无益也。请以船械让敌，兵民尚可保全。”丁汝昌不为所动，严辞拒绝了泰莱等人的劝降活动，说：“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向全军将士发出命令：援兵将至，固守待命！当夜，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在“定远”舰中央部装上炸药，将它炸毁。刘步蟾眼看着艰苦经营的北洋舰只毁于一旦，怀着满腔悲愤，服毒殉国。

10日，日军围攻益急，一些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的将领，竟同洋员勾结一起，鼓动士兵水勇，威逼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汝等欲杀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坐中感极，掩面歔歔者有之”。当天

下午，他又派“广丙”号用鱼雷炸沉了搁浅的“靖远”号。

11日晚，丁汝昌始知鱼雷艇队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谎报刘公岛失守，李秉衡信以为真，将援威海卫的部队一律截回。丁汝昌召集诸将会议，以援军绝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鼓力碰敌船突围而去，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胜于尽覆。但洋员马格禄、营务处道员牛昶昞带头散去，并指使一些兵勇水手持刀威逼丁汝昌。丁汝昌知事不可为，乃召见牛昶昞，对他说：“吾誓以身殉，”并命其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遂服鸦片自杀殉国。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反对投降，随之自杀。牛昶昞召集诸将和洋员议降，公推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接洽降事。杨用霖严辞拒绝，回舱后口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用手枪自击而死。接着，牛昶昞又与马格禄、泰莱、浩威、瑞乃尔等洋员商定，由浩威起草降书，伪托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12日上午8时30分，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镇北”舰，树白旗由北口出港，向伊东祐亨乞降。14日，牛昶昞向日本交出威海卫海陆军官、洋员名册及兵勇军属统计表，计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16日，牛昶昞代表清军在降约上签字，缴出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全部残余舰只及刘公岛、日岛各炮台所有军械弹药。17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舰队占领威海卫，将港内北洋舰队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大小舰船全部掳去，只将练习舰“康济”号解除武装，交给清政府。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山东半岛战役遂告结束。

三、《马关条约》

从清政府对日宣战到平壤、黄海战役之前，由于战争胜负尚未定局，慈禧太后等人暂时不敢公开进行求和活动，列强也暂时中止了“调解”。但是，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接连溃败，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又日益急切起来。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复出后的奕訢，不仅接受教训再也不敢得罪慈禧太后，而且努力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10月初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俄两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

这时，英国担心中日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引起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不安，影响自己的在华利益，同意出面斡旋。10月6日，英国建议美、德、俄等国联合调停中日战争。美国认为日本现有的胜利还不足以压迫清政府无条件投降，予以拒绝。德国急于要在中国夺取一个海港，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也表示调停时机尚未成熟。俄国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又让清政府对它感恩戴德，很希望出面调停，早在英国建议之前就曾指示驻华公使喀西尼催促李鸿章，要他趁日军“尚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但它不愿和英国联合行动，一心想独自充当调停人。因此，俄国政府曾千方百计地对中日两国施加影响，并电令驻日公使希特罗渥，要他设法对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提议：“俄、日两国应彼此交换意见，以防其他强国的干涉。”这里所说的其他强国，显然主要是指英国。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打算，英国的调停建议

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形势危急。清政府又转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还召集美、英、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要求他们的政府参与干涉。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又想单独操纵中日和谈，表示愿意居间“调停”。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通知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日本虽然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但已经出现财政空虚和军需缺乏的困难，因此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意见。11月21日，田贝见日军攻占旅顺已成定局，便正式向总理衙门表示愿以“传信人”的身份为中日两国传达意见，劝两国派员直接会议。慈禧太后害怕日军乘胜进犯京津，求和心切，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支持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1895年1月14日，清政府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当时日军正进攻威海卫，日本政府不愿立即休战议和，借口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訢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前往。为了破坏谈判，日本不惜破坏国际间的外交公例，对中国使臣咨意侮辱，张、邵一行被迫于2月12日启程回国。

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气焰更加嚣张。已成惊弓之鸟的慈禧太后，决定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

臣”，前往日本办理投降交涉。李鸿章深知这次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问题，奉召到京后首先“访问”列强驻京公使，再次请求美、俄、英、法等国出面干涉，促使日本放弃割地要求。英、美等国公使表示拒绝。俄国公使表面上虚与周旋，暗地里却企图乘机和日本进行分赃。它暗示日本，若能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周围地区享有特权，俄国将支持日本割占台湾。日本探明俄国的真实意图后，进一步坚定了割占台湾的决心，也对割占辽东半岛一事愈加严格保密。

李鸿章争取外国干涉的活动到处碰壁，只得不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他为了不承担割地的罪责，表示只有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后才能赴日。慈禧太后这时称病不出，传话李鸿章，要他“一切遵上旨”，显然也是要推卸这割地卖国的责任。光绪皇帝既不敢与慈禧太后公开决裂，又盼望湘军能在辽东扭转败局，一直犹豫不决。3月初，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光绪皇帝为形势所迫，终于让恭亲王奕訢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及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等人从一开始就摆出了战胜者的骄横态度，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24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4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割

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 3 亿两等内容的媾和条款，条件非常苛刻，清政府指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4 月 10 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话“允、不允两句而已”，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4 月 17 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五）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处在抗敌前线的东北海城、盖平、岫岩等地人民，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并集结义兵十数万，准备继续抗击日军。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发动各省前来应试的 1300 余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废约拒和、迁都再战，并发出改革政治、挽救民族危机的强烈呼吁。台湾省举人汪春源等上书都察院，强烈抗议割让台湾，表达了台湾人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决心。清朝中央及地方许多官吏也为《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杀李

鸿章以谢天下，有的主张废约再战。

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鉴于割地一事太苛刻和全国官民的强烈抗议，曾一度拒绝用宝，还派总理衙门大臣拜见俄、德、法等国驻华公使，请求他们速与本国密商相救办法。但慈禧太后和奕訢、李鸿章等人反对毁约再战，俄、德、法三国也不肯帮助商改条约。光绪皇帝顶不住内外压力，延至5月2日还是批准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这种巨额的勒索，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利权作抵押大借外债，进一步受制于人。至于《马关条约》中准许日本臣民在中国设厂的规定，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前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还不算“合法”，现在却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在中国“合法”地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增强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的通商通航，又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都向帝国主义开放。列强扩大商品倾销，1898年进口货总值比1894年增加了29.3%。同一时期，列强也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土货出口总值增加了19.4%。《马关条约》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富庶的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刺激了帝国主义掠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加深了中国的

民族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通过甲午战争迅速地膨胀起来。它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增加了资本的积累，继续发展军需工业和与此相关的工业，很快地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此，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

四、台湾人民的斗争

台湾人民反对日本 侵占台湾的武装斗争的爆发

《马关条约》一签定，割台的消息便传到台湾。台湾人民“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他们相继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台湾民众集会，宣告饷银不能运走，制造局不准停工，台湾税收全部留供抗日之用。台湾绅民还联名发布檄文，声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坚强决心。

清政府将台湾割与日本，也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许多报纸都充满了反对割台的激烈言论，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各地的爱国士绅和知识分子也纷纷上书政府，痛斥李鸿章割台卖国。还有人赋诗填词，抒发对领土被割让的愤慨。如“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元戎甘割地，上将竟投戈”等联语诗句，对慈禧太后等人的投降卖国进行了抨击。

然而，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悲愤抗议，于1895年5月20日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陆续内渡”，撤出台湾。与此同时，清政府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由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会见日本“台湾总督”，将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以及台湾的所有兵工厂、公物财产等清单交给日本。台湾就这样被出卖了。

台湾绅民决心自谋保台之策，在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的倡议下，5月25日，组织了抗日政府，定名“台湾民主国”，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于清朝之意；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台湾民主国”是在台湾已经成为“弃地”的情况下，由当地士绅联合清朝命官为御敌保台而建立起来的，是台湾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的产物。

日本为逼迫台湾人民投降，于5月27日派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分两路进攻台湾。5月29日，一路日军从三貂角强行登陆。6月1日，另一路日军攻占基隆。这时，曾经扬言要守卫台湾的唐景崧和一些地主士绅，纷纷内渡逃命，把大量武器军火留给了敌人，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台北。6月17日，日本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台湾总督正式成立，表示要坚决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不甘当亡国奴的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以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人为首，与台中驻防的清军联合抗敌。刘永福也率军队坚守台南，与台湾人民共同抗击日军。

6月中旬，日本近卫师团兵分两路进犯新竹，以打开通往

台中的门户。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人率义军和清军分统杨载云分路迎战，据险阻敌，一直坚持到6月22日，才因军械不继、粮食断绝而后撤。新竹失陷后，各路义军继续活跃在城外四周。7月10日，吴汤兴联络各军在新竹城东的十八尖山和虎头山与日军展开激战，损伤很大。姜绍祖被俘牺牲，徐骧、吴汤兴被迫率部突围。

台中、彰化保卫战

从8月初到9月下旬，台湾义军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保卫台中。这一时期的主要战斗有：尖笔山、苗栗、大甲溪、八卦山、彰化等地的争夺战。

尖笔山之战

日军南犯台中，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夺取尖笔山。尖笔山位于苗栗镇以北，是义军防线的前哨据点。集结在这一地区的义军有吴汤兴、徐骧、李惟义、杨载云、陈澄波等部7000余人。当时日军在前线的兵力约1万余人，并有海军配合作战。

8月7日，日军出动两个支队，扫荡活动在新竹和尖笔山之间的义军，在水仙岭与陈澄波所部义军遭遇，经过激战，义军败退。次日黎明，日军分左右两翼，向尖笔山前的枕头山和鸡卵面义军阵地发动进攻。吴汤兴、徐骧所部义军，奋勇抗击，又败退。9日，日军以3个联队的兵力在军舰配合下，向尖笔山和头份庄发起攻击。日军1个联队在凌晨5时进攻头份庄，杨载云率部抵御，大挫敌军，日军正面进攻不能得

逞，便抄袭杨部后路，切断杨载云部与其他义军的联系。杨载云部孤军作战，不稍退避。最后，这支新楚军将士大部战死，杨载云也中弹牺牲。

向尖笔山进攻的日军另两个联队，在军舰协同下，以猛烈炮火轰击义军，坚守尖笔山的徐骧部，巧妙地利用地形，抄袭日军，给进攻之敌以较大杀伤。终因力量悬殊，义军被迫转移，尖笔山又陷敌手。

日军于8月13日进攻苗栗。守军吴彭年部不畏强敌，与日军1个联队展开激战，损失较重，被迫撤退，14日，苗栗沦陷。

大甲溪伏击战

大甲溪为台湾一条大河，成东西向奔泻于苗栗、台中、彰化间。河两边竹林丛生，山谷险峻，是一道天然屏障。徐骧退守大甲溪后，与吴彭年计议，决定在这里伏击日军。

22日，日军两个中队南犯大甲溪，埋伏于南岸的吴彭年部，乘日军刚过溪岸不备，发起猛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回渡。待日军回渡到中流时，伏于北岸竹林中的徐骧率众杀出，给日军以重创，日军大败溃退。

次日，日军集中主力，再度进犯。当时，吴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带由黑旗军管带袁锦清与徐骧部民团，共同防守。袁锦清与徐骧谋划，分兵包抄日军，由新楚军统领李惟义为后援。日军收买土匪，伪装义军，由后面袭击新楚军，李惟义部溃逃。在前方作战的义军闻讯被迫后退，袁锦清率兵5000余人断后，扼守大甲溪阻击日军，敌军迫近时，

袁锦清率队出击，全队壮烈牺牲。徐骧率民团与敌死战，冲出重围，退往彰化，日军渡过大甲溪。

日军越溪后，以全力扑犯台中。义军统领陈尚志等部千余人，与日军激战一昼夜，台中又陷入敌手。

争夺八卦山

日军占领台中，进攻彰化。义军在彰化城东八卦山与敌人展开激战，这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八卦山位于彰化城东 1 公里处，是彰化城的制高点和天然屏障，形势险要。当时防守彰化的部队，除了从各战场聚集来的各路义军外，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共约 3600 余人。在日军进攻前，义军的防御部署：王德标、刘得胜各率部守中寮庄；徐骧、吴汤兴、汤人贵、罗树勋等率部守八卦山；李惟义守彰化城。

8 月 27 日，日军近卫师团主力分三路向义军进犯。右路两个大队由陆军少将川村率领；左路两个联队由陆军少将山根率领；中路 3 个大队由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战斗发起后，守卫八卦山的义军奋勇抵抗，激战一天，日军不得进。入夜，日军左路从大竹庄附近山谷僻径，悄悄爬上八卦山，匍匐到山顶。28 日晨，当义军发现时，敌军已布满山谷，并接近八卦山东侧高地。义军汤人贵、李士炳、沈福山等立即率部扑向这股日军，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八卦山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杀声震野，双方为争夺八卦山阵地展开了殊死战斗。义军首领吴汤兴、汤人贵、李士炳、沈福山等壮烈殉国。只有徐骧率部杀出重围，退往台南。

徐骧率部且战且退，突出重围时，吴彭年正率部在大肚溪南岸同日军右翼队激战，遥望八卦山危急，急忙率众回救八卦山。吴彭年身先士卒，率义军奋勇登上山头，与日军白刃相搏，大创日军。吴彭年壮烈牺牲，义军大部战死，八卦山失守。

日军占领八卦山，居高临下，向彰化城实施炮击。城内秩序大乱，日军乘势进攻。城内老弱妇幼奔出西门避难，正与敌军相遇，尽被杀戮。日军入城后，义军与敌人巷战半日，守将李仕高、沈仲安、杨春发战死，义军全部殉难，彰化陷敌。

就在彰化失守的当天，日军乘义军败退之机，迅速抢占了鹿港。此后，日本近卫师团按照桦山资纪的命令，除向台南方向进行搜索、警戒外，暂停向南进军，避免孤军深入，遭受损失。

反攻彰化

彰化失守，嘉义吃紧，台南震动。刘永福“亲赴嘉义前敌诸营，指授兵机。”命令王德标率七星队坚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率军5营奔赴前敌，发动当地民众，组织武装，抗日自卫。同时派人联络附近的简精华、黄荣邦、林义成等义军，共同抗敌。

8月30日夜，杨泗洪率部进攻大莆林，简精华、林义成等率义民数千人助战。当时，日军占领大莆林，散居民家，警戒疏忽，给义军以可乘之机。杨泗洪率百余人连夜摸至敌营附近，四处纵火，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一场激战，日

军大溃，仓惶逃窜，义军乘胜追击。退路中的一座桥梁被义军拆毁，日军走投无路，只好拼死抵抗，激战持续到深夜。正当日军精疲力尽之时，义军黄荣邦、林义成等又率众从敌后抄袭过来，前后夹击，日军四散奔逃，义军一举收复大莆林。这场战斗义军歼敌数百，战果显著。副将杨泗洪和管带朱乃昌，在战斗中不幸中炮身亡。

杨泗洪，早年参加抗法斗争，屡立战功，后被台湾巡抚刘铭传聘任到台湾负责教练军队，以副将署台南镇总兵。日军入侵台湾时，杨任刘永福黑旗军协统。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被誉为“黑虎将军”，最后，为保卫台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杨泗洪牺牲后，刘永福令萧三发统率其众，令简精华、简成功父子统领民团，令黄荣邦率义民 2500 人、林义成率义民 3000 人，随简精华大队前进，准备收复失地。

9 月 1 日，王德标率七星营与简精华等义军，合攻云林县城，日军弃城溃逃。王德标会合义军追击，将日军冲为两股：一股窜入山林，被林义成部切断退路，予以全歼；另一股逃回彰化。2 日，义军又乘胜收复苗栗，日军也退入彰化。黑旗军和义军反攻云林等地获胜，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军民的抗战热情，参军者日众，义军队伍发展很快，准备乘胜收复彰化。

4 日，萧三发督率各军包围彰化城。彰化地势险要，日军拼死抵抗，炮火猛烈，义军几次攻击均未得手。只好在彰化城外，择地屯驻，包围封锁。彰化日军连遭打击，士气消沉，无力反击，只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包围彰化城期间，义军组织了多次围攻，紧缩了对彰化的包围，打得日军龟缩城

内，胆战心惊。台中附近居民也纷纷组织“联庄”，协同抗敌。一时之间，台中抗日形势甚好。

但是，黑旗军、义军经过长时间战斗，人力、物力消耗太大，又得不到外援，弹药将尽。而日本大本营为支援近卫师团，已从辽东半岛抽调了第二师团以及国内的后备部队、要塞炮兵及宪兵队等共2万多人，于11日到达台北。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义军决定攻城，希望夺回彰化，以扭转战局。

23日，各路义军向彰化发动总攻。日军负隅顽抗，终不能克。24日，黄荣邦率部猛攻炮台，不幸中弹牺牲。25日，林义成率部再战，亦受重伤。其后，日军大队反攻，萧三发指挥部队力战，受重创。徐骧、简精化率义民往援，由于损失惨重，弹药告竭，实力大减，已无力再攻彰化。从此，义军只得采取守势。

台南之战

日军得彰化，大规模南进，谋取台南。日军在海上集结兵力，配合陆军进攻，水陆并进，夹击台南。

日军南犯

9月16日，日军在台北东瀛书院成立了南进军司令部，统一筹划进攻台南事宜。日军南进军的总兵力约4万人，其作战部署是：以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主力约1.5万人，从彰化南下，经嘉义，由陆路直扑台南。由辽东半岛调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约2.5万余人，在师团长乃木中将的率领下，由海路进攻台南。第二师团主力兵分两路：其第四混成

旅团主力约 1.2 万余人，在旅团长伏见率领下，于嘉义西部布袋嘴港登陆，沿海边直扑台南前侧；其第三旅团主力约 1.2 万人，由山口少将率领，在枋寮登陆，经凤山（今高雄县）向台南后背进击。海军配合陆军攻击安平、打狗等要港。

10 月 1 日，日军近卫师团攻击萧三发的队伍。萧三发率众力战，身负重伤。徐骧和简精华率义军鼎力相助，相持数日，最后义军弹尽粮绝，被迫后退。日军遂兵分三路南进。

5 日，王德标所部义军在西螺溪、中浮州等处迎击日军，接战不久，即经尧平退至斗六镇。6 日晨，日军进犯西螺镇，义军廖三聘在镇内坚持抵抗，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纵火围攻，义军败退，西螺镇失陷。7 日，日军相继占领斗南镇、土库庄，并向斗六镇发起攻击。义军兵单，主动撤退，斗六镇也于当日失陷，义军各部撤至大莆林。8 日，日军乘胜攻击大莆林。义军分路御敌，日军付出了很大代价，近卫师团第二旅团长山根少将身负重伤，不久死去。义军力量单薄，日军再次攻陷大莆林，直指嘉义。

嘉义地雷战

8 日，日军兵临嘉义城下。早在日军到来之前，守将王德标与徐骧、林义成等商议，日军来势凶猛，无法硬拼，决定巧设地雷阵，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他们事先在城外义军营地中埋设众多地雷，并进行伪装。布置停当，义军撤入城内，徐骧、林义成率部分义军埋伏营地两侧。当晚日军到来之时，义军放了一阵枪，佯装败退入城。日军以为义军退走，即占据义军营地宿营。半夜，王德标派人潜至营地，点燃地雷药

线，各处地雷连续爆炸，炸死炸伤日军 700 余人，能久亲王身受重伤，不久也死去，义军大胜。

9 日，被激怒的日军集中炮火猛轰嘉义城，集中兵力向嘉义城发动总攻。徐骧登上城楼，持刀指挥作战。总兵柏正才、守备王德标以及义民领袖简精华父子均率部力战，双方伤亡惨重。义军首领柏正才、刘步升、杨文豹等人壮烈牺牲。午后，日军破西门，涌入城内。城内义军一面奋力抗击，一面夺路冲杀，冒着猛烈的炮火冲出重围，退至城外。嘉义县城失守，王德标和徐骧等退守曾文溪。

保卫台南

正当嘉义保卫战激烈进行时，日本南进军司令官高岛鞞之助由基隆到达澎湖，部署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水陆合攻台南。

10 月 10 日，近卫师团由嘉义向台南进犯，第四旅团在布袋嘴登陆。11 日，第三旅团在枋寮登陆，海军同时出动 6 艘军舰进攻打狗港。

在日军的三面围攻之下，形势对义军越发不利。义军经过 4 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伤亡严重，弹药缺乏，孤军奋战，反割台斗争已处于十分危急时刻。这时，曾严拒日军诱降的刘永福，也感到大势已去，开始动摇，通过英国驻台领事欧思讷向日军求和。日军认为胜利在握，拒绝了刘永福的要求。但是，广大爱国军民决心抗战到底，誓死不向侵略者低头。10 月 11 日，日军近卫师团前锋抵近盐水港附近村落时，遭到义军袭击，伤亡 10 余人。18 日，义军 4000 余人在李翊安指挥

下，与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的一个联队，在王爷头附近展开激战。义军以村落、民房和大堤为掩护，坚守阵地毫不退让。许多义军士兵，英勇战死在阵地前沿，就连日军也不得不称赞这些士兵，“其勇敢真值得赏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15日，2000多名日军在“吉野”、“秋津洲”等6舰掩护下，占领打狗港，立即进犯台南，沿途不断遭到义军的伏击。16日，日军一个骑兵队行至二层溪时，遭到义士郑清部700余人的袭击，被击毙骑兵10余人。20日，由布袋嘴登陆的日军一个联队，渡曾文溪犯东势寮庄。徐骧等率义军及高山族同胞700余人，在溪尾庄附近迎敌。这里距台南府城仅20公里，是府城外围的要地。日军集结大量兵力，义军与敌人展开了最后决战。日军依仗其精良装备和优势兵力，马步并进，义军官兵凭着爱国热情和民族义愤，毫不畏惧，在激烈的炮火中奋勇冲杀，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徐骧中弹身亡，王德标、简精华下落不明。

徐骧，苗栗县庠生。甲午战前执教于头份庄。日军入侵台北，徐骧组织义军杀敌报国。先后驰骋在台北、台中、台南各战场。几乎每次重大战斗都有徐骧率领的义军参加，他在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中，立下不朽功勋，至今犹为人们所怀念。

当义军在曾文溪与日军决战之前，另外两路日军已进逼台南城下。刘永福部柯壬贵率部坚守，与敌血战。18日，刘永福集众会议，商战守计，未得结果。19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守军顽强抗击，毙伤敌数十人。入夜，日军攻城

益急。刘永福违背自己的誓言，抛下正在与日军殊死搏斗的抗日军民，与随从 10 人，从安平乘英国商轮多利士号逃回厦门。

刘永福去后，台南城抗日武装失去指挥，顿时大乱。21 日，日军攻入台南城。11 月，日军占领台湾所有重要城镇，但是，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达 7 年之久。

台湾军民抗击日寇入侵的作战，是甲午战争的继续。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台湾人民空前广泛地动员起来，踊跃地参加抗日斗争，用鲜血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他们虽然缺少武器，没有外援。但有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巧妙地打击敌人，将入侵台湾的两个师团日军“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势的猛烈的游击活动和疟疾之中。在 4 个多月的战斗中，日军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 4800 名死亡和 2.7 万名负伤的巨大代价”，日本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比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死伤的人数多了将近 1 倍。台湾军民用自己浴血奋战的事实，向全世界表明：台湾人民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侮！

第六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三国干涉还辽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了急先锋。它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工业比较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同英、美等列强竞争，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大领土的办法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将该路穿越中国东北北部，从而控制这一地区。1895年初，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

竟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不久，日本战胜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任所为，财政大臣维特还强调说：“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核心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认为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尽管它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这次却一反常态欣然同意与俄、法两国在远东合作。其目的，一是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设法松动和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二是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减轻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三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感激，实现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冒此风险，也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

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

二、帝国主义在中国 划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

三国干涉还辽是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在“还辽”事件后，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主张“一意联络俄人”，牵制其他列强。俄国便利用这一点，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报酬”。这年冬天，它就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舰到胶州湾“过冬”的权利。

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国准备利用这个机会，与清政府的贺冕专使秘密谈判。清政府原拟派遣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彼得堡参加典礼，但俄国政府表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要求改派李鸿章为专使。于是，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邦交”。

李鸿章奉命出使的消息一发表，西方列强便纷纷来电，请他先赴西欧和中欧。俄国急派专使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俄国。4月30日，李鸿章达到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5月3日，李鸿章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于6月3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有：（一）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朝

两国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二)战争期间，中国所有的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三)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铁路以达海参崴。该路的修筑和经营，由中国交与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其详细合同由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道胜银行商订。(四)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品。

表面上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实际上，俄国的目的是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自己的势力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正像维特所说，中东铁路的修建，必然“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都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又强迫清政府于1896年9月8日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设立了名为中、俄合办实由俄国独揽大权的所谓“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俄国在铁路沿线享有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矿企业的权利，实际上把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国的这一系列活动，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他们纷纷在中国强占港湾，掠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

德国在甲午战争前就垂涎我国胶州湾。1896年12月，它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要求。鉴于这时俄国舰队已在胶州湾攫得“过冬”权利，德皇威廉二世又于1897年8月访问俄国，就侵占中国胶州湾问题同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1月14日，德国借口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占领了

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紧接着，俄国便于12月中旬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事后，俄国对德国占领胶州湾“表示感谢”，说什么“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找到一个口实”。

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将胶州湾租给德国，租期99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二）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地以达济南及山东边境，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莱芜以达济南。铁路沿线两边各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商有权开采。（三）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人、外资和外国器材时，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通过这一条约，德国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继德国之后，俄国又于3月27日同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并于5月7日订立《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在租期内旅顺口和大连湾完全由俄国管辖。（二）租借地以北设一“中立区”，该地区内的行政由中国官吏主持，但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等，都不得让与他国。（三）允许中东铁路公司修筑一条支线，把中东铁路和旅顺口、大连湾连接起来，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利权不得让与他国。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设首席长官管理行政。这样，不仅辽东半岛完全落入俄国手中，东北全境也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 1895 年就强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7 年 3 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 年 4 月，法国再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并于 1899 年 11 月 6 日正式和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 99 年。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从越南边境至昆明和从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并逼迫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两广割让给他国。从此，滇、桂、粤三省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法、俄两国在掠夺中国权利的过程中互相支持。法国驻华临时代办吕班在给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的报告中说：关于强租广州湾一事，“我得到俄国代办的支持，有如对类似情况我所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英国为了抑制法国在西南两省的扩张，于 1897 年夺取了中缅边境上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南碗（猛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以及开辟广东三水、广西梧州等地为商埠。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英国立即要强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并于 1898 年 6 月 9 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为期 99 年。至此，连同香港本岛、南九龙半岛和昂船洲，便是今天的香港。

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东北地区南下，英国又要求按照租让旅顺口的同样条件租借威海卫，并于 1898 年 7 月 1 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海湾同刘公

岛和威海卫沿岸 10 里宽的地段的租借权。

英国为了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又于 1898 年 2 月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也不甘落后，于 1898 年 4 月 22 日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意大利也于 1899 年 3 月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浙江沿海的三门湾，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清政府的拒绝，没有得逞。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最后总是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它们相互之间的妥协。1896 年，英、法两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权利，都由英、法两国共同享有。1898 年，英、德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这些协议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背着中国订立的分赃协定，既是他们之间暂时妥协的产物，也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屈辱地位和险恶形势。

当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划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顾及中国。然而，美国丝毫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在 1899 年 3 月 1 日向国务院报告说：“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但是，这一省加上可供整个华北出口的天津，将来必然成为东方具有永久商业价值的占领地之一。”后来，美国海军部企图租借三沙湾或舟山群岛，但因和英国利益冲突而没有如愿。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的基地。接着，美国政府于

1899年9月至11月由国务卿海约翰出面，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门户开放”的基本内容是：（一）各国对他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任何势力范围、租借地、通商口岸和既得利益，不得干涉。（二）各国对运往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率征税。（三）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当他国使用自己所修或所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

美国在1899年9月6日致英国的照会中还提出：美国希望中国“为全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消除国际摩擦的危险根源，从而使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防止列强瓜分中国，以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当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自信能凭借雄厚的资金和物美价廉、不断更新换代的精美产品称霸中国市场。其他列强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不完全一致。未能取得势力范围的意大利首先赞成。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德国、日本和法国也表示接受。拥有对华贸易绝对优势的英国，虽然衷心赞同，却将刚在九龙半岛取得的“新界”，保留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范围以外。经济落后的俄国，对于关税问题应由中国本身决定一节闪烁其词地作了保留，对于航行税和铁路优惠运费也没有正面答复，显然是勉强地予以承认。美国对列强基本上赞同“门户开放”政策十分得

意，认为这是“在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比此次更光辉和更重大的胜利”，“它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1922年，在列强组织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门户开放”政策得到正式承认，作为列强对华侵略的政策原则而被载入《九国公约》。

三、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

（一）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 《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政府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赔款 20000 万两，后来又加上赎辽费 3000 万两。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 8000 余万两，根本无力筹划。列强认为这是掠取特权的大好机会，争相兜揽借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 3 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

第一次是 1895 年 7 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清政府原想通过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第一期赔款，遭到俄、法、德三国的极力反对。它们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揽借要求。清政府屈服于三国压力，决定向三国分借。俄国仍不满意，便挤掉德国，与法国合作争得了第一次借款。1895 年 7 月，《俄法洋款合同》签字，又称《四厘贷款合同》。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性大借款的开端。“俄法借款”的总额为 4 亿法郎，折银 9800 余万两，由

四家俄国银行和六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折扣 94.125，年息四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 36 年还清。俄法集团通过这笔借款，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中国海关在 1896 年增加了俄、法人员名额，因此发生了俄、法两国与英国争夺中国海关控制权的严重矛盾。

第二次是 1896 年 3 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1896 年初，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二期对日赔款。英国抢先和被俄、法撇开的德国联合，并责成两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强硬宣称：这次如不向英、德借款，将“不惜诉诸武力”。美国也想分润利益，俄、法还想继续出借，闹得总理衙门像个大拍卖场。经过一场激烈争夺，英德集团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第二次借款权。3 月，《英德洋款合同》（又称《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签字，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折银 9700 余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分摊贷给，九四扣，年息五厘，以海关收入的为担保，分 36 年还清。借款合同还规定，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从而使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行政 36 年的保证。

第三次是 1898 年 3 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清政府从 1897 年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英德集团再一次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这次借款权。1898 年 3 月，《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又称《英德续借款合同》）签字，借款总额 1600 万英镑，折银 1.12 亿余两，仍由汇丰、德华两银行贷给，八三扣，年息四厘五，分 45 年还清，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及宜昌、鄂岸盐厘为担保。通过这笔借款，英国又获得控制上述各地常关 45 年的保证，此处还取得了一些地区的厘金抵押权。

除以上三次政治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借款。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4.51亿余两白银，约为当时财政收入的五倍半。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部分内地的盐税、厘金、外贸和运输；也使亏空骤增的清政府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二）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 法国在争夺中捷足先登。1895年9月，它借助刚争得《俄法洋款》的优势，向清政府要求由法国“费务林公司”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经“镇南”关到广西龙州的铁路，并于次年6月5日签订了这项合同。这是法国后来强修滇越铁路的先声，从此开了外国侵占中国铁路线的恶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自然十分眼红，群起争夺芦汉、津镇、粤汉、京奉等铁路干线的投资权，从而使争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逐渐达到高潮。1897年7月到1898年6月，俄法集团几经钻营，利用比利时银行团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投资、修筑的经营权。俄国的势力从此可由东北地区直趋南下，沿铁路线伸入河南和湖北，在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打开了一个缺口。英国为了减轻芦汉铁路的重要性和阻挡俄、法插足长江流域，争揽到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要求。清政府迫于压力，表示除津镇路另行商议外，其他完全接受。

清政府之所以不敢答应英国修筑津镇铁路，主要因为该路直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地位极其重要，而且

美国和德国早已开始争揽。当英国提出修筑这条铁路的要求时，德国竟向清政府表示：德国在山东有修筑铁路的独占权，如果这条铁路不由德国修筑，就不能穿过山东境内。英国被迫和德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两国共同分割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作为条件，来换取德国在津镇铁路上的让步。德国觊觎非洲已久，愿与英国妥协。双方议定：天津到山东南境的一段由德国修建，镇江至山东南境的一段由英国修建，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此外，双方还议定：英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长江以南各省和北经河南至山西；德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山东省以及自黄河沿岸至南京一带。这项协定表面上是划分在华铁路投资范围，实际上却公开承认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英德协定签订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承筑津镇铁路的要求，并于1899年5月18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

美国在争夺津镇铁路的过程中受到英、德两国的排挤，很不甘心，便于1898年4月夺取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不久，美西战争爆发，修建粤汉铁路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这时，德国倡议欧洲各国干涉美西战争。英国便乘机以反对这一倡议作为交换条件，于1899年2月与美国签订协定，议定美国所取得的粤汉铁路允许英国投资，英国所取得的广九铁路也容许美国投资，从而瓜分了粤汉和广九两条铁路的投资利权。

英国虽然早在1898年6月就争得了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但由于俄国的反对，清政府不敢批准借款合同。10月18日，俄国警告英国说：“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界接壤的中国各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英国

被迫与俄国寻求妥协，双方于 1899 年 4 月达成协议，议定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铁路投资；英国则保证不在长城以北地区进行铁路的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投资。从此，双方互相划定了在华的铁路投资范围，瓜分了中国铁路权利，进一步巩固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先后通过八次铁路借款，共贷给中国 8967 万元，夺取了长达 1.9 万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不仅通过输出资本榨取巨额的利润，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可见，投资和修筑铁路已成为甲午战后列强在华争相输出资本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

（三）投资中国矿山 1896 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效尤，诱迫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到 1899 年，美国先后夺取了山西平定、盂县煤矿的开采权和四川麻哈金矿的开采权；英国先后夺取了四川全省和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以及河南怀庆附近地区的矿产开采权，还夺取了热河朝阳煤矿的开采权；俄国除了夺得中东铁路及其支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外，还攫取了新疆全省金矿的开采权；法国先后取得了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煤矿的开采权和四川金矿的开采权；德国先后取得了山东胶济铁路两旁的沂水、沂州、诸城、潍县、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

（四）在华开设工厂 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已有 80 余家，资本总额约为 2800 万元，其中多属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1895 年至 1900 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 933 家，资本雄厚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增裕面粉厂、鸿源纱厂、三井制面厂、美国机器碾米厂和美国纸烟公司都是这时期建成的。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并把上海变成了它们在华纺织业的中心。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迅速发展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这个时期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继续增长，中国的入超越来越严重。在 1890 年至 1894 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 1.4 亿多海关两，出口总值为 1 亿多海关两，入超额是 3000 多万海关两。而 1895 年至 1900 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 2.1 亿多海关两，出口总值为 1.5 亿多海关两，入超额增至 6000 多万海关两。中国的出口货物中，除茶、丝之外，毛类、豆类等原料作物和草帽缣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进口的货物中，又以棉布、棉纱、煤油、纸烟、面粉、钢铁、杂货等日用工业品居多，很少有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城乡手工业的破产。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沿海地区，而且在内地也日益明显。例如由于煤油输入的激增，中国的白蜡制造业逐渐衰落，植物油的销售也在部分地区受到排挤。土纱土布被洋纱洋布排挤的程度更为严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停织的现象。

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也刺激了中国农村某些经

济作物的生产。当时，像蚕桑、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的生产，由于国际市场的需要，都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大豆，由于出口量急剧增长，种植面积也跟着迅速扩大。与此相反，中国一向远销欧美、日本和朝鲜的蔗糖和蓝靛，这时却由于欧洲和爪哇甜菜糖的发展以及德国洋靛的畅销，一蹶不振。种植甘蔗、蓝靛的土地，纷纷改种杂粮。由此可见，中国某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本国经济的需要，而是受到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

中国对外贸易早已掌在外商手中，进出口货物均被少数外商垄断。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畅销和农产品的大量输出，到19世纪末，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已经为外商所控制。他们以雄厚资金为后盾，操纵市场，任意抬高或压低货价。中国的商业资本不得不仰承外国资本的鼻息，或成了替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工具。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第二节 戊戌变法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些爱国的官僚、士

绅、商人及其知识分子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他们要求自办铁路，设厂采矿，以抵制洋商洋厂。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洋务派失去对近代工业的垄断；清政府又因财政拮据，无力投资新式企业；而《马关条约》允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促使清政府再也不能对民间的设厂限制过严。民办工业逐步挣脱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的桎梏，从而使民族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兴办了不少的纺织、缫丝、面粉、碾米等轻工企业。据初步不完整的统计，从1895年至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资金在万元以上的，共有104个，资本总额为2200万元。若除去采矿业，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79个，其资本总额为170多万元，甲午战争后6年间创办的私人资本工厂的投资总额为战前的2.3倍。

在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发展尤其突出。1895年至1899年先后设厂的有上海裕晋纱厂、大纯纱厂、宁波通久源纱厂、无锡业勤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苏州苏纶纱厂、南通大生纱厂以及萧山通惠公纱厂等等。

缫丝工业和轮船运输工业在这个时期也都有较大的发展。此外如酿酒、印刷、火柴、肥皂、碾米、织麻等以及采矿、机器等重工业，均有所发展。不过近代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没有自己的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多数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设备简陋，和同时期在华设厂的外国企业相比，资金少、资本有机构成低，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

民族工业的发展、成长是艰难困苦而又障碍重重的。首先，它遭到列强的廉价商品和雄厚资本的激烈竞争，在外资

的强烈排挤和打击下，常常亏损乃至倒闭，如发展较快的棉纺织工业，由于入口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的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有优势地位，上海及苏杭一带的民族资本纱厂无力与其抗衡。1895 年设立的上海裕晋纱厂，开工不久，就为英国收买，改名为协隆，同年创办的大纯纱厂，1905 年也归日商经办。其他如裕源、新华等厂亦均岌岌可危。缫丝业也遭到外资打击，上海的华商缫丝厂因与外资丝厂争夺丝茧遭受亏损，20 多家华商缫丝厂，到 1898 年全年开工的寥寥无几。其次，它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民族工业虽然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但直到 19 世纪末，清政府仍未给民族工业以真正的保障，在法律上并没有给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利。洋务派官僚还力图把华商的资本变为自己的附庸，各级官吏对兴办民族工业肆意刁难、勒索，束缚和阻碍民族工业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这些都是民族工业无力与外商竞争的重要原因。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但毕竟有了初步发展，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超过了战前 20 多年的总和。当时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的厂矿占总数 42%，资本额占投资总额的 93.3%。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但它还是一支不成熟的政治力量。那时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的厂矿，大都是官僚、地主、商人所投资创办，如宁波通久源纱厂系李鸿章幕僚严信厚所开设，苏州苏纶纱厂系国子监祭酒陈润庠所建立。它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而资本在 10 万元以下的厂矿，主要是一些普通商人和手工业工场主所创办，它们同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势力的联系较少，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下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机以及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因而有着救亡变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它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无决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

总之，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卖国投降、腐朽落后的真正面目。它虽然靠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得以苟延残喘，但困难重重，人心思变，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

对日本的巨额赔款，逼使清政府先后三次举借外债。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2000万两，到1898年又增为每年2500万两，财政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在中日甲午战后几年间，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先后发生严重的水灾或旱灾。1896年，湖北发生特大水灾，灾民“饿殍枕藉”。1897年，湖南出现数十年未有的大旱，安徽、江苏、广东、广西等省因淮河、珠江、西江先后泛滥，一片汪洋，数十万饥民在中国南北各省颠沛流离。1898年、1899年，黄河又连续两年大溃决，直隶、山东沿河两岸多被淹没，死亡十

六七万人，灾情之重为百余年来所未见。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连续增加了数百万两的河工与赈灾费用，又减免了灾区 1000 万多两的田赋，使财政赤字愈增愈大，财政危机日甚一日。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瓜分危机，还使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同程度地对清政府感到失望。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思考民族的前途和救国的出路，并共同地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在清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以上奏疏、递条陈的方式，要求在财政、用人和军事方面进行某些改革。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危机，还进一步加剧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矛盾。慈禧太后在战后仍醉心于自己的大权独揽，依靠后党集团把持军政实权，以削弱光绪皇帝和帝党的势力。光绪皇帝因甲午战争惨败蒙受奇耻大辱深为忧愤，担心国势衰微，外敌环逼，也难以忍受慈禧太后事事干预朝政。他依靠师傅翁同龢和帝党集团，希图改变其处境，并图强御侮，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更趋激化。

面对空前的危机，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试图做一些改革，主要措施如下：

（一）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 年，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练新军，计 5000 人，编成 10 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燏棻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

袁世凯（1859—1916 年），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出身于

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投靠过淮军将领吴长庆，后又攀援李鸿章，得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处境危险，托词患病回国，奉李鸿章之命在辽东前线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后来回到北京，到处钻营，受到刘坤一、张之洞、荣禄、李鸿藻等人的赏识。袁世凯奉命在小站接练新军后，将定武军扩编到 7000 余人，改称“新建陆军”。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在编制上以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为蓝本，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全部使用购自国外的新式武器，延聘德国军官督练洋操。

清政府期望依靠新建陆军振衰起弊。新建陆军由督办军务处直接控制，由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袁世凯也因督练新陆军而受到清政府的特别垂青，1897 年 7 月被提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南京从卫队、护军等营中选拔了 2600 人，按德国章程编为步兵 8 营、炮兵 2 营、马队 2 营、工程兵 1 营，练成了“自强军”。1896 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自强军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续练。

（二）整顿财政 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约 8000 余万两，仅军饷、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现 7000 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 2000 余万两，尚短一千数百万两。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清政府在增捐增税、向人民大肆搜刮的同时，又着手整顿财政。它提出了“裁革陋规，严剔中饱”，令各省督抚严查各地在关税、厘金、盐课和田房税契等

管理上的种种弊政，并委派军机大臣刚毅南下江苏、安徽、浙江、广东各省监督执行。刚毅所到各省，责成各级官吏将他们平时营私玩法所得的不义之财上交国库，并依据情节大小扣了这部分官员的“廉俸”，结果收回了1000多万两白银。

此外，清政府还决定用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1亿两，年利5厘，20年内归还。它号召王公贵族和文武官员带头“领票缴银”，以推动各地商民踊跃认购。但清政府已在人民中失去信用，各级官员又借机强行摊派，结果引起不满，不得不在筹到1000多万两时就停止发行。

（三）派遣留学生 清政府有些官员鉴于日本自强得力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陆奥宗光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有的大臣还大奏折中指出：日本的成绩经验最适合中国采用，到日本留学路近、省钱、文字困难又少，是解决贯通中西人才的最好捷径。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清政府在1896年3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13名。此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

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新军编练的主要受益者是袁世凯。他不仅因此得到清政府的提拔，而且引起了列强关注。俄、英、日等国经常派人到小站“观操”，不断吹捧袁世凯治军有方，试图控制袁世凯，进而把新建陆军变成他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工具。袁世凯自然明白他的身份荣誉都来自新建陆军，因此越发苦心经营和控制这支军队，以此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

和工具。至于财政整顿所收款项，对于巨额的赔款和赤字来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派遣留学生中的多数人，后来都走到了清政府愿望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其统治危机，更谈不到给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提供转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仍然与日俱增。

三、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兴起

甲午战争的丧师、割地、赔款，使中国面临瓜分危机，这首先惊醒了当时的知识界，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再不改革政治，必将灭亡。

曾国藩、李鸿章、奕訢最后凑上张之洞，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全都破了产。有人给他们算了笔细帐结论说：“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加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稍有救乎？”这里提出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真理，渴望向西方学习，这与清廷官僚的兴办洋务，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前者早在40年代就开始，清廷不予理会，他们出于爱国心肠，始终向前探索，不断进入新的境界。从60年代起，清廷从“和戎安内”的观点出发，支离破碎地摭拾一些西学皮毛，发动了所谓“洋务”，目的仅在于追求船坚炮利，同时坚决排斥进步思潮，因此它具有极大的闭塞性与反动性，这与前者是两码事。由于一些

成熟的或不成熟的进步思想家，居于洋务官僚的幕僚地位，或者直接参加了洋务机构，例如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等人，因而两者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个别人甚至受到舆论指责为“汉奸”。而这些人在本末之辩、体用之辩、保持现状与变法之争、爱国与卖国的分野这许多方面，都站在进步一边，与洋务官僚是矛盾着的。放眼世界，探索摆脱封建枷锁之道呢，还是袭取一点西学皮毛，安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现状呢？两种倾向根本不能调和。但时世急剧变化，90年代又有新的号角声吹起，有人站出来指责洋务官僚是“奸蠹”，是“巨害”了。这是新的时代潮流赋予的使命，这种呼声与前此倭仁、刘锡鸿之流誓死与新学为敌的狂吠恶骂，完全是两回事。甲午是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先进的思想家宣告了30年官僚洋务的彻底破产，指为奸蠹与巨害，他们是掌握着时代的脉搏来发出呼喊的。

30年来爱国知识分子对外患的看法，在魏源时代是恢复“圣武”问题；到冯桂芬时代，是争国家体面问题；中法战争时期，痛感到“百十年中国膏血之枯竭”，幻想以商战解救危机；甲午战争后，更多的人感到面临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了。早在战争前两年，军机处章京、曾到港澳考察的陈炽所著《庸书》就痛切陈辞：“琉球、越南、缅甸，其亡不旋踵焉；日本，变法者也，而至今存焉，强且富焉；暹罗、朝鲜，欲变而未变者也，其势岌岌然如不终日。”他敲起警钟：“堂堂中国，有器无人，遂将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复辙……。”（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无限悲愤，时常“高歌痛哭”，越年即含恨去世。）这是要求变法的一声响亮的号角。

什么“同治中兴”，“自强新政”，吹嘘了30年的神话一齐成了肥皂泡，幻灭了。人们惟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来“救亡”，而要救亡图存就非变法不可。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想望着中国出一个彼得式或明治式的皇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

四、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

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政治演出。

19世纪9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与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竭力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甲午战败，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且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以新的姿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向着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在痛斥封建顽固势力的同时，也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种种失误和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要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取

得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实行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为此，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借取了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封建顽固思想和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判。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从19岁开始又到广州，在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致力于“济人经世”之学。这使他对乾、嘉以来流行的“汉学”表示怀疑和反对。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贫弱和民族的危亡，使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深感不满。1879年，他在家乡西樵山“专讲佛道之书”，与来游的同乡京官张鼎华相晤。在与张的交谈中，“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同年，又到香港旅行，“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882年，应顺天乡试不中，在归途中，路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开始讲求西学，努力阅读江南制造局和外国教会翻译的西书及《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从此，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要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进步得多，决心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志在救国救

民的康有为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愤发图强。1888年，他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面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的严峻形势下，“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成法，力求自强。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封上书没有递到皇帝手里。但它却在一些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人士中辗转传诵，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影响，也使康有为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从此，康有为就开始了他倡导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

第一次上书不达，康有为于1890年1月返回广东。同年春，晤见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其启发，将今文经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经的“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人类社会进化的系统程序。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中国儒家的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就成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两个来源。他根据这个思想学说，构筑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1891年，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表面上不谈政治，实际上是在用他的政治理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积极培养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学宫万木草堂。学生中除陈千秋、梁启超之外，还有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徐勤等。从1889年到1895年，他先后出版了《长兴学记》和《桂学答问》两本讲学记录外，又在陈千秋、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是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8月刊行。在这本书里，康有为以极大的勇气对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表示强烈不满。把自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人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统统说成是刘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子之经。他的这种大胆言论，无疑是从根本上对“汉学”和“宋学”的严重打击，在学术上是要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上是要抨击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主张，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康有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却在沉寂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声惊雷。从来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大胆地向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发起挑战。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封建卫道者们的仇恨和攻击，他们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僇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于是借一用周礼之王莽、附王莽之刘歆以痛诋之”。也有人惊呼：《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在顽固派的攻击下，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下令严禁该书流传。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重要著作。他从1892年起就在陈千秋和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精心撰写此书，直到1898年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在此书中，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

“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所谓“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附会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但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所取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永远不可更改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茫无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为“六经”，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宣传孔子自己“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倡“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改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同时也把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说成是符合孔子道统的真谛。他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就是要向人们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就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完全合乎“圣人之道”。

《孔子改制考》的问世，立即遭到顽固守旧派更猛烈的仇视和攻击。叶德辉说，康有为利用孔子宣传托古改制的理论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御史文悌在严参康有为的奏摺中，说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阐发的理论，是“灭圣经”、“乱成宪”的叛逆行为，要求将该书毁版，将康有为处死。顽固守旧派的这种攻击，表现出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极大恐惧，同时也反映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统治阶级中产生了重大反响。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授徒期间，还继续编著从1885年开始着手的《人类公理》。在这部书里，他要求人类社会能够实

现“平等公同”，希望有一个“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统一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子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两部理论著作，两书的先后问世，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梁启超曾说：如果把《新学伪经考》比做“思想界之一大飓风”，那么《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喷发”。因为在此以前，思想界还从未有过这样骇世俗谷的新奇理论。康有为不论是指斥刘歆为新莽篡汉而制造“伪经”，还是借用孔子宣扬“托古改制”，其目的均不在古而在今，都是利用古书古人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同时，在顽固守旧势力还很强大，封建传统观念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借用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偶像进行宣传，还可以减少来自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压力。正如他自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经过几年的思想理论准备，又有了一批维新志士作为骨干力量，一场以改革封建专制制度、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一俟有了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就将迅速兴起。

五、“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

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对于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以省籍为单位纷纷到都察院请愿，表示反对。在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中，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奔走呼号，发动了1300多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痛切指出形势的危殆，在上书中警告光绪皇帝，如按条约规定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引起列强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即由皇帝下诏罪己，严厉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实行变法，采取“富国”、“养民”、“教民”的各种有效措施，以改弦更张，转弱为强。强调“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重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皇帝如果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法”。还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约十万户公举一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供皇帝谘询，决定“内外兴革大政”。康有为认为“鼓气”、“迁都”、“练兵”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是康有为继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后的第二次上书皇帝。这次上书，不论在政治思想内容上和变法的政治主张上，都比第一次上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可以说，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这就是中国

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但是，这次上书，都察院却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当然也就不可能到达光绪皇帝手里。

“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批举人的这次上书请愿，却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公车上书”被传抄印刷，不胫而走，流传很广。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领袖的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29日、6月30日，他又两次上书。第三次上书基本上是重申“公车上书”中的内容，请求皇帝“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这次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新政不久，即遭甲午之败，他虽然想要有所振作，力求自强，但格于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的掣肘，无能为力。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之后，感到所言痛切中肯，书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危局，因此颇为重视，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康有为在第四次上书中，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为在设议院问题上避免顽固派的反对，也为了消除光绪皇帝的疑虑，他一再解释设立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他说：“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尽管如此，顽固派仍然拒绝代呈。不过，这时光绪皇帝已经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所了

解，并且内心表示赞同。康有为取得光绪皇帝的支持，不但使他本人感到振奋，更加信心十足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也给维新派其他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大体上分为“帝党”和“后党”两大派，也有游移于帝、后两党之间的一些洋务派官僚。光绪皇帝和支持他的帝党官僚，虽然倾向赞成变法，但并不掌握实权，中央军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们把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亲信重臣，他与康有为接触较多，对康有为的才能和见识颇为赞赏。此外，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僚还有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

为了争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维新变动运动，康有为和一些维新志士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很快成社会思潮的主流，维新变法运动了逐渐高涨起来。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开始每期印1000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在京官员。随着变法思想的传播，《万国公报》不久改名为《中外纪闻》，印数也很快增加到3000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进11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活动和倡导之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

员。陈炽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之一，当时任户部郎中，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的危急犹如在列强“磨牙涎舌”、宰割瓜分的险境中，“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在维新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声浪高涨之时，强学会的成立引起了不少官僚的兴趣。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来参加，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为学会捐款，甚至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只是由于名声不好，而被拒绝。

在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来华的一些著名传教士，也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的变法，并极力向中国的维新派施加影响。早在1887年，他们就在上海成立了“广学会”，这个学会一方面作宗教宣传，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一些有关西方近代知识的书籍。强学会成立后，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纷纷加入，甚至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这些传教士都是长期住在中国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并且极力要用西方的面貌改造中国。他们表示热心支持中国变法，但是却并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方案。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名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不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只要中央政府能实行“新政策”就行了。李佳白说：“中国立南北直省，环拱京师，外而督抚将军，内而阁部大臣，俱有专司，以上承天子，意美法良，诚不必如泰西君民共主，政多纷更

也。”他们主张保持清朝原来的政治体制，其目的是在于更进一步控制清朝中央政府。李提摩太在《新政策》最后《目前应办之事》中，列举九项具体方案，其中有八项都提出要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还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内设总管8人，其中4人要由赫德、艾迪斯、科士达、德鲁等在华外国人担任。由外国人指导中国的“新政”当然要符合外国的利益，显然与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目的的维新宗旨相背。然而，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把这些外国传教士引为同调，来往甚密，还希望同他们合作，推动维新运动。这些传教士虽然要通过“传教”来维护西方国家侵华的利益，但是他们也毕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同时各人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并不同样都是帝国主义侵华分子。

强学会成立不久，就吸纳了一批维新派人士和帝党官僚，同时混进了一些首鼠两端的利禄之徒。由于派系各异，政见不一，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一些守旧顽固官僚就散布流言，伺机破坏。1895年10月，康有为留梁启超在北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在南京会见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并于1896年1月创刊《强学报》。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的维新运动也很快开展起来。维新变法的声势愈来愈大，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紧。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首先发难，于1896年1月上疏弹劾，说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随即奉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上海强学会

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三期而终刊。3月间,杨崇伊又奏劾文廷式“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结果文廷式被革职。

强学会被迫解散,固然是封建顽固势力向维新派发动的一次反扑,但同时也与强学会内部组织庞杂、思想混乱有关,有些官僚入会并不是为了维新,而是观望风色,甚至有的别有意图。然而维新运动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止步,维新派仍然继续大力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维新运动在全国许多地区不断发展。经过翁同龢、李鸿藻等的策划,在强学会旧址设立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每月拨给经费1000两,供购买、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之用。上海强学会停办后,由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汪康年于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为主笔,黄遵宪也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工作。《时务报》从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96册。它以新颖的言论,流畅的文笔,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更是势如破竹,震聋发聩,显示了他杰出的宣传才能。

梁启超(17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在他主编《时务报》期间,写了著名的《变法通议》、《议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相嬗之理》、《说群》等重要文章。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

之所敢言矣！”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大胆地宣传“民权论”，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把历代帝王斥之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他还要求改变科举制度，培养有用人才；主张实行“工艺专利”，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梁启超宣传变法图强的政论文字，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数月之间，《时务报》销数增加到一万多份。连张之洞也一度对之大加赞赏，称《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由于《时务报》的有力宣传，不但大大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梁启超的名声也迅速提高，时人把他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

在北京、上海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的维新志士也积极活动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最具有维新朝气的一省。由于一方面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努力倡导，开通风气；另一方面又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的积极支持，湖南的维新运动进行得有声有色。

在湖南，最活跃、最激进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是谭嗣同（1863—1898年）。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少年时代曾在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学习和钻研王夫之和黄宗羲的著作，后来多次游历南北各省，不但眼界大开，还结交了不少维新志士；同时目睹国家的贫弱和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他的救国信念，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走上了救亡爱国的道路。在探索和追

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他逐渐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三纲五常”和封建制度产生怀疑，并且由信奉“中学”转变为热衷“西学”。他努力学习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热烈地主张维新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骨干和杰出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

1896年，谭嗣同到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并志同道合地积极投入变法救亡运动。谭嗣同写过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作过许多鼓吹变法的讲演，并于1897年1月完成他的重要著作《仁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大胆提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痛切揭露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的虚伪性，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特别是对“三纲”中“君为臣纲”的抨击尤为激烈。他说：“2000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在这里，谭嗣同不仅批判了二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同时，谭嗣同表现了追求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精神。他认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只有“朋友”一伦，因而伦理关系就要像“朋友”那样：“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在《仁学》中，他虽然认为中国的危亡“唯变法可以救之”，但就思想深层而言，他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改良的范围，而带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色彩。

谭嗣同发出冲决封建网罗的呼喊，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进行猛烈的抨击。虽然他的变法实践与他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表现出某种自我矛盾，但在当时的维新派知识群体中，他仍然是最坚定和最激进的变革者。

在维新变法思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湖南省表现得最为活跃，最有声势。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各督抚中最热心支持变法的开明大吏。他周围的一批重要官吏，如署按察史黄遵宪、督学江标及继任徐仁铸，都积极支持变法。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以及经学家皮锡瑞等，也在湖南各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理论。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对维新变法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同年10月，陈宝箴又创办时务学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学总教习，以唐才常、韩文举、欧榘甲等为中学分教习。学堂为培养维新人才，不少有志青年纷纷入校学习。1898年春，谭嗣同、唐才常又创立南学会，于长沙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总会每7天举行讲演会，听者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主讲人有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等，他们所讲的内容包括世界形势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南学会与其他各学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但讲学，而且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如倡导设立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式机构，实际上南学会带有地方议会的性质。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新政的逐步推行，谭嗣同和唐才常于1898

年3月又创办了《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创刊以后,对维新变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且对南方各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湖南外,两广地区的维新运动也颇为可观。1897年2月,康有为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何廷光为经理,由他的学生徐勤担任主笔,这是当时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同年春,康有为去广西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创办了《广仁报》。广西的维新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在天津,严复于1895年即在《直报》上相继发表了《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重要政论,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痛切批判封建传统观念。这些文章理直气壮,文笔犀利,是宣传维新变法的有名力作。1897年冬,他又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和《国闻汇编》(旬刊),并介绍了《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名著,影响深远。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后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深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远远优越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回国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目睹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他

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倡“西学”。强调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严复除了撰写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之外，他的更大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尤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在甲午战后译述其中的前两篇，并以《天演论》为书名。在译述时，严复写了序言并加了不少按语，认为“物竞天择”的法则也适用人类社会。他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自己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康有为读到《天演论》译稿后，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第一人，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进化论的历史观。梁启超也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在《时务报》大作文章。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是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严复在倡导“西学”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化进行批判。他认为儒家的政教学说“少是而多非”，至于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更是“无实”、“无用”。他批评洋务派所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国之实弊”，并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一番比较，得出的断论是：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这种对比，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是在当时却是起了解放思想、弃旧图新的作

用。后来他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多部名著。严复以他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重要启蒙思想家和最著名的翻译家。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并且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了一定的准备，从而为开创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创造了条件。

六、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维新运动迅猛发展，使顽固派不仅感到“痛心疾首”，而且引起极大恐惧。他们把维新派视为“洪水猛兽”，通过奏折、书刊和书院的讲坛，对维新派进行攻击，说维新派“心迹悖乱”，是“名教罪人”、“士人败类”、“文妖”，诬蔑维新派的主张是“离经悖道”，是“淫词”、“邪说”，误人子弟，叫嚷“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甚至咬牙切齿要对维新派“离割寸磔”，“处以极刑”。维新派也通过奏折、书刊、讲台进行驳斥。于是，顽固派和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进行：

（一）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

顽固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宣称“祖宗之法不可变”，一味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对改变政治制度更是切齿痛恨。认为这是“无义无君。”顽固派大官僚徐桐公然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虽然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但他们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至善至美的，万万不

可更改。否则，便会违背天理，祸乱国家。

维新派用儒家“三世”说和进化论观点进行批驳。他们指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天地之间，没有不变的东西。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这是事物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地除旧布新。“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反之，“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聚之。”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列举中国历代制度的变化及清廷自身的军事上和外交方面变化的事实批驳顽固派的谬论。指出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由“刀矛弓石”变为洋枪洋炮与总理事务衙门的设置等事实，论证世间并无百年不变之法。他们还以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而沙俄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由弱变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变法与否，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攸关的大事。指出：“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二）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反对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湖南顽绅叶德辉说：“兴民权，无君上也。”他们认为设议院，是“以民制君，上下倒置，”就是“叛徒执政。”在他们看来这是违反纲常的。

维新派针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谬论，依据中国历史上先进思想家的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从探索君

权和国家起源出发，对“君权神授”进行批判。谭嗣同认为：“人类社会的早期，根本就不存在着君、臣、民之分，到后来，因为需要才共举一民为君，不过国君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民办事的公仆，所以说，‘君末也，民本也。’既然君可以由民共举之，也就“必可共废之”，因为“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严复则依据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他在《辟韩》一文中，揭露自秦以来的君主，都是窃国大盗。梁启超也斥君主为贼，在《西学书目序》中指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君主专制，所以要改变中国贫弱的局面，只有兴民权、设议院。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如人人有自主的权利，则国家就得安宁，就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只要兴民权就可以“解生民之倒悬置国家于磐石之安。”但怎样来安民权呢？就是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君民一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也就不愁无饷可筹、无兵可得了。可见，“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维新派驳斥顽固派的谬论，从理论上阐明了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性。

（三）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

顽固派“恶西学如仇”，他们坚持尊孔读经，宣称三纲五常是万世不变的常经，维护八股取士的科学制度。洋务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谓的西学，仅仅是“西文”和“西艺”，根本反对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主张以四书五经、纲常名教作为根本。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明确指出：“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必以中学固其根源”。旧

学是起决定作用，西学只起辅助作用。顽固派攻击学西学、办学校是散布“邪说”，“名为育才，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

维新派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必须革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学习西学，兴办学校。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严复指出科举制度的三大祸害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他们反对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词章”之学。认为这只能培养一些空谈理性，玩弄词章，抱残守阙，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俗庸、鄙夫和学究，必然导致埋没人才、削弱国势的后果。因此，科举制必须废除。同时，他们又指出洋务派的所谓西学，实际上仍然沿用着旧的教育制度。所以只有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按照通古今、知时务，学以致用原则去造就人才，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维新派和顽固派、洋务派的这场论战，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在思想上的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在这场论战中，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广泛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禁锢，改变了社会风气，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献身，给以后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但是，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本身的弱点，他们主张的变革，只是“渐变”，反对“突变”。他们所谓的“民权”，也只限于资产阶级和部分绅士参政，并发出所谓“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张。他们轻视劳动人民，脱离劳动群众。故而反对封建文化，又不能清除自己思想中的封建毒素，更不敢反对孔子这个儒家的祖师爷。这一切表明维新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七、百日维新

正在维新运动日趋高涨之时，1897年11月，预谋已久的德国侵略者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这一强盗行为，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慨。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赶赴北京，并于12月和第二年的1、2月连续三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即上清帝第五、第六、第七书）。在这些上书中，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维新变法的紧迫性。他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嚆矢，“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牙”。中国的处境“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国际环境已经险恶到了极点，而国内又是“乱民蠢动”，“奸宄生心”“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警告光绪皇帝，必须立下决心，“发愤维新”，否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第五次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崧桂不肯代呈。这次上书虽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里，但因为内容痛切，在

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公开刊载，因此流传颇广，影响甚大。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向光绪皇帝上奏折，请求召见康有为，授以重任，恭亲王奕訢和一些守旧王公大臣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王公大臣传康有为“问话”，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在这次问话中，康有为再次申明变法的主张，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同时回答和批驳了荣禄等人的诘问。康的主张得到了翁同龢的赞赏。在翁同龢的推荐下，光绪皇帝谕令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加压，同时令总署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摺》（第六次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厉行变法，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皇帝，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当务之急，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里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的具体措施。显而易见，在“统筹全局”的上书中，康有为关于变法的主张比他以前的言论有所缓和，他把变法的希望几乎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而对原来的开议院、兴民权等则避而不谈，提出“以君权雷厉风行”，开制度局于宫中“以参酌新政”。康有为变法主张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他深感顽固势力对变法的阻力太大，

为了减少阻力，只得收起“开议院”、“兴民权”的旗帜，而以尊崇君权、依靠皇帝推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也是他后来政治倒退的思想根源。

康有为的上书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这对维新派人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联络和发动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地区性的各种学会，在北京相继成立的就有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接着又出现了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1898年春，会议举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经过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奔走联络，由康有为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成立了保国会。保国会以救亡保国相号召，在该会《章程》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它揭橥“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各设总会，在各省、府、县均设分会，以讲求“内治变法之宜”和“外交之故”，“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康有为撰写的《保国会序》大声疾呼：对濒临危亡的中国，“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之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十分明显，保国会本是一个以保国救亡为宗旨的团体，而且得到了众多爱国人士的赞同和参加。然而它却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和攻击，他们唆使御史文悌上章弹劾，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徒欲保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把“四万万人”与“大清国”完全对立起来。由于文悌的奏折无据无理，光绪皇帝拒不听信，还为

保国会辩护说：“会为保国，岂有不善”，下令将文悌革职。由于保国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参加动机也各有不同，因此，在顽固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有一些人畏祸退出，而出面发起保国会的主持人李盛铎，看到风头不对，也转而攻击保国会。保国会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由于出席会议大为减少，因而不得不停止集会。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的宗旨和康、梁等人在会上发表的政治演说，却被天津、上海、广州各地的报纸刊载，影响甚大。

变法与反变法，不但在维新派和顽固派之间，从始至终进行着剧烈的斗争，而且也同朝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密切相关。1898年春夏之交，支持变法的帝党与反对变法的后党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反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皇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多方挟制，为了减少来自慈禧太后和后党的压力和阻力，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勿去旧衙门，而惟增设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共专摺奏事足矣”。召见之后，光绪皇帝特许康有为专摺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从此，康有为接连向光绪皇帝上奏摺、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议。在政治方面，要求“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开制度民政之局，拔天下通达之

才，大誓群臣以雪国耻”。在经济方面，要求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劝募工艺，奖励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漕运，裁厘金，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废八股、改书院、兴学校、废淫祠、办报馆、禁缠足、废发辫、改制服，开通社会风气。在军事方面，要求裁旧军，练新兵，整顿国防，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从6月到9月，康有为本人或代其他官员起草的变法奏摺50多件，大部分都被光绪皇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6月11日到7月下旬，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新政由经济、文教、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旧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至于维新派和康有为在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并未提出，光绪皇帝颁发的维新诏令中也无此内容。康有为在此期间一再提醒光绪皇帝对国会、议院等不可操之过急，他说

“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原因是“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新政明显是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变法和反变法，既然是封建顽固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就不能不引起把持统治实权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对康有为的奏摺和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关于变法和新政的诏谕，除了手无实权的某些开明帝党官员表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链也比较热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谭 2 人，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而阴险狡诈的慈禧太后集团，从新政一开始，就加紧布置，准备反扑。

“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6 月 15 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皇帝下令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驱逐回籍。翁本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他的被罢黜，无疑是对光绪皇帝和变法的沉重打击。就在这同一天，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皇帝下令，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照例不再召见大臣，这一违反常例的规定，无疑是要重新控制光绪皇帝，抓住朝廷用人权，使光绪皇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同日，慈

慈禧太后又强迫光绪皇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于是，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同时，慈禧太后又广布心腹，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

这三道命令，为慈禧太后扑灭新政、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变法与变法的斗争加速表面化，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慈禧太后的一连串打击，光绪皇帝也试图对抗。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6人全部革职，并赞许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一措施，显然是对顽固势力的示威和反变法的反击，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9月5日，光绪皇帝又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4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

光绪皇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引起了慈禧太后更加恼恨，下决心要扑灭新政。于是加紧策划政变，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突然调动聂士成的军队移驻天津陈家沟，调动董福祥的军队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军队的这种调动，显然预示着政局即将发生变动。

对于慈禧太后的反扑和新政面临的危机，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都万分惊恐。光绪皇帝既无实权，又无军队，维新派谈起变法头头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胁，就一筹莫展。在束手无策之中，便甘冒风险想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来对付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武力威胁。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发迹，这时已

掌握了 7000 余人的新式陆军，1895 年又加入过强学会，表示支持维新。这就使维新派误认为袁世凯可为己用。其实袁世凯早已受到荣禄的赏识，而且是一个狡诈多端的奸雄。当康有为为了拯救光绪皇帝提出拉拢袁世凯的时候，维新派中有人认为袁不可信，但在走投无路的紧急关头，仍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袁世凯。

9 月中旬，政变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光绪皇帝在惊惶失措之中，于 15 日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杨锐原是张之洞的门生，以新进官僚表示支持维新而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密诏诉说慈禧太后及昏庸大臣反对变法及自己无权之苦，并表示“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他问杨锐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打破维新变法的阻力，除旧布新，使中国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他要杨锐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妥速筹商”。16 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可见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林旭将密诏带出，康有为、谭嗣同等看了之后相对痛哭，束手无策，除拉拢袁世凯之外，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败局。17 日，光绪皇帝为保护康有为，并希望他能设法救援，诏令他去上海办报。18 日，御史杨崇伊看到时机已到，遂上密摺，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历数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等等“罪过”。19 日，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回宫，密作政变准备。

在政变发生之前，英、日等帝国主义为了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轻信了他们的

诺言，称赞英国是“救人之国”，并奏请光绪皇帝联合英、日对抗顽固势力。英、日帝国主义也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发展。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败局已定，遂无意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只对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虚表“同情”。康有为等人也曾到外国驻华使馆要求支持，但毫无结果。此时，他们只有把自己和新政的命运交给袁世凯了。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当面表示对光绪皇帝“忠诚”报效，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9月20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

21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布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继而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出走日本的劝告，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把自己所做的诗文和书稿交给准备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决心为变法而死。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严复虽然也有人

主张惩办，但因并未参加维新活动而未被追究。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八、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是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维新派抱着外御强敌，内兴祖国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一次变法运动。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并通过改革，使中国富强。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既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问题。

戊戌变法的失败，从客观上说，是中国封建势力过分强大。中国封建社会长达 2000 多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即使在 19 世纪末期，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初步的发展，但封建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旧思想纲常名教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维新派的势力就显得十分单薄，无法与之抗衡。

从主观上说，维新派严重地脱离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和少数帝党官僚身上，希望以君权推行新法，但光绪处处受制于慈禧，虽然在 103 天中，连续发布了颇有“雷厉风行之势”的“上谕”。但这些“上谕”大多成了一纸空文，维新派为推动变法，也组织了各种学会，但学会只集合了一

群封建官僚和正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动机不一，派系纷争，到了关键时刻，纷纷后退，有的人甚至向顽固派献媚。此外，维新派不仅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反而站在群众对立面，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农民起义表现出十分的恐惧。因此，他们不能找到真正打破封建势力的力量，当封建守旧势力反扑时，必然是一败涂地。

维新派还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以为借外力可以推进变法。强学会筹办时，他们就延请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译书”，“百日维新”中，伊藤博文来华，康有为曾请伊藤博文觐见慈禧太后，妄图靠伊藤博文一席话，能使慈禧回心转意。最后，这些希望都破灭了。对帝国主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另一原因。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戊戌变法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的那些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改革。戊戌变法是要求变封建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而进行改革社会制度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选择的变法方案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迫切要求，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戊戌变法是维新派发动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刻，提出了一系列“立国自强”的建议。他们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置功名利禄于不顾，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爱国献身精神，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光

荣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次，维新变法又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维新变法的活动中，维新派积极宣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维新派用发展变化观点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进行批判，他们对“君权神授”和旧的封建文化教育的抨击，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束缚，并改变了社会风气，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了传播，为以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的总体改革方案虽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其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建议，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是起了作用的，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戊戌变法是一次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运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的兴起及其内部组织结构

从太平天国起义被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镇压后，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其间近50年中，中国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斗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

早在 1862 年，江西、贵州和湖南就已发生过反洋教运动。此后，江苏、四川、贵州、直隶等地接连发生“教案”。

1870 年 6 月，爆发了著名的“天津教案”。

1876 年，四川邻水、涪州等地又发生反洋教的斗争。

1875 年至 1879 年，福建延平、福州、建宁、福清等地教案频仍。

到了 90 年代初，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今辽宁朝阳）又先后爆发了大规模反洋教武装斗争。其中 1891 年 11 月热河朝阳金丹起义，1 个月之间，几百人的队伍发展成万人大军。起义军公开地举起消灭侵略者、消灭传教士和推翻清政府的旗帜，惩办作恶多端的传教士和教民 800 余人，同时惩处了一些地方官吏和反动蒙古王公。清政府调集了直隶、热河、奉天三省军队“围剿”2 个月，经过大小数十仗，才镇压了这次起义。2 万多起义群众被残杀。以后很长时间里，清政府还余悸在心，时时感到隐患未除。

1895 年 5 月，四川成都发生大规模反洋教斗争；由成都而嘉定、叙州、新津，打毁教堂 70 多处。同年 8 月，福建古田的秘密结社——“斋教”发动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 10 余人。

1896 年至 1897 年间，两湖、四川、江苏、江西、安徽、贵州、山东等省反洋教斗争连接不断。

1898 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宣称：由于外国侵略者强横掠夺，我民脂民膏被他们吸榨净尽；我们一定要赶走洋人，夺回中国人生存的权利。

1898年，四川大足县农民又一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檄文中历数侵略者的罪行，号召驱逐洋教士，以“剪国仇”，“除民害”，在四川影响所及达20余州县，焚毁教堂20余处。

正是这样频繁的人民起义和斗争，为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作了历史的酝酿和准备，使得它一揭起义旗，就在广大群众中获得热烈的支持和响应。

义和团原名“红拳会”、“义和拳”，是山东、河南一带农民长期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个秘密结社，又是江湖游民和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它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个小支派。八卦教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山东、河南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乾隆中叶，曾被清政府破获，教中许多重要人物惨遭杀害。此后，徒众散往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各省，继续在民间私相传习。到嘉庆年间，它的势力已经相当壮大了，支派也愈加繁衍。1812年（嘉庆十七年），八卦教天理会起义，震卦教首领李文成和坎卦教首领林清联合进攻北京皇宫，谋求夺取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就在各地大规模搜查教门。仅在直隶一省，被破获的教门就有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教、离卦教等十几种。义和拳也遭到疯狂的镇压和杀戮。清朝统治者还特别发布谕旨，命令将各教门首领全部处以绞刑，有的人还被处以最野蛮的刖刑；从犯则流放边疆，还要严格搜查所有被捕人的住家。务令严加惩处，不留根株。尽管这样，义和拳仍然是1868年捻军起义失败后，人民反清斗争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1898年，以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为首的一支义和拳，在山东恩县、平原、高唐、茌平等地揭竿起义。从这两个首领的姓和号来看，起义有明显的“反清复明”性质，仍然具有义和拳前期斗争的传统。但是“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和当时的实际形势不相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这使义和拳的斗争由“反清复明”，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义和拳举起了“灭洋”的旗帜，在农村中广泛发展自己的组织，带领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

义和拳在揭贴和乱语中指出：“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侵略者要霸占中国的地、人民的天，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义和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感动人心枪刀排”，“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

义和拳利用拳术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宣称它有“神拳”，可以练就奇技；练成之后能善避枪炮，刀枪不入，杀敌斩寇，所向无敌。他们中也确有些人武艺精湛，更增加了群众对于依靠“神拳”打败侵略者的信心。义和拳在揭帖中宣传：“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赶走鬼子不费难。”这些宣传，收到极大成效，“传单一出，千人立聚”。

义和拳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的基层组织是“坛”。一般一村的拳民组成一个坛，各坛独立地进行活动。坛口一般称坛场或拳厂，为集会议事、操练比武的场所，也是义和拳各支首领“拜坛”的所在地。有的地区，几个或十几个坛口之上，还设总坛口。各总坛之间，没有固定

的组织联系，当斗争需要联合行动时，就发出“帖子”，互相邀请。一般是由较有声望的大坛出面邀请，并统一指挥战斗。总坛口的负责人称为老师，一切军政事务及出战领队等，都由老师决定、指挥。坛的首领有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大师兄为正，二师兄为副。大师兄不在时由二师兄代行职权。由于有着共同的目的和要求，参加义和拳的群众“个个拿起刀，见了鬼子往上窜，剁的剁，砍的砍”，显示出战斗的自觉和勇敢。当然，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斗力的发挥，容易受混进来的敌对分子的影响，甚至有的坛为地主豪绅所篡窃和把持。

义和拳由农民、手工业者、船工、车夫和士兵等组成。

此外，义和拳还发动妇女参加斗争行列，其中以“红灯照”最为活跃。

义和拳内有许多戒条，用来约束它的成员。即使是在进入北京、天津，有很多不同成份、抱着不同目的的人大量投入的时候，仍能基本保持纯朴严肃的纪律。它的戒令中有：“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灭洋人，杀赃官”，“不准公报私仇、以贫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不茹荤，避妇人”等等。他们生活清苦，“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夜间席地而卧”。

义和拳坛内所供的神，多出自《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中的人物，如骊山老母、诸葛亮、张飞、关羽、二郎神、孙悟空、猪八戒、黄三太、黄天霸等等。

由于义和拳不断地遭受反动势力的镇压，尽管它的组织源流可以上溯 100 多年，但它的成长却一直困难重重、坎坷

艰难。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乃是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又使得这一组织先天不足，带有不可避免的宗教迷信色彩。再加以历史的局限，使先进阶级的革命组织还不能出现。因此，当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刚一跨入 20 世纪——1900 年时，面对着空前的民族危难，农民群众只能利用现成的组织形式进行斗争。他们迎战了，带着自己落后、幼稚、不成熟乃至所有由历史所造成的局限，走上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最前线。

山东义和团揭开反帝斗争的序幕

义和拳在初期活动中，尽管屡次遭受国内反动势力的杀伐血洗，但是这支中国人民反压迫斗争的火把，却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好像是火上浇油，更使它熊熊燃烧起来。义和拳在跟中外反动势力的艰苦搏斗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由民间秘密结社转为公开活动的义和团。

义和拳之所以最初兴起于山东，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反帝运动，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官府欺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德国帝国主义自从 1897 年强占胶州湾以后，紧接着又攫取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侵夺铁路沿线大量土地，强开矿山，并且把山东全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德国还借口所谓“教案”，迫使清政府以“事前未能防范”为理由，把不肯屈从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撤职，改派张汝梅继任。这以后，清朝政府又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连下了几道谕旨，严令“此后不准再发生教案。倘若防范不力，除将（发生教案之处）该地方官从

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

清政府对于侵略势力如此畏惧，极尽阿谀献媚之能事，因此教会气焰的嚣张，也就越发变本加厉了。外国传教士更是纷纷窜到中国，大量建造教堂，招揽教徒。仅只山东 1 省的 73 州县，就设有大小教堂 1000 多处，外国传教士（其中许多是德国人）300 多人，招引和胁迫入教的教徒竟达 8 万人之多，成为社会上一个独特的集团。外国教会与当地封建豪绅、地痞流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形成了一支压迫中国人民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

当时，清朝政府为了偿付甲午战争的赔款，竟然不顾山东省境连年黄河决口，以及继之而来的水、旱、虫灾，加紧向人民进行无情的搜刮。老百姓无力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洋教士就趁火打劫，利用高利贷巧取豪夺，把许多农民赖以糊口度命的仅有的小块土地也收夺净尽。老百姓如果不甘心这种讹诈，到官府去申诉，地方官总是秉承朝廷旨意，处处袒护教会，压抑百姓。这样，广大人民被屈含冤，曲直难辨，受辱遭难，申诉无门；积怨既久，官府又不足恃，唯一的道路只有拿起武器自救了。义和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惜身家性命挺身而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嗜血成性的外国强盗们。于是，老百姓争相学拳，一场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就首先在受蹂躏压迫最为惨重的山东地区爆发了。义和拳从此公开地揭开反帝斗争的第一幕。

在 1898 年至 1899 年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几乎到处都有义和拳的活动，尤其以山东西北部沿运河流域各地，声势最大。山东巡抚张汝梅在 1898 年的奏折中说，拳民

已经愈来愈多，往往趁农村集市的日期，约聚比赛拳勇，称作“亮拳”。他们以练拳为名，形成与外国教会为敌，并与官府相抗的组织。

清政府要求山东巡抚张汝梅镇压人民的这种自卫反抗运动，接连命令他“飭属实力保护教堂”。但是，面对着遍地怒潮，张汝梅实在无力镇压，乃提出了“收编”义和拳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因此“妥筹各属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保身家，守望相助。”这实际是企图把这支日益壮大的人民武装力量，纳入地主阶级的反动乡团范围之内，以湮没其原来的性质。

不过，义和拳并没有受张汝梅的收编，仍然继续自己的斗争。当时冠县和威县一带的拳民，在姚洛奇率领下，联合大刀会共同开展反抗天主教堂的活动。官府逮捕了姚洛奇，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反抗的情绪更加高涨。张汝梅由于镇压不力，被撤职。清政府改派绰号“屠夫”的毓贤接任山东巡抚。

毓贤曾任山东曹州知府，在任一年中，就残杀所谓“匪盗”2000多人；靠着制造血案和屠戮人民，官运日益亨通。清政府这时候任命他做山东巡抚，目的显然是要让他故伎重演，残杀山东拳民。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不同了。面对着义和拳的强大威力，眼看广大群众对义和拳争相趋附，毓贤也难以施展他的屠夫伎俩了。清朝地方官员最害怕在自己的管辖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如果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的严重惩罚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当毓贤感到无力镇压义和拳时，他

便企图用安抚的策略，以换取暂时的苟且偷安。义和拳当时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外国侵略者。毓贤为了躲过群众斗争的锋芒，就伪装支持群众，实际上，是要使运动更多地染上迷信色彩，尽量把它引导到绝对排外主义方面去，借以使自己免受损害，好等待时机，放手屠杀。

恰巧这时候，慈禧催促各省办理保甲团练。毓贤就袭用张汝梅的故技，出告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承认它为民间团练。向来下层社会中的秘密结社一般都是称为“会”的，而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地方武装多称为“团”。“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安抚的策略而取得的。各地义和团的组织渐渐都采用了“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张汝梅、毓贤实行这种安抚的策略有关的。

不过，毓贤也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能够根本改变义和团作为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组织的性质。而且，义和团因得到巡抚所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反而日益发展。

教会方面看到义和团的兴起和壮大，竟然唆使教民准备武装冲突，组织教徒袭击义和团，有意地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一次，一些拳民路经禹城的韩庄，教徒设下了埋伏，用快枪射击拳民，造成了死亡10余人的流血事件，还抢劫了拳民的马匹。又一次，拳民经过临城的庞庄，那里的教徒首先向他们开枪。拳民被迫还击，当即烧毁教堂一座。于是，帝国主义者借题发挥，极力进行歪曲和夸张，并且强迫清朝官吏立即镇压义和团。

1899年9月，山东平原县义和团与教会发生冲突。平原

知县派遣马队把义和团冲散，并把6名拳民逮捕下狱。

为了营救罹难的战友，10月9日，义和团首领朱红灯亲自带领城高唐、茌平、长清等县拳民来到平原县。知县蒋楷倚仗兵力众多和武器精良，竟带领城防官兵和衙役出城攻击，企图大批屠杀义和团。

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列队迎战。他把拳民每4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单元，轮流交替着进行攻战，与官兵格杀。拳民勇猛异常。官兵招架不住，只得仓皇败下阵去。

官兵大败而归，恼羞成怒，竟然跟教堂勾结，唆使教徒出头，诬告村民“谋变”。然后，蒋楷就根据这种诬告不实之词，申报自己的上司，并且还添油加醋，谎报义和团围困平原县城，请求火速派兵救援。6天以后，10月15日，济南知府亲率卫队马步军来到平原。当天夜间，统领亲兵马步队、侯补知府袁世敦（袁世凯之弟）也率领大队骑兵赶到。一路上，官兵听到义和团的号角声此伏彼起，才知道自己面前的对手势力之大，先自减消了往昔的威风，气馁了一大半。

由于当时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传教士，因而朱红灯决定避免和官兵的摩擦扩大化。他主动撤离县城10余里，并且警告清朝官兵，不要逼人太甚！

然而官兵却误认为朱红灯胆怯不敢恋战，因此非但不听警告，反而仗着人多势众、枪械精良，死死追赶义和团，发动猛攻。

朱红灯迫不得已，只好选择了平原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地方，起而应战了。尽管官兵的火力凶猛，弹发如雨，但拳民毫不畏惧，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施展出平素练就的一身

好武功，跟官军近战肉搏。有一名拳民冲进官兵的阵中，夺取了一面大旗，吓得守旗的哨官狼狈奔逃，阵脚大乱。义和团乘势杀将过去，当场杀死官兵3人，重伤10余人。

就在官兵难于支撑的时刻，又有清军大队骑兵从恩县开来。于是，两路官兵部署成钳形攻势，张开虎口，企图把朱红灯所率领的义和团全部歼灭。眼看官兵快要合围了。倏然间，义和团化整为零，从敌骑的隙缝中钻出，分别朝几个方向撤退。清军的领兵将官也赶忙分兵为几路，追蹊在义和团的背后。不过，官兵一经分散为小股队伍，由于害怕中义和团的埋伏，就越发丧失战斗力了。追赶没有多远，义和团就已经无影无踪了。尽管清军的骑兵在庄稼地里来回践踏，轮番搜索，却连个义和团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原来朱红灯的队伍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已经安全撤回到高唐、茌平一带根据地去了。

官兵的企图落了空，就在义和团曾经驻扎过的村庄里大肆烧杀抢掠。其中袁世敦更是无耻之尤，他纵容士兵向无辜的老百姓开枪，然后冒称杀死义和团以邀功领赏。官兵的暴行，激起老百姓更大的愤怒，他们更加争相参加义和团的战斗行列。

朱红灯回到茌平、高唐根据地以后，更加积极地从事发展组织的工作，为将来大规模起义积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在附近各地开展对抗教会恶势力的斗争。这样，更多的农民纷纷聚集到义和团的旗帜之下。当然，这也就愈发招致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嫉恨。天主教意大利教士马天恩写信给山东巡抚毓贤，要他点派大军去“剿办”义和团。但毓贤

却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自知不是义和团的手。马天恩又转通过法国公使向清朝总理衙门威胁。在总理衙门函电交驰的催促下，毓贤只得派出参将马金叙统率大队官兵前往“查办”。马金叙根本不敢与义和团刀枪相对，战阵交锋。他只好费尽心机，施展阴谋诡计，先是甜言蜜语哄骗朱红灯与本明和尚出来会见，然后忽然翻脸，命令伏兵于1899年11月逮捕了他们，并立即用快马飞速押送到巡抚衙门，交给毓贤去发落。

官府以奸诈欺骗手法，劫夺去义和团的两位首领，更加激起了拳民的无比愤怒。他们丝毫没有被打退。他们在怀念身陷图圉的英雄的同时，决定以更加坚强的战斗行动，来回答统治者的迫害残杀。于是，一位智勇双全、深孚众望的大师兄王立言，被拳民们推举出来，接替朱红灯担任首领，率领拳民继续从事反帝斗争。为了加强战斗力，王立言向豪绅地主征发了一部分马匹，着手训练自己的马队，准备对付官府骑兵的镇压。不久，他们就收集了一批马匹，训练成自己的骑兵，开始纵马驰骋于鲁西平原了。

毓贤才捉了朱红灯，却又冲杀出来个王立言，而且这支义和团又增加了马队，战斗力愈发强大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情绪是压服不了的。义和团运动犹如烈火一般，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蔓延。

济南、东昌（今聊城）、曹州3府，以及济宁、临清2州，义和团到处设坛起义，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几十处，每处都聚集着拳民数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其势有如疾风骤雨，迅猛异常。义和团在战火中成长，从秘密活动走向公开征战，从

弱小分散走向壮大集结。众拳民在艰难的环境中辗转搏斗，终于冲杀了出来。

在这种情势下，毓贤这个山东巡抚，自觉像是坐在火药桶上，随时都有被炸殒命的危险。他不敢贸然杀害朱红灯等人，只是把他们关押在监狱中，严加看守。

朱红灯虽然身在铁窗下，但是他的名字却更响亮，传得更远，呼唤出更多的中华儿女加入到义和团的战斗行列。

直、鲁两省烽火遍燃

面对在山东蓬勃开展的义和团运动，毓贤不敢放胆镇压，使得帝国主义各国大为不满。

法国公使代表天主教会，美国公使代表耶稣教会，向清朝政府提出了对毓贤的指责。

1899年11月25日，美国公使康格收到美国传教士查平拍来的电报，内称：“拳民袭击或威胁山东临城（今河北临城）附近四区的基督徒。官吏拒绝保护他们。拳众已威胁到此地教会的产业，请予适当的援助。”康格于是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认为“巡抚的态度是鼓励‘盗匪’，显然要承担现在行动的责任。”他要清政府“认清大局的重心，电谕巡抚及其他官吏，强制他们采取有效办法，即消灭那些‘暴徒’，并保护教堂和基督徒的生命财产安全。”紧接着，第二天和第三天，他又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催促清政府。

总理衙门接到照会当然不敢迟误，立即电告毓贤，要他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堂；同时，一再严厉地责成他对义和团从严惩办，以迅速安定地方秩序。

不过，到底直接面对义和团、深知其厉害的是毓贤。他仍然慑于义和团的势力，不敢贸然动手。他一面回电总理衙门说，受理的各种教案很多，自己都是立即予以处理，无论昼夜，不敢稍稍迟延，力气都已用尽，希望洋大人们体谅他的苦衷。另一方面，他赶紧去贿赂荣禄，设法立刻把他调离山东。他感到义和团这个马蜂窝可是万万捅不得的。

12月2日，康格又照会总理衙门说：“我再次要求立刻给山东一电，立即实行保护外人的方案，这是条约所规定的。”过了三天，康格再度照会说：“我再叙述昨天晚间会上我所说的话，就是假若这位巡抚（指毓贤）不能控制‘暴徒’及保护教会的这些人，那么，就必定要撤他的职，并且要派一位能干的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如果他没有充足的武力来干的话，可以从天津把操练很好的军队调来协助他。”在这里，康格指出了只有袁世凯才最适合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角色。康格还威胁说：“除非中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镇压这些‘暴徒’，不然，则外国将要证实这样的信念——即中国意欲玩弄一个大的问题，不必要地引起杀害外人，而这些人是中国所同意保护的；这对她自己来讲，将构成一个最严重的困难。”

4天以后，12月6日，清廷就发布谕旨，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另候任用，改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就在袁世凯正式到任前两天，毓贤为了进京陛见有词，于12月24日杀害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另一个义和团首领邵玉环也被斩首于兖州。从毓贤的调度和袁世凯的继任这件事，人们再次看到清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主子的命令百依百顺、不

敢稍有违忤怠慢的奴才相。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是清朝统治者将要疯狂屠杀义和团的信号。当然这也正是帝国主义者所企望与要求的。他们有的说：“从他（指袁世凯）的一般名望看来，外国人是预料并希望能有好的结果的。”有的说：“其时山东巡抚为袁世凯，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学，其部下有精兵一万，故吾人恃以无恐。”康格在12月7日，即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谕旨发布的第二天，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欢喜雀跃地报告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御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前往代理巡抚。他是一位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繁，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他们期待之重，溢于言表。袁世凯也真的没有辜负中外主子们的重托。

袁世凯不仅手中掌握一支近代化武装——新建陆军，还善于秉承洋主子的旨意行事。早在1899年7月，他就向清政府密陈山东义和拳问题，提出一套镇压剿洗的主张。1899年12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后，就开始猖狂地“护洋人而剿拳匪”了。

袁世凯自称：“办理民教，以调和公断为治本之计，以兵力剿办为治标之计。”让我们先看看他所谓“调和公断”的“治本”办法吧！

袁世凯刚刚到任，山东肥城县发生了英国牧师伯鲁克被杀案，袁世凯谎称“平阴、肥城两县‘匪徒’聚众滋事，……教士被‘匪徒’杀害”，故意扩大了案情。清朝廷命令他限期捉拿行凶人犯，严加惩处。袁世凯捉不到真正的“凶手”，便

狡计顿生，立即逮捕了十几个人，声言这些人就是凶犯，重刑惩办，判处其中两人以死刑，其余几人也分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中国人民的生命，就这样作了伯鲁克的抵偿品，同时被袁世凯作为谄媚洋大人的资本。但这还不够，袁世凯又命令当地居民给教会 9000 两银子和 5 亩土地建教堂，再花 500 两银子为伯鲁克建造一座纪念碑。

这就是袁世凯“调和公断”的“治本”办法。

至于他所谓“治标”的办法——“以兵力剿办”，确是心口如一，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袁世凯精心炮制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严厉督促官绅吏役保甲查拿拳民；奖励告密，提被告人家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奖赏；凡有练拳或赞助设立拳厂者格杀无赦。

袁世凯请来了驻扎青岛的德国军队，联合各地教堂的武装，此战彼剿，协力攻击屠杀义和团。

他还派遣道府大员，随军监督搜捕；命令军队只要见到拳民，就必须就地枪杀。他规定：遇见义和团，放炮开枪，杀死多少人也没关系；若遇见义和团不痛击，从将领到士兵一律处死刑。这完全是“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过一个”。残暴凶狠，可想而知。

就这样，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在各种新式武器的屠戮下，义和团遭到严重的摧残。

义和团首领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朱西公、范小、陈卷、宋朝义、李九芝、孙洛泉等数十人，先后被袁世凯逮捕，“置诸极刑”。至于一般拳民，惨死在袁世

凯屠刀之下的，更不知有多少。凡袁世凯统治势力所及的地方，都充满了杀人的恐怖。山东省到处流淌着爱国者的鲜血。袁世凯在山东屠杀还不算，还越出省界一直杀到直隶境内，仅东光一县，方圆十里的地方，很多树上都挂有被害者的头颅。

袁世凯的大屠杀，固然使义和团遭受到了很大的牺牲，但不屈的人民对他更恨之入骨。当时民间流传出“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的愤怒的歌谣。甚至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山东巡抚衙门大门外的照壁上，画了个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趴在洋人屁股后面乞怜的漫画，乌龟头的脸相与袁世凯的长相一模一样，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人民对这个汉奸的切齿痛恨。袁世凯非常害怕义和团的惩罚，因此防范甚严，据说他的卧室外密护铁网，岗哨林立。

山东全省，人民挣扎于血海之中，但民贼袁世凯嗜血成性，还继续到处捕杀义和团，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在这样的形势下，山东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一时转入低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散播革命火种，1900 的初春，山东义和团的一部分北上进入直隶；一部分留在山东，与大刀会联合起来，继续斗争。

当义和团势力在山东发展的时候，直隶东南部和山东交界各州县的义和团也很活跃。景州、吴桥、盐山、南宫、威县、交城等地，都有义和团起来斗争。威县赵三多率领的义和团数百人，曾参加冠县梨园屯起义。早在 1898 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就说过：“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1899 年 10 月，直隶景州知州说：“我的州里，拳党众多，一呼百应，动不动就集聚千百余人，汹涌而来。弄得我欲拿不得，而

且拿不胜拿。倘若冒昧从事，抓了他们，他们就说官长袒护教民。这要激起众怒，局面将不可收拾。即使立刻向上级请兵救助，也是缓不济急。州县权力又小得可怜，不得不暂顾眼前，以无事为福。”这番话，足以说明景州地区义和团活动的蓬勃发展。1899年12月18日，清军曾发动围攻，当地义和团首领修武和尚在景州被捕，义和团组织遭到较大的破坏。直隶其它地区义和团，也在1899年末频受清军剿杀，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但它已在群众中播下了种子。所以，1900年初，山东的部分拳民一经进入直隶，又鼓起了这里群众斗争的勇气。义和团在直隶境内再度活跃起来了。

帝国主义者直隶的罪恶活动，与他们在山东的恶行并没有什么两样，尤其在冀中地区和芦保铁路沿线，因为是天主教重要巢穴所在，人民所受到的欺压更令人发指。

保定的天主教会，曾借口和董福祥军发生冲突，竟强索当地名胜古迹莲池书院改建教堂，遭到全省人民的强烈反对。

固城有教民20余家。有一次，平民的两个孩子和教民的两个孩子在路上相遇，争吵了起来。教民孩子的洋书被撕了几页。洋教士写了个条子给当地县令。县官即扣押和鞭打了好几个农民，还勒令出来说和双方的赵老庆出钱，摆筵赔礼才算了事。

涞水县高洛村的人们，在春节期间搭席棚迎神赛会。天主教士指使无赖教民到棚内寻衅辱骂，撕毁神像，还要点火烧棚。而洋教士反而向县衙门诬告村民阎老福率众闯进礼拜堂，摔毁祭物，要求赔偿白银万两。经村子里在北京经商的人辗转向天主教头子樊国梁说情，最后，他们才让阎老福赔

银 250 两，设酒席 20 余桌，并到安家庄总教堂叩头赔礼；此外，又强迫知县把高洛村的树木全部判归教民砍伐，这才算了结。

因此，直隶省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山东的义和团前来传授拳术，在直隶各地很快又形成了一支支强有力的反帝战斗队伍。

直隶全境，西到正定，东至天津、静海；南自大名，北到张家口，义和团恢宏发展起来。据当时文献记载：“京畿东南各属，一唱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入其教者，当不下万千之众，消息灵通，一呼百应，志不在小可知。”

在直隶东南地区，义和团的声势越来越大，并向北一路“铺团”；新城、定兴、涞水、涿州一带，很快都兴起了义和团。扩充和推进得最快的则是在芦保沿线汇集并扩大实力的义和团，他们以“乾”、“坎”为标志，其中以“坎”字团为最盛。“坎”字团色尚红，因此直隶的拳民多束红色巾带。

义和团在沿途各村镇遍贴告示，上面写道：“中原各省集市村庄人等知悉：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

这告示像把火，投进受尽欺凌侮辱、满怀仇恨的人们心中，唤起了他们的热情与勇力，推动他们投身到反帝斗争的巨大浪潮中来。

直隶人民的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起初，他们并没有打算伤害在华洋人的性命。他们的最高要求仅仅是“驱

逐洋寇”而已。可是，和在山东境内一样，帝国主义者却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恨不得一口把义和团吞下去。法国驻天津领事卡拉德，指令天主教士把枪枝分发给教徒，准备屠杀义和团。在一本教会编写的书籍中，有如下的记载：“任丘段家坞，绕教堂筑围墙，能战者二百人，枪炮不少。”威县魏村本堂万神甫召集本村的主事人，教给他们战守方略；还把兵器枪炮都用“圣水”泼洒以求天主助战祐护。他挑选壮丁 600 余人，“各持精械利器，用白布作冠，冠上绣耶稣圣心像，日夜操练。”河间府步主教在范家圪瘩村让村民挖壕沟，深和宽都为 4 尺半，筑起土墙，高 1 丈余，墙上掏有射击孔；铸造小炮 10 尊，制火药若干，准备了抬枪 26 杆，鸟枪 106 枝，手枪 23 枝，快枪 6 枝，长矛 45 枝，大刀数柄；组织了 350 人的教民武装队伍。洋教士们就倚恃着他们的武装力量向义和团挑衅。

一次，一个农民在范家圪瘩村教堂附近牵牛种田，教民出来追赶他。他丢下耕牛和粮种逃走了。第二天，一队拳民约百人，去教堂索要牛和粮种。没想到教堂竟然开枪杀伤拳民。义和团群情激愤，大队拳民赶来包围了教堂。他们只有木棍、石块、大刀，而且就连这些仅有的刀械也都锈涩不堪。教堂的武装从土墙里开枪射击，杀死义和团 50 人。义和团用大车装满柴禾作堡垒，掩护着队伍向前冲锋。由于教堂用炮轰击，简陋的堡垒被炸坏，拳民伤亡更重，被迫退了下来。此外，威县的教民也曾用 7 尊大炮轰击义和团，并趁硝烟弥漫时追杀，杀死拳民数百人。

义和团的战士们拼血肉之躯，与拥有新式武器的帝国主

义武装力量进行着决死的战斗，无数优秀的好儿女牺牲了。斗争是惨烈的。然而，中国人民丝毫没有畏难之色；相反地，数以千万计的有血性和气节的人民，却更多地聚集到义和团大旗之下。

反“剿办”

面对义和团的日渐壮大和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反帝运动的蓬勃开展，清朝统治者不能不联想到历史的教训。太平天国的幽灵，仿佛又威风凛凛地驾临到皇城的上空了。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的些小反抗或顶撞，尚且决不允许，更何况义和团竟敢违抗禁令。“聚众抗官”，这更是非同小可了。因此，清朝统治者当然要“剿灭”义和团，扑灭起义的烈火。

这时，帝国主义者也给清廷施加压力。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如果你们不能立即剿灭义和团的话，我们就要自己调兵来处理了。”

这一催逼，清朝统治者敢不从命？他们于是决定以自己的兵力，立即去“剿办”义和团了。

1900年3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接二连三地贴出告示，诬蔑义和团“私立义和拳会，练习拳棒，蔓延各处，以仇教为名，滋事扰害……其情与强盗土匪何异？”另外，他又假惺惺地劝诱参加义和团的群众“迅自改悔，自当宽其既往。”他还恫吓说，如果再有人敢设坛练习拳术，即由地方官会同官兵捕拿，从严惩办；大小头目一经拿获，则“就地正法，决不稍从宽贷。”

裕禄还命令当时在直隶驻扎的淮系军阀梅东益和道员张

运芳，分别赴津南及芦保铁路沿线，“随处稽查，随处弹压”，不许稍有疏忽宽容。梅东益率所部淮军在沧县和青县一带围攻义和团，屠杀 3000 余人，连河水都被鲜血染红。在这血腥暴行之前，在吴桥县，义和团也曾遭受清朝官兵的大规模屠杀。这两次屠杀，使得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义和团实力受到极大的损失。

面对清政府的血腥屠杀，义和团毅然展开了反“剿灭”战斗。

据当时的《京津时报》记载：“在河间府所属任丘县内，官军曾经和义和团发生激战，官兵被他们打败，统带官员重伤，官军士兵也被杀多人。河间府知府也受刀伤。此外这支义和团还曾和天主教教会开仗”等等。

反动武装队伍在义和团的面前，就是这样脆弱不堪，威风扫地。

涿水县高洛村的村民，曾深受天主教会的百般欺凌。当他们听到义和团“乾”字团、“坎”字团在以定兴为中心的新城、涿州、涿水和易县的广大地区活动时，便派人专程前去邀请，以图洗雪天主教会给予的侮辱。4月30日，高洛村大庙中建立拳场，竖起了义和团的大纛旗。教堂方面非但不肯稍为敛迹，反而调集教徒，发给武器，准备厮杀。洋教士还强迫涿水知县祝蒂请求上级发兵“剿匪”。这就越发激怒义和团，他们飞贴邀聚几县拳众前来助阵。5月12日，各路拳众汇齐，把高洛村南的教堂和刁恶教民的住房 75 间全部焚毁。

涿水知县祝蒂挟洋教士的来信请求调兵，受到上级的重视。天津方面，裕禄特派营官杨福同率所部马队赶赴涿水。直

隶布政使廷杰也派马队营官王占魁带兵助战。

5月15日，涞水知县祝蒂会同这些马队包围了高洛村，用甜言蜜语哄骗，诱捕拳民16人，以及参加练习拳术的幼童13人。

5月16日晚间，祝蒂押解这些拳民往县城途中，义和团设埋伏劫救自己的伙伴。官兵发觉之后，抢占了一个高坡，居高临下，开枪射击，当场又打死打伤拳民100多人。

更为惨无人道的是，杨福同声言要试验一下义和团是否真的能避枪炮。竟把两名习拳的幼童带往营房，用枪打死。

为了替被捕和死难的战友报仇，房山、定兴、涿县等地义和团，纷纷增援涞水。

涞水县东北的石亭镇，是通往房山、涿县的必经要道；两旁山峦起伏，地势险要。6月22日，杨福同闻报邻县拳民向涞水集中，便带上30名骑兵和40名步兵前往石亭截击。义和团早就相中这一地势，事先设下埋伏。当杨福同来到时，上千名拳民在叙和和尚指挥下，呐喊着猛扑出来，把杨福同和他手下的官兵团团包围。官兵仓皇还击，枪声正好给周围的义和团报了警。顷刻之间拳民从四面八方云集，增至数千人。杨福同一伙被驱困在山沟狭道上，马队无法驰骤，洋枪也很难发挥作用。义和团却刀矛并举，大显神威。杨福同左冲右突，也难突出重围。两三个小时后，官兵已个个带伤，连杨福同的两个亲随护兵也被刀劈马下。叙和大师兄抡动镔铁禅杖向杨福同打来。杨福同闪身躲过，禅杖打中他的坐骑，把他从马上掀翻在地。还没有容他爬起来，众拳民雪刃齐下，早把这个坏蛋分尸数段。这个双手沾满太平天国起义军和捻军

鲜血的李鸿章的走狗，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终于罪有应得，受到了人民的惩罚。

义和团在涞水取得的这一辉煌胜利，更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胆战。“剿灭”的步伐加快，规模也迅速升级。

直隶总督裕禄命令直隶提督聂士成，统领所部武卫前军火速镇压义和团。武卫前军在北洋五大军中，和袁世凯所部一样，都是用新法操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这次调聂军出动，说明裕禄的心急如焚，决意效法袁世凯，要大动干戈，疯狂镇压屠杀义和团了。

聂士成受命之后，分兵两路。左路由总兵杨慕时率所部3个营约2000人，乘车从天津西行，直扑涞水；右路由聂士成亲自统领本部人马，乘火车至丰台，转道芦保铁路南下，预期与杨慕时军会合。然后，保定方面再发兵一支北上，南北两路夹击，妄图一举歼灭聚集在涞水地区的义和团。

5月25日，杨慕时部先到达高碑店车站。杨慕时借口护路，凶相毕露地下令：“今夜我们就开始行动，查探义和团；遇到他们，当即剿杀，不允稍有迟疑。如果查明某村某人加入义和团，反叛迹象昭彰，必须毫不含糊地集中力量，坚决消灭干净。”

当时，义和团主力已经集结在涿州附近。他们听说官兵开到高碑店，为了防止其向北侵袭，就调遣拳众在铁路沿线布防驻守。5月27日，有几十名年仅十四五岁的拳民，在距高碑店18里的高家庄地方监视铁路，与官兵相遇。官兵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年轻的拳民10余人。

这时，聂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丰台。一旦官兵从南北两

方面夹击，义和团就要遭到钳形包围。迫于这一严峻局势，义和团决定大举破坏铁路，以阻止官兵的进攻。

义和团发动铁路沿线的老百姓合村出动，人人手持火把，向火车站站房猛扑。就这样，从 27 日夜间开始，义和团首先把高碑店、涿州、琉璃河等车站烧毁；第二天，又焚烧长辛店、芦沟桥车站；第三天，丰台站也被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义和团 3 万多人乘势开进涿州城。一时之间，佩戴红巾的拳民，遍布涿州城厢。他们宣称：涿州兵备空虚，一旦洋人来攻，将防守不利，义和团愿代替官军守城。从此，涿州城墙上刀矛林立，连城门启闭也都由拳民控制。此外，直隶中部新城、容城一带的拳民，也纷纷向定兴县集结，准备拆除北河铁桥，以阻止保定方面的官兵北上。

这样一来，义和团取得了战略上一定的优势。清兵南北两方面增援路线全被截断，杨慕时率领的 3 个营马步军驻扎的高碑店，成了孤立无援的一个小小孤岛，而高碑店又无城池可守，杨慕时只好移驻定兴，据城死守，以待救援。

5 月 31 日，杨军开至定兴。步兵驻扎在县城的东关，马队驻扎在西关。

杨慕时的队伍和清政府的其它军队一样，军风纪律极端败坏，抢掠烧杀，无恶不作。杨军一到定兴，就到处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他们向商民广为勒索食物，还纵容士兵进入城内，以索要妓女为名，公然闯进老百姓家，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杨军不敢和义和团作战，却屠杀百姓数十人，诬为“拳匪”，向上级报功领赏。因此，定兴被他们搅得鸡犬不宁，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定兴知县害怕

酿成大事，请求杨军撤出县境。于是杨慕时又带兵退回高碑店。这伙官兵携财带物，扬长而去了。

义和团为了控制高碑店这一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6月5日，发动各路拳民一起向高碑店进攻，迫使杨慕时军离开高碑店，移驻涞水。而涞水县的老百姓则又扶老携幼，举家逃难。从老百姓的趋避，就可以说明民心所向的是义和团，而清政府豢养的官兵，才是货真价实的残害百姓的强盗和土匪！

在各国公使的胁迫下，清朝总理衙门连接电告聂士成，要求他确保铁路畅通。聂士成也就屡屡转饬杨慕时遵照办理。但杨慕时亲身领教了义和团的厉害，不敢出战。他写信给聂士成，一再说明他现在兵力只能在涞水、高碑店一带牵掣义和团，使之不致南下攻打省城保定。如果要他守护铁路，则请求调拨炮弹1000发，枪弹15万粒，交丰台王营官火速运来。杨慕时被义和团打得昏头昏脑，陷入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的境地，只能乞灵于洋枪洋炮来摆脱这种困境。但芦保铁路已被义和团截断，他所要的武器弹药根本无法运来。同时由于天津也出现了大批义和团活动，聂士成军已被调回天津去增强防务，所以杨慕时部连援救也都没了指望。杨军3营官兵坐困涞水，既缺弹药，又无补给接应。人民群众痛恨他们，地方官吏畏惧回避他们，义和团则决计要歼灭他们。杨慕时“剿灭”义和团未得半点功劳，却自己落了个人命危浅，朝不保夕，茕茕子立，形影相吊。

清政府怵于义和团的巨大压力，担心杨慕时全军覆没，只得发布命令：“武卫前军左路步兵三营，现驻高碑店等处防御，地面诸多不便……该统领即便遵照，迅将所部各营撤赴聂军

门驻扎处所。”说明白了，这无异是清政府宣告了自己“剿灭”计划的破产。

杨军撤退中，途经雄县、文安时，处处遭到义和团的围攻。据杨慕时自己供称：“惟有打一步，走一步。炮火所至，烧及村庄。人无藏避，后渐可行。”他们使用所携带的两门大炮，平毁沿途一些村庄，并打死打伤义和团和无辜人民两三千人，才得以狼狈逃回天津。

义和团在直隶境内芦保铁路沿线痛击官军，赢得了反“剿灭”战斗的空前胜利。消息传开，饱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凌和压抑的人民群众眉头舒展，喜笑颜开。他们心情振奋，斗志高昂。人民看到了义和团的巨大力量，体验到了自己的伟力。因而，义和团的声威大振，实力日益壮大。“直隶西北境上，几乎无处不有（义和团），日蔓日多，遂成不可向迕之势。”直隶境内，出现了人人习拳，处处设坛，旗帜招展，刀枪林立的火热场面，为义和团大规模向北京、天津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廊坊大捷

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反“剿办”战斗的赫赫战果，不仅使清政府惊骇异常，对于列强各国，也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它们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了。

英国档案馆中，现存有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份报告。报告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义和团仅仅使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就打败了素以凶悍闻名的俄国哥萨克骑兵，大煞其威风的情景。

赛纳乐在报告里还忧心忡忡地写道：“欧洲军队从义和团面前败退这一事实将发生坏作用，并使一般人愈加相信义和团具有神秘的魔力。”

各国驻华公使深感局势严重，便纷纷急电报告本国政府，请求火速调派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列强各国政府也正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和美国在这次对义和团运动的武装镇压当中，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拍电报给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对中国共同行动。海约翰在电报中说：“如需兵力以平乱，兼保护教堂旅客，亦惟我两国同舟共济。……英美合力以相助，比较他国协助为优，……即洞辟华门，大通商利之举，亦可因此而成”。

不过，当时英国在南非正陷于殖民战争的泥淖里，一时无法抽调大批兵力前来中国。因此，英国乃向美国建议拉拢日本。它考虑日本紧靠中国，可以就近出兵，充当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急先锋。同时，它又想利用日军在北京建立反俄堡垒，以阻止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根据后来发表的日本外务省一份原注有“极密”字样的文件透露，英国政府当时曾答应付给日本政府 100 万英磅，来补助日本出兵中国的军需开支。

日本本来就很想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当然乐意跟英、美采取一致行动，并且充当侵华的主力军。

俄国由于切身的利害关系，极端反对日本出兵。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都想参加这次侵略行动，以便事后分赃有份，利益均沾。

几经周折，最后才决定各列强一起派遣军队前往北京。于是，在美国和英国的主谋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联合武装侵略就初步勾结成功，组成八国联军，先开始了军事行动。至于正式成立联军司令部，则是几个月后，1900年8月间的事。

1900年5月末，英、美、日三国军队首先在塘沽登陆，等候俄、德、法、意、奥等国军队，以便会同增驻天津。

5月30日，英、美、俄、法四国公使便前往清总理衙门，公然提出：“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如果听从我们的话，外国军队在北京只停留到我们认为解除危险的时候为止；如果竟然坚持反对我们的意见，则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料了。”

这已不是一般的外交照会了。这是最后通牒，甚至是命令。态度蛮横，语气强硬。这不是一般国家的公使在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政府讲话，完全是主子在呵斥奴才。

清朝总理衙门对此当然不敢违抗，只能唯唯诺诺，俯首听命。

但直隶总督裕禄自从滦水战役以后，已深知义和团的威力，唯恐再次激怒义和团，酿成更大事端，因此传令不准用火车载运外国军队进京。

第二天，5月31日，法、俄两国公使再度前往清总理衙门，声称：“此禁不除，即当再增大兵力，自乘火车入都。”结果，经慈禧亲自批准，当天下午四时半，从天津方面开出专车一列，载运英、美、日、俄、法、意等国官兵337名，携带大炮5门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开往北京。6月1日，又有德

国官兵 50 名由塘沽乘火车直接开赴北京。另外还有美、英、俄、意等国官兵 310 名，开进天津租界驻扎。

6 月 2 日，8000 名外国军队抵达大沽登陆待命。6 月 5 日，又有海军陆战队 600 人在大沽登陆，并随即开往天津租界。各国接连不断地增调军队，使得整个局势越发紧张起来了。

也就在这时，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战斗，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6 月 8 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了初次游行大示威。许多市民也参加了示威行列。从东便门到西便门，人声鼎沸。愤怒讨伐侵略者的呐喊声如钱塘怒潮般，震撼了这座古老森严的封建帝都，把它从沉睡中惊醒。

这时候，京津间铁路和电讯都还能通达。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当天晚间就发急电给驻天津的领事，要他们赶快增调军队到北京来“保卫”公使馆。英国外交大臣萨利斯布里也有电报给当时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准其便宜行事，务须保全英国权势以及商务。”经过各国领事们协调意见，决定从当时驻在天津的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八国的 2000 多官兵中抽调出 1500 名，由西摩尔率领，前往北京。

6 月 10 日，西摩尔勒令直隶总督裕禄为他准备好一列火车，亲自带领第一批联军 800 名由天津出发，随带大炮数门。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有几列火车装载着另一批联军和武器粮秣等物，陆续从天津开出。

为了阻止侵略军大批开入北京，义和团把京津铁路部分

拆毁，把电线杆锯掉，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完全断绝了。因此，乘坐第一列火车出发的侵略军，沿途只能一边抢修铁路，一边前进。这时，由于清朝政府已经命令聂士成部官兵全部撤回天津，义和团在京津铁路沿线上已无掣肘之忧，得以埋伏在铁路两侧，准备随时给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6月11日晚间，侵略军在距离落垡车站不远的地方抢修路轨的时候，大队拳民高举大刀长矛，从铁路北侧不远处突然冲杀出来。这一队拳民当中，十几岁的青年占大多数。他们英气勃勃，胆气极壮，直扑敌阵，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义和团一个首领，曾勇敢地把敌兵的大旗夺到手中。他虽然不幸被枪击中倒地，但仍然紧握大旗不肯放手。就在这位英雄的有我无敌的精神感召下，义和团战士们无不英勇顽强地冲锋陷阵，前仆后继。

战斗坚持了很久。当侵略军被打得眼看支持不住的时候，后队的美国兵来到了。他们在铁路两旁架起大炮，将拳民诱至射程之内，开炮轰击。在敌人的新式武器屠杀下，拳民60余人牺牲。

13日晚间，侵略军除了在落垡车站留驻一个小队以外，其余全部进驻廊坊车站。第二天（14日）的清晨，又有拳民300多人把廊坊车站团团包围。这些英勇的拳民奋不顾身地冲向火车，举起长矛向敌兵猛刺。侵略军在火车上用机枪扫射。前边的拳民被击中倒地，后面的拳民仍然毫不畏缩地继续往前冲。就这样，义和团硬是冒着枪林弹雨杀开一条血路，用长矛刺死了意大利侵略军5人。由于敌人的机枪密集封锁，火力太强，拳民被打死打伤百余人，只好抢救回受伤的伙伴，

撤出了战斗。

这一天晚间，侵略军留驻落堡车站的一个小队，也陷入了义和团的重围，濒于即将被歼灭的境地。消息传来，西摩尔赶紧派回一列火车，载着大炮回兵救援。靠了密集的炮火狂轰滥炸了一阵，才勉强解围。

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本来只需几个小时。可是，由于沿途接连遭到义和团的顽强阻击，西摩尔穷于应战，虽然已经花费了5天时间，却依然滞留在廊坊车站，不能再往前挪动一步。

西摩尔事先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随军携带的给养并不太充裕，从15日起，粮食已经吃光了，只好乍着胆子窜到附近的村庄去抢老百姓的牲口和粮食。西摩尔坐困廊坊，弹药也行将用光。仅仅靠抢劫度日，毕竟不是久远之计。于是他又派一列火车，想返回天津搬运粮食和弹药。可是，杨村东南方的铁路已被义和团彻底破坏。这列火车开回到杨村，就不能再开行了。

6月18日，董福祥所部武卫后军一部2000人，奉命进驻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当即和他们联合，向廊坊车站再次发动进攻。

董福祥的部队之所以能够参加这次战斗，是因为这支军队原来驻防保定时，曾经遭受洋人的欺侮。而义和团首领之一李来中又积极做了许多争取董福祥的工作，因此，董军官兵有不少人是同情义和团而痛恨侵略者的。

义和团由于得到董军的帮助，进攻更为得力。董军开枪射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拳民就趁势向前又一次猛冲，有

时甚至冲到车站站台，跟敌人白刃交锋。这场厮杀从下午2点到4点，方才罢战收兵。在这次战役里，尽管拳民和董军士兵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同时也收到了赫赫战果——打死敌兵50余名，狠狠地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至此，联军沿京津铁路进京的企图已经完全落空。西摩尔又设想改由杨村乘船，取道运河自通州入京。他决定放弃廊坊，把侵略军重新撤回杨村；同时，差人赶赴天津送信，要求增援一些船只和补给。可是，义和团一直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攻击。

6月18日，太阳落山以后，一队精壮的拳民，潜伏在杨村车站附近茂密的青纱帐里。一周多来战事频仍，侵略军疲倦异常，个个都巴不得躺下来好好睡他一觉。就连西摩尔也熬得两眼通红，举步维艰。他下了命令，除了派出十几名意大利兵在车站四周放哨警戒外，其余所有官兵一律休息。有的住宿在火车车厢里，有的住宿在车站站房里。

入夜后，车站周围一片寂静。鼾声向巡游的意大利哨兵不时地传送过来。哨兵们疲倦不堪，第一班岗哨还没有挨到换岗，就都拄着大枪睡着了。

于是，袭击的命令传了下来。一队拳民从青纱帐中一跃而出，轻捷地隐蔽行进，直奔车站。其中有几个人很快地接近车站，腾身如燕，跃入站台。那几个打瞌睡的哨兵全然没有觉察，只见几个拳民手中匕首寒光一闪，哨兵们来不及吭一声，便被收拾了。后续的拳民一拥而上，扑进车厢。敌兵从梦中惊醒，还没有摸到武器，义和团的大刀便斜肩带背地砍将下来了。站房里的敌军惊醒后，一时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只好从窗口向外面胡乱放枪。车站一片混乱。

夜袭已获胜利，一声令下，义和团全部安全撤离现场，返回驻地。

这次夜袭中，侵略军被义和团杀死6名，打伤30余名。

经过这次夜袭的打击，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西摩尔，只好暂停取道运河进北京的行动，寄希望于天津派兵来救援。

但天津租界里的联军，这时也正遭受到义和团的猛烈进攻，自顾不暇，一时也很难分兵去救助西摩尔。

6月19日，西摩尔召集所部各国领兵将官商议对策。会上，他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情绪沮丧，承认进军北京，不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都已经无法通达。而且，法国军队早已断炊，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感觉给养吃紧，弹药不足。因此，大家主张赶快撤回天津；否则，坐困杨村，即便不被义和团全歼，也会变成饿俘。西摩尔同样束手无策，只有同意大家的意见，决定沿北运河退回天津。

20日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侵略军就开始撤退。他们利用抢夺来的4只大型民船和2只小舢舨，载运伤兵和剩余弹药，其余的辎重几乎全部丢弃了。沿着运河两岸，由美、法、意三国军队在前面开路；英、俄、日、德、奥五国军队则在后面守护伤兵。这伙侵略军白天不敢行走，天黑以后才敢偷偷摸摸地赶路。但是，义和团也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袭击。他们已经被义和团吓破了胆，再也不敢短兵相接。因此，只要一发现义和团的踪影，便立即开炮乱轰击。就这样，他们炸毁了四、五座村庄，屠杀了许多无辜平民，才勉强越过北仓，于22日到达天津西沽地方。这时，距他们从天津出发的时候，

12 天已经过去了。

西沽军械局是清军贮存枪炮弹药的重要仓库。当杨慕时的 3 营官兵被义和团从芦保铁路线上驱赶回来后，聂士成就派他们守卫军械局。军械局墙垣高厚，防守的条件本来极好。但是，杨慕时军一见洋兵，就像是老鼠遇见猫一般，以致被西摩尔的疲军惫旅偷袭得手，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占领了。

侵略军占军械局，从那里获得了大量军械和粮食。这样一来，被义和团杀得狼狈逃窜、疲惫不堪的联军，竟意外地从清军那里获得了补给。

粮食、军械虽然已经得到了补充，天津租界也近在咫尺，可是西摩尔还是不敢向租界前进。因为天津城区已经有很多义和团驻扎，他考虑到手下能作战的士兵不足千人，又被受伤的兵士们拖累，要想通过义和团的防线进入租界，则“众寡之不敌，强弱之异势，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他只好暂时死守在军械局里，派人秘密潜回租界求救兵。到了 25 日上午，因为大沽方面连续有大批侵略军开到，租界里才得以抽调 1000 多人去救援西摩尔。

援军和西摩尔军会合后，于 26 日清晨向租界进发。临走时，他们把军械局的精良武器全部捆载而走，把军械局炸毁，夷为平地。

侵略军沿铁路朝租界行进。沿途守护铁路的清军“任西军经过，亦未攻击。”可是，当他们快要接近租界的时候，却遭到义和团大队的迎头痛击。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亲自临阵指挥，拳民人人奋勇杀敌。联军势不能支，被打死打伤的不少，多数抛枪弃炮，夺路而逃。西摩尔一伙虽然狼狈逃回租界，但

从军械局中劫夺来的武器弹药，却有相当一部分被义和团缴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义和团的装备，有助于后来保卫天津的战斗。

这一次义和团抗击西摩尔所率八国联军，历时 16 天，共打死侵略军 63 人，打伤 320 人。就连敌酋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的勇敢。他说：“假如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则必将全军覆没。”

义和团廊坊战斗的辉煌胜利，阻止了侵略军更多地进入北京，同时也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敌决心和必胜信心，对京、津保卫战，起了极为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

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北京，是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心脏，也是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势力的中枢。义和团的英雄们在这里展开了气壮山河的反帝爱国斗争，许多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的战斗足迹，洒下了他们的宝贵鲜血。

北京最早出现义和团的活动，是在 1900 年春天。当时南郊的黄村和庞各庄虽已成为赴京各路义和团的汇聚中心，但由于拳民入城人数较少，城内还没有设坛，只是以张贴传单来宣传鼓动群众，抨击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第五纵队——教堂和洋教士。

这一年春天，华北大旱。北京各教堂附近出现了不少传

单，上面写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传单还警告各国传教士必须收敛他们的罪恶活动，迅速离开中国，否则将用“神火”焚烧教堂。

这时，由于义和团主力部队正在芦保铁路沿线，全力对付清朝官兵的“剿灭”，还没有大批开进北京。因而，清政府也就没有注意这几张传单。侵略者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他们相互间因划分势力范围而引起的猜忌和倾轧上，对于北京出现的这方面事态，也没有更多的介意。

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们认为：“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能迅速的恢复平静。”因此，他们都相信“北京必定安全无患。”

帝国主义者哪里知道，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深深地积聚了仇恨；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义和团虽然组织上幼稚，但却蕴藏着深厚的群众威力。

由于义和团反“剿灭”战斗取得胜利，直隶中部遍设拳厂，势力迅速发展，地位逐渐改观。清军只能困守有限的几个据点，连裕禄也迫于形势，一再指示他的军队：只要义和团不打上门来，就一定避免交战。清军既无力镇压，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战士便沿着铁路线，以“双拳一闪山摇震”的雄伟气势，络绎不绝地进入北京城。

5月间，清政府发布谕旨说：“前因义和团拳会延及京师，曾经寄谕步军统领衙门认真查禁。近闻京师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处，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王城

御史，会同妥议章程，迅速处理；并着裕禄一体严禁。”

但是清政府的查禁，已经不发生作用，北京城内，很多青年纷纷向义和团大师兄学习拳术；通衢大道张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愈来愈多了。凡是官府贴出查禁义和团告示的地方，旁边一定也会出现义和团的告示。如五城察院用六言韵文发布告示，宣称参加义和团是违犯禁令；义和团就编写七言歌谣，阐述习拳“灭洋”的主张，遍贴在各重要街衢路口。北京城的人们说这是御史与义和团唱和诗歌，一时传为笑谈。

义和团进北京的人数逐日增多。前门外打磨厂一带铁铺，为他们赶制大刀；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昼夜不停。拳民们头扎红巾，手持武器，三五成群地行走在街市上，北京城沉闷的气氛大为改观。有些官吏被义和团从车里拉下来，恭恭敬敬立在道旁，威风扫地。清朝统治头子慈禧当时正住在西郊颐和园，得到这些消息，惶恐万分，特地调兵二营专门保卫自己的安全。所有这些，都说明义和团的势力和声威，已在北京急剧扩大，清朝统治者不但无力镇压，甚至连自身安全也都成了问题。

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他们借用庙宇和一些空闲客房，设坛居住。拳民们每日三餐不过是小米饭、玉米面窝头及咸菜之类，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而操练演习却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北京城内，“义和神团”的大旗高悬空中，迎风招展，到处飘扬。

居住在北京城的汉、满、蒙、回等各族劳动人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侵略者的欺压蹂躏。在清朝政府

的统治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反帝的义和团神兵天降，人民群众真是欢欣若狂。他们纷纷参加义和团。截至6月中旬，北京城郊内外设坛已不下800余所，参加的群众多达10余万人。连同外县进京的，北京城郊一带拳民总数可达20万之多。人民反帝斗争的烈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当然，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洪流滔滔，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混入少数不良分子，是在所难免的。同时，义和团“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反帝宗旨，也使得这一斗争比单纯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要复杂得多。有些土棍恶霸，趁机仿效义和团的装束，手持刀械，招摇过市，想借义和团运动捞上一把。封建统治者想利用他们破坏义和团的信誉，对他们甚至暗中支持。

还有一部分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声威，达到废光绪帝立新君的政治目的，其中以端王载漪主张最力。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慈禧重掌政权，囚禁光绪皇帝，屡谋废立，未能得逞。这时，端王的儿子溥儀已立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正在窥伺机会，以期速登皇位。端王看到义和团的势力强大，想利用来搞一次武装政变，一方面既可杀掉光绪皇帝，另一方面又可顶住外国干预。只要自己的儿子能够登上皇位，事后即便是割地赔款去孝敬洋大人，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以端王为代表的部分官僚，心怀鬼胎，口头上对义和团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种态度，对慈禧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们竭力渗透到义和团运动中去，煽动群众的排外情绪，湮没它反清朝统治者的性质，以达到其奸险的目的。

清朝统治者的总头子慈禧，这时对义和团的态度又如何呢？在她当政的四十年里，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屠杀了。尽管她和洋主子之间，在废立等问题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镇压人民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她不会求助于义和团。可是，这时从周围臣仆口中所听到的关于义和团神威的种种传说，却使她深感忧惧，不敢孟浪从事。

据当时英国公使给本国政府的电报透露，慈禧十分惊恐，已决定逃往西安。

不过这时候，慈禧却很难逃到西安去，因为无论是取道芦保铁路由河南沿黄河西去，或者是出居庸关经山西入陕，沿途都处在义和团控制之下。慈禧没有足够的军队来排除沿路阻碍，当然也就不敢贸然出走。

这个狡诈多端的老狐狸，开始耍起她浑身解数，于混乱中周旋了。首先，她不再大声叫喊对义和团“剿办”了。6月3日，她曾叮嘱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6日，她又派出吏部尚书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翹，往保定等地对义和团做“宣抚”工作。刚毅以前因阿谀端王而得到赏识；赵舒翹则是戊戌政变时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刽子手。二人当时皆任军机大臣，是顽固派的中坚分子。慈禧派他俩出行，一方面是“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务宜仰体皇仁，即日解散”；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去实地察看义和团的实力，以便筹划对策。她想以此迁延时日，借机调兵遣将，到她认为力量足够的时候，就要举起屠刀，镇压这些起义的群众了。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5月30日还在厉声喝道：“拳匪滋

事，……现在直隶及附近京畿一带，到处人心浮动。若不迅速剿办，何以靖邪慝而净根株。”到6月6日，她又称义和团是“朝廷赤子”了。可就在同一天，她在另外一道上谕里，却又用截然不同的口吻说道：“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赖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

一面亲昵地称拳民为“朝廷赤子”，一面却在咬牙切齿地厉令“剿除”。这一方面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惶惑困窘，手足无措，简直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另一方面则又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慈禧的两面三刀嘴脸。实际上“宣抚”不过是故弄姿态的权术伎俩，“剿灭”的主意却是始终如一的，只是随人民反帝斗争的进展，其手段和策略有所变化罢了。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揭开了义和团在北京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

6月9日上午，从4月以来一直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回到城内皇宫。当天下午，她将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调进城来，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左近。慈禧调董军进城，是心怀叵测的。她曾密谕董福祥，令董军尽屠北京城中的义和团。但董福祥的军队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寄以很大的同情，有很多士兵甚至参加了义和团。慈禧让他们屠杀义和团，董福祥以不能杀老百姓苦娃娃为辞，竟拒绝执行命令。与慈禧的意愿相反，董军不少士兵却立意要“剿除洋人”。

就在董福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Sugiyama），因天津援兵迟迟未到，想出永定门

探看情况，走到天坛门外地方，被董军杀死。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慈禧的意料。

北京局势的急剧变化，杉山彬的被杀，侵略者更加有所借口。他们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构筑工事，分兵驻守。有的教堂，如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和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基督教亚斯利堂，也都有外国兵驻扎，俨若敌国外域。孝顺胡同一带甚至还贴出大张“告示”，禁止中国人通过。如果有人胆敢接近这里的教堂，则告示上赫然大字写得明白：“如有不遵，枪毙尔命”。侵略者蓄意武装挑衅，其凶横跋扈的气焰完全溢于言表了。

13日清晨，义和团列队自崇文门进入内城，驻亚斯利堂的美国兵竟突然开枪截击，伤亡拳民多人。义和团愤怒万分，决定火烧教堂，以示警告和回报。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波及民房，当天上午，义和团在全城到处通知，要求各家在院内用大缸多贮凉水，说是可以防瘟疫，实际是为了消防之用。

6月13日下午，义和团挑选了精壮拳民1000人，个个红布包头，手持明晃晃大刀，列队开赴孝顺胡同亚斯利堂。

驻扎在这里的美国兵闻讯慌了手脚，带领“二毛子”们仓皇逃往东交民巷使馆去了。

义和团首领高声宣布：“今天请天降神火，把这些害人魔窟统统烧光。请大家一起呐喊助威。”说罢，大喝一声：“着！”教堂里火光一闪，预先进入教堂的义和团战士，把准备好的柴草硫磺等物点了起来。顷刻间浓烟滚涌，烈焰翻腾。围观的群众看得兴高采烈，欢呼跳跃，伴随着冲天大火，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同一天下午，义和团又接连焚烧了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的英国伦敦会、八面槽的法国天主教东堂、灯市口的美国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的美国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的长老会、西直门内法国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的基督教堂、石驸马桥的英国安利甘会等处；傍晚，烧毁了宣武门内的法国天主教南堂。半天时间，共烧了 11 所教堂。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传教士在中国加紧建造教堂，扩大侵略活动。中国人民早已无比憎恨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以及一小撮认贼作父的汉奸教民“二毛子”了。如今十一烛大火冲天而起，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焚烧教堂的大火映红了北京上空，义和团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慈禧望着冲天烈焰和滚滚浓烟，听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虽然深居在皇宫仪鸾殿里，也觉得宝座不稳而大惊失色了。

6 月 15 日，慈禧连下几道谕旨，其中说到：“昨日夜間，城内各处焚烧如旧，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因此，慈禧命令卖国贼李鸿章即刻迅速来京；又命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迅速来京；还命令刚毅迅速来京。

但这时李鸿章远在广东，袁世凯也远在山东。远水不解近渴，北京的局势却又使她万分不安。于是，第二天，她又命令驻防津榆铁路沿线的马玉崑，带领马步军星夜入京。

李鸿章早年因勾结英、美、法等国，绞杀太平天国革命，深得慈禧的赏识。慈禧调他来京，是要用他进一步和帝国主义勾结。袁世凯在山东曾勾结德国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义和团，

是帝国主义垂青的能干走狗。马玉崑以镇压捻军起家。慈禧如今同时调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来北京，是要把义和团淹没在大屠杀的血泊之中，从而向洋大人谢“治民无方”之罪。至于慈禧调刚毅回京，则是急于要了解义和团在北京周围究竟有多大实力，以便部署下一步具体行动。

17日，慈禧更急调张春发、陈泽霖统带所部武卫先锋左右翼20营来京；同时还谕令各省选派将兵听候调用。她在给各省督抚的谕旨中写道：“近因民教寻仇，‘匪徒’乘机烧抢，京师内外，扰乱已极。着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

义和团燃起的冲天大火，就在清朝皇宫的四面熊熊燃烧。人民喊杀之声摇撼着皇宫道道大门。北京，这是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根本之地”。犖犖之下，竟然大乱。封建统治者歇斯底里大发作，要对人民残酷镇压了。

然而正当慈禧一帮反动统治者正磨刀霍霍，争于向义和团大开杀戒时，结束了大沽陷落和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谣言。面对着义和团和列强的双重压力，一场以“宣战”为幌子、借洋人之手屠杀义和团的阴谋开始了。

大沽陷落与对外“宣战”

1900年6月4日各国公使在北京集会。法国公使建议，凡有舰队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各国公使，应立刻通电本国政府，要求下令给各海军统帅，在北京被封锁而排外运动占上风的情况下，立刻采取必要的营救办法。这建议得到与会各国公

使一致赞同，在中国有海军的各国公使立刻发了电报。

6月中旬，英、日、法、俄、德等国海军陆续开到大沽口外深水处，计有战舰和巡洋舰22艘。另有炮艇10艘则驶入大沽口内。

16日下午8时，各国舰队统带官致函大沽守将罗荣光，要求“暂借”炮台，限翌晨2时以前必须交出，否则将用武力夺取。罗荣光未接上级命令，不敢让出炮台。

清朝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时，由于李鸿章的妥协政策，以致溃不成军。那以后，清政府在裕禄奏请下添购兵轮，重整北洋海军。这样，又有了连同旧有残船在内的13艘船，每年军费等开支100多万两。当时戍守大沽炮台的清朝军队，计步炮各队共二三千人，所用都是新式武器，并有大口径炮多尊。以这样的装备而论，坚守海口应是没问题的。可是，清军十分腐败，对于防务毫不讲求，岸上炮台的弹药库完全暴露在敌舰的射程之内。

16日夜间11时，外国兵船10余艘，一齐开炮，向岸上各炮台猛烈轰击。罗荣光率军奋力还击，鏖战6小时，共击沉击伤敌船6艘。相持到17日黎明，岸上4个弹药库被敌炮击中，爆炸起火。侵略军遂趁势登陆，攻陷炮台。在这次战役中，北洋海军仅有的鱼雷艇4艘被敌人俘获，分别由英、法、俄、德四国侵略军管辖。巡洋舰“海容号”则被敌舰看管，勒令熄火，停泊湾内，不准移动。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于日本手中的甲午战争后5年，这支新建舰队旧创未愈，又败北了。

大沽陷落是17日上午。因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已被截断，

公文投递只能沿运河由通州入京，所以清廷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荣禄的武卫中军还忠实地执行着“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的命令。

突然，有一种谣传说，列强将要以武力胁迫慈禧归政光绪皇帝。这对于顽固派简直是晴天霹雳，无异于宣布他们的死期来临。

谣传的来源是这样的：16日深夜，外国兵舰开始袭击大沽口的时候，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儿子叩荣禄家门，呈密信一封，内称传闻英国将以大兵进京，要求有四条，第一条即勒令皇太后“归政”。本来，顽固派在废立问题上屡屡受到外国主子的打击，早已成惊弓之鸟。如今这一密信带来的消息，正中顽固派心病。荣禄读信后，急得绕屋行走，徬徨终夜，第二天，17日清晨，赶忙跑进皇宫报告慈禧去了。

17日下午4时，慈禧传急诏，宣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受惊吓后，心绪不宁。但她不肯告诉手下臣仆关于“归政”这一“消息”，只说：“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由于会议前，慈禧的死党已经得知“归政”的“消息”，这时他们竟然嚎啕痛哭，异口同声地要求非跟洋人决一死战不可。但另外一些大臣却莫名其妙。因此，有的人仍力言“衅不可开”。慈禧说：“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慈禧果真有这样的骨气么？要真的有，她决不会活到这时候了。她不过是感到洋人欺负她太狠了些，不免有些动气。但她对于洋主子终究是畏惧的，所以会议最后

没有作出宣战的决定。她只不过命荣禄传令武卫军“备战守”，并派徐用仪等去各使馆，向公使们“谕以利害”。

18日，御前会议继续进行。仪鸾殿上，各种不同主张争辩甚为激烈。端王等主张利用义和团以达到“灭洋”的目的。当然他们的“灭洋”和赞助义和团，是有一定限度的。如前所说，他们只是要利用义和团去慑服各国公使，等溥儀取得皇位以后，再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义和团。

另一派如徐用仪、袁昶等，则主张屠杀义和团以取悦洋人。袁昶力言各国公使调兵到北京，只是为了保护使馆，绝不敢干预中国的内政。袁昶还奏请慈禧，责成荣禄向清军及各级官吏发布命令，让他们只要遇见拳民，就坚决镇压，格杀勿论；并且要以朝廷名义出重赏奖励捉捕到义和团首领的人。捉到义和团总首领、老师的，赏银2万两，立即超升官阶；捉到或杀死大师兄一人，则赏银500两；杀死一个拳民，赏银100两。此外，袁昶还奏请慈禧暂时关闭各城门，调用武卫中军的精锐部队，分为十队，分头在城内搜捕义和团，见一杀一，见百杀百。袁昶之流的这一主张如果被采纳，那么，不是北京城变成血海，就是义和团起而推翻清王朝。

奸诈狡猾的慈禧审时度势，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中还有微妙处存在。如果全力镇压而无效，就是她的死期到了。但是义和团本身的弱点却不是不可以利用的。笼络和欺骗的办法可以使她能苟延一时，然后等缓过手来，再出卖和屠杀义和团。于是，慈禧想到可以施展欺骗的阴谋。可时机似乎还不成熟，这一天的御前会议依然无结果而散。

19日，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才送到北京。同时，奉旨往

天津“劝阻”侵略军的许景澄、那桐二人，也因半路遇到义和团的盘诘而狼狈折回。

于是，慈禧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办法。她命令总理衙门紧急照会各国公使说：因各国水师占据大沽炮台，因此不能再保护使馆，希望各公使在 24 小时之内下旗归国。慈禧所以要各公使离开北京，因为她知道京津铁路线已在义和团控制之下，公使们去天津途中可能被杀。同时，她也知道大队侵略军已陆续开到中国，她可以把公使被杀一事归罪于义和团，以便借侵略军代她完成屠杀义和团的计划。

清政府紧急照会是 19 日下午送到各使馆的。当天晚间，总理衙门收到公使团的一封回信，信中说：第一，24 小时的期限太苛刻了，我们行李都来不及收拾；第二，鉴于京津间交通长时间中断，又有义和团到处活动，到天津 200 余里路程，安全是没有保障的。中国政府方面必须担保没有危险，我们才能考虑离开北京的问题。各国公使还约定第二天（20 日）早晨派人前往总理衙门当面接洽。慈禧的“妙计”又失算了。走狗和主子之间这样勾心斗角不知有多少回。

20 日，有一道谕旨颁给军机大臣：“近日京师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这说明慈禧一时又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究竟怎样处理才好了。

就在这一天上午，慈禧传旨“叫大起儿”（即召集御前扩大会议）。这时，恰好刚毅从涿州回来。慈禧原指望刚毅带点消息能宽慰忡忡忧心，而刚毅报告的情况却更让她意乱心慌。

原来，刚毅等一行到达涿州后，就被阻不能前进，看到困守芦保铁路沿线几个据点的清军，“日夜戒严，营中已七昼夜不寝矣。”一向作威作福，坐享富贵荣华的清朝官僚们，初次见识到人民的威力，才知道自己所有的镇压手段全是徒劳无益的。这时，天津方面也有战报继续送到，八国联军在攻占大沽之后，又向天津城郊进犯。为了保卫天津，义和团已迫使裕禄传令清军协同拳民攻打租界。天津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

紧接着，北京也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行至东单，巡逻的清军虎神营士兵拦轿盘查。克林德非但不肯停轿，而且首先从轿内开枪。清军士兵开枪还击，克林德被击毙。据一名英国记者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载，克林德在被打死的前6天，即6月14日，曾率水手一队巡行北京崇文门以西城墙上，看见下面沙地上有拳民练习拳术，他竟无端寻衅，下令开枪，当即打死义和团拳民约20余人。如今他竟死在虎神营士兵的枪下。

使馆里的洋兵们，听到克林德的死讯，结队外出寻衅，并向外开枪乱射，打死打伤无辜百姓多人。义和团再也按捺不住满腔义愤，20日下午，出动了五六千人，张旗出东华门夹道，进攻东交民巷御河桥。

中国人民和侵略者之间的一场激烈搏斗，就在慈禧居住的皇宫近旁展开了。

当时，使馆区里驻扎有外国军队440人，在东交民巷一带分区布防。另有各使馆、税务司署的人员、家属以及传教士，共900余人，其中壮年男子负责守护内线。此外，尚有

逃来的天主教及耶稣教的中国教徒 2300 余名。其中年轻力壮者，发给枪枝弹药，编为“教民队”，由日本人野口温率领，拉到第一线去当炮灰；其余的人就被驱赶着挖战壕，运炮弹，干苦力了。

义和团从 6 月 20 日攻打东交民巷的时候开始，就使用了火攻的战术。他们从东交民巷东西两端分头攻入。一部分拳民手执火把，直冲向前，扑向使馆的楼房。但是楼窗距离地面较高，百叶窗紧闭，火把难以投入。拳民们就找来一些长竹竿，将火把绑在竿头，捅破玻璃窗，连竿带火把一起掷入室内。火把里面裹着硫磺，很容易就将木质地板引燃。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东交民巷东口内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使馆和西口内的荷兰使馆的楼房全部烧毁。侵略者不得不退守到台基厂大街以西的第二道防线。

四座使馆，转瞬之间，化为灰烬。这一事态使慈禧感到局势更加严重了。肘腋之间，义和团的压力比远在天津的八国联军大得多。如果使馆一旦被全部攻下，义和团就可能转而攻入皇宫，把慈禧这个封建独裁统治者兼洋奴也赶下台去。慈禧立即施展她老奸巨猾的狡诈手段，要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在，她的办法找到了，就是对义和团“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也就是竭尽全力去煽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把这一运动引入歧途。

局势在瞬息万变，清朝统治者的态度也在瞬息万变。慈禧铤而走险，居然对外“宣战”了。

6 月 21 日“宣战谕旨”公布了：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僉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难得清王朝的御用文人写下这么言词慷慨、血泪交加的圣旨。

昨日被咬牙切齿称为“盗匪”、必欲剪除屠尽而后安的义和团，今日被称为“义兵”，并且夸赞他们的“不期而集”。昨日还在向洋主子秋波频送、媚态娇柔、言听计从的慈禧太后，今天竟然揭示：“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她真的一屁股就坐回到人民一边来了吗？否。庄严神圣的谕旨是在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

就在这道谕旨起草的时候，20日下午，大队武卫军在荣禄指挥下，把东交民巷使馆地区团团包围，声言要用洋枪洋炮去“大张挞伐”。荣禄于是让义和团撤到第二线。当天晚上，只听大炮轰鸣，枪声大作。

第二天，激昂慷慨的“宣战”谕旨公布了。遭了一夜炮击的使馆区竟毫毛未动，依然故我。原来荣禄得了慈禧的交底，下令部队枪要冲天开，炮要放空炮。这就是“宣战”，宣而不战；这就是“大张挞伐”，张而不伐。一连几天，天天如此。人民血汗钱换得的枪炮弹药就由着清王朝一伙洋奴们耗费，向侵略者献媚去了。

当义和团要求向前攻打时，“撻伐”倒真的来了；武卫军竟掉转枪口，实弹射击，屠戮义和团。

义和团终于发觉了：慈禧命荣禄“围攻”使馆是假；“围护”驻在那里的武装侵略者才是她真正的意图。这就是“宣战”丑剧的真象。

因此，“宣战”后一个时期内，义和团要想惩处盘踞在使馆内的侵略者，只能在御河桥（今正义路北口）找到一个可以同他们搏斗的场所。原来，派驻在这里的是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尽管有荣禄的密令不许真打，但他们还是默许义和团从这里发动进攻。6月下旬，御河桥一带就成为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一个最激烈的战场。

由日军占据的御河桥南岸的肃王府，是义和团攻击的目标。据守的日本兵，凭借高墙，架设机关枪，向外扫射，致使许多义和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御河桥下的流水。但拳民们仍勇猛地向前冲，屡屡进攻。枪弹如雨，砖石如泼。

在义和团英勇作战的感召下，董福祥部下的士兵，很多人不顾慈禧的禁令，也表现了他们的勇敢。有一次董军数人与侵略者肉搏，被洋枪击中，倒在地上，便口中仍然大呼杀杀不已。在另一次战斗中，一个士兵中弹倒地，仍奋力把手中的大刀向敌人猛掷，砍在敌人的大腿上。

义和团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发挥群众的智慧，想出各种办法，向敌人进攻。6月23日，居于翰林院及其他使馆中心的英使馆，突然起火。这里，由于被许多高大建筑物蔽护着，不容易受到直接攻击，成为许多公使的避居地。义和团却出其不意，派出一个身体轻健、武功高超的拳民，用

他灵巧的武术技艺，越过翰林院的高大建筑物，潜入英国公使馆。正巧 11 国公使都躲在那里密谋策划。这个拳民把带去的引火硝磺放在窗外点燃，刹时烈焰飞腾，吓得众公使跪倒在地，连呼“天主保佑”。

在义和团和董军部分官兵的猛攻下，使馆内的侵略军死伤 100 多人。

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进而波及全国。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宣战。这时，一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住其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决定联合长江流域军阀官僚共同采取行动，以扼止该地区爆发反对英国的运动。为此，当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联军向北京进发时，英国在长江流域开始进行使东南各省中立化的活动。

6 月 14 日，英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伦建议英国政府立即与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帮助他们在辖区内尽力维持秩序。两天后，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复电，授权华伦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英国海军将支持他们维持秩序。17 日，英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张之洞表示他和刘坤一都非常愿意与英联络。张之洞在“致江宁刘制台”的电文中表达了他的思想动机：“英领事来见，云英政府电令他们来告，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鄙人力阻之，谓鄂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并云已与台端商

妥，意见与我同，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岷帅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清政府于6月21日正式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对此，东南各省督抚认为清政府对列强的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出于逼胁”。于是，不但决心置身局外，并且还拟进一步同列强相勾结，共同镇压他们管辖境内的人民爱国运动。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互约，凡6月20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建议他们“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岷帅（刘坤一）、香帅（张之洞）会同电飭地方官上海道与中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对此亟表赞同，并且挽请盛宣怀出面帮助。刘坤一、张之洞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害怕北方的义和团会影响到长江流域，引起大规模暴动，所以他们于6月26日会衔电奏中说：“……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为首的诸列强与清政府地方官僚军阀势力两者结合起来，共谋“东南互保”。同日，刘坤一约请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派上海道余联沅与列强驻沪领事会议，盛宣怀等人出席。当日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也叫《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内容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第二，希望各国不要派太多的兵船

进入长江，兵船不要驶近炮台，水手等人不可上岸，传教士不可进入偏僻内地，“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互保章程还规定，由刘坤一、张之洞负责在长江中下游的自己辖区之内，“禁止谣言，严拿匪徒”。随之各国借口保护，纷纷把军舰驶向长江各口岸，并增兵上海。刘坤一、张之洞则在长江中下游到处张贴“互保”告示，并派遣大量兵勇日夜巡逻，严防义和团民入境。

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李鸿章表示全力支持，袁世凯决心依照东南各省的办法进行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则于7月14日与英、美、俄、日等六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在其权限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分割”；“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人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罚。互保范围由苏、赣、皖、鄂、湘扩大到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东南互保”约款后来并未取得中外任何一方的正式批准，但双方都已有了谅解、默契，其条款已付诸实现。英国政府由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胜利，便决定放置原有的制造各地“独立”的做法。“东南互保”的实施，使长江会党的起义活动遭到镇压，未能声援北方，使义和团的斗争陷于孤立。

天津保卫战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京津义和团部分爱国的清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大沽陷落后，天津义和团

和清军即开始围攻紫竹林租界，抗击联军进攻，展开了保卫天津的战斗。

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是大沽向京津运兵的要地，又是租界与外界联系的必经之地，有 1700 余名俄军据守。6 月 18 日，又有 2000 余名俄军从大沽开到车站附近的娘娘庙炮轰义和团，曹福田率领义和团团民数千人和清军一起合力攻打俄军，并趁机包围车站，用枪炮武装的敌人，被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打得丢盔弃甲，死伤 500 余人。6 月 29 日，曹福田又联合从独流赶来的张德成部，对车站发起攻击，在清军炮火配合下，曾一度占领了火车站，给沙俄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在争夺老龙头火车站的同时，张德成又率领团众向紫竹林租界发起进攻。7 月 1 日，张德成率部再次对敌人发起攻击，激战 5 个多小时，为冲破敌人的地雷封锁，摆出了“火牛阵”，用几十条尾巴燃着火的牛作前驱，踏毁地雷，大队义和团随后冲入租界，捣毁三井洋行、萨宝室洋行等机构，杀伤不少敌人，后因遭到敌人的猛烈阻击，方始撤出。

7 月 6 日，敌人偷袭马家口，被张德成部的伏兵打得狼狈逃窜。当天，直隶提督聂士成带领武卫前军从天津城南迁回到租界西南方，在城墙上架起大炮，向租界和跑马场一带猛烈轰击，又挑选百名勇士潜入跑马场，用手雷击溃敌兵。7 日，聂军又沿跑马场进攻，直逼租界小营门一带。

侵略军不断增兵天津，至 7 月上旬，敌军已达 1.8 万余人。当此紧要关头，清政府任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主持天津军务。宋庆执行清政府屠杀义和团的政策，将

枪口对准义和团，使义和团实力大受损失。

1900年7月9日凌晨，联军约6000人分两路向八里台反扑。一路由日军担任前锋，另一路由英国皇家火枪团在其右翼策应。联军企图占领八里台后，经由海光寺往北挺进，以南机器局为突破口，攻占天津城厢。联军先夺回了跑马场，正在八里台酣战，聂士成率队迎战，血战数小时，八里台被联军包围。聂士成沉着指挥部队浴血奋战。聂士成两腿受枪伤，营官宋占标劝他退下，聂士成奋不顾身，持刀督战，又被子弹洞穿两腮，颈侧、脑门和腹部多处受伤，肠出数寸，壮烈牺牲。聂士成从天津之战开始，率领部队，英勇抗击联军。在作战中，身先士卒，屡破敌阵，主动支援友邻，为清军所称颂，为联军所畏服。据外人记述：“华兵虽重，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聂士成阵亡后，裕禄奏报清廷：“聂士成，秉性忠纯，勇敢素著”，兹以临阵捐躯，身受多伤，死事甚为惨烈，“当此军务方急之际，遂失良将，莫不同声悼惜。”今天津八里台犹存聂公墓，永为后人瞻仰。和聂士成一起牺牲的还有营官宋占彪、哨官范振先等7人。清军主将阵亡，八里台失守，退守西教场，联军攻入海光寺。聂部哨官潘鸿生携炮二门，扼守门外小桥，顽强阻击联军，阵亡哨长一名，士兵伤亡不少。武卫前军右营统带卞长胜、练军统领何永盛、武卫前军统领胡殿甲会同义和团攻入租界，反复冲杀，日暮退出。9日中午，联军占领天津南门外重要据点南机器局。

清军实施的三面进攻紫竹林租界之计，付出了巨大代价，

取得了一定成果，给联军造成了不小困难。可是，清廷没有抓住有利战机，组织兵力，扩大战果，相反，却着手求和。联军则乘机从大沽增兵，到12日，租界联军达到1.7万人，遂解租界之危，由防御转入进攻，天津危急。

联军进攻天津的部署是：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分两路进攻天津。一路由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2600人为前队，德军两个连、法军一个连为其后队，从白河东岸进攻清军水师营炮台和天津城的东北部；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700名，美将白勒率美军600名，日将福岛率日军2400名，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800名，共4500人，携大炮24门，进攻天津城南。

当时，清军水师营驻守五岔河口的炮台；马玉崑率15营驻老龙头车站以北地区；聂士成部25营，由胡殿甲率领驻守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余部分别驻守南门内外；宋庆部驻守西门。义和团分散天津各地。清军的兵力与联军相当，但缺乏坚守的充分准备。

7月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运动。次日黎明，炮击马玉崑部和水师营炮台。清军北撤，联军进至天津东北部。白河两岸的英、美、日、法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经海光寺，在天津南郊集结。14日零时联军开始总攻，俄、法、军被清军炮火压制，伤亡较大；日、美、英军推进到距离城墙约五百公尺处，清军猛烈反击，联军伤亡惨重。美军陷入城南沼泽地，损失更重，团长里斯库姆上校被击毙。15日清晨，日军用猛烈炮火轰开天津城南的外城门，强渡护城河，用火药桶将内城炸

破，日、美、英、法军趁机冲入城内。黄昏，美军占领了清军的枪台和军械所。裕禄、宋庆、马玉崑等率 2 万余人撤到北仓，练军、淮军和水师营撤到杨柳青，天津城陷落，只有装备简陋的义和团，始终在城里坚持战斗，但已无法挽回败局。联军进入天津城后疯狂洗劫，造币厂、衙门官府、丝绸店、珠宝店以及民宅，均被抢劫一空。

北京防御战

通州陷落，北京危急，大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此时慈禧太后从根本上动摇了抗战的决心，著总理衙门向联军乞求停战议和，联军置之不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又一次被列强的铁蹄践踏，遭到惊人的浩劫。

8 月 13 日午夜，俄军先头部队直抵东便门。他们以为清军已成惊弓之鸟，不敢抗战，可以像轻取通州一样攻占北京，便贸然攻城。不料遭张怀芝部顽强抵抗，“在此血战，华兵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进攻齐化门的日军也受阻，被迫停止攻城。

14 日上午，日军再攻朝阳门、东直门，武卫军坚决还击。荣禄派孙万林、李金成两统领，率部出安定门，抄袭日军侧翼，日军攻势受挫。北京城墙高大坚固（宽 40 英尺，高 60 英尺）日、俄军虽然炮火猛烈，仍不奏效，改用工兵爆破，俄、日军死伤 100 余人。在东直门、朝阳门激战的 2 天期间，广渠门方向异常平静，荣禄误认为无联军来攻，遂将广渠门守军董福祥部调往朝阳门、东直门，正巧此时英军赶到广渠门，

展开 12 门野炮，轰击城门，破门而入，直指前门。英军中有许多缠头的印度兵，清军和义和团误认为是清军马安良的回民部队，未加阻截，英军得以顺利占领天坛，迅速抵达使馆区外围，从一个水洞进入东交民巷，美、法军跟踪而入。日、俄军爆破东直门、朝阳门成功，法军也于 14 日午夜入城，在城内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清军逐步收缩，联军向紫禁城逼近。

8 月 14 日，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议事，急筹补救之策，但无人应召。入值大臣载澜借口无可调之兵，应立即投降，慈禧拒绝。15 日晨，联军攻打紫禁城，守卫紫禁城的神机营、虎神营与联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天安门遭到联军炮火的猛烈轰击，神机营退守午门。守卫皇宫后门景山的神机营，居高临下，对联军威胁很大。联军为争夺这一制高点，进行了数小时的强攻，神机营誓死鏖战，官兵大部伤亡，景山失守。安定门被联军大炮击毁，守将延茂见大势已去，将自己的住宅焚毁，举家自焚而死。守卫皇宫的清军在困难情况下，与联军血战一天，打退了联军的多次进攻。可是就在清军同联军在东华门苦战之时，慈禧挟光绪帝着青衣素服出逃。他们出西华门、西直门，经颐和园、昌平区、居庸关，转道山西，直奔陕西。荣禄和董福祥也率部分别从西直门、彰仪门撤走。16 日晨，日军首先攻进紫禁城，北京陷落。在一片出逃声中，唯有义和团在城内坚持了最后的抵抗。北京之战，联军伤亡 450 人，清军伤亡 4000 余人。

北京陷落后，联军纵兵掠城 3 天。皇宫、官邸、商店和民宅，均遭抢掠，无一幸免。这些外国强盗大发横财，出京时“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橐而来，捆载而往。”

他们是一伙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破坏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联军为统治北京，经过内部的斗争，由德国瓦德西元帅担任联军司令，成立了所谓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划成十一个区，由各国侵略军分别占领，便于搜刮和弹压。瓦德西于10月27日抵北京，将司令部设在紫禁城的金銮殿。

在北京即将陷落时，清廷于8月7日派李鸿章与联军和谈。清廷在西撤途中，于8月27日派庆亲王奕劻回京议和，令李鸿章会办。9月7日，清廷颁发上谕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剿除不可”，要求议和。联军认为“直隶一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人，设剿灭之未尽，自平安之无期”，拒绝议和，不肯歇手，仍四出攻掠，扩大军事占领。9月8日占独流和良乡，11日从天津占北塘，20日占芦台，22日占领山海关。

保定是直隶的首府，是义和团的活跃地区，芦汉铁路始于此，当时铁路正在修筑中，与英、法、日、德有直接利害，故联军打下北京，便急于夺取保定。法军于13日疾足先抵。守军准备迎战，李鸿章不许，令守军撤向山西。直隶布政使廷雍开门迎法军入城，其它国家的军队于20日前后相继进入保定。联军入城后，大肆搜捕义和团，残杀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廷藩司、城守尉奎恒被杀死，王占魁被敲死，连开门揖盗的廷雍未得幸免，被联军处决。联军除蔑视我主权，滥杀朝廷官员外，还勒索保定交给白银10万两。新授山西按察使升允愤联军暴行，在直隶紫荆关同联军鏖战，帮带副左营官黄明远、哨官李士彬中炮阵亡，哨官陈心胜、黄印负伤。升允在关上督率左翼分统周玉堂、管带萧世禧，据险回击，毙

敌数十人。守军阵亡 60 余人，受伤 28 人，因弹竭兵单，先退浮图峪，再转至平型关。

11 月 12 日，德意军 2500 余人，越南口、居庸关，占宣化，27 日占张家口。12 月上旬，法军 100 人贸然进犯直隶要隘井陉。井陉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镇总兵刘光才率部 20 个营约 1 万人，在此遍筑石壕，密布地雷。法军悍然强攻井陉南的虎头山，被清军打死打伤 10 余名。李鸿章于 1901 年 1 月 25 日严令停火，要刘光才“退兵晋境，不准一人一骑东出”。刘光才以为井陉外围东天门乃入晋第一关隘，“数月绸缪，精力毕萃”，所有设防，“均藉民力，有不能去之势”，没有遵令。4 月中旬联军又以此为口实，集结德、法军约 7000 人，强行挺进，大战在即，李鸿章又急电令刘光才撤退。刘光才无奈，率 15 营撤至固关，另 5 营退守娘子关。

三、东北军民的抗俄斗争

瑷珲保卫战和北大岭阻击战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声势最大的是东北义和团和清军抗击俄国侵略军的斗争。1900 年 7 月上旬，俄军 11.6 万人，兵分 7 路入侵我国东北。

攻占瑷珲，是北路侵略军的首要目标。战役开始时，俄军组织了 49 个步兵连、6 个骑兵连和 27 门炮，在格里布斯基中将统一指挥下，由苏鲍齐奇少将担任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苏

鲍齐奇是关东边省部队的副司令、参谋长，此时从彼得堡赴旅顺返任，奉命临时率领援军刚刚抵达海兰泡。俄军的作战部署是：主力从黑河屯上游偷渡过江，从黑河屯守军的侧后进攻；瑗珲及其下游对江的俄军，则用火炮轰击瑗珲城，并相机从下游渡江，插至瑗珲通往齐齐哈尔的大道上，截断清军的退路。同时，为了吸引清军的注意力，配合主力的偷渡和进攻，派出四艘武装轮船在黑龙江上来回穿驶，向右岸清军射击。

1900年8月2日凌晨1时，俄军先头部队从黑河屯以北清军疏于防守的地段偷渡，占领了右岸阵地，后续部队继之大批过江，并随即向黑河屯清军侧后攻击前进。江面俄轮和海兰泡留守俄军，亦配合进攻部队，以猛烈炮火向黑河屯清军轰击。“鏖战四小时，我军官兵阵亡受伤甚多，援兵不济，势寡不支，半击半退。”于是，黑河屯乃于中午失守，俄军纵火焚烧了黑河屯。统领崇昆山率所部退往大四嘉屯，与统领恒玉部队会合，在卡伦山据壕防守。

俄军攻占黑河屯后，调整了部署，由亚历山德罗夫少将指挥攻击卡伦山，苏鲍齐奇少将的部队改为预备队。3日晨6时，俄军开始进攻。清军在卡伦山前面的阵地上，以猛烈的枪炮射击和小规模出击，一再拦阻了敌军的进攻，并一度迫使向清军右翼进攻之敌后退。当清军开始追击时，俄军两翼的炮火阻止了清军，使之不得不退回战壕。俄军在进攻卡伦山高地主阵地时，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枪击，并且把总预备队投入了战斗。清军冒着敌人炮火，守卫阵地，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我冲彼撞，混杀至午后，我军力疲，退守到城外

头道沟，俄军扎营在四道沟。”退却中，清军后卫的几个分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掩护了大部队的撤退。在卡伦山高地战斗中，许多中国官兵，打得英勇顽强。当俄国中尉军官前来夺取火炮时，一个中国士兵毅然引爆了自己身下的炮弹箱，炸死了俄国军官，自己也同归于尽，为国壮烈牺牲。

接着，俄军于8月4日攻打瑗珲城。攻城战斗又改由苏鲍齐奇指挥，亚历山德罗夫所率部队改为总预备队。4日下午2时，俄军万余，采取正面强攻、两翼迂回包围战术，向瑗珲进攻。清军翼长凤翔督饬守城军士暨各路退回官兵3000余人，分布3路，死力扼守。义和团和城内居民，也奋起参战。在瑗珲城郊，清军据守战壕工事，英勇抗击优势敌军的攻击，使敌人要逐个攻打，才能前进。在瑗珲城南端，有三四百名清军死守战壕和房舍，使进攻的哥萨克骑兵遭到杀伤，陷入困境，俄军不得不调集许多部队向清军猛烈攻击。这些守军拒绝劝降，宁死不屈，大部分英勇战死，少数没有战死的官兵，在房舍被俄军焚烧起火时，“便跑到外面自我爆炸”，光荣捐躯。下午7时，俄军进抵瑗珲城下。瑗珲城郊的战斗持续到晚上9时，当夜清军大部分撤至城西南约40公里之额雨尔一带山口。翌日，俄军入城，少数留守的清军和义和团以及一些居民，仍然顽强抵抗，与敌逐屋争夺。俄军“几乎每幢房子都是经过战斗取得的。许多房子里，中国人都纵火自焚。”中国军民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而英勇献身的精神，使俄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许多中国人“表现为真正的英雄”。俄军在攻打和占领瑗珲时，大肆纵火，使这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

瑗珲战斗结束后，苏鲍齐奇按预定计划继续前往旅顺口，

并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占领瑗琿的俄军，由外贝加尔边省部队参谋长、外贝加尔派遣军司令连年刚博夫少将指挥。8月6日，连年刚博夫率领4个连步兵、2门炮的“快速支队”追击清军至额雨尔。其他俄军随后跟进。7日，自瑗琿撤退的清军与援军义胜军两个营在二龙屯、东西额雨尔站左山坡一带，凭险据守，迎击来犯之敌，毙伤敌官兵40余名。后因敌大批后续部队来援，清军侧后又遭到迂回之敌的威胁，凤翔乃率部退守北大岭（今大青山）山口。

北大岭是小兴安岭的一个重要隘口，是“通省紧要关键”，凤翔率部退守此处，连同从省城调来的两营援军，兵力共约5000人，并有火炮10门。当地鄂伦春族人民组织了骑队500名参战。清军在山口东坡构筑了坚固阵地，伏兵于岭下两旁山侧，待敌深入岭底，突然攻击。8月10日，连年刚博夫率军进入清军伏击圈“将半”，清军三面枪炮齐发，素以驍悍著称的鄂伦春族骑队也投入战斗，大量杀伤了敌人。俄军遭到突然打击，乱作一团，稍后才调整部署，以骑兵从侧翼包抄清军，亦被击退。凤翔亲临前敌督战、指挥，左腿右臂“两受弹伤，坠马者三，辄复跃上，鏖战不少休，既还，呕血数升而死。”清军因翼长死难，未能深追敌人。14日镇边新军后路统领恒玉被委为翼长，率军继续扼守北大岭。

败退的俄军在援兵陆续到达后，经过几天准备，于8月16日再次进犯北大岭。俄军在岭下先以大炮猛烈轰击清军阵地，然后以步兵和骑兵分头抢岭。清军据守阵地回击，与俄军相持。另一支俄军数百人绕道由岭北树丛中偷越上岭，夹击清军。清军腹背受敌，伤亡颇多。镇边新军右路统领崇玉、

义胜军左营管带瑞昌同时阵亡，后路统领喜昌、后路左营管带连和负伤，全线溃败，当夜退至四站东十八里湾屯，又与尾追之敌骑兵战斗，再败退。至博尔多（今黑龙江省讷河）集合各军，查点人数，不过千名，器械亦复短少，炮位一尊俱无，只得据河南岸为营，掘壕固守，抵死不退。墨尔根原驻清军 300 余人，闻风逃散，俄军遂于 17 日不经战斗占领了墨尔根。22 日，俄军大队亦抵讷谟尔河北岸。

此时，西路俄军正向齐齐哈尔西线的最后屏障雅克岭进犯，省垣防务又很单薄，仅有制兵 2 营，义胜军 3 营，以及刚刚到达的奉天的 3 个营，形势极为严重。寿山适于 8 月中旬收到朝廷于 8 月 7 日简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的电报，于是，寿山乃派程德全于 22 日赴北路俄营议和，提议立即停战，遭到俄方拒绝。经商量，俄方同意在俄军向齐齐哈尔开进时，“不攻城镇，不杀生灵，扎营城北，面与将军议事。”28 日，俄军进抵齐齐哈尔城郊，并炮击由城南撤退的清军。将军寿山不肯屈膝事敌，决心自尽殉节。当得知俄军已抵城外时，乃吞金卧于枢中，复令随从对之枪击，洞胸而亡。次日，俄军进城，黑龙江省城遂陷敌手。

完工保卫战和牙克石、雅克岭之战

在璦琿军民抗击北路俄军的同时，驻防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铁路沿线的清军，也开始了抗击西路俄军进犯的作战。

呼伦贝尔城北距中俄边境的粗鲁海图、西距边境的阿巴该图，均为 300 里。该城驻有清军马步队共 7 个营，有克虏伯炮 4 尊，小钢炮 2 尊，由副都统依兴阿统率。7 月初，为加

强呼伦贝尔方向的防务，寿山调原驻省城的镇边陈军 3 个营赴扎兰屯及雅克岭驻扎。另调骑兵 1 营进探嫩江源和粗鲁海图，以防俄军间道入侵。7 月 20 日左右，寿山得知粗鲁海图俄兵甚众，深感驻防呼伦贝尔的军队兵力单薄，乃派驻省的义胜军左路统领吉祥率中营和左营，速由雅克岭一路西进。又调陈军中路 1 营，亦由雅克岭续进。除已拔的马兵 1 营进探嫩江源外，再派步队 1 营随后接应。其防御部署为：以重兵北扼粗鲁海图，与由旱河向粗鲁海图方向前进之马队相犄角，复以偏师驻扎海拉尔河两岸，西扼阿巴该图。在二线要隘雅克岭，由于原驻该地的部分清军西调，便另调义胜军左路后营携炮 2 尊前往驻扎。

西路入侵的俄军约 5000 人（以后增加的兵力未计入），以及从东省铁路西线撤回的护路队 3 个骑兵连和 1 个步兵连，由奥尔洛夫少将统一指挥，原定集结于旧粗鲁海图，沿大道进攻呼伦贝尔。奥尔洛夫得知清军的防御重点在粗鲁海图方向，就变更了计划，改在阿巴该图集结，由此沿铁路向呼伦贝尔进攻，以期一举突破清军防线，打乱清军的防御部署，迅速夺取呼伦贝尔城。

7 月 25 日，俄军从阿巴该图出发，当天抵达达赉诺尔，27 日进至赫尔洪德，一路只与清军有过小的接触。29 日清晨，清军的一支骑军部队在完工以西与俄军先头兵 2 个骑兵连遭遇，经过战斗后撤退。当天，俄军主力到达完工附近。清军则由统领全德率步队 2 个营、骑兵 3 个营，前去阻击。30 日凌晨 3 时半，清军骑、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向俄军发起进攻，双方互相射击持续了几个小时。俄军后续部队 1 个步兵

团和 1 个炮兵连于中午赶来，下午对清军炮击了约两小时，然后转入进攻。除了正面攻击外，还派出部队迂回到清军侧后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清军不支，向后撤退。但许多士兵仍“作殊死战”，坚决打击前来追击的敌人。有的隐蔽在丛林中，有的在掩体中，等待敌人走近就发枪射击，给敌人以杀伤。战斗持续了大半天，清军终于败退。完工车站被俄军占领。此战俄军死亡近 30 人，清军伤亡甚多。

31 日，完工战斗失利的消息传到呼伦贝尔城时，衙署官兵闻风逃窜一空，副都统依兴阿亦退往雅克岭。不久，俄军先头骑兵侦察部队未遇任何抵抗就进入呼伦贝尔城，但在 8 月 2 日拂晓遭到派赴粗鲁海图半途折回的一支清军的袭击，几名俄兵被清军击毙和俘获，俄军不得不撤到城外一个小山头固守待援。3 日上午，俄军后续部队到达呼伦贝尔城外，清军后撤。下午，俄军占领了呼伦贝尔城。呼伦贝尔的不战而陷，使黑龙江省失去西部边疆地区的军事、行政中心，西路大门洞开，对以后作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依兴阿于 8 月 10 日接奉寿山咨调“来省听参”，副都统一职由全代护理。寿山旋又饬令依兴阿仍在大岭随营效力，戴罪图功。

俄军占领呼伦贝尔时，其先头部队追击并占领了扎罗木得。随后，又派出骑兵侦察队和一个骑兵连前往牙克石、免渡河及其以东地区进行侦察。8 月 8 日，又派护路队 3 个骑兵连续进。西路清军将领深知呼伦贝尔失陷的严重性，遂于 10 日商定，以统领保全所部镇边练军的 4 个营、统领吉祥所部义胜军的 2 个营出击，11、12、13 日连获胜仗，将俄侦察队和护路队的骑兵一再击败，跟踪追击几十公里，直至牙克石

车站附近。13日晚，败退的俄军与前来增援的1个步兵团在牙克石会合，固守待援。14日晨5时，清军对俄军阵地发起攻击，逼使俄军左翼前沿的骑兵撤出阵地。后清军步兵在炮火支援下几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派出包抄敌人炮兵连的部队，也因侧翼遭到俄军攻击而不得不退回。下午2时左右，奥尔洛夫率1个步兵旅赶到牙克石，使俄军兵力增至5300余人。俄军于下午5时转入进攻，在炮火袭击后，骑兵和步兵发起冲锋。清军利用有利地形，占据山头，顽强抗击，竭力坚守阵地，使敌人骑兵不得不下马以步兵队形前进，并且总是在经过肉搏后，才能占领清军阵地。战斗中，统领保全冒着敌人密集炮火指挥战斗，被敌击中，英勇牺牲，“所部弁兵，半随战歿”。仅代理副都统全德、统领吉祥与其他一些官兵“溃围而出”。当天，敌骑兵追击清军约20公里。

牙克石之战的失败，使大兴安岭以西地区沦入敌手，齐齐哈尔西路最为险要的屏障——雅克岭清军阵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此时雅克岭仅有义胜军5个营，以及由齐齐哈尔续发之义胜军2个营，防务益形单薄。而西路俄军的兵力已增至20个营。俄军主力于8月20日到达免渡河，其骑兵侦察队则已迫近雅克岭清军阵地进行侦察。22日俄军进至哈拉沟，23日移至大兴安岭西麓的伊列克得，24日攻打雅克岭清军。

俄军进攻雅克岭的部署是：主力从正面对清军阵地攻击，而提前一天派出3个（一说是5个）骑兵连，在清军左翼阵地以南约32公里处，越过火燎沟，直插从雅克岭通往齐齐哈尔的大道，切断清军退路。24日晨6时半，俄军主力全面展

开攻击，并派出3个营包抄清军右翼阵地。清军对来犯之敌射击，并从右翼进行反击，杀伤了一些敌兵。清军由于炮兵被敌炮火压制，右翼受到3个营敌军的严重威胁，左翼也出现了俄军骑兵，部队又有不少伤亡，因而坚持不住，向后撤退。午后，在兴安岭东麓通往扎兰屯的大道上，退却之清军遭到从火燎沟迂回过来的俄骑兵部队的拦截，随即溃败。至此，省城以西已无险可守，西路作战部队损失殆尽。俄军即长驱直进，一路未遇抵抗，于9月4日进入齐齐哈尔，与北路俄军会合。随后，连年刚博夫奉命率部分俄军于9月12日进占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后，经过长春，于23日占领吉林城。

黑龙江军民抗俄之战，除上述主要战役、战斗外，还有7月底渡江进攻哈尔滨俄护路队之战等。攻哈之战因吉林将军长顺借故拖延，不肯参加会攻，以致黑龙江省部队孤军作战失利，不得不撤回江北。

黑龙江军民为了保卫祖国北疆，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给了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许多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的事迹，可歌可泣。以寿山为代表的爱国将领，排除妥协投降势力的阻挠和干扰，在敌强我弱的困难条件下，组织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严惩了俄国侵略军。寿山在其遗折中还念念不忘祖国北疆的边防建设和民众福利，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凤翔等将领多次冒着敌人炮火，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激励官兵，与敌血战，终至光荣牺牲，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黑龙江军民的抗俄斗争，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吉林三边保卫战

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琿春，称为吉林三边。这3个地区“处处与俄接壤”，与俄方军事重镇伯力、双城子、海参崴紧相毗邻。“自兴修铁路以来，江禁、边禁均弛，塔城之侧火车畅行，姓城之下轮船飞驰，而俄又以哈尔滨为三省总车站，当吉腹地，屯兵储粮，已非一日。”吉林省清军原有靖边防军18营3哨，练军3000余人，新练之兵，至7月初已挑足旗队5营，另有靖边强军20营“虽已招募大半，尚未全行成军。”吉林将军长顺，虽然见局势日益严重，做了一些战争准备，如补足原有军队之定额及挑练新军等，但由于他对沙俄侵略的基本态度是妥协、退让、求和，因而战前的准备很不得力。在战争中遭到挫折时，很快向敌乞和、投降。吉林军民就是在统帅的这种消极、妥协的态度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起抗击东北和东南两路入侵俄军的。

俄军方面，早在6月中、下旬，其陆军大臣就一再下令要求沿阿穆尔军区派兵增援哈尔滨。7月3日，陆军大臣又要求该军区用要塞部队和其他部队组织一支小型攻城炮队和一支小型工务车队，以备俄军在进攻东北时攻打中国军队设防坚固的据点。18日，指示格罗杰科夫中将令第二西伯利亚军团沿伯力——哈尔滨——奉天方向作战；登陆军团和一个步兵旅沿海参崴——吉林——奉天一线作战（随后规定为由海参崴向宁古塔——吉林——奉天方面推进）。俄军从7月18日至7月底，先后向宁古塔、三姓和琿春发动了进攻。

东北路俄军首批入侵我国的部队，有4个步兵营、4个骑兵连、2个炮兵连，以及1个工兵排、1个电信排、1个医疗救护队，随带26门炮，由独立边防军团参谋长萨哈罗夫少将指挥，分乘22艘轮船和50余艘驳船，于7月中旬从伯力出发，溯黑龙江而上，再进入松花江。18日，该路俄军占领了拉哈苏苏（今黑龙江省同江），19日进占富克锦，继续上驶，矛头直指三姓。三姓为松花江的要口，哈尔滨的东方门户。其下游30里处的巴彦通，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修筑了炮台和营垒。1900年，原驻三姓的防军共3个营，由副都统依兴阿指挥。后调出2个营，故三姓只剩1个营。此外，尚有一些练军和水师营。当战事日益吃紧之际，长顺才指拨矿务局护勇七八哨赴三姓增援。7月底，又拨新募靖边强军4营开赴东北一路，以资策应。

7月25日，巴彦通靖边后路防营被俄军围攻，守军在统领周保麟指挥下，奋勇抵御，后周保麟力战负伤，部队乃突围而出，退守三姓。26、27日，俄军进抵三姓城附近。28日上午9时，俄军发起攻城战斗，首先是炮击，持续约3个小时。同时，武装轮船从江面对中国军队阵地射击，步兵和骑兵则涉过牡丹江支流的浅滩，由南向北攻城。中国军队“分队力御，毙俄百余，沉兵轮一只”，清军官兵也“伤亡甚众”。后俄兵由城罅越进，清军奋力抵御，毙敌四五十名。俄将格罗杰科夫向陆军大臣报告说：“敌人最初非常坚强地抵御排炮的轰攻，顽强地据守设在我步兵进攻路上的一切掩体。”鏖战至下午4时许，守军不支，从城内撤出，该城遂为俄军占领。

29日和30日，俄军陆续登轮上驶，前往哈尔滨。途中，

与少数中国军队有过交锋，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8月3日，萨哈罗夫率领俄军抵达哈尔滨，与原驻哈尔滨的护路队司令部及其部队会合。哈尔滨周围地区和松花江沿岸军民坚持抗俄战斗，就在俄军大队人马到达哈尔滨的两天后，黑龙江省清军统领孙自谔，即率部在巴彦苏苏沿江地区屡次打击来往于松花江上的俄国兵船。在三姓上游60余里处，俄轮也遭到中国军民的袭击。三姓义和团用笨船或用柳条编筐，中填碎石，沉之江底，以堵塞松花江航道，阻碍侵略军运兵运粮。

8月17日晨，萨哈罗夫率16个步兵连和12个半骑兵团，携炮16门，出发攻打阿勒楚喀（即阿城）。中国军队节节阻击进犯之敌，杀伤了一些敌人，迟滞了俄军的行动。18日上午9时许，俄军抵达阿勒楚喀城外，遭到清军的阻击和袭击。中午，俄军包围阿城，其步兵和骑兵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城，中国军队弃城撤往拉林河。下午1时许，俄军占领了阿城。

东南路入侵之俄军分为两支，一支进攻宁古塔，一支进攻珲春。进攻宁古塔之俄军，由滨海边省军管省长、乌苏里哥萨克军委任长官奇恰哥夫少将指挥。早在7月上半月，就已由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地区派出部队抵达牡丹江，并构筑工事，原驻苇河、横道河子、磨刀石一线的护路队骑兵，则集中到牡丹江。奇恰哥夫亲自前往绥芬河，以组织驻在绥芬河——牡丹江沿线上的部队采取行动。

宁古塔是吉林三边居中扼要重镇，省城东边的屏障。由宁古塔副都统双龄统一指挥的守军，除少量担负捕盗之练军和保卫铁路之新军外，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仅只靖边防军3个

营，只是在战役开始后，才陆续调来几营援兵。7月18日，俄军进攻宁古塔东北之乜河防营，清军“列队应敌，相持终日，互有伤亡，始各收队。”其间清军曾于下午4时许出击，但未取得进展，退回阵地。19日，俄军绕过乜河防营，趋宁古塔，防营回援，于塔城20里外堵住俄军，战斗半日，清军阵亡哨官2员兵10余名，士气颇沮。此时，义和团众40余名，突然到来支援，与清军合兵攻击，俄军始退。随后，长顺又电调驻南冈的两营来援。俄军这时因正在调集兵力，准备进攻珲春，在牡丹江、宁古塔方向上部署的兵力不足，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故“于塔城40里外坚筑高垒，意在持久”，期待攻占珲春后抽调部队，集中兵力，再攻宁古塔。中俄双方军队在塔城外相持约40余日，直至8月底。在此期间，宁古塔添练捷胜军3个营，又调来招抚的唐殿荣部众组成的垦务营（又称振东营），帮同堵御。

珲春与俄逼处，为吉林东南门户。守军为靖边防军6个营又3哨，共约3000人，由珲春副都统英联指挥。在城西南10余里之外郎屯地方设有炮台3座，俗呼为西炮台；城东南10里阿拉坎地方亦有炮台3座，俗呼为东炮台。进攻珲春的俄军，包括3个步兵团、3个炮兵连、2个骑兵连以及半个工兵连，以艾古斯托夫少将为司令，于7月29日从新基辅斯克出发，30日清晨5时，对珲春地区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俄军先犯黑顶子，该处三面皆系俄地，驻防的一营清军，与俄军相持至上午八九点钟，恐退路被切断，乃向珲春撤退，俄军遂进逼炮台。面对优势敌军的进攻，驻珲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英勇作战，尤其是炮台发挥了很大作用，以猛烈的炮

火毙伤俄军甚众。连俄将格罗杰科夫也不得不承认清军的“抵抗是顽强的”。不料东炮台忽然震裂，俄军又对东炮台守军实行迂回包抄，守军被迫后撤。这时集中于西炮台的3个营清军尚在坚守。不久，西炮台守军见城中火起，始向凉水泉子撤退，珲春便于当晚8时许为敌占领。此后，英联所率部队继续与俄军有所接触，力战不胜，再退南冈。

俄军占领珲春后，格罗杰科夫进一步考虑了攻取宁古塔的路线。他认为从珲春进攻宁古塔，粮食供应甚为困难，同时，两地相距二百几十公里，皆系土路，很不好走，不利于作战。他选择了从绥芬河向宁古塔进军的路线，因为这条线上的土路只有82公里，而从绥芬河到穆棱、牡丹江的铁路线上，已驻有不少俄军，供应也有保证。根据这一部署，艾古斯托夫即率领一部分部队从珲春折向双城子，前往宁古塔参战。沿阿穆尔军区又抽调第十四步兵团和第十九步兵团，驰赴牡丹江，以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宁古塔城，这2个团行军途中为暴雨山洪所阻，延迟了到达牡丹江的日期，第十九步兵团是在宁古塔战斗开始后赶到战场的。

8月28日，在奇恰哥夫指挥下，俄军从牡丹江出发，向宁古塔进攻，也河中国守军以密集火力向俄军先头部队射击，因敌人的兵力、火力均占优势，清军恐后路被切断，乃向后撤退。在撤退过程中，曾三次占领阵地，阻击来犯之敌。在距宁古塔10余里的牡丹江右岸渡口，清军又以炮火拦击俄军。但都未能阻止住敌人前进，当晚一部分俄军即渡过牡丹江，到达左岸。29日清晨，俄军其余部队渡江。俄军向宁古塔城进攻时，城外阵地上的清军，以炮火袭击敌人。在俄军

还击后，清军被迫后撤，宁古塔城遂为敌占，清军退扎额穆和索。

正当前线守军和义和团协同奋战、抵御强敌进攻之时，长顺却加紧进行着投降活动。早在8月13日夜，长顺煽动受其控制的义和团民杀害了义和团首领敬际信及40名团民。25日，长顺派已革记名副都统、协领达桂前往哈尔滨，后又转赴伯力，与俄方商议停战。俄方坚持即使停战，俄军仍须前进。达桂代表吉林当局与俄方约定“俄兵到处，我兵手执白旗，不先开枪，彼亦不进攻，并须格外优待。为之备办牛羊食物，作为犒师。”并且规定了中国军队要解散，所有枪械一律收缴等项条件。达桂与俄方达成协议回省时，东南路俄军已占领额穆和索并朝省城而来。北路俄军已进逼伯都讷。长顺随即飞檄各地清军，告以与俄方所约各项，严令执行。

9月22日，东南路俄军先派官兵六人到省，长顺与之会见，待之以礼。23日下午，北路俄军骑兵数百名，由连年刚博夫少将率领，进入吉林城，直入长顺署内，纷扰不已。长顺则设晚宴款待，留宿署中。24日、25日，俄军将银元厂所存的一百数十万两银元、银条、银坯，抢散大半，枪炮子弹悉行毁弃，并将两个火药库炸毁。

奉天保卫战

奉天省系清皇朝发祥之地，盛京是清朝的留都，一直被清政府视为根本重地。清政府历来在此置盛京将军，设盛京5部侍郎，进行管理，驻军也较黑龙江、吉林为多。1900年6月，“综计通省马步现有五十余营，加之各乡团互相联络，兵

力已不甚单”。到7月中旬，除前已添练2000余名旗兵外，“育军增募三营”，“又添招步队七八营”。在整个抗俄战争期间，“陆续添兵，寝至百有余营。”

盛京将军增祺对义和团反帝运动曾严加禁止。到6月底、7月初，朝廷屡次谕令增祺招集义和团民和布置战守事宜，奉省才对战事作了某些准备：开始招集义和团众；补足军队缺额，并添招新的部队；军队驻防和作战任务作了一点调整。增祺还致电长顺和寿山，希望三省“联络一气”，要求吉林、黑龙江两省截住俄军南来之路，使其首尾不能兼顾。

俄军大举进犯奉省，开始于7月底。在此以前，俄军护路队已经与义和团及部分中国军队，多次发生小规模战斗。奉天省义和团的兴起，远较关内为迟，但发展甚快，到6月底、7月初已进入高潮。6月30日和7月1日，义和团焚烧了省城的英国教堂、医院和洋楼，拆毁了城内城外外国人的讲书堂及俄国铁路公司的房屋。2日，德胜门外法国主教指挥教民持枪射杀拳民，义和团众在清军支持下冲入教堂，将教堂焚毁。3日，义和团众又往辽阳，焚烧俄人茨儿山煤矿。俄国护路队在得胜营子车站小房被烧后，施行报复，屡次火烧尤家庄等处民房。4日以后，义和团在辽阳、盛京车站、苏家屯车站、新城堡、铁岭等地与俄护路队以及在营口与当地俄军，发生冲突，有的冲突还有一些清军介入。护路队分别向营口和哈尔滨逃窜。7月上旬，北至开原南至海城共计500里之铁路、桥梁，均被义和团众拆毁。7月15日，南线护路队在撤退过程中，向海城中国驻军攻击，夺占唐王、亮甲各山，向城内开炮，城楼被毁。清军育字军步队2哨坚守海城，分统

承顺闻迅赶到，从侧后对敌攻击，俄军伤亡数十人后退走，中国军队乘胜追击直抵大石桥。7月26日（一说27日），承顺率队进攻大石桥俄军，受伤阵亡，部众败退海城。

7月底，南路俄军开始了进攻作战行动。7月26日，驻营口城外之俄军向城东中国炮台攻击，并占领了炮台。从旅顺口派出的俄军，于27日占领了金州，炸毁了城门，将清朝署金州副都统福陞、协领继德、富伦、同知马宗武拘赴旅顺，在金州设立了俄国官厅。30日，俄军1个团攻占熊岳城。同日，被委任指挥辽南地区作战部队的弗莱希尔少将，率领4个连在营口登陆。此时俄军在辽南的步骑兵已达4850人。8月1日，占领熊岳城的俄军，又向盖平进攻。当时该城清军只有练勇和旗兵近百人，乃联合义和团民并力守城。俄兵来攻，炮火猛烈，义和团奋勇抵御，多有死伤，而兵勇见势不佳逸去，县令弃城逃走。8月4日，营口义和团众300余人赴庙烧香，与俄军发生冲突，俄军先行开枪，义和团民多人伤亡，驻营口的清军即参加战斗，与义和团协同对敌。下午1时，俄军2个步兵连和2个骑兵连，从西南方向攻城，另外2个步兵连占领城内外国侨民区；同时“勇士”号和“雷公”号2艘炮艇开炮轰击城区和辽河口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正在陆上与俄军相持间，突遭俄舰炮轰击，力不能支，于傍晚撤离营口，该城遂为俄军占领。

占领营口、熊岳和盖平后，俄军便积极准备进攻海城。其部署为：在大石桥集中4个全额的步兵营和400名护路队官兵，配备20门大炮，其任务是攻占海城。以10个步兵连、2个骑兵连和8门火炮留守于营口、大石桥、盖平和熊岳城，就

近保护铁路线。此时，集中于这一地区的俄军约 7470 余人。中国驻海城地区的部队约 4000 人，另有义和团众约 1000 人。

8 月 9 日，帮办奉天军务、盛京副都统晋昌抵海城督师。10 日，俄军由大石桥出发，分三路向海城进攻。俄军大队向虎獐屯中国军队阵地猛烈攻击，育字军分统富魁死力接仗，敌不稍却，并以大炮向清军轰击。清军不支，退守于距海城南 25 里的邓家台。战斗中，义和团众积极参战，配合清军打击敌人。当清军败退之时，“他们便大张旗鼓，吹起喇叭唱着歌，结队上山，欲与洋兵白刃格斗，决一死战。”俄军连忙射击，“然而并未吓退这些勇士，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仍然继续往上爬；十二岁左右的少年、年轻的姑娘、年迈的老人毫无畏惧地迎着敌人冲锋陷阵。”战斗结束后，“这一带地方找到了很多尸体”。11 日，俄军以 2 个纵队继续进攻。邓家台无险可守，清军数营竭力抵御，自早至午后伤亡相继，力难相持，且战且退，至海城西南之唐王山和城郊之亮甲山，与守山军队会合抵御俄军进攻。唐王山为海城要隘，由育字军统领志和率队携炮守卫。亮甲山有署海城知县凤鸣拨营防守，并有奉军各营分扼左右。在前敌部队退至该两地后，晋昌即亲往督战。俄国进迫唐王山，两军互相炮击两小时之久，守军大炮 1 尊、快炮 2 尊被击坏，俄军趁势抢攻上山，清军乃撤向海城西北郊，扼守要路，晋昌则亲带大炮驰赴城东双隅山，设置新的防御阵地。晋昌“本知唐王山一失，余山均难扼守。顾犹有立足之地，即不能不作背城之战。”12 日拂晓，俄军进迫双山，炮击中国守军，中国军队以炮还击，击毁敌炮 1 门，伤敌数十名。俄军乃另派出一股部队从西北面对清军阵地迂

回，企图从侧后夹击。守军见势极危急，便退出双山，海城随即陷于敌手。俄军占领海城后，烧杀抢掠，作恶多端。6天后，一个俄国铁路工程师到海城见到一个村庄被烧毁，20多处起火，整个海城一片荒凉。

当海城即将失守时，晋昌驰回辽阳，调拨炮队赴援。海城失守后，他严饬退守各军，收集散兵，分别驻防鞍山站、吉洞峪一带要隘，以阻击北犯之俄军。而在此之前，西南方向之水路，已拨出部队巡逻、守卫，以防俄军间道包抄辽阳或径犯盛京。海城沦陷后，双方在该地区相持约40余日，未有大的战事。

在双方相持期间，俄军为大举进攻奉天进行了准备。沙俄陆军大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第五天（8月19日），根据沙皇谕旨电示阿列克谢耶夫：联军占领北京后，北直隶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关东边省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奉天和征服盛京省”；将2个步兵团和2个骑兵连由北直隶战场撤回营口和旅顺口；决定由苏鲍齐奇领导向奉天的进军，并晋升他为陆军中将；要为进攻奉天准备好前进基地。8月27日，苏鲍齐奇抵旅顺口，就任俄军南满部队司令，随即着手组织和准备向奉天的进攻作战。

中国方面在此期间的情况是：盛京将军增祺除委派已革副都统寿长为全军翼长和由北路抽调马步数营于8月底驰赴辽阳加强防御外，却把希望寄托在乞求停战议和上面。其实增祺等人在此以前已上奏朝廷，建议饬出使俄国大臣速与俄国商谈停战事宜。在得知瑗珲、呼伦贝尔、珲春、三姓等地业已沦陷和本省海城失守后，增祺对抗俄便完全失去信心。8

月20日前后，照会营口俄国领事和旅顺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要求暂为停战，以听北京妥议。随后接获营口俄国领事复照要求释放俄俘，增祺即将所俘俄官6名送去营口，并派员驰赴海城，面见俄军指挥官，商请停战。对于前敌各军，则严饬不得轻进。与增祺相反，晋昌则主张坚决抗击俄军，对于增祺向俄军乞和的主张和行动，往复辩驳，同时命令部队对敌仍须严加防堵。至9月20日前后，因奉省北线形势紧张，增祺派出练军两营驰往铁岭扼扎，同时飞电寿长由辽阳前线调数营回省，防备北路。晋昌调育字军4个营星夜开往省城，一半分扎浑河，一半分堵北路，晋昌本人亦于23日由辽阳回省，辽阳前敌各军，均交由寿长统一指挥。当夜，俄军即从海城出发，对驻牛庄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揭开了俄军在奉省最后阶段进攻作战的序幕。

9月21日，苏鲍齐奇从旅顺经由海路抵达营口，当天即乘火车赴海城。这时集结在海城用于进攻奉天的俄军计有47个步兵连、28门炮、2个半哥萨克骑兵连和半个辎重队，共约9000人。为了保卫后方和保证交通和通讯联络的畅通，在营口、辽河口炮台、盖平、熊岳城以及海城和铁路各段，留下2个步兵团、7个步兵连以及一些炮兵。苏鲍齐奇抵海城后即召集高级指挥官开会，研究和确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分三路向中国军队进攻。

23日，弗莱希尔少将率左路俄军由海城出发，进攻牛庄，企图歼灭中国守军，占领该地，以免向鞍山、辽阳进攻时后侧受到清军威胁。清军利用遍地的青纱帐，伏击和袭击来犯之敌，使俄军伤亡官兵近30名。当夜，俄军在距牛庄不到3

公里处宿营。24 日黎明，俄军向牛庄进击，中国守军从牛庄的围墙内和附近的村庄中，向俄军猛烈射击，双方对射多时。清军统带瑞禄和营官贵喜、赵福汇、李瀛洲等人督队奋力血战，虽杀伤了一些俄军，但己方也阵亡官兵 300 余名。敌方炮火猛烈，清军抵敌不住，退往大望台，牛庄遂告失陷。

25 日，弗莱希尔率部向鞍山站清军阵地的右翼进发，途中击溃由牛庄撤退的一部分清军。与此同时，中路和右路俄军亦整装待命向鞍山进犯，定于 9 月 26 日左路俄军部队接近清军右翼时，各路俄军都发起对鞍山的攻击。26 日晨，俄军中路和右路部队进入阵地后，即开始炮击对面山上的清军，进行火力侦察。随后右路部队在米先科上校率领下，从东面迂回攻击鞍山站东面和北面山上的清军主力的阵地，左路俄军也及时赶到，从西面攻击清军的右翼，并威胁清军的后方，清军据守工事，竭力向俄军左、右两路炮击，但未能阻住敌人的攻击，于午后撤出阵地，有组织地向东北方向退却。

此时，清军的总预备队和从牛庄撤退的部队，集结于鞍山与辽阳间的沙河南八卦沟一带，决心“复决死战”。“他们摆开了长约 12 俄里，成马蹄型的阵地，其顶部是沙河堡村，绕村的两边：一边沿千山东部山脉西部，另一边则沿铁路路基与村庄边缘，以防备侧翼包抄来犯之敌。”9 月 27 日，占领鞍山的俄军继续北犯。米先科率先头部队于晨 6 时半出发，主力随后跟进，行约 13 公里，即与据守于小山上的清军交火，并占领了小山，但却陷入北面和东面山上清军大炮和步枪的交叉火力的射击。附近村庄和铁路路基后面的清军，也对这股侵略军开火，并发起冲锋。6 名侵略军士兵被打伤，1 门大

炮的炮架和机件被炸毁，这股侵略军陷入困境。上午 11 时许，增援的俄军炮兵和步兵赶来，对清军反击。清军决心抗击俄军的进攻，派出部队从两翼攻击俄军，但被俄军打退。“尽管遭到二十门大炮、四挺机枪和步枪的猛射，几千个中国人还是顽强地坚守在山上岩石后和壕沟里，不肯退出阵地。”并且几次企图包抄俄军。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 4 时，清军伤亡很多，退往首山堡一带。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连当时随军的俄国战地记者也承认“在这场战役中，中国人顽强得惊人。”“在七个小时的战斗中，他们用尽了全力，想方设法来攻打俄军，直到无法坚持时才退跑。”

9 月 28 日，俄军分三路继续北犯，此时清军未能有组织地进行战斗，只是有些部队在遭到敌人进攻时作了零散的抵抗。在敌人乘胜进攻面前，各军大溃，辽阳城便于当日下午被俄军占领。9 月 30 日俄军继续北犯盛京，10 月 1 日俄军不经战斗轻取了这座名城。俄军入城后，将清宫内的珠宝珍藏，劫掠一空。

在俄国占领盛京以前，晋昌曾于 29 日“驰往前敌策应”，然此时俄军已乘势北渡太子河，寿长已退守省城，晋昌见此情形，便赶紧折回，而增祺等人已先后出城西逃，奉天已成一座空城。增祺西逃后循新民厅界至广宁、义州一带暂避。晋昌则于 30 日督运饷械出城，沿途招集溃散部队，出法库门至库噜王旗（今库伦旗），到 10 月中旬，整顿各军已有 7 营，“拟联合各蒙王旗，同心戮力，以图恢复。”10 月 6 日，南路俄军派出的一支部队抵达铁岭，与北路南下的俄军连年刚博夫部队会师。同时，侵占直隶地区的俄军和英军，也派出部

队，于10月1日竞相抢占了山海关。随后，从旅顺口派出的俄国海军陆战队大批到达，日、德、法等国侵略军也水陆并进，驰抵山海关。4日，俄军进占锦州，随后又占领了从山海关至锦州、营口的整条铁路。至此，我国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均被俄国侵略军占领，东北地区的抗俄斗争转入了新的阶段。

综观吉林、奉天的抗俄之战，清军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不顾主帅的对敌妥协乞和，坚持抗击入侵的俄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义和团踊跃参战，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作战。许多官兵和义和团民视死如归，奋勇杀敌，以身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誓死反抗外国侵略的崇高精神。两省军民发扬了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前仆后继，力搏强敌，痛惩侵略军，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辛丑条约》

1900年12月24日，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个国家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这个“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李鸿章等把它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此后，列强又在“惩凶”和“赔款”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

西、比、荷 11 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 19 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 4 亿 5000 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 39 年还清，加上年息 4 厘，本息共计 9.82 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 2000 万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款。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受帝国主义控制。

（二）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这里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

（三）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 12 个战略要地（黄村、廊坊、杨村、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山海关、秦皇岛、天津），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四）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事件，“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是帝国主义要清政府更加唯命是从，进一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办理今后对帝国主义的交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人民敲榨勒索外，还重新

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的在华代理人。清政府也彻底投降帝国主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以“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中国人民通过这一次血的教训，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不打倒它，中华民族不可能有振兴之日。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清政府则愈来愈孤立，终于在10年之后，为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第七章 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辛丑条约》 签订后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

一、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加紧控制清政府，清政府也彻底投靠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完全服了外人”的“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它们相互角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各国军队陆续从华北撤走，但沙俄十几万大军仍然盘据在中国东北，赖住不走，企图将东北据为己有。日本早就把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定为“国策”，并想占领库页岛和俄国远东区。英国在中东、远东各地和沙俄争夺霸权，特别是为了防止沙俄势力南下，侵犯它在

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因而在1902年1月和日本签订《英日攻守同盟条约》。美国则想利用日本替它“开放”被沙俄关闭的“门户”，把东北变为它的资本输出地区。因而形成美、英、日联合对付沙俄，由日本打先锋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沙俄被迫于1902年4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但沙俄根本没有撤军诚意，第一期（1902年10月）只是把辽西的俄军集中到东清铁路沿线。第二期（1903年4月）将要到期时，便提出将东三省变为俄国独占禁区等七项无理要求，接着，沙俄特设远东总督府于旅顺，非法将旅大租借地及东清铁路作为俄国远东领土的一部分，归远东总督管辖。到第三期（1903年10月），俄军非但不撤，反而增兵奉天省城；同时，派兵驻守各衙门及电报局，命令各家各户悬挂俄国国旗，并强迫各处团练交出武器，妄图实现变中国东北为“黄俄罗斯”的野心。为此，日本依仗英、美的支持，于1904年2月，突然袭击在旅顺口的沙俄舰队，日俄战争由此爆发。

日、俄双方开辟了海上和陆上两个战场。海上从2月到8月，日俄舰队集中在旅顺口及其附近进行多次战斗，俄舰损失惨重。沙俄为了挽回败局，调波罗的海舰队东驶，结果于1905年5月间在对马六甲海峡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全军覆没。日本陆军在同一期间兵分两路，一路自新义州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凤凰城、宽甸，进逼辽阳，牵制住在辽沈地区俄军主力。另一路日军从貔子窝登陆，攻占金州、营口，切断了俄军主力与旅顺口及海上的联系。9月，经过激战，俄军主力自辽阳撤到沈阳。1905年1月，旅顺口俄军投降。二三

月间，双方以 60 万兵力展开了沈阳大会战，两周后俄军战败向北退却。日军进占开原、铁岭。

日俄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厮杀，给战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数万生灵遭涂炭，无数村庄被破坏，千里良田成赤地。清政府竟无耻宣称“彼此均系友邦”，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严守所谓“局外中立”。

美国在日俄双方厮杀得精疲力尽之时，出面“调停”。1905 年 9 月，日俄在美国签订了《林茨予斯条约》。条约规定：沙俄割库页岛南部给日本；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地位，两国除铁路警备队外，同时撤退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军队；俄国将它在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它有关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2 月，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日本继承沙俄在东北的特权外，还同意增开长春、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等 16 处为商埠；在营口、安东、沈阳等地划定日本租界；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等等特权。从此，中国人民又增加了一付沉重的枷锁。

当日俄争夺东北的时候，英俄在西藏也竞争激烈。1904 年，日俄开战，4 月，英国侵略军乘机攻陷江孜。8 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烧杀，9 月，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所谓《拉萨条约》，企图将西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由于全国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激烈反对，清政府也认为失权过多，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使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一时未能得逞。

德国利用英国入侵西藏的时机，企图向长江流域英国的势力范围扩张政治经济势力。1904 年春，德国向清政府提出

了“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一带的要求，并从青岛派遣炮舰，通过长江口，驶入鄱阳湖，鸣炮示威。英国不甘退让，一面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抵偿”；一面派军舰进入长江，准备封锁鄱阳湖德国军舰的出口。美国和法国也配合英国派军舰闯进鄱阳湖。由于各国勾心斗角，相互牵制，德国的野心才未能实现。

列强除了在中国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还加紧控制清政府。帝国主义的所谓顾问充斥于清政府的要害部门，各国公使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大小官员“一遇外人则色动心折”，不敢违逆。

20 世纪初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华的经济侵略，也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特点。

它们为了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奴役，首先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侵略性的商约。1902 年至 1903 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条约》。条约规定：（一）增开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沈阳、大东沟等地为商埠。（二）整顿内河水道以利外国轮船、军舰航行。（三）洋商可加入中国股份公司，华商也可加入外国股份公司。（四）华商设厂制造，都要和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出厂税”，借以加强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便利外国进口货在中国市场的倾销。这些规定，大大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各国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共达 82 处，在 16 个城市设立了“租界”。这样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和商品倾销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对华掠夺性贸易不断扩张，据统计，

1903年，洋货进口总值折合银元为4.8亿多元，土货出口总值为3.7亿多元，入超额达1.1亿多元，比19世纪末年增加1倍以上；外商在华企业盈余为2400多万元；赔款及外债本利6800万元。仅此3项，在一年内就从中国掠走银元2亿元以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农业生产萎缩，灾荒连绵不断，工商凋敝，百业萧条。

中国的采矿权也不断落入外人之手。沙俄夺走中东路沿线的采煤权；美国夺走粤汉路沿线的采煤权；日本取得了抚顺、烟台煤矿；山西煤矿被英国、意大利所垄断；云南7个府的矿权分别被英、法霸占。英国还在取得了河南、安徽铜官山等处的煤炭和铜矿开采权；甚至连广东顺德、直隶内五、安徽凤阳，这样小煤矿也被帝国主义侵占。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帝国主义列强夺取了我国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热河、吉林、奉天、蒙古等地的重要矿权。已开采的矿山有34处，资本达4100余万元，机械采煤业有91%以上被外国所控制。

外国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开设的工厂，据统计，1901年至1911年有90家（资本在10万以上的），相当于55年在华投资的两倍以上。外国已经控制了20世纪初中国生铁生产的100%（1901年），棉纺织市场的76.07%（1908年），内外航运业的84.4%（1907年），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工业形成绝对的优势。

中国铁路利权尤为列强所垂涎。因为攫取铁路利权，不仅可以输出资本，而且铁路沿线的政治、军事、经济各种特权也随之到手。日本《朝日新闻》曾鼓吹说：“铁路所布，即

权力所及，……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则凡其他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他人民，皆我俎上之肉。”20世纪初，英、俄、日3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进行激烈的争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造滇越铁路，并企图夺取两广铁路权；英国阴谋展筑滇缅铁路，染指粤汉铁路，并夺取江浙路权；英、德两国加紧侵夺津镇铁路；日、美、德等国为攫取福建、浙江、江西路权展开了各种阴谋活动。1902年至1903年间，正太、汴洛、沪宁等三条重要铁路，终于分别落入俄、比、英等帝国主义的手中。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9600多公里的铁路中，中国自主的只有600多公里，占全部铁路总长的7%。

在对华侵略中，银行成为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时期，继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之后，美国的花旗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荷兰的荷兰银行，意大利的意品银行分别设立支行。到1913年止，外国在中国设立了21个银行，101个分支机构。他们拼命扩大经营范围，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

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操纵，使中国陷入绝境，爱国志士大声疾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

列强在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刊以扩大影响。到1905年，仅基督教教会所严密控制下的学校总数就多达2585所，学生总人数达5.76多万名。1907年，这个数字又在猛增，仅美国所办的学校就多达1195所，在中国的传教士多达1426人。

二、中国农村经济的残破停滞

进入 20 世纪,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封建统治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据 1911 年的调查,在主要农业省份,2/3 以上的农民都是缺地少地的佃户和半佃户,为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农民需要将收成的半数以上奉献给地主。军阀、官僚、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大肆兼并土地,有的占地乃至数十万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城市附近,地租的形式有从分成租向定额租、从实物向货币发展的趋势,表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松动。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地租的剥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例如,江苏震泽县“田每亩得二十(斗)粟已庆大有,共代价不过六七元,除去肥料人工,所余几何?乃收租竟至五六元,少亦须五元,是以冬期农民只可罗掘以应,不足则卖妻鬻子以偿。”不断增加的外债、新捐,最后又都落在农民头上。仅庚子赔款一项,从 1902 年起,每年必须支付 1800 多万两,头 3 年另加赔款缓期半年的利息 300 多万两。户部把赔款额摊派给各省。建议各省试办“房间捐输”、“按粮捐输”、地丁收钱提盈余、盐斤加价再加价以及增抽厘捐等办法,并声明如此上述办法“窒碍难行”,各省还可以“因时制宜”,“另行筹措”,只要求“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于是,各省的田赋、粮捐、房捐、卖税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各级地方官吏又乘机贪污中饱。1904 年,清廷曾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剝肉补疮,生

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

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残酷压榨，是造成农村经济残破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以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残酷盘剥。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特别是洋纱洋布的倾销，使广大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剥夺了农民赖以勉强维持穷苦生活的手段。同时，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破坏，农产品日渐商品化，农村经济卷入了商品市场，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据直隶省景县的调查材料，1880年1斗小麦可换得15尺洋布，至1910年便只能换得9尺2寸，减少了1/3以上。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利用农民的贫困，农产品压价收购，低价预买，使农民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由于商业资本的控制操纵，粮价暴涨暴跌，农民越来越严重地遭受商业高利贷资本在市场的投机盘剥，这种盘剥又和封建性质的地租、高利贷剥削联系在一起，使广大农民陷入了绝境。据1906年《盛京时报》记者报道：“向四乡农民询及今年丰歉何如，莫不痛心疾首曰：‘无论丰歉何如，嗣后种地皆须赔死。’”

亿万农民的赤贫化，不能不引起农业生产的衰退。农民们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终日不得一饱，自然不可能改善生产经营。通常的农具仍然是世代相传的犁、耙、锄、镰，而且由于农民贫困已极，无力畜牛，只得以人代牛耕作，肥料缺乏，只得坐视土地日益浇薄，因而产量递减，生产衰退。加上连年不断严重灾荒，更使得农村经济趋于崩溃的状态。1905

年前后，全国每年受灾地区平均达三四百州县。灾区如此广泛，灾情又极其严重。1906 年的报纸报道：“今年中国饥馑之状，实为从来所未有。……灾荒之广泛，约八百平方英里，被灾民数有一千五百万之多。”1910 年 1911 年间，长江流域六省同遭水灾，“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湖南饥民卖女，价权 2000 文。皖北一带，往往数十里内炊烟断绝。

三、清末新政和新北洋军阀的崛起

清王朝在义和团战争中几乎垮台。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还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限期奏报。1901 年 4 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等 6 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从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官制。1901 年 7 月，清政府应帝国主义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为适应“新政”的需要，1903 年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

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并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虚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除外)、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至此瓦解。但这种裁旧衙门、添新衙门的“官制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革除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种种弊端。“整顿吏治”等则流于一纸空文。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官制改革成为首要“预备”项目,并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

二、改革兵制。1901年,清廷下谕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并决定裁汰20%至30%的绿营和防勇,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1902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成为全国练兵的“样板”。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师),每镇官兵12500人,总共为45万人,后来还拟定了按省分配、限年编成的办法。但除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陆军”六镇外,各省限于财力、人力,大都没有完成计划,直到清朝覆亡,总共只编成十四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旅)、又四标(团)及禁卫军一镇,约17万人左右。这些新编的“常备军”,泛称“新军”。为争夺“新军”的指挥权,激化了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新军”军官多选用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生,对

士兵也要求具有某些文化知识，从而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条件，最终使“新军”成为一支反清力量，这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三、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为了造就有用的人才，传统的科学制度必然改革，这是有识者的共识。应诏陈言的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摺》中便强调了这个问题。1901年，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省科举要考试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废除八股文章；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学生毕业后可以取得功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学生也“一体考验奖励”。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规定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三级，高等学堂毕业后还可以升入分科大学或通儒院深造，通儒院或分科大学毕业生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毕业生授予生员（秀才）功名，并宣布科举录取名额将自丙午（1906年）科起递减。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随后命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并在12月设立学部。延续1000多年的科学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科举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

增长。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清朝统治者改革学制的本意在于因应时势、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候补官员，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清政府曾三令五申，各级学堂“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史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府”。但学生们在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学之后，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便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四、奖励工商。主要是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1903年商部成立前，清廷已派人议订商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除“立法”与奖赏外，清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振兴实业的实际措施，即如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些“立法”与奖赏，在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崛起，这些“官绅”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的行列，并有取代“士绅”传统地位之势。

此外，清政府还发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

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综观“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沓，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官制改革只是裁并一些旧衙门，增设一些新衙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丝毫没有触动。这套机构所派生的种种弊端自然也无从消除。不少“新政”流于一纸空文。即以较有成效的学制改革来说，许多新学堂只不过是旧式书院或村塾挂上一块新招牌而已，特别是在州县，根本没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因此新式学堂只好仍然照旧授课，“新瓶装旧酒”。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清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辛丑条约》订立后更是债台高筑，罗掘俱穷。筹办“新政”需要经费，在乱增税种、乱提税率、严剔中饱、多方搜刮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只好让各地官吏自开饷源任意抽税，从而财税制度紊乱不堪，贪污勒索肆无忌惮。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新政”的推行自然步履维艰。新军的编练就是这样。“新政”的支离、敷衍、拖沓，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于是日益强烈。

清政府最为重视的“新政”，便是编练新军。新军的编练开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湘淮精锐”连战皆败，溃不成军，清政府看到制兵练勇不敌采用西法的日军，于是命淮系将领、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按西法编练一支新军。胡燏棻从京津、山东、河南、辽宁等地选拔4750人，取名为定武军，驻扎在天津附近的马厂，后又迁到小站，聘请德国军官为教习。1895年10月，清政府调从朝鲜回国后任浙江温处道的袁

世凯接替胡燏棻编练新军。袁世凯抓住机会，并扩充到 7300 人，在义和团运动中，又乘机把新军扩充到 2 万余人。1901 年 11 月，李鸿章病死，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袁世凯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1900 年至 1905 年，袁世凯陆续编成北洋六镇，共计兵额六七万人。袁世凯办了随营学堂、北洋陆军武备学堂，他的将员即是他的部属，又是他的门生；他对手下的谋士、幕僚、门客，也多方笼络，与之换帖拜把，攀亲联姻，结为死党。总之，以各种封建关系为纽带，结成一个以北洋新军为主体的军阀集团。造成营中“只知有袁中保，不知有大清。”袁世凯以练兵起家，以北洋新军为资本，飞黄腾达，逐渐成为左右清朝政局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从一个小小道员，不到几年，居然一跃而成为接替李鸿章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在戊戌变法时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他在庚子事变中同刘坤一、张之洞站在一边，完全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行事，又为列强所赏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共同支持下，袁世凯很快成为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当时最大的官僚军阀。

四、此起彼伏的反清起义

20 世纪初的中国，民族灾难深重，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军阀、官僚、地主、富商趁机兼并土地。“一邑之中而拥田万亩者有焉，千亩者有焉，百亩者有焉。

……家无一亩之地者，十之七八。”当时李鸿章占田 60 万亩，袁世凯一家，在辛亥革命前拥田 400 顷。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苏州地租改为折收货币后，农民“应完一石者，须得一石六七斗方能符额足数。”无异于提高租率六七成。

清朝的财政收支早已入不敷出，年年亏空，加上偿付赔款和举办“新政”，事事要钱，唯一办法就是加重人民的搜刮。当时“各种苛捐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数十种之多。”如房税、契税、烟酒税、赔款捐、坐贾捐、果蛋捐、肉捐、米捐、牛捐，甚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各级地方官吏又乘机贪污中饱，以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不堪忍受的残酷搜刮和负担，迫使广大群众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20 世纪初，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主要有以下 4 种类型：

一种是继续举起义和团旗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 1902 年直隶景廷宾领导的起义。是年 4 月，景廷宾率领农民及义和团成员共三四万人在巨鹿县正式起义，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大旗，联合附近州县农民，抗“洋差”、拒赔款、攻教堂、破清军，起义遍及直隶、河南、山东 24 个州县。5 月间，在广宗件只村对德、日、法等国侵略军及袁世凯所部作战失利。6 月，景廷宾兵败被捕，7 月，英勇就义，起义失败。

一种是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斗争。虽然《辛丑条约》规定了清政府必须严厉镇压群众反洋教斗争，但实际上

并未奏效。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等省教案不断发生。1905年四川巴塘的法国传教士勾结清朝地方官吏欺压人民，群众十分愤怒，聚众3000余人，焚毁了当地教堂，并杀死作威作福的法国传教士2人。翌年2月，江西南昌法国主教王安之杀害当地知县江召棠，激起民愤，附近各县民众数万人在百花洲畔集会，连毁法、英教堂、学堂4处，击毙王安之等传教士9人。

一种是会党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其中以广西省最为活跃。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党就不断发动起义，1902年，起义已遍及广西南部及西部广大地区。翌年，西北部的南丹、东兰及北部的柳州、桂林也纷纷起义。1904年初，王和顺、覃伍氏等几支起义军多次打败清军的“会剿”，全省烽火遍燃，当年下半年，形成了以陆亚友、王和顺分别领导的柳州、南宁两个中心，其中以柳州中心的起义势力最为强大，“数逾万人，械精且多”直逼省城桂林，并扩大至湖南、贵州边境。清政府调集军队10万人进行镇压。后来，由于起义队伍分散，内部不统一，至1905年被各个击破。广西会党起义虽然失败，但坚持了3年之久，猛烈冲击了清政府在两广的统治，为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一种是为反对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而进行的抗捐抗税斗争。这一斗争在全国掀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江西乐平的反“靛捐”斗争。1904年7月，靛青主要产区江西乐平群众反对增加靛捐，由夏廷义领导起义，先后几次冲入县城，夺取枪枝，捣毁学堂、盐卡，焚烧县署、教堂，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搏斗。10月，由于起义队伍内部奸细的破坏而失败。

上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 1905 年约有 90 余次，斗争的锋芒，既指向官员衙署、地主豪绅，也指向不法的传教士和教堂，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日益结合起来。

在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的同时，工人也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902 年，上海耶松船厂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堪忍受地狱般的黑暗生活，一年之内发动了两次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迫害。

1903 年，云南箇旧锡厂工人掀起反抗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侵占锡厂的斗争。数日内，群众响应者万余人，攻下临安、石屏等地，省城大震。云贵总督哀叹：“势等燎原，几难收拾。”这场斗争一直坚持了 3 个多月，是近代中国工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

1904 年，成都兵工厂 600 多名职工举行了持续 16 天的大罢工，抗议工头任意克扣他们的工资。盛京辑安一带的伐木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的木材。

1905 年 4 月，上海集成纱厂工人因反对工头的压迫和剥削，4600 多人举行罢工，砸毁了厂内部分设备，并抗击外国巡捕的镇压。同年 5 月，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人因反对外国工程师无理扣发工资而举行罢工，工人们捣毁洋房，痛打监工，并准备夺取军械，迫使洋人逃往湖南。

这一时期工人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从 1901 年至 1905 年，较大的工人斗争达 25 次之多。这些斗争与农村抗捐抗租斗争、会党起义活动等等，汇聚合流，共同冲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推动了 20 世纪初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地兴起，唐才常利用这一时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改名为“自立会”，准备策动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唐才常（1867—1900年）湖南浏阳人。是谭嗣同的同乡、挚友，维新派中较激进的一员。维新时期，与谭嗣同一起在湖南创办算学馆、南学会、群萌学会和《湘报》，提倡新学、宣传变法。1893年9月，应谭嗣同召，欲赴京参与新政，刚到汉口，就传来变法失败的消息，乃流亡日本。从此思想逐渐倾向反满，但仍主张保皇。他企图劝说康有为同孙中山合作，遭到拒绝。1900年7月，他邀集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会上，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担任总干事。其宗旨有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唐才常一面声称不承认满清政府，要反清创自立国；一面又请光绪帝复辟，要“勤王”。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解的矛盾之中。他这样做的意图是想既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不失康有为的款项接济。许多准备参加自立会起义的革命党人看到唐才常的“勤王”旗号，纷纷离去。

唐才常为了策划长江流域起义，还在上海开富有山堂，暗中联络哥老会，组织“自立军”。不数月，南北各省的军人、会党、农民纷纷加入。唐才常设自立军总机关于汉口。自立军共分七军，唐自任诸军督办，决定于当年8月9日同时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起事。但由于等待康有为汇款接济，一再延期。驻安徽大通的秦力山未得通知，如期在大通举事，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唐才常迫于形势，决定于8月23日在武

汉三镇同时起事，由于武汉一些被唐才常所收买的清军官兵自首告密，原曾表示支持唐才常的英帝国主义也出卖了“自立军”。8月2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破获了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总机关，唐才常等20多人被捕杀害。维新派中较激进人物所策划的一次武装起事失败了。

这次起事的失败，许多人认为是康有为的拖延汇款所致，使本来接受康有为主张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分化，秦力山也因此与康有为绝交，许多人转向了反清革命。

第二节 资产 阶级革命兴起和发展

一、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探索救国的方案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听村里老一辈讲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斗故事，就为之向往，幼小的心田里萌发出效法前辈革命英雄的愿望。1878年，他远渡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同经营农牧业的大哥孙眉一起生活。在那里，他先后进入英、美基督教会

所办的学校读书，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开始产生“改良祖国”的意念，踏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与此同时，他目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夏威夷的野蛮行径，从而对当地人民持续反抗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深表同情。

1883年夏，孙中山回国，到香港读书。次年夏秋间，法国挑起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广东沿海连续发生群众打击侵略势力的事件。香港的中国工人也开展抗法运动：船坞工人坚决拒绝修理侵犯我国受创的法国军舰；驳船、码头、舂米等业工人，相约不替法国军舰搬运煤炭和粮食等，不给法国商船卸货。香港英国当局横加迫害，各业工人就群起罢工，游行示威，坚持斗争1个多月。这种情景，给亲历其境的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感到，这“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而清朝统治者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腐败无能、屈辱妥协的行径，则引起这个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慨。

此后几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的西医专门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他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致力于寻求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社会的方案。他多方结识倾向进步的人士，经常聚谈变革当时黑暗政治的问题。

1892年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即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他设法接近具有反抗传统的会党联络清朝防营兵勇，作反清起义的准备。但是，就他那时候的思想倾向来看，主要还是期待清王朝能够接纳变法的主张。他认为，只要清政府确有变法的决心，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振兴工矿贸易，中国也许可以富强起来。

1894年，孙中山把上述见解综合为一份详细的政见书，送给以办洋务著称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希望得到采纳。他还北上天津，求见李鸿章。可是，他的政见和希望，都落了空。

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落空后，到达北京。恰值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夕，战云密布，形势紧迫，而清朝统治者仍没有任何振作的迹象。北京城内，为慈禧太后60岁“万寿”而装设的“点影”，正加紧施工。辽东烽火告警，宫廷宴安升平，此情此景，怎能不令救国情炽、投效无门的孙中山倍增愤懑！这样，原来希冀清王朝厉行变法的念头，渐次消失，早先潜藏在脑海里的革命思潮，迅即奔腾涌溢。在孙中山的心境里，维新和革命相互对换了位置，反清革命的意识，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倾向。

离开北京南下行抵上海后，孙中山又一次远涉重洋，到达檀香山。1894年11月24日，他约集赞助反清的侨胞，组成名为兴中会的革命小团体。次年春，他回到广东，会合旧日志趣相投的朋友，物色有志革命的人士，建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

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和在香港设置总部时，都曾通过章程，指出中国面临帝国主义蚕食瓜分的严重危机，斥责清王朝的暴虐黑暗统治。在入会秘密盟书里，则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作为会员信守不渝的誓词。初期参加兴中会的，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多数

(80%左右是华侨)。这一切，表明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香港兴中会一建立，即着手部署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部分会员辛勤奔走，在香港和广州附近州县联络会党以及清朝防营兵勇，相约于1895年10月26日（阴历重阳节）各路会齐，夺取广州。起义前夕，被举为兴中会总办（会长）的杨衢云在香港筹措不力，军械、人员延期两日才能启运。而清朝两广总督恰得香港当局电告，并有反动绅士告密，于是调集兵勇分头搜捕，一举捕去70多人。在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划的陆皓东等不幸殉难。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往来欧美和日本，考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社会情况，钻研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社会财富垄断于少数财阀手里；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日益贫困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祸”的现实，却深有感触，认识到象欧美那样号称富强的国家，只是少数资本家富有，广大人民依然极端贫困，并不曾到达“极乐之乡”。他因此得到启示，认为在中国实行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的“民族”、“民权”革命的同时，还要想个法子，以预防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之祸”。稍后，孙中山宣称他这种预防资本主义弊害的主观愿望可以通过“平均地权”来实现，并称之为“民生主义”。到了20世纪初，孙中山逐步

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高涨时，孙中山第二次筹划在广东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他派郑士良等去惠州，联络会党；派史坚如去广州响应。10月，惠州起义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个总督，没有炸中，被捕牺牲。

但孙中山丝毫也没灰心，仍然不辞艰苦，不畏险阻，为民主革命事业尽瘁奔走。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1895年至1898年一度出现兴办高潮后，经过几年的回落、徘徊，从1904年起开始回升，1905年至1908年出现了又一次高潮。4年间，新设资本万元以上厂矿238家，资本额6121.9万元，较上次高潮增长3倍以上。1909、1910年发展势头减弱，但还是有所增长。总计1901年至1911年间，新设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10年间超过前此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2倍以上。

商办民用企业的突飞猛进是这时期的特色。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兴办的军工企业这期间大都靠常年拨款维持生产，很少增资扩建，唯一新设的北洋机器局是在天津机器局被烧毁后兴办的。由于经费困难，出现了“招商承办”的呼声，个别局厂由“军工”转“民用”而改归商办。洋务运动时期占当时民用企业资本总额78%的“官办”、“官督商办”厂矿，这期间发生了不少变化：有的停办，如兰州织呢局、漠河金矿；有的因债务而受外国资本控制，如开平煤矿、湖北铁政局；有

的招商承办，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纺织四局；继续维持的也失去了原来的垄断地位，如上海轮船招商局。新设的“官办”、“官商合办”厂矿资本所占比重下降到民用企业资本总额的 27.1%，商办企业则占 72.9%，处于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向城市公用事业方面发展，是这时期出现的新动向。据统计，1901 至 1911 年间，各地自办水、电厂共计 36 家，资本额 1900 多万元，其中商办 31 家，资本额 1500 多万元。在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下，采矿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01 年至 1911 年间，开办矿冶企业 55 家，资本额 1600 多万元，其中商办 26 家，资本额 700 多万元。纺织、食品方面，仍是民族资本的主要投向。1901 年至 1911 年间设立的纺织厂共 85 家，资本额 400 多万元；食品厂共 95 家，资本额 1300 多万元，除少数几家官商合办外，几乎全是商办的。此外，卷烟、造纸、火柴、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些发展。

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某些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经济力量发展较快，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出自于大商人、买办的，往往乞求外国资本的“援助”，或者把自己的企业在国外注册，或者吸收一部分外国股份，或者聘请一位外籍经理，借以抵制清政府的压制和征敛。出身于大地主、官僚的，往往勾结官府作奥援，进行封建式垄断，排斥一般工商业者的自由竞争。前者可以祝大椿为代表，后者可以张謇为代表。祝大椿原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借佣金积累了大量资财，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由于他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借其势力避免地方官的种种勒索，所以营业发展较快，先

后投资于航运、面粉、缫丝、纺织、打包等工业，其中源昌碾米厂、怡和源打包公司、公益纱厂都是与外商合办的。祝大椿经营的企业获得发展，显然得益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张謇是甲午（1894年）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创办大生纱厂，不仅在筹建期间曾借用公款，依靠官兵保护厂房，而且开车以后依仗清政府的扶植，取得了“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权。1904年，上海纺织业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增设大有公司，清政府商部竟出面替张謇加以阻止；朱畴拟改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织分厂，又遭到张謇的坚决抵制。由于具有这种垄断地位，张謇经营的大生纱厂获利甚丰。他用纱厂的部分盈余结合招股，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20多个企业，并充当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江苏铁路公司协理、中国图书公司总理、江苏谘议局议长，清廷赏予三品衔和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成为“东南实业领袖”。

然而，民族工业的基础仍然是十分脆弱的。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不足。帝国主义的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百业萧条。1904年，张謇便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前、上两年每交赔款之时，上海商市大力掣动，拆息之为从来所未有。推原其故，由于输出之银太多，商市因之窘蹙。屈指赔偿之期末至十一，而上下交困，势已如此。过此以往，何堪设想！”这种“上下交困”的社会危机和“不堪设想”的惨淡前景，年复一年，情况愈益严重。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关系也起着阻遏社会资金流向近代企业的作用。土地、高利贷和商业是中国富豪们传统的投资对象，收益大，又较熟悉，因而感到稳妥。据统

计，1912年，在农商部登记的全国钱庄和典当业资本为1.6亿多元，比全国工业资本（不到5500万元）多出两倍有余。也就是说，流向钱庄和典当这两个封建性行的社会资金便大大超出了工业投资。资金贫乏，不仅使中国的重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且轻工业也是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下，经常起风浪。1905年至1908年民族工业的兴盛，是和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等爱国运动的推动分不开的。就扬州织布业的情况来说，因抵制美货运动减少了美国布匹的输入，“扬城内所设之机器手工织布厂，去岁（1906年）年终已不下40余处”。但运动平息后洋布卷土重来，扬州织布业经受不住压力，发生了一片“倒风”。至1907年，保存下来的不过10余家，而且都赔累不堪，难以继续维持下去。1908年以后，由于银根紧迫，控制金融市场的外国银行拒绝给钱庄、银号拆息借款，引发了接二连三的金融风潮，1909年三起，1910年八起，1911年仅上半年便达五起，从而“富商巨肆，倒闭频闻”，市面萧条，百业凋敝，整个工商界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困境。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都有所加强。据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东方杂志》所载，各地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达46所。安徽省于1906年10月成立芜湖商务总会，到1908年各埠商务总会、分会增至12所，1911年增至33所。许多重要集镇设有商务分所、商务集议所。此外，还成立了一些专业商会，如茶业商会等。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大都掌握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手中。这些上层人物，虽然在根本利益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但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妥协性很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便参与政权，保护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反对可能会使自己的百万资财遭受损失的暴力革命。于是，立宪派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人士虽然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比较强烈，但软弱的地位使他们惧怕风险，往往在政治上唯上层人物马首是瞻，成为立宪运动的追随者。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报纸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国内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苏报》、《童子世界》等等报刊杂志，广泛地传播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宣传家。其中陈天华、邹容、章炳麟影响最大。

陈天华写了两本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浅显的文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揭露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

我冠裳”。他极力号召：“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他痛斥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守土官长”，把中国“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他鼓动大家起来革命，“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这两个小册子，在当时“风行于世”，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鼓舞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青年革命家邹容，发表了《革命军》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公开地指出满族贵族的腐朽卖国，是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他热情地颂扬了民主革命，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极力宣传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学说。他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他明确地提出革命建国的纲领，满怀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像一颗巨型炸弹，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清政府逮捕了邹容和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查封了发表《革命军》的《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邹容被判两年徒刑，不幸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青春。但《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上百万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章太炎又叫章炳麟，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力地揭露了清朝反动政府的黑暗，严厉地斥责了康有为等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诬蔑，公开痛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着力宣扬革命不但可以作为“天雄大黄之猛剂”，还能成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指出了“合众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由于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这一战斗的文章，遭到了反动派的逮捕。章太炎毫无惧色，对巡捕和警探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认为“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表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革命气概。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猛烈地冲击着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对于鼓舞人民起来斗争，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在宣传民族主义，痛斥清政府卖国罪行的时候，掺杂着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斗争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软弱性和所处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四、资产阶级 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

1903年拒俄运动前，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秦毓鎰等组织了一个名为青年会的小团体，参加者20余人。拒俄运动中，青年会成员都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俾便于公开活动。秦毓鎰曾提议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随后，一部分会员秘密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决定回国进行实际革命活动。暗杀团成员黄兴、龚宝铨分别在长沙、上海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

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号廛午，后因进行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少年时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后来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2年初，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转向革命。他先后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工作，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及暗杀团的活动。1903年夏回国，在长沙的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教员，秘密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湖南革命分子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等20多人，于11月4日以庆贺黄兴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票。1904年2月1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另设同仇会为外围组织，专门联络会党。拥有会众2万多人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接受华兴会的领导。黄兴和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取得了共同意见，决定

趁农历十月初十（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五路策动响应。同时，他们还联络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清朝地方官员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1904年6月（一说7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科学补习所曾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后来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科学补习所也受牵连，被迫停止活动。于是，刘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阅览室——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同志，于1906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

1904年10月，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的酝酿开始于1903年冬。当时，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曾两次密商，认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应组织革命团体回国发动起义。龚宝铨到上海设立“暗杀团”机关，陶成章回浙江联络各地会党，并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在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的同时，浙江、安徽起义响应。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45人，于1904年10月在上海组成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与闻其事。后来，光复会在日本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百人。

1904 年前后，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福建的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苏的强国会、江西的自强会，等等。

第三节 同盟会的成立

一、同盟会的成立 及“三民主义”的发表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他积极支持海外华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自 1902 至 1905 年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从越南河内取道日本、檀香山，前往美洲和欧洲，到处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1903 年，孙中山在东京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第一次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后来在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在美洲实行洪门会会员总注册，以及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建立革命组织时，都以此十六字纲领为号召。1904 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

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为乐观。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已经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团体领导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开会讨论建立统一组织问题。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经孙中山详加解释后通过。会上，黄兴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支持孙中山的倡议，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者之一。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各革命团体，基本上没有脱离旧式会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而且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并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同盟会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它设本部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主持执行部庶务科，总理外出时由庶务代理一切，相当于协理。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各省分会的主盟人。海外华侨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下按国

别、地区设立分会。

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兴中会是同盟会的组织基础。同盟会成立后，香港、河内、檀香山等处兴中会会员都是全体转入同盟会的。兴中会会员总数约 300 多人，成份可考的有 279 人，其中 78% 以上侨居国外（219 人）。这 279 人的社会成份是：农业和商业资本家 9 人，中小商人 124 人，教员、职员、科技人员等 31 人，学生 23 人，官吏 4 人，工人 54 人，会党活动分子 34 人，即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全体会员的 67% 强。

同盟会成立后，知识分子的比重大大增加。据统计，1905 年至 1907 年三年间加入的会员，出身可考的有 379 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 354 人，官吏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 10 人，教员、医生 8 人，资本家、商人 6 人，贫农 1 人，即 98% 以上都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所制定的革命纲领，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指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它强调这是一次“国民革命”。

1905 年 11 月 26 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并且宣布要将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

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从此以后，“反满”的宣传基本上是遵循这个原则的，可见革命派所宣传的“反满”，实质上是反对清王朝反动统治。孙中山与当时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认识到，中国社会所以陷入“外邦逼之”的境地，主要原因就在于反动腐朽的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军政府宣言》中勾画了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规定国民应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着重说明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把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他又特别强调，要废除君主专制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必须

进行“政治革命”。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按孙中山的解释，它包括如下几项基本思想：（一）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劳资的尖锐对立，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停留在“媲迹于欧美”上，而应“睹其祸害于未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所以产生，根据亨利·乔治“单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为了“预防”贫富的分化和对立，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后的迫切任务。（三）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定地价的法子”，即约翰·穆勒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法子，“核定天下地价。其现在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四）中国实行平均地权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样，就能“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总之，民生主义或平均地权，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一种社会政策，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群众的恳切同情和对世界潮流的敏锐观察。孙中山后来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确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在与政治改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它

主张民权主义，但又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但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同盟会纲领中的这些弱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此外，同盟会成员对纲领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只接受民族主义，在筹备会上就曾有人提议定名为“对满同盟会”。有的不赞成或忽视土地纲领，只接受民族、民权“二民主义”。表示赞成三民主义纲领的，在具体解释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盟会所设计的组织系统，也始终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特别是支部一级，海外仅建立了南洋支部，国内仅建立了南方支部。本部和各地分会之间缺乏紧密联系的桥梁，各地分会实际上往往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的状态。

同盟会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坚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立场，从而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同盟会成立为标志，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二、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一面创办《民报》和其他报刊，广泛宣传三民主义纲领，大造革命舆论，对保皇思想展开了斗争，在同盟会推动下，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此十分

仇视和恐惧。梁启超公然声称：“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与异己者宣战。”对革命派发起攻击，妄图驳倒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认识到，改良派已经堕落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帮凶。只有坚决回击，革命形势才能向前发展。于是一场大论战展开了。

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是在日本。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要阵地，由因苏报案入狱刚刚获释就被孙中山迎來东京的章炳麟担任主编。改良派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6年7月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负责，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改良派以《南洋总汇报》为自己喉舌，与革命派交锋。此外，在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 and 香港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论战。

这次大论战的内容很广，涉及到纲领、制度、政策这样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具体是：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是双方论战的中心。

改良派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否认清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攻击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他们谈清统治者的“圣德”，是“古今至仁之政”，吹嘘“举国人民，其在律法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批驳。指出民族歧

视和民族压迫一直存在。清军入关 260 余年来始终实行对汉族的压制政策，所以清帝是“一手掩尽天下泪，一人独压万人上”的罪魁。他们还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

改良派又以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为借口，宣扬反清革命不但不能救国，反而非导致亡国不可。他们恫吓革命派必须立即放弃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否则“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

革命派有力地驳斥改良派攻击暴力革命的谬论，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害怕的，惟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并强调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

第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关于“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为了保皇，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继续贩卖庸俗进化论“三世说”，认为中国必须由“据乱世”，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也就是说，由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制。改良派甚至仿照帝国主义的口吻，污蔑中国“民智不逮”，“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缺乏作“共和国”的资格。甚至咒骂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不但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也不能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倘若实行共和，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的动乱，结果共和制度无法实行，还

会导致君主专制。

革命派对于改良派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言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严正指出：“民权”之兴乃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由君主专制而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直截了当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人民必须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奋斗。他说：“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乎进化之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革命派还尖锐地批判了梁启超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指出：这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忍受政府的奴役，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革命。这些言论，表现了革命派的鲜明立场，坚定了革命党人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的信念。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关于“社会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攻击“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违背了所谓“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并歌颂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就是危害“国本”，就是“煽动乞丐流民”暴动。梁启超曾顿足捶胸地发誓说：“虽以匕首堪吾胸，吾犹大声疾呼曰：敢有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的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平均地权是必要的，中国社会

所以贫弱其根源在于地权之失平。他们说：“土地者，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为了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现象，惟有实行土地国有，这样，不仅可以消除社会上坐食土地之利的地主阶级，有力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是最有利的。革命派的主张虽然有主观色彩，但却显示了革命派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鲜明立场。

在这次大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明显暴露了许多弱点。

在关于革命会不会引起列强的干涉问题上，他们一直没有做正面回答，反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在阐述革命会不会引起“内乱”问题上，他们对劳动人民存有戒心，强调革命要“有秩序”的进行。在对待改良派提出的“土地国有”的“夺富予贫”的指责时，不但不敢给予有力的回击，反而极力辩解。反映了他们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不够彻底的立场。

尽管在论战中存在着许多弱点，1905年至1907年的论战仍有它的重大意义。这次论战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它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使人们清楚看到改良派的反动面目。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被迫停刊。这次论战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民报》多次重印，供不应求。在内地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中，《民报》秘密流传，革命的宣传鼓动，“一唱百和，如饮狂泉”，形成了“以不谈革

命为耻”的风尚。总之，通过这次论战，驳倒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等谬论，传播了革命思想，对于伸张民气，解放思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舆论准备。

三、同盟会成立后 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在批判改良思想的同时，在国内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同盟会领导、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位于湘、赣交界，历来是两省哥老会聚会的地点，1905年马福益被清统治者杀害后，会党群众誓复此仇，继续谋划起事。第二年春，长江流域洪水成灾，米价大涨，不少地区处于饥谨状态。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国，进行起义的准备。刘道一驻长沙，筹备起义工作，并负责与东京同盟会本部联系；蔡绍南前往江西萍乡老家同原先在那里一起从事联络会党工作的魏宗铨会合，加紧活动。蔡、魏以两源地区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联络哥老会和武教师会，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内八堂”和“外八堂”，入会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积极准备起义。后来，由于清军突袭设在麻石的会党大本营，一些会党首领先后被捕杀，

总机关也被抄封，在形势十分紧急情况下，会党二三千人于1906年12月4日在麻石宣布起义。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并散发檄文，历数清王朝投降卖国，宣布要推翻清朝统治，还“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会。”

起义的消息传来，革命党人精神为之一振。同盟会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响应，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义军队伍。革命军发展迅速，“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清政府急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和江西巡抚先后调集鄂、湘、赣、苏4省军队及地方驻军“团勇”近5万人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美、英、德、日各帝国主义派军舰至岳州，威胁起义军。起义军除从团防局夺来的两三千支枪以外，多是木杆和大刀，他们与围剿的敌人奋战近月，交战20多次，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龚春台潜走长沙，刘道一、蔡绍南被捕牺牲。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强了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的信心。

从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地区连续发动6次武装起义，他们的战略思想是夺取两广为根据地，挥师北上，策动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从而推翻清王朝。为了实现这个目的，1907年3月孙中山在河内组织了起义总机关，黄兴从日本前来协助，胡汉民则往来香港策应。

1907年5月，革命党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广东潮州饶平县黄冈镇是闽、粤两省的交通要道。这次起义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启迪下酝酿，由同盟会领导，以会党为主力发动的。原定于1907年5月25日由许雪秋、陈涌波等率众起义，但5月22日，潮州清军至黄冈搜捕革命党人，陈涌波等见情况紧急，于当晚集合群众700余人，在离黄冈镇三里的连厝墓誓师起义，他们打着革命军字样的旗号，由陈涌波率领，向黄冈进军。次日占领黄冈，并成立军政府，推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府”等名义发布檄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宣布废除苛捐杂税，除暴安民。后来请政府出兵镇压，激战7次，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在27日解散。

孙中山派往惠州的同盟会负责人邓子瑜，得知黄冈起义已经发动，于是在当年6月2日发动了惠州起义。在惠州府归善县七女湖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起义军增至200余人，攻占一些地方，广州震动。但由于黄冈起义失败，惠州义军孤立无援，无法坚持，被迫埋枪解散。

广东钦廉地方素称“地瘠民贫”，清政府巧立名目，开办糖捐，进行勒索，钦廉人民派出代表要求减免，当地官吏滥施镇压，将请愿代表数十人关押起来。于是，群情激愤，起而反抗。尤其是三那（指那思、那黎、那彭）地方，出产蔗糖较多，糖捐更重。官逼民反，三那群众召开“万人会”，以团绅刘思裕等为首组织抗捐队伍，曾攻入钦州城，与清军激战。孙中山派人联系，刘思裕等表示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共同起义。后来刘思裕牺牲，钦州人民派代表赴河内向孙中山

求援，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至钦州联络民团、会党，领导钦廉地区的斗争。广群众革命情绪大为高涨。1907年9月3日，王和顺率领200人起义，以革命党人清军哨官刘辉廷、李耀堂为内应，在5日占领防城，擒杀清知县宋晁元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进攻钦州城未能得手，转战灵山时，防城又被清军夺去，背腹受敌。9月中旬王和顺被迫解散义军，退走越南，起义失败。

广东方面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活动重点逐渐转向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一些守兵，于1907年12月2日发动镇南起义，猛扑镇南关，占领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孙中山得到捷报后，立即偕同黄兴、胡汉民等，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并亲自为伤员裹伤和开炮轰击敌军。起义军与清军激战7昼夜，最后因款械接济困难，而西南其他义军又相隔遥远，“攻守均感失据”，于12月9日，被迫退入越南境内。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时，把军事重任交给黄兴、胡汉民2人。黄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将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余人，组成“中华革命军南军”，自任总司令。1908年4月2日，攻占两广交界的钦州马笃山，随后转战钦廉二州和广西上思一带，在多次战斗中连战皆捷，使“清官闻风而栗。”在同盟会领导各次起义中，这次战斗是最激烈的、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又没有建立起根据地，粮弹补给也发生困难，最后无法坚持下去，黄兴等去安南，余部被遣归十万大山。

河口是滇南门户，滇越铁路的交通要道。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前，即着手筹划河口起义，企图夺取河口后逐步控制云南。1908年4月30日，派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进攻，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革命军胜利攻占河口。“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清政府急忙调兵围攻，起义军激战近月，最后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起义失败。

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地区筹划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义，未能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只是与当地会党建立松散的联盟，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此以后，革命党人把注意力转向新军。

萍、浏、醴起义鼓舞了在长江下游的革命党人。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等人在安徽、浙江也展开了武装反清斗争。

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早年在绍兴中学任教。1904年冬，徐锡麟在上海会见蔡元培，加入光复会，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从事联络会党工作。因有不同意见，他没有加入同盟会。1905年9月，他与陶成章等创办绍兴大通学堂。为了打入清军内部，他捐钱得了个道员头衔，安徽巡抚恩铭见他年轻有为，命他为巡警学堂监督。

秋瑾(1877—1907年)字璿卿，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赴日本留学。年底，经徐锡麟介绍在绍兴加入光复会。次年，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7年春，她接办大通学堂后，积极联络会党，吸收浙江新军官佐及军事学堂师生参加光复会。秋瑾和徐锡麟经过秘密联系，决定于1907年

7月19日同时在浙江、安徽发动起义，遥相呼应。6月中旬，嵊县会党先期发难，这一过早的行动打乱了起义计划，徐锡麟感到形势紧张，于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到会之机，仓卒起事，刺杀恩铭，率领学生军进攻军械所，激战后被捕。在敌人的刑庭上，徐锡麟威武不屈，慷慨陈词，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最后英勇就义。

徐锡麟被捕时，浙江巡抚张曾敫得到密报于7月14日派兵包围大通学堂，搜捕秋瑾。秋瑾得知安庆起义失败，痛不欲生，决计以身殉国，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她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大通学堂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后命令学生撤退，自己则坚守学堂，开枪抵抗，寡不敌众，被清军逮捕。面对屠刀，秋瑾大义凛然地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次日清晨，壮烈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31岁。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两广、云南的沿海边境地区起义失败之后，把主要力量放到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当时，新军中有不少士兵是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中又有很多是留日士官生和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其中相当多的人加入同盟会，因此，新军中埋藏着革命种子。

1909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由胡汉民任支部长。准备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发动起义，派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年底，加入同盟会的已达3000多人，约占广州新军总数的一半以上。预定于次年2月24日（元宵节）举事。不幸消息泄露，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倪映典于1910年

2月12日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并率新军3000人分3路进攻广州城。清军以商谈起义条件诱骗倪映典入营，倪映典在出营时被清军乱枪击毙。起义军失去指挥，坚持激战一个多小时后退往白云山一带，起义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许多革命党人的情绪严重低落，对前途信心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开秘密会议。会上孙中山大讲“一败何足馁”！“革命之风潮已成”的大好形势，热情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坚持战斗。会议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会后，孙中山负责在海外募集起义经费，黄兴、赵声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他们返回香港，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多处。经过长时间的活动，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的发动工作逐渐成熟。1911年4月8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了会议，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决定分10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一支800人组成的敢死队，至广州发难，预定4月13日起事。就在4月8日这天，同盟会员温生才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同日，又有革命党人吴镜运炸药被捕。广州清吏加紧戒严。而美洲的款款和从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能及时运到，起义只好延期举行。不久，统筹部获悉广州的一部分清军于5月初退伍的消息，认为起义不宜再延。4月25日，黄兴赶到广州，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由于清政府搜捕极严，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在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黄兴临时决定于27日晚发动起义，进攻计划由原来的10路改为4路，集中全

力攻打总督衙门。起义前夕，活动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吴、楚、闽、滇、桂、洛、蜀、皖、赣、越”等十一省革命志士，都先后赶到广州。战斗临近时，大家争着参加敢死队。朱执信原来另有任务，但坚决要求参加，别人劝他年岁大了，穿着长衫又不便冲锋陷阵，他不顾劝阻，立即取刀截去长衫的下截，勇敢地投入进攻督署的战斗。冯超骧于起义前在家侍奉病重的父亲，别人劝他不要参加起义，他说：“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吾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机，而终为亡国奴也。”他毅然离开病重的父亲，慷慨起义。林觉民在他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吾自遇你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他决心“以天下人为念”抱定牺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为天下谋永福”。积极参加战斗，英勇献身。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120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布，手执炸弹、枪支，用海螺吹响进军号冲进督署，同时，喻培伦等人也从后门炸墙而入。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在主持防范起义会议，闻警后即越墙遁入水师行台。起义队伍纵火焚烧总督衙门后，兵分3路，分头攻打督练公所等地，途中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遭遇，在东辕一带展开激战，黄兴被打断右手二指，仍坚持继续射击。喻佩伦胸前挂满一筐炸弹，奋勇当先。敌人见了无不丧胆，一直战到弹尽被捕。经过一昼激战，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惨遭失败。次日，黄兴化装逃往香港。

在这次起义中，不论是战场还是在敌人法庭、刑场上，革命志士们都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牺牲的 100 余位烈士中华侨占了 1/3。后收尸骸 72 具，葬于广州城郊白云山下红花岗，后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但这次起义使清朝统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烈士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着人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孙中山后来总结这次起义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大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第四节 预备立宪 和革命形式的发展

一、清政府 “预备立宪”骗局的失败

在国内革命形势迅猛高涨的形势下，清廷为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以抵制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从 1905 年起，清政府开始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宪党人则掀起要求立宪的请愿活动。革命党人起而揭露“预备立

宪”的政治阴谋，努力把革命推向前进。

当国内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清政府的一些地方督抚为了挽救清朝的覆亡和利用立宪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请求清政府“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决定接受建议，于1905年底派载泽等五大臣，分为两伙，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五大臣于1906年夏秋之交先后回国，向清廷复命。载泽所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称：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经过御前会议的一番争议之后，慈禧太后于9月1日正式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声称要“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是又借口“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将实行立宪的具体时间无限制拖延。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看到参政的希望，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即活动起来。1906年，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并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向清政府保证：“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当发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外，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这些立宪团体的成立，都是为了响应和催促清政府尽早立宪，并用立宪抵制革命。

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立宪抱着敷衍拖延的态度，

只求安度晚年。满族亲贵企图通过立宪巩固自己的特权，并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族官僚则企图借立宪限制满族亲贵的权势，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清廷派载泽等编纂官制，本想大体效法日本，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将财政、军事权全部收归中央，使督抚的权限和日本府县知事相当。但在讨论的时候，遭到参加会议的袁世凯等人的强硬反对。主持会议的奕劻就认为这问题太大，暂把地方官制押后，先议中央官制。中央官制的改革也碰到许多权位、饭碗的轧轹问题，于是有“五不议”之说，即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太监的事不议。这五项不议，可议的就不多了。最后在1906年11月6日宣谕中央官制改革方案：

一、军机处不变，“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二、设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1个部，“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

三、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增设资政院以“博采群言”、审计院以“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

四、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陆军部；都察院改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仓场衙门，均不作变动。

这个方案，除变更几个名称、归并几个旧衙门、增设几个新衙门外，并没有多大意义。作为“议院”之“预备”的

资政院的设立，又迟迟不见下文。而根据这个方案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即军机大臣）和内阁政务大臣（即各部尚书），共计 13 人，其中满族 7 人，汉族 4 人，蒙古 1 人，汉军旗 1 人。过去各部堂官满汉平列，现在“不分满汉”，却成为满七汉四，而蒙古、汉军旗实际上一贯依附满族，汉族不足三分之一。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满族内阁”。

陆军部是要害部门。尚书铁良，侍郎寿勋、廕昌，清一色的满族贵族。铁良强调陆军部有统率全国陆军之权，迫使袁世凯将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个镇，归陆军部统率。中央政府机关直接控制军队，这在清朝是前所未有的。铁良又创立贵胄学校，相当于陆军大学，以培养高级军官，规定宗室、八旗子弟及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方准入学。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几乎没有来入这种学校的，所以这条规定只是掩人耳目，实际目的是使统率军队的高级军官都由满族贵胄充任。习惯于骄奢淫逸的贵胄们学不成才，这项计划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1907 年 9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同时入调任军机大臣，明为荣升，实则剥夺了这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预备立宪”不仅有名无实，而且显露出满族贵族借立宪以集权的种种迹象，引起各省官绅的普遍不满而发动了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作为对国会请愿的回应，清政府于 1908 年 9 月间宣布“预备立宪”以 9 年为限，9 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

《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规定皇帝

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力，并总揽司法权，实际上和专制帝王没有多少不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对议院职权、议员言论作了种种限制，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上成为皇帝的谘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详细列举了9年内每年应办事项，包括调查户口、实行会计法、编纂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推广识字学塾，等等。所列项目，许多都不是为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所必需的“预备”。这样的“宪法大纲”和9年的期限，自然都不能令人满意。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0小时之内先后死去，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监国的第一件大事，是罢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

袁世凯在戊戌维新期间因叛卖行径为光绪皇帝所痛恨，但在慈禧太后的宠信下飞黄腾达，迅速成为权势煊赫的大官僚。他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着北洋六镇军队。他纠集死党，网罗爪牙，采用破格提拔、金钱收买等各种办法控制各级将领，竭力把北洋六镇培训成私人军队；各级将领则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衣食父母”的观念，甚至在兵营中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全军绝对服从袁世凯一人。尽管满族贵族逼他交出了四镇，随后又内调军机大臣，但他对北洋六镇的控制力依然存在。他继承李鸿章衣钵，把持着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等企业，并和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

级改良派，并借立宪以削弱满族贵族的权势，袁世凯曾多次奏请立宪，还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招致一批改良派人士，推行新政。载沣为了给光绪皇帝“雪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养病”。但清朝中枢主政的庆亲王奕劻早已被袁世凯用大量钱财所收买，以“小站旧人”为核心的袁世凯心腹爪牙，文官如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杨士琦，武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怀芝等，仍然身任要职，布满朝廷内外，对袁世凯唯命是从，“事无大小毕报”。改良派首领张謇等人也常和袁世凯互通声气。彰德实际上成为秘密的小朝廷。袁世凯的被罢斥，是清朝统治集团的重大分裂。

在罢斥袁世凯的同时，载沣宣示“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宗旨，诏令官员们认真筹办立宪事宜，务必于1909年内成立各省谘议局，借以稳定局势、笼络人心；并先后给戊戌维新中被黜革的已故户部尚书翁同龢、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开复原官”，陕甘总督升允、甘肃布政使毛庆蕃等则以阻挠、玩误宪政而被革职，力图显示新朝廷颇有“除旧布新”的气概。

1909年10月，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设立谘议局是地方官制改革的重要项目，作为省议会的“预备”，但还不是省议会。它只有“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的谘询、建议职能，而没有立法和监督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谘议局议员的名额是比照原来各省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和负担漕粮数目来确定的，少则数十名，多则百数十名。议员的产生采用复选举法。首先，根据籍贯、性别、年龄、职

业、社会身份、文化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确定“合格选举人”。“合格选举人”为数极少，没有超过该省总人数1%的。然后，由选举人选出若干“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人投票选出议员。有些省份的谘议局（如山东），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所控制，凡事“阿附官绅，颠倒舆论”。但绝大多数省份的谘议局，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占据明显的优势，他们的头面人物如江苏的张謇、奉天的吴景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联袂当选为议长。不少省份也有革命党人当选为议员的。谘议员的常年会定于每年10月间召开，会期一般为40天；遇有必要时可随时召开临时会，会期一般为20天，休会期间由常驻议员处理有关事务。改良派力图使谘议局成为代表“民意”的权威机构，他们一面以谘议局为讲坛，发表议论，通过各项决议，力争监督地方政府的权柄，从而在谘议局和督抚间发生了大量的纠纷和争执；一面互通声气，“函电谘询”，发起和组织各省谘议局联合请愿，要求缩短“预备”年限，从速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加快立宪的步伐。通过谘议局，改良派取得了“国民代表”的合法资格，成为清末一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议员分“民选”、“钦选”两种。“民选议员”98人，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经督抚核定。“钦选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和纳税多额者，按对等原则，也是98人。不过，正副总裁（即正、副议长）是“特旨简充”

的，秘书长也是“请旨简放”的，所以“钦定”的议员稳占多数。但是“钦选”议员在文化教育程度和对议会民主的理解方面，都远不如“民选”议员，实际上是十几个最活跃的改良派人士如刘春霖、雷奋、罗杰、马宗夔、籍忠寅、孟昭常、吴赐龄等左右着会议。“钦选”议员往往呆若木鸡，或随声附和。第一次常年会接章会期为3个月，后因议事未竣，延长10天。议案包括政府交议、本院议员提议和地方谘议局提请核议三种来源，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法律、文化、教育、地方事务等各个方面。政府交议的多为不关痛痒的“规则”、“章程”等条例，议员们渐渐感到极不耐烦，于是中断对条例的讨论，要求议长改定议事日程，首先讨论“速开国会案”，议员们慷慨陈词，要求“议员全体赞成通过”，“从速上奏”、“即允速开”。最后用“起立法”表决，全体议员应声矗立，连一些顽固的“钦选”议员在左顾右盼之后也只好噤噤而起，获一致通过。随后的“弹劾军机大臣案”，虽有争议，但也以112对12，获绝大多数通过。不过，资政院的决议案还得“请旨裁夺”。对于“速开国会”，载沣的回答是，将“预备”年限缩短3年，还得等到宣统五年才能召开国会。对于“弹劾军机大臣”，则以“朱谕”形式，对资政院严加申斥，对军机大臣奕劻等温言抚慰。议员们大为沮丧，吵嚷着要“请旨解散”资政院。谘议局提请核议的议案，资政院一般都支持各省谘议局，而朝廷和军机处则偏袒各省督抚，资政院的核议也大多不起作用。会开了100天，几乎没有办成一件大事。尽管如此，资政院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民意的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议员们高谈国事，抨击

政府，中外记者到会旁听，报刊报道评说，多少也有些民主的气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人来说，也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谘议局、资政院的开设，是载沣迎合立宪潮流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即力图集中权力于皇室，首先是军权。监国伊始，他就另编禁卫军，由自己亲自统率，派弟弟载涛、皇族毓朗等为禁卫军大臣。接着宣布，摄政王暂行代理大元帅，设军谘处（参谋部），派毓朗、载涛管理。军谘处改军谘府，即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紧接着又派另一弟弟载洵等办海军，后设海军部，即以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沣还裁撤了近畿督练公所，命近畿陆军均归陆军部管辖。1911年5月，载沣颁布新内阁官制，撤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由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国务大臣，总揽政务，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国务大臣共13人，汉族只有协理大臣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等4人，满族9人中，皇族如总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海军大臣载洵、农工商大臣溥伦等又占了5人。这届内阁于是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皇族组阁，是违反立宪精神的。载沣集权于皇室的用心遂大白于天下。实践证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

二、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

1901年后，为了偿还赔款和实行新政，清政府在旧捐税之外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使劳动人民大大加重负担，加

上连年灾荒，日益陷入饥饿破产的境地。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起来“闹捐抗税”。到了1909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见于记载的130多次，1910年更猛增到290多次。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在各省普遍发生，成为重要的斗争形式。其中规模较大的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

1910年，长江流域发生水旱灾荒，湖南的农民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及中外商人却把人民的灾难看作是大发横财的机会，他们互相勾结，屯积粮食，抬高米价，获取暴利。湖南巡抚岑春蓁接受英、美、日等外国商人贿赂，允许他们继续运粮出省，致使湖南米价飞涨。1910年春，米价由常年每升二三十文涨到七、八十文，甚至一日数变，闹得人心惶惶。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人黄贵荪一天工钱不过80文，生计无着，忧愤交加，全家老少4口投水自尽。长沙人民闻此惨耗，无不义愤填膺。第二天，长沙南门外，又发生碓坊主挑剔大钱，抬高米价的事件。这更引起了群众的愤慨，在木匠刘永福的带领下，将碓坊捣毁，并齐聚巡抚署前，要求平糶救灾。湖南巡抚岑春蓁，反而在13日逮捕领众起事的刘永福，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拥入巡抚衙门，要求释放刘永福，捣毁了辕门、照壁、石狮，岑春蓁下令开枪，打死多人。当晚，愤怒的长沙人民将城厢的碓坊、米店100多家一齐捣毁并一抢而空，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14日数万饥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衙署，还先后焚烧和捣毁一些外国教堂、洋行、银号和巡捕局等，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帝

国主义派 10 多艘兵舰开往长沙，清政府也忙调重兵才把群众斗争镇压下去。

1910 年春，莱阳一带发生霜灾，粮食歉收，群众“缺食者十届八九”。县令朱槐之以“办理新政”为名，巧立名目，增加捐税，更是火上加油。这年 5 月，乡民 700 余人在曲诗文率领下突入县衙，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度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绅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在曲诗文等的领导下，几万人围困莱阳县城，坚持两个多月，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

三、保路运动

和农民群众反抗斗争相呼应，收回矿、路权的爱国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 1905 年至 1911 年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先后收回黑龙江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山西福公司矿区、奉天锦西暖矿区、四川江北厅矿区、云南潞江、临安等 7 府矿区、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等矿权。

与此同时，收回路权的斗争也蓬勃展开。1905 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经过激烈斗争，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路权，清政府允许分段集资自办。1909 年，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议定湖广铁路借款，由于美国强行要求参加，三国银行团改为四国银行团。湖南绅商民众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留日学生出版《湘路警钟》号召抵制。湖南谘议局初选议员 800 余人致函清政府，提出：“铁路借款，湘人决不承认。”湖南绅商组织湘省集股

会，用抽股、认股等办法，集资开始修筑株州——长沙段。湖北绅民接着行动起来。留日学生千余人集会抗议，派张伯烈等回国力争。绅商学联合组成湖北铁路协会，公举张伯烈等为代表入京抗争。他们在京和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进行了说理斗争，绝食七昼夜。消息传来，湖北各界人士极为愤慨，酝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清政府玩弄欺骗手段，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先后准许湖南境内粤汉路和湖北境内粤汉、川汉路商办，但实际上并未废除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合同。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上台的第二天，就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宣布已经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的上谕。随即命令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6月20日，端方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铁路借款为名，把收归“国有”的铁路转手拍卖给帝国主义。

清政府这种开门揖盗，祸国殃民的罪行，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到湖南修路，则“立即全力抵抗”。紧接着湖北谘议局也召开数千人大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气氛极为悲壮。

广东也召开千余人股东大会，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海防华商会馆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

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浩大，斗争最为激烈。1904年，四川开始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于是决定除私人投资外，全省按租抽谷，百分取三，凡实收租谷在15石以上者，约按所

收谷数提出 3 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租役”。这些“租役”占了全部股金的 80% 以上。这样一来，四川全省农民的命运都与川汉铁路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清政府的拍卖路权，侵吞筹集铁路股银，不仅侵犯了投资铁路的商绅的利益，而且直接剥夺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这就使四川的保路风潮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1911 年 6 月 17 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保路会每次集会，到会者动辄成千上万，情绪异常激昂。8 月，成都罢市，数十县闻风而动，卷入了罢市斗争。9 月，斗争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蒲殿俊、罗纶本来打算把反抗风潮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他们大量印发写着光绪牌位的黄纸长条，并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写在黄条的两侧。令各家各户张贴，设案焚香，巧妙地从事合法斗争。不少同盟会员则联合会党把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准备发动起义。清政府电令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抽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 9 月 7 日上午诡称北京来电，把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 5 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时封闭了川汉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这样一来，矛盾更激化了。全城数万群众闻讯后扶老携幼涌向督署请愿，赵尔丰竟下令开枪镇压，又令马队在人群中冲撞践踏，当场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无数。并下令 3 日不准收尸，督署前惨不忍睹。同时，成都城门紧门，交通邮电全被封锁，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全省

几十州县迅速组织保路同志军，云集成都城下的同志军就有10余万人。在革命党人龙剑鸣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人率领下，英勇奋战，重创清军。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战斗持续10余天，省城仍未攻下，同志军陆续转而分兵攻打各州县。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永珊（即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此后，各州县纷纷效法，独立的浪潮席卷全川。

四川的保路同志军起义，牵动了全国，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从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第五节 辛亥革命

一、武昌起义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科学补习所设有专门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群众输送入伍，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虽然革命团体遭到

几次破坏，团体名称一再变更，但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以及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都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始终坚持不懈。根据多年积累的秘密工作的经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标（团）、营、队（连）各级都推举了他们的代表，组织网遍及湖北新军各基层单位，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 $1/3$ 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 年的广州起义，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 9 月 24 日组织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部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鼐、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是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的。

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的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待孙中山筹措 20 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同时，他们看到清政

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险。因此，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事在必行”。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覲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彭、刘及杨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5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往停泊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革命政府，扩

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高潮。湖北革命党人是奉孙中山为领袖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孙中山远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11日，经过一夜战斗的起义士兵群众，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准备推举都督，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军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以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于是邀请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高级军官、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他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学习，由管带升至协统的职位。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黎元洪仍坚持顽抗，亲手杀死了响应起义的士兵2人。起义的迅速胜利，迫使他仓惶逃到一个营管带家里躲藏。由于他平时在汉族官僚中以“开明”著称，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黎元洪并不愿意顺从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对，他是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愿意让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汤化龙原是立宪派首领，在立宪运动破产后对清廷绝望。他在11日推举湖北

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上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过了几天，他便发布了一个冒称同盟会东京本部草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七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旧派人物。虽然这个条例不久即被革命党人否定，各局一律改为部，只给汤化龙留下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负责，汤化龙因而弃职东去。但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立宪派首领出面主持，却具有“示范”的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所效法。

二、革命形势在全国的迅速发展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翔为都督。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

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准备拥清朝巡抚冯汝骥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政府，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樞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江苏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立即抢先一步，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5月，江苏军政府成立，程德全摇身一变，由巡抚成了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蔭诚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员联合团练发动起义，占领寿州，连克颖上、亳州等地。8日，立宪派劝说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推朱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朱家宝感到形势不稳，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议决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

同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入租界，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內，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至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川东南50多州县响应。在四川资州，一部分新军起义，杀死了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拆毁铁路，袭击军用列车，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革命军。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和驻保定的新军第六镇举事。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飞跃发展，有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中也掀起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革命大都督”的旗帜。上海附近各县农民，普遍掀起了抗租斗争。湖南衡阳、醴陵等十几个州县农民起义，围攻县署，杀逐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陕西自咸阳到凤翔、陇州的数百里地区內，到处发生戮官劫狱等暴动。四川农民反抗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战斗，在各州县如火如荼地猛烈开展。奉天辽阳、辽

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和山东的民军都迅速发展，声势浩大，迫使东北三省和山东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独立”，借以应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几乎全国各省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群众起义和暴动。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地区一部分蒙古族和汉族的同盟会员，曾经在学校、军队、会党和反清士绅中进行工作。武昌起义后，归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包头、丰镇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组成革命军，12月间一度攻克丰镇。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军占领包头，成立革命军政府。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有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伊犁。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并成立了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员以及与同盟会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在全国蓬勃发展。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缺乏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十分害怕帝国主

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希望赶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的历程，取得廉价的胜利。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压力下，转到革命方面，利用自己在各省谘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力图维护旧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并窃夺权位。湖南起义后，曾一度设立筹饷局，按房地产和田产的多寡摊派捐款，以保证革命的需要。湖南绅商和立宪派激烈反对，把这个革命措施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他们唆使旧军官在湖南起义后十天发动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等人，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就这样，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力。

另一些省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以后，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很快地向左转了，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当时宣布起义的各省，无论是革命派掌权，还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几乎一律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府县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被遣散，广东的十几万民军被裁撤，湖北军政府通告全省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武装。资产阶级革命人刚刚取得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

三、中外反动 势力的反扑及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使中外反动派十分震惊。他们随即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扑灭这场革命烈火。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要求驻华英国海军，“给以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汉口的俄国领事也主动建议“让租界义勇队出动，”扑灭革命。几天之内，帝国主义列强在武汉江面集中了20艘外国军舰，对起义军施加压力，伺机干涉。至11月间，外国军舰游弋在中国领水已达51艘。海军1.9万多人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并以7000兵力分驻北京至山海关铁路，又向沿海各口岸和北京使馆区增兵、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但是他们看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用武力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已无希望；同时又看到革命党人对列强抱有明显的幻想和妥协，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于是便改换方式，宣布“严守中立”，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扶植新的代理人，以取代行将崩溃的清王朝，这个代理人就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行平息。”英、美公使一再示意，必须重新起用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一时“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舆论甚嚣尘上。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赶往武汉镇压。但是，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军阀军

队，大部分将领都是袁的心腹爪牙，荫昌指挥不灵，军事毫无进展。10月14日，清政府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要他统率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想乘机索取更大的权力，借口“足疾未痊”，迟迟不肯出山。同时，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采取观望态度，以便他向清政府讨价还价。

10月19日，湖北革命党人攻克刘家庙，随后湖南、江西、陕西相继独立，清政府只好于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袁世凯这次虽南下视师，但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实际上是要求授予他军政全权。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载沣等权贵惶恐万分，被迫屈服，赶忙下“罪己诏”，颁布宪法“十九信条”，下令释放政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由于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欣然走马上任。

袁世凯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后，采取了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手借清王朝力量打击革命势力，一手借南方的革命力量压迫清政府，以达到既将革命镇压下去，又要迫使清皇室交出政权，最后建立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于是他急令北洋军进攻武汉，11月2日，汉口陷落，北洋军焚劫市区，借此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在北京组成，主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同时，载沣以醇亲王之名号退居私邸。英国外交大臣满意地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这时，袁世凯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开始集中全力对付南方革命势力。

袁世凯到北京就职，马上得到四国银行团的贷款，英国公使朱尔典更出面帮助他策划“南北议和”。实际上是向革命施加压力，强迫革命党人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袁世凯则在同一天命令冯国璋猛攻汉阳，向革命军施加压力。第二天攻陷汉阳，并在电山上架炮隔江轰击武昌都督府。黎元洪急忙逃离武昌，湖北军政府同意从12月3日起停战三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南北双方于12月18日开始在上海进行和谈。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与南方革命政府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谈判。从18日到31日，双方举行了5次会谈，谈判内容主要是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英、美、法、日、德、俄六国驻上海总领事，奉命采取一致行动，压迫革命方面妥协。20日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六国总领事同时照会南北议和谈判的首席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粗暴地要求双方“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在这同时，它们在政治上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在经济上切断南方革命政权主要财源，却把海关税收的一部分送到袁世凯手中，并由四国银行团向北京提供300多万两贷款。此外，帝国主义军舰还在长江水面上向南方革命势力示威，并叫嚣如不停止“内战”，就要进行武力干涉。压迫南方革命势力尽快向袁世凯妥协。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混进革命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他

们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既得利益。因而，对革命派施加压力，要求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条件，实现南北“和解”。使革命面临着流产的危险。

四、中华民国的成立

武昌起义胜利后，围绕着如何建立中央政权，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斗争。作为首义之区的都督黎元洪，在11月7日致电各省，征询组织中央政府的意见，两天之后，他又通电各省，要求各都督府迅速派员到武昌商议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江浙方面也不落后，11月12日，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等用江苏、浙江两省都督府的名义致电各省要求速派代表赴沪参加会议。由于战争关系，黎元洪11月9日的电报，在不少省区都有耽搁，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湖南、直隶、河南等省区都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等几个省区，才派代表径赴武昌。11月15日到达上海的代表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第一次会议，20日又议决，承认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这一方案，张謇后来称之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但是湖北方面则坚持会议应该在武汉召开。由于湖北是首义之区，上海方面只得让步。24日代表联合会迁往武汉开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联系。11月30日，由于袁世凯对武昌方面施加压力，武昌正遭炮击，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老同盟会员谭人凤被推选为议长。12月3日，代表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议：一是通过《临时政府

组织法大纲》，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参议院由各都督府派参议员三人组成。尽管大纲还不够完备，但是它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共和政体的诞生和君主政体的灭亡。另一是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从一开始，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就和期待袁世凯“反正”联系在一起，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买办势力的妥协性，也暴露了立宪派和旧官僚对袁世凯的期望。

11月27日汉阳的失守和12月2日南京的光复，革命党人和江浙立宪派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电催代表速返上海集会。黎元洪等因为武昌已处于清军炮火之下也不敢坚持。4日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代表会议改在南京举行。这时，究竟是由谁出任临时政府负责人，上海和汉口双方意见不同，于是，各省代表又议定推迟大总统选举，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由于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正汇集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于26日举行会议，议决选举临时大总统，筹组中央政府。29日，各省代表会议进行选举，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称民国元年。3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院人选，组成南京临时政府。月底，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

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

从武昌起义到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愿望，激起了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运动的高涨。孙中山在宣誓就职时，宣布了国内各民族平等的主张，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增强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

武昌起义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给台湾省同胞以极大的鼓舞。1912年发生了林杞埔（台中竹山）起义和土库（嘉义）起义。1913年同盟会人罗福星等在苗栗组织起义。这些起义虽被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下去，但台湾全省人民更加坚定了反抗殖民主义奴役、同自己的骨肉同胞早日团聚的战斗意志和决心。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3个月内，还颁布了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诸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各类所谓“贱民”的歧视条令；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主奴名分；通令剪辫；禁止缠足等。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临时参议院议决的《临时约法》7章56条。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约法，对于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推行民主和法制，是有作用的。此后几年，它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用来反抗军阀独裁统治，争取在中国贯彻实行的成文方案。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待帝国主义是软弱的。它所发表的《对外宣言》，承认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利益，承担偿付清政府的外债和“赔款”的义务，希图以此争得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帝国主义的粗暴干涉和危言恫吓，借口保护侨民而增派兵员、船舰侵入中国，以及截留关税盐税以困扼革命

等挑衅行为，临时政府也采取隐忍退让的态度，深恐一有触犯，就招来灾祸。

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施行任何变革封建土地制度的措施，以致不能在广大的农村掀起反封建的运动，从而争得亿万农民的支持。所以，在抵抗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时，临时政府也就显得窘乏无力，难以坚持斗争。

五、袁世凯窃取政权

孙中山回国前，革命派已与袁世凯达成用革命成果换取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协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已成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孙中山是不愿妥协的，还责备黄兴过于软弱。但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也只能执行已有协议，“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袁世凯打算用南方临时政府作筹码逼清政府让位于他，但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却使他非常恼怒，他宣称唐绍仪逾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对商定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一概拒绝承认。又在孙中山就职之日，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表通电，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王公贵族拿出钱来，誓死抵抗；并撤消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故意制造决裂势态。

孙中山对此组织了反击。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制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北伐发动后，军心振奋，捷报频传，大有直捣黄龙之势。但是北伐并没有顺利

发展，这时，帝国主义公开出面支持袁世凯，他们继续把海关收入交给清政府，对革命军不提供任何贷款；并阻止革命军在秦皇岛登陆。驻北京各国外交使团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而且派兵进驻京榆段（从北京至山海关），对革命派大肆恫吓。

立宪派旧官僚在革命高潮中依附革命，但是他始终与革命派同床异梦。他们不仅在南北和谈中设计一套使辛亥革命流产的方案，而且对革命政权也进行了拆台活动。

立宪派首领张謇早在武昌起义前夕，于北上途中，特下车专程往彰德拜访袁世凯，对未来的政局和对策，达成了默契。后来张謇虽然在临时政府任职，但拒不到任，他不但对他所控制的岁入达5000余万两的两淮盐税拒不交付，临时政府想让各地商会认捐款项，也不肯执行，而且在对外借款问题上带头对孙中山谩骂攻击。张謇还一再向孙中山、黄兴提出“即日散党”的要求，认为“统一最要之前提，……销去党名为第一”。立宪派妄图取消革命党人对革命的领导权。同时还在革命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交出政权。张謇还密电要袁世凯“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表示立宪派对袁世凯殷切的期望。

旧官僚的代表人物黎元洪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日竟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各省都督，说什么“项城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以仕清廷，未克以选，识者惜之”。为袁世凯叫屈。后来，虽选他为临时副总统，但他仍一心拥袁，以各种借口攻击孙中山和黄兴，甚至扬言要与临时政府脱离关系。

不仅如此，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妥协分子

还大造舆论，危言耸听地宣扬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大多数革命党人也忧心忡忡，仿佛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这样，南京临时政府既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施加的种种压力，也不能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

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妥协分子的联合进攻，革命党人中妥协的思想逐渐占了风。先是袁世凯露骨地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另立统一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无法接受这个无理要求。孙中山揭露“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一人而独揽大权，”坚持他在就职誓词中所提出的“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孙中山的主张遭到反对，被迫放弃各国承认民国的条件，但仍坚持认为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于理绝对不行”，同意与袁协商组织政府，又一次作了让步。

如何“处置清帝”是另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袁世凯为了使旧秩序减少变动，并顺利地 from 清王朝手中得到政权，要求给清帝及皇室以极高的“优待”。其主要内容是：皇帝称号不废；每年由民国政府给 400 万元；暂居皇宫，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等。这个荒谬的优待条件，使孙中山、黄兴等一些革命党人感到是奇耻大辱，实在难以接受。然而，南方议和代表却认为保留皇帝称号，不过是“虚名”，“不必重视。……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结果妥协一派占了上风。2 月 6 日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优待条件。

袁世凯得到南方让权的确切保证后，马上开始逼宫。清朝皇室的一些王公贵族当然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结成宗

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投弹炸死了宗社党首领良弼，宗社党成员纷纷逃离北京。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暗中指使不久前还通电主张君主立宪的段祺瑞等46名北洋军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已经被革命吓破了胆的清皇室再也无法支撑局面，不得不在1912年2月12日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实践让总统给袁的诺言，除对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表示异议，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外，遂即于2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议员，每省1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日袁欣然接受。就这样，袁世凯篡夺全国政权的阴谋逐步得到了实现。

孙中山虽然对袁让权，但对袁并非没有戒心。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时。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所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孙中山想以这三个条件达到两重目的：第一、建都南京，把袁世凯调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第二、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实行封建军

事独裁。

奠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反动集团之间的最后一战。孙中山知道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起初是一再催促袁南下就职，继而特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7日抵京。袁世凯表面上盛大欢迎，“愚谈”南下问题，暗中却在29日晚密令他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等地制造暴乱，“北京城内炮声四起，所在纵火，招待所亦有兵士纵枪破门而入，掳抢一空。”同日晚，保定和京保沿线也发生军队哄抢事件，乱事延续两昼夜。然后袁世凯以北方局势不稳作为不能南下的借口。孙中山得知后，决定出兵平乱。这时帝国主义又一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的阴谋，北方公使团以“兵变”为借口，派各国军队在北京街头巡逻。随后俄、日、英、德、美、法等国，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青岛、香港等地，陆续增调军队入京，总数达3000人，制造紧张空气。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发出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黎元洪危言耸听地通电各省，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如果相争不决，就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革命阵营中也有部分人主张妥协。孙中山被迫再次迁就退让。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口是心非地宣读了“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的誓词，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负责组织第一届内阁。25日，唐抵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他把内政、外交、

陆军和海军四个主要部门，都交由袁世凯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袁的立宪派手中。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而握有军权的黄兴则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孙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陆续北迁，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从此，辛亥革命出现的光明熄灭了，开始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统治的黑暗时代。

在孙中山领导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南京参议院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7章56条，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这个《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宪法效力的根本大法，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立法建制的最重要的成就。它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政权的组织形式改为内阁制，内阁直接向国会负责，内阁国务各员辅助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和行使立法权；法院为司法机关，独立审理民刑诉讼，行使司法权。这样它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宣告了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同时，这个《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虽然，它同欧

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宪法一样，不可避免地打上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宪政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孙中山指出：在“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的中国，必须把民主共和精神用法律确立下来，才可能使“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很显然，它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然而，它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孙中山想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和政权为后盾的情况下，用它去约束袁世凯，那是无济于事的。因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时，虽然口头上表示“拥护”，但一纸空文绝不能约束窃取了政权的反动势力，不久就被他彻底废弃了。

六、辛亥革命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留下的经验教训的宝贵的。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同以往革命不同的是，因这个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政党领导的，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比较完

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废除了持续 2000 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前进。

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使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也革了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就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也就打击了它背后的帝国主义。从此，帝国主义很难找到像清政府那样理想的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资本主义发展以新的推动。南京临时政府所采取的保护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近代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辛亥革命爆发在约占世界人口 1/4 的亚洲的一个大国，对东方和世界都不能不发生影响。中国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下，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人民都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形成了一次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最伟大的斗争，它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盟会的纲领是反满、反君主政体和主张不切实际的“平均地权”。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企图以承认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同情和援助，自然就放弃了反帝斗争。他们只关注建立“共和”政体，没有认识

必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在掌权的日子里，也没有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关键时刻，无法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大批革命党人反而转化成新官僚、新军阀、新政客，站到袁世凯方面去反对革命。

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坚决的革命路线，也不能用正确思想武装自己的队伍和动员广大的群众，因而也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辛亥革命的失败，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必须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必须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这是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个民主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八章 近代中国 文化和科学技术

第一节 社会思潮

一、社会思潮的出现

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20 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所谓“学问饥荒”年代。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人们以无比的热情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潮之输入，如火如荼，然则皆‘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炙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各种思想、理论，和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相结合，于是涌现出各种思潮，诸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教

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等等。孙中山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中汲取营养，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制订出简单明确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遂成为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多为改良派人士所倡导，并成为他们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动力。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则是革命阵营所派生的两个别具特色的支流。

1905年2月，《国粹学报》月刊在上海创刊，标志着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国粹学报》在《发刊辞》中声明：“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不存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从创刊到武昌起义后停刊，7年共出82期，是革命报刊中生命最长的一种，在同封建文化联系较深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并得到一些改良派人士如郑孝胥、张謇等的赞扬，对于一些守旧而又有点反满情绪的文士也有相当的吸引力。除《国粹学报》外，他们还在上海设立了“国学保存会”和藏书楼，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1906年，章炳麟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又把大量国粹主义的文章塞进《民报》，还在《民报》社内设立“国学振起社”的事务所，主讲“国学”，发行讲义，号称“国学泰斗”，一时声势颇盛。

什么是“国粹”？国粹派认为，“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为什么要提倡“国粹”？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

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排满光复”。他们从所谓“夷夏之辨”的封建传统思想出发，认为中国理应由汉族统治，从而把包括满族在内的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一律称之为“亡国”，借此激励人们的“排满”情绪，献身于“光复故国”的大业。二是从古代的“良法美意”中寻找某些可以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所怀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缺乏信心，企图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中去寻找救世的药方。

国粹派继承了明末清初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但注入了新的内容。除强调“排满”是反对“满洲政府”而不是一般满族平民外，还把“排满”与政体改革、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从而使之获得了新的阶级和时代的特色。不过，他们对古代历史、民族起源和民族关系作了许多错误的论述，并散发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的气息，具有消极作用。

国粹派也不是封建的复古主义者。他们郑重声明，“国学”不是“君学”，不是“孔学”。他们认为孔子的学说和其他诸子的学说一样，“仅列周季学派之一”，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他们倡导的“古学复兴”，是以西欧早期的文艺复兴为蓝本的，力图从古代文化中发掘出民主的乃至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为对国故的整理，国粹派从经籍中撷采关于民族斗争、民主思想的材料，在“保存文献”、“会通学术”、“创定义例”等方面，确实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不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太深，往往沉溺于故纸堆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对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理解太少，用以比附古代典章，往往不伦不类，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超越资产

阶级制度的可行方案。国粹派总是引导人们向后看，从而干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

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反映了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汇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吸取和改造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国粹派没有能够解决这个课题。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初，包括《苏报》、《政艺通报》、《浙江潮》、《江苏》、《民报》在内的许多报刊，都发表过介绍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译著。1907 年夏，张继、刘师培、何震（刘师培妻）等在日本东京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女子复权会”，出版《天义报》半月刊；李石曾、吴敬恒（稚晖）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刊。他们各以所据刊物为阵地，鼓吹无政府主义，标榜“倾覆一切强权”，从而在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在留日、留法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天义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主编为何震，主要撰稿人为刘师培、汪公权等，以鼓吹废弃人治、废兵、废财、废除政府，“人类均力”，妇女解放、破除家庭为特色。“人类均力”是其理论核心。刘师培在《人类均力说》中认为，平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要实现人与人平等，就必须消除分工，使“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力相等，义务相均”。为此，他设计了一个“均力主义”方案：以乡为社会的基本自治单位，设老幼栖息所以抚老育幼，20 岁以前学习

语言文字、科学及器械制造，21至36岁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农耕、筑路、开矿、建房等，37至50岁从事轻体力劳动，如烹饪、运输货物等，或担任技师、医师等工作，除农忙外，每人每日劳动仅2小时，所余时间，“均可各择其性之所近，‘从事于学。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小生产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王国。在他们激烈反对一切强权的掩盖下，包藏的却是小生产者对大工业发展的恐惧，这就使以《天义报》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民粹主义的特色。

《天义报》刊行时间不长，但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对一部分同盟会员如章炳麟、陶成章等有很深的影响，直到1910年重建光复会，仍可觉察到这种影响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因素之一。

《新世纪》和同盟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它的主编是李石曾、褚民谊、吴敬恒，由张静江出资创办。他们虽然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终极目标，反对强权、特权；反对军备，反对法律，反对赋税，反对财产，但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社会进化的“过渡物”，承认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过渡”到无政府主义的必经阶段，这就使得以《新世纪》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有了共同的语言，主义虽“稍有异同”，并不妨碍“同为革命党”，并不妨碍“协力以图”反清的革命。此外，他们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努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统治，主张“三纲革命”、“祖宗革命”、“破除迷信”、“革孔丘的命”，批判儒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不失为革命民主主义的一支友军。自然，他们出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需要，攻击民族主义是“不凭公道

真理”的复仇主义，指责民权主义实际上是“富权”，是自利主义，诋毁革命民主派都是“为功名利禄”，“不脱乎自私自利”等等，以偏概全，混淆视听，也起了恶劣的消极影响。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时髦的外衣，借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挟甚高之主义，以抵制他人之实行”，在当时就曾遭到革命民主派的严正批判。

二、西学的继续输入

洋务运动期间，一些译书局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书籍，但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比较系统的介绍，还是从19世纪末康、梁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严复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广泛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人物。他先后翻译了不少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书籍，其中以《天演论》影响最大。

20世纪初，为适应当时反清革命思想宣传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中国。除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社会革命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理论。其中关于法国革命学说的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精理》、法国《人权宣言》；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有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这些书中包含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倡民主政治，反对专制政体，鼓吹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当时还翻译了一些历史著作，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美国独立战争》等。1889

年以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及外国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只有 60 多种，但至 1904 年为止，已有 200 多种。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心从西方介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形成五色杂陈的局面。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也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著作。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有零星片断的翻译和介绍。如 1903 年 2 月《洋书汇编》刊载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附有《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1906 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颂扬《共产党宣言》，并片断地评述了《共产党宣言》。1907 年《天义》报第 15 号，刊登恩格斯 1888 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翌年，《天义报》登载了《共产党宣言》每章全文和第二章，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片断。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在知识界反响不大。

辛亥革命后，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英国诗人拜伦为鼓舞希腊人民争取独立而写的《哀希腊》诗，由苏曼殊译为中国旧体诗，传诵甚广。波兰爱国诗人米契维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的菲律宾文人厘沙路的诗篇也都被翻译过来。同时莎士比亚、雨果、拜伦、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陆续翻译出版。

译述工作者当中，最有影响的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1852—1924 年），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光绪举人，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

维新运动。他并不懂英文，但依靠别人口述，在长达 19 年的时间中，用古文译述了欧美等国的小说 170 多种，其中辛亥革命前出版的有 50 多种，辛亥革命后约 110 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外国的名著。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塞万提斯的《魔侠传》（今译《唐·诘诃德》）。他的译文风格优美流畅，译作风行一时，在当时很有影响。特别是《黑奴吁天录》一书，是在 1905 年全国反对美国虐待华人高潮中译出的，影响更大。

第二节 史学、文学 艺术和新闻出版的发展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中，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过去的历史书进行批评，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炳麟在同时期也提出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佐在 1904 年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稍后，

刘师培也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对外国历史作了不少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时期文学艺术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它的社会教育功能，从而推动了小说的繁荣和戏剧的革新。

小说，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眼里，向来是“街谈巷语”、“君子弗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小说别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和缀辑琐语三派，“甄录其近雅驯者”，至于宋代的平话，元明的演义，包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等，虽然盛行于民间，但被认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皆“黜不载”。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从启蒙的角度开始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价值。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改变社会风气，从而把小说提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崇高地位，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主张。梁启超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不少有志者为抨击清政府，提倡维新、提倡革命而挥毫创作小说，蓬勃兴起的报纸、期刊也竞相刊登小说以吸引读者，还涌现了一批专刊小说的杂志，继《新小说》之后，有《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等，盛极一时。据估计，当时创作的成册的小说，至少在1000种以上。

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从官场到商场，从内政到外交，从

学界到工界，从维新人士到革命党人，几乎都有所反映。一般作者有意识地用小说作武器，对清政府和一切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抨击，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命意在于匡世”，“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体裁上最普遍采用的是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类似《儒林外史》的形式，拆开来每段各自成篇，合拢来可以长至无穷，这是为适应报纸杂志连续发表的需要和容纳繁杂多样的题材所决定的。写作上则大都采取直接暴露、批判的手法，艺术性较低，“不重含蓄”，口号化，论文化。“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因此，传世之作较少。最著名的作家有李宝嘉（伯元）、吴沃尧（趸人）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人所称道。

辛亥革命时期小说的繁荣，还应包括翻译小说的日兴月盛。由于社会对小说的需要殷切，而翻译毕竟比创作省时、省力，翻译小说在数量上占据压倒的优势。除林纾外，吴俦、陈冷血、包天笑等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介绍了大批世界名著，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为小说园地增添了绚丽的异国风采。

从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很容易联想到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但传统的剧目及其表演程式，距离现实生活太远，于是有戏剧的革新。

1904年柳亚子、陈去病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戏剧杂志。在柳亚子的《发刊词》和陈去病的

《论戏剧之有益》等论文里，指出戏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对观众有很强烈的感染力，主张重视戏剧的社会作用，提高戏剧及艺人的社会地位，并着眼于戏剧革新。首先是剧本问题。要编演有利于反清革命的历史剧和时事剧，以唤醒国民，激励士气。其次在语言和表演艺术上也要有所改革，使观众能够接受。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剧作家们费了很大力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截至1911年，创作各类戏曲剧本达160多种，包括传奇54种，杂剧40种，地方戏51种，话剧16种。其中，“引古鉴今，明夷辨夏，激动种族之观念”以及鼓吹“推翻这专制政府，扫灭那无道昏君”的中外历史剧占了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歌颂革命党人英勇事迹的作品。在京剧舞台上，编演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逐渐流行。主要倡导者是被称为“剧班第一革命巨子”的汪笑侬，夏月珊、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等京剧艺人对新剧的编演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在春仙、丹桂、新舞台等戏院，演出了《波兰亡国惨》、《缕金箱》等直接讽刺和抨击清政府的新戏，受到群众欢迎。在编演时事新剧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内容和旧形式的矛盾。穿西装唱皮黄，观众总觉得不自然，难以接受。有些人认为还不如改为纯用话白演出。于是，一个新的剧种——话剧应运而生。

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或“文明戏”，创始于1907年。这一年，以留日学生曾孝谷、李息霜（叔同）、欧阳予倩为骨干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用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以其强烈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使观众深受感动，取得了成功。不久，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也演出了该

剧。随后，王钟声还演出了《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新剧，并在1908年到北京、天津演出，和刘艺舟等将新剧播及北方。此外，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的职业新剧团进化团，对初期话剧运动也有较大贡献。这个剧团除在上海演出外，还到南京、芜湖、汉口、宁波等地演出。所演剧目多半是反映当时的政治问题，宣传革命和爱国思想的。

综观20世纪初年小说、戏剧所表现的文艺观，着眼的是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实际上是把小说和戏剧作为从属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工具，忽视了它们作为文艺的本质特征，即具体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它起了启迪、振奋人心的作用，但艺术质量不高，突出地表现在没有塑造出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人物大都比较概念化，缺乏丰满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因而不能给读者和观众以深刻的印象。当政治上失去需要之后，也就为人们所逐渐淡忘。

这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于1909年底在苏州成立，是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发起的。翌年，出版《南社》杂志，为专刊诗文的集刊。最初入社的只有17人，多属同盟会员，后来发展到1000余人。南社通过文学活动，提倡民族气节，宣传革命反满。鲁迅说：南社“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在诗歌创作上，南社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宋诗派、同光体等诗派，改变了诗坛风气。

20世纪初年，新闻出版也呈现出兴旺的景象。

中国的报纸，如果从《邸报》算起，可以上推到汉唐，但历时千余年没有什么发展。清代的《京报》，也仍是每日内阁

所发抄的内容：宫门抄、上谕、奏摺等。1851年，有人奏请刊刻《邸报》发交各省，奉谕严行申斥。1886年，强学书局改归官办，刊行《官书局报》，形式和内容都和《京报》相似，只是增加了若干“新事、新艺”的介绍。1901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创《北洋官报》，内容除谕、摺、公牍外，还有本省时政、外省新闻和各国新闻等，为地方政府办报的先导。1903年后，各省纷纷仿效，《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江西日日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在此之前，农工商部还刊行了《商务官报》，学部刊行了《学务官报》。官办报纸一时称盛。

民办报纸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官办报纸，在数量 and 影响上更远远超过官办报纸。早在19世纪70年代，受来华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纸的“刺激”，武汉、香港、上海就有民办报纸出现，80年代，广州也出现了民办报纸，但多销路不畅，或受地方官员禁阻，先后停办。进入20世纪，民办报纸蓬勃兴起。沿海、沿江的十几个省的省城及其他十几个大中城市都办起了报纸，总数在150种以上。上海、广州的民办报纸都超过了30种，而且约三分之一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苏报》、《时报》、《民立报》等都受到社会的欢迎。

维新运动期间，办杂志曾一度成为时髦，因戊戌政变而顿挫。20世纪初年，办杂志之风再度兴起，并超过了此前的势头。革命派、改良派竞相通过杂志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日本东京和上海是两个刊行杂志最多的地方。据有关著录统计：上海有杂志46种，其中鼓吹革命的报纸、杂志的兴盛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密切关系。石印、铅印取代了雕版印刷，大

大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继商务印书馆（1897 年）之后，文明书局（1902 年）、集成图书公司（由集成图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申昌书局和开明书店在 1906 年合并组成）、中国图书公司（1908 年）相继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最为突出，它在 1900 年开始采用纸型，1901 年出版《外交报》，1904 年创刊《东方杂志》，1905 年开始采用雕刻铜版，1909 年刊行《小说月报》、创制正楷铅字，可说是独步一时，书业的营业额约占全国的 1/3。1912 年中华书局创设后，商务印书馆才遇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第三节 科学技术

一、近代自然科学 和应用科学的兴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人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主张，但人数少，影响不大。后来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工业的建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外交涉日益频繁，西方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大量的科技书籍被翻译过来。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经营的“墨海书馆”，就开始翻译、出版了少量的科技书籍。五六十年代它又出版了我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和在华外国人

合译的关于代数、解析几何、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科技著作。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在 1868 年成立翻译馆，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到 1880 年止，已译 156 种，出版了 98 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地学浅释》、《决疑数学》（概率方面）。该局解释的书籍不仅数量多，学科也较齐全。其中关于采矿、蒸汽机、化学、造船等方面的知识是首次介绍到中国。北京同文馆设立的印刷所也翻译印刷了数、理、化、史地方面的书籍，其中有部分是西方科技著作。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学校，为适应学校用书，他们编译了一些科学书籍，作为学校用的课本。如 1853 年墨海书馆出版的《数学启蒙》，1857 年刊订的《博物新编》等。60 年代以后，这类书籍更多，发行量大，影响较广。主要的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几何学），《八线备旨》（平面三角）、《代形合参》（解析几何）等。当时还出版有《六合丛刊》（1857 年出版）、《格致汇编》等，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综合性科学杂志。

戊戌变法，使学习西方科学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留学生出国不断增多，20 世纪初形成高潮。在官派留学生中，学理工科的又占大多数。他们介绍和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对我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03 年《癸卯学制》颁行后，大学农、工、商、医等科的设立，中小学和各类学校对自然科学和科技书籍的需求，特别是对教科书的需要大量增加。1897 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 年创办的中华书局都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也出现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使自然科

学的传播更为广泛。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在全国各地成立的许多学会中，也有自然科学专业学会，如南京测量会、上海的农学会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09年由张柏文等人创立的“地学公会”，并出现《地学杂志》，它是一个由专业人员创立的，并出版刊物一直持续近30年之久的学会。故有人把“地学公会”的建立，作为我国近代学会的开始。

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以及许多科技书籍。

二、李善兰、华衡芳、 徐寿在数学、化学上的贡献

西方科技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对启发和提高人们对近代科技知识的认识和开通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使学习和研究西方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开始形成一种风气，从而产生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其中较著名的有李善兰、华衡芳、徐寿、詹天佑、冯如等。

李善兰（1811—1882年），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曾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等职。从小喜爱数学，通过刻苦学习，成为著名的数学家。他编著的《则古昔斋算学》一书，包括他的数学著作13种。其中《方圆阐幽》、《孤矢启秘》、《对数探原》3种，是关于幂级数展开方式方面的研究。他的“尖锥术”研究曾用于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并阐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还在《考数据法》中，得出一

些关于二项式定理系数的恒定式和判定素数的定理。在《垛积比类》一书中，通过对中国传统的三角垛研究，列出了一系列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公式，从而得出有名的“李善兰恒等式”，为国际数学界所注意。

李善兰还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后9卷，又和其他外国传教士合译了许多科学技术书籍。其中《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是西方近代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和微积分学在中国的最早中译本。《谈天》、《重学》、《植物学》是介绍西方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的书籍。李善兰学术精湛，在数学方面的造诣，受到人们的一致公认，在传播西方近代数学知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衡芳（1833—1902年），字若汀，江苏金匱（今无锡）人。他曾独立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并与徐寿等人一起自制我国第一艘轮船。他是一位多才的科学家，尤其精于数学。他的名著《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其中有不少是有相当创见的名篇，如《算学笔谈》一书，是学习近代数学极好的启蒙读物。《开方别术》、《积较术》则被李善兰称之为空前绝后之作。他到江南制造局工作后，与人合作先后翻译了12种著作，其中以数学方面的最多，主要有《代数术》、《代数难题解决》、《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合数术》等，介绍西方关于代数、三角、微积分、概论等方面知识。除此之外，还有《金石识别》、《地学浅释》、《地质学原理》等地质探矿方面的书籍。

李善兰、华衡芳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在促使中国进入近代数学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徐寿(1818—1884年),字雪邨,江苏无锡人。他和华衡芳等人曾在安庆内军械所制造过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后来他转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他最突出的贡献是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先进的近代化学知识,他和来华外国人合译了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方面的著作。如《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篇》、《化学鉴原补编》,分别介绍了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又如《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则是关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面的书籍,介绍了化学实验方法。从此,实验的方法的引入开始得到引用。徐寿还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西方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今天我国化学著作中所使用的绝大部分金属元素的名称,如钾、钠、钙、锌、镍等均为徐寿所命名。他对近代化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翻译过《物体遇热改易说》,这是物理化学初步知识的著作。1874年,徐寿与英国人傅兰雅等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徐寿亲自兼课,又聘请西人教化学、矿学,进行化学实验的演示,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曾起过先驱作用。

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年),字眷诚,广东南海人。1872年,12岁时,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当年赴美学习。188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回国后,任旗舰“扬武”号驾驶官,在马尾海战中,坚决还击法舰,英勇沉着,顽强战斗,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

精神。以后相继在福州船政局后学堂、广东博学馆、水陆师学堂任英文教员。直至 1888 年方始调往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作为分段工程师的助手，从事铁路建设工作。他到职后，仅用了 80 天就指挥完成塘津铁路的辅轨工程。1892 年詹天佑任总段工程师，督修从古冶到滦州的铁路工程。当时中国铁路公司把该线修建滦河大桥的工程全部包给了外国人，英、日、德等国工程师打桩均遭失败。詹天佑深入实际勘察调查，变更桥址，采用中国传统打桩法配合机械打桩，终于胜利打好桥基，完成滦河大桥的全部工程。由于成绩显著，1894 年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为会员。

1905 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局总工程师兼会办，负责修筑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全部工程，该铁路全长约 200 公里，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工程难度很大。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翻山越岭、精心测量，定点制图，最后确定了从丰台经西直门、清河、南口、居庸关、青龙桥到张家口的线路。帝国主义分子曾嘲笑说，中国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詹天佑团结其他工程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工程极其艰巨的南口至八达岭之间的关沟地段进行反复勘测，深入调查，最后决定开凿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个隧道。其中以居庸关、八达岭两隧道最为艰巨，他对居庸关隧道采用从两端向中点凿进的办法，即从隧道两端同时开工，向中点凿进。詹天佑经常与工人吃住在一起，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隧道工程中渗水、塌方等困难，终于胜利打通了居庸关隧道。八达岭附近山坡高大，詹天佑从青龙桥起利用折返线的办法，傍依山腰，设计出“人”字形线路，使

坡度不超过 3.3%，既减少隧道，又节省费用。他还使用两个机车一前一后同时推拉，后面机车先推列车前进，到交叉点再改为往上拉，原来前面的机车则改为后推，使列车爬上八达岭的顶巅。由于这些创造性的设计使全部工程提前了两年完成，京张路在 1909 年 10 月 2 日正式通车，并节余了 28 万元。京张铁路的建成，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提高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信心，为中国科技人员争得了荣誉，使外国再也不敢轻视中国科技人员。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此后，他一直为建设汉粤川铁路而努力，直到 1919 年逝世为止。

詹天佑十分重视对我国工程技术力量的培养。在他的教育下，我国最早的火车司机张美后来成为工程师。他还教育出不少的学生，为中国铁路工程作出卓绝的贡献。

詹天佑为祖国铁路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

四、飞机设计师冯如

冯如（1882—1912 年），字鼎三，广东恩平人。幼年家境贫苦，1895 年，随其表亲到美国做工。他不顾劳动的疲累，千方百计地利用时间学习英语和科学技术。后来又钻研机械制造，成为机械制造专家。1904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义愤。他认为要保卫祖国，飞机为“万不可缺之物”。从此，精心研究飞机制造技术。1907 年他向当地华侨倡议集资筹办飞机公司，在奥克兰租了一间厂房，试

制飞机，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于1908年制成了一架试验性飞机。1909年又制成一架在当时具有先进水平的飞机。9月21日，冯如驾驶自制飞机飞上蓝天，航程2640英尺，为飞机发明者美国莱特兄弟在1903年首次试飞的距离（852英尺）的3倍，成为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1910年6月，他又制成一架更先进的飞机，在奥克兰表演。正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参观后，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同年10月，国际飞行协会在旧金山举行飞行比赛大会，冯如驾驶改进了的自制飞机参加，以飞行距离30多公里，折算时速104公里，飞行高度达230公尺的成绩荣获第一名。在欧洲各报竞相报导这个消息之后，美国人想聘请他为技师制造飞机，但他一心报效祖国，拒绝了外国的重金聘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冯如带着两架自制飞机回国。他拒绝了清朝两广总督的收买。武昌起义后，冯如参加广东革命军，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他为陆军飞机长。他组成飞机侦察队，准备配合革命军作战。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郊区燕塘大操场举行飞机表演，不幸失事，伤重牺牲。年仅20岁。

冯如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爱国思想和在科学技术上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献精神，将永留人间。